汉语史与
中国古典文献学
研究丛书

杜甫学史

刘文刚 著

巴蜀书社
四川出版集团

汉语史与
中国古典文献学
研究丛书

四川大学“九八五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项目

ISBN 978-7-5531-0056-2
9 787553 100562 >
定价：32.00元

四川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项目

汉语史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丛书

杜甫学史

刘文刚 著

四川省社会科学项目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甫学史 / 刘文刚著.—成都：巴蜀书社，
2012.6
ISBN 978-7-5531-0056-2

Ⅰ.①杜… Ⅱ.①刘… Ⅲ.①杜甫（712~770）—人物研究 ②杜诗—诗歌研究 Ⅳ.①K825.6 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0876 号

杜甫学史

Du Fu Xue Shi

刘文刚 著

责任编辑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28）84122206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3.5
字　　数　32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056-2
定　　价　32.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绪 论

一

在历史的天空中，杜甫以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形象闪耀着绚烂的光辉。人品决定诗品，只有品格与精神伟大高尚的人，才能成为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的诗之所以长盛不衰，一直是文化中的热点，杜甫之所以始终受到人们的钦佩与尊敬，正是杜甫伟大品格与精神的巨大魅力使然。在古人心目中，杜甫是像孟子一样伟大的圣人，是万世师表。宋代黄彻说："东坡问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余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碧溪诗话》卷一）故而人们尊杜甫为诗圣。

自孔子创立儒学，战国时已欣欣向荣，迅速发展。汉代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老庄思想盛行，儒家思想入老庄思想而成为玄学。唐代重新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国家规定科举要考试儒家经典，组织著名学者注释儒家经典，以广其传。杜甫出生的时代，正是唐代儒学氛围最浓的时代。杜甫幼年就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儒家思想渐渐化为杜甫的思想，成年的杜甫的思想品德已经完全符合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杜甫已经是一位纯粹的儒。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杜甫天资醇厚，他怎么想就怎

么做，表里如一，言行如一。他的思想既然已经儒家思想化，他的行为也就完全符合儒家的行为规范。可以说，杜甫的言行和思想，完全符合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的规范，特别具有儒家所宣扬的仁爱。渔民捕食幼小的银鱼，杜甫坚决反对，认为那样太残忍，是暴殄天物。在夔州，邻居老妇扑枣，亲戚吴郎插篱拒之，杜甫劝导吴郎同情老妇，说那是贫困无食所致，要吴郎撤篱任老妇扑枣。虽是一些小事，却表现出杜甫的博爱精神和大仁思想。

杜甫少年时代就树立了远大的政治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个理想就是辅佐君王，把国家治理好。可以说杜甫少年时代就立志献身国家。他刻苦砥砺自己的政治才能，汲汲奔走求仕，以求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却没有得到机会。但他的爱国之心却愈益执著，愈益强烈。为了国家，他批评玄宗用武力开拓边境，大肆征兵，造成田园荒芜（《兵车行》：“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批评玄宗享乐腐化，横征暴敛（《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他抨击皇亲国戚邀宠弄权，气焰熏灼。他犯颜救房琯，认为国家用人之际不该贬大臣，自己却遭贬官。他研究军事，作诗为国献策献计，以抗击安史叛军。延安的芦子关是军事要塞，杜甫认为国家防守的兵力不够，如果被安史叛军攻破，对肃宗驻跸的灵武会产生严重威胁，认为应该火速派重兵严守不失，而作《塞芦子》云：“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乾元时，郭子仪等领兵围攻据守邺城的安庆绪，杜甫认为应该派兵直捣安史叛军的老巢，以求全胜，而不应只是围攻邺城。《观兵》写道：“莫守邺城下，斩鲸辽海波。”这些都表现出杜甫伟大的爱国精神和杰出的政治与军事才能。

杜甫精神的根本是爱国爱民。在杜甫心中，民与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杜甫爱国爱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忧”，就是忧国忧民。他忧国是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天宝时国家昌盛，一片太平景象，他已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对立，从官府的横征暴敛，预感到国家潜伏着巨大危机，社会将发生巨大变乱。“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那时，他对国家的前途已深感忧虑。他忧得广。国家很多重大问题，他都要忧。他忧怎样平息安史之乱，忧借兵回纥可能给国家产生的危害，忧吐蕃在西川边疆发生的骚扰与战事，难以一一细数。他忧得远。他忧很多将领借安史之乱拥兵自强，形成藩镇割据，忧安史之乱后不断对国家产生的严重后果。杜甫的忧国是看到国家现实存在和可能发生的危险，希望国家用政治智慧和力量化解并战胜危机，始终保持安定与强盛，这是最深挚的爱国。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甫对人民的爱与忧都是很深的。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杜甫深知人民是国家的基础，极为重要，但百姓的生存状况极为堪忧。杜甫注意到，就是太平盛世，百姓的境况也非常凄惨。百姓遭受横征暴敛，处于饥寒中，甚至冻馁而死。有的失业，没有生活来源；有的守边，艰难而又危险。这些在杜甫的诗中多有记载。在战乱中，百姓更是生活在危难与水深火热中。百姓惨遭杀戮，幸存者逃难而去，留在家乡的人要负担比平时更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血汗完全被榨干，过着非人的生活。杜甫所到之处，总是对百姓的悲惨境况表示深切的关注和极大的忧虑。三峡地区远离战乱的中心地带，而这里的百姓却与战乱中心地带的命运完全一样。“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战争和贫穷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夔州女子长年负薪，显得粗丑，四五十岁尚不能出

嫁，杜甫非常同情她们，认为完全是战争和贫困造成的悲剧。

杜甫的伟大之处更在于他能认识到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和富人的豪夺巧取是造成人民痛苦和不幸的主要根源，在爱国忧民的同时，对统治者和剥削者的残酷掠夺和压迫进行严厉的斥责和挞伐。他晚年在湖南作的《遣遇》写道："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这样恶劣的世道完全没有百姓的活路，实在令人悲愤！

杜甫始终憧憬一个美好的社会。这个社会清明、太平、淳朴、和谐。就是在战乱中，他也抱着这样的憧憬。说到底是希望国家能尽快平息战乱，让社会能够太平。轻徭役，薄赋税，使百姓能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他在诗中写道："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寄柏学士林居》）在赠朋友道州刺史裴虬的诗中说"上请减兵甲，下请安井田"（《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就是希望朋友在管辖范围内，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真正把杜甫的愿望落在实处。即使是一点点，也是很好的。

现实中的杜甫一生失意，困顿坎坷，可就精神而言，却是一位品德高尚、忠君爱国、忧世忧民的伟人，一位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完人。在封建社会由极盛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杜甫俨然成了儒家新的重要的代表人物，成了封建社会衰落时期儒家思想的领袖。杜甫的思想是儒家在封建社会衰落时期的思想，杜甫的言行是儒家思想在封建时期衰落的运用与表现。它有着封建社会衰落时期的鲜明特点。其特点有二。一、强烈的忧患意识。首先是忧得早。先天下之忧而忧，在太平之时已忧天下的动乱。其次是忧

得广。天下大事，似乎件件堪忧，似乎没有不令人忧的大事。再次是忧得深。其忧像大海一样深，像高山一样高。问题总像不能解决，而忧愁总是没有尽头。二、真诚的献身精神。忧世自然就想救世，而世已病入膏肓，自己没有回天之力，又不愿放弃救世，只有献身。在没有献身机会的情况下，就表达救世献身的愿望。杜甫漂泊成都时，大风吹破茅屋，雨脚如麻，家漏无干处。杜甫想到的是，天下屋漏的人很多。只要这些穷人有房子住，自己就是冻死，也心甘情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里表现出的是一种类似宗教献身的高尚的精神。在封建社会衰落时期，忧世和献身都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无法拯救封建社会的灭亡。但其对美好社会的追求、舍身的奉献，更显出精神的伟大、品格的高尚，显出圣人的风采。

二

文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作品。平庸的时代、混乱的时代，绝对不会产生伟大的作品。何谓伟大的时代？就是社会高度繁荣与发达的时代，就是社会大变革的纷繁复杂的时代。伟大的时代为作家提供了无比繁富精彩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造就作家无比广阔的胸怀，极大地激发作家的思想与激情，极大地激发作家的艺术才华。这样，伟大作品的产生也就成为必然。杜甫生活的时代，是唐帝国由极盛走向衰落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由极盛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正是这个封建社会大变革大转折的时代，把杜甫的诗集《杜工部集》成就为最伟大的诗歌。

《杜工部集》的内容极具特点。

它全面、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唐代开元至大历初期的社会。

唐代开元至大历初，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封建社会由极盛走向衰落的时代，安史之乱正是最重要的转折点。杜甫从自己的经历出发，以正义的思想，注入强烈的爱与恨，来表现当时的社会，表现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生活状况，表现时局的变化和发展。

作品所写的时代，大致可以划为三个时期。一、盛世时期，即开元天宝时期。二、安史之乱时期，从安史之乱的爆发至平定时期，即肃宗至德至代宗广德时期。三、后安史之乱时期，即代宗广德至大历五年杜甫去世。

开元时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国家富裕、强盛、祥和、繁荣，史家称为开元盛世。《忆昔二首》其二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但是，渐渐地，一切都在变化。唐玄宗贪图享乐，懒于政事，宠信权贵，弊政百出。官府横征暴敛，赋税徭役沉重，贫富严重对立。这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有深刻而全面的描写。虽然天宝时期表面依然是盛世，实际上充满尖锐的矛盾，充满巨变的危机。唐王朝就像处在一座平静的活火山上一样，随时都有爆发巨变的可能。

安史之乱突然爆发。叛军占领长安，"黄昏胡骑尘满城"(《哀江头》)。玄宗幸蜀，肃宗在灵武即位，组织抗击叛军。战争非常激烈，作品对平息安史之乱的全过程有细致的记载。官军在前期与叛军的战斗中，遭受惨败，陈陶战役、青坂战役、桃林战役都伤亡极重。后任用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收复都城长安，扭转战局。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又取相州，收邺城。官军节节

胜利，最后荡平幽燕，平息叛乱。

作品同时记录了处于战争状态的社会。烽火连天，尸骨遍野。“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遣兴》）“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山原丹。”（《垂老别》）战争地区，百姓惨遭杀戮，幸存者纷纷逃命，田园荒芜，村落残破。“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无家别》）在战区之外，百姓青壮年都被征兵，还要负担沉重的赋税。“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羌村三首》其三）

战乱破坏了国家的纲纪，破坏了社会的秩序，带给百姓的灾难是无穷无尽的。逃难离开家乡的百姓大量死于路途和他乡。御林军像土匪一样大肆掳掠杀戮，地方军阀发动叛乱，造反者也杀掉地方长官造反。《三绝句》写道：“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其一）“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其二）“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其三）对百姓来说，战乱时期的社会就是一座活地狱。

平息安史之乱，战乱却依然不断。这种战乱主要是地方藩镇之间的战争。在安史之乱中，各地很多主帅就拥兵自重，对中央阳奉阴违，形成地方藩镇势力。它是唐代军事制度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杜甫对政治非常敏感，早在安史之乱尚未平息之时，就担心地方军队主帅成为对抗中央的藩镇势力，危害国家。在听说河北诸道节度使入朝时，杜甫作诗云：“禄山作逆降天诛，更有思明亦已无。汹汹人寰犹不定，时时战斗欲何须？”（《承闻河北诸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其一）“不道诸侯无表来，茫茫庶事遣人猜。拥兵相学干戈锐，使者徒劳万里回。”（同上，

其四）“十二年来多战场，天威已息阵堂堂。神灵汉代中兴主，功业汾阳异姓王。”（同上，其一二）从诗看，杜甫确实对河北节度使入朝感到很欢欣，但对藩镇拥兵自重仍有担忧。事实上，拥兵自重的藩镇是很多的，而且有不断蔓延之势。藩镇拥兵自重是安史之乱以后，战争的主要根源，动乱的主要根源。藩镇拥兵自重没有停止，战乱就会继续。“战血流依旧，军声遂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杜甫这样感叹道。其实，藩镇割据表明唐王朝已无力实施封建集权统治，也表明封建社会开始衰微。

平息安史之乱，朝廷中兴，本应创造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轻税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让社会繁荣起来。但现实是，战乱还在延续，赋税依旧沉重。“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又呈吴郎》）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百姓难以生存，国家就难以生存。杜甫对国家的前程深深地忧虑。

在诗歌史上，还没有一部诗集如此真实生动地记录那样多的时代史实，如此大量而强烈地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倾注于自己生活的时代，如此鲜明而正确地展示社会未来的走向。

《杜工部集》另一大特点，就是大量作品组成了一部非常完善而精彩的自传。从自传的角度来看，其具有如下特色：

（一）真实、生动而完整地记录了杜甫自己的一生。记录了他一生的主要经历、重要事件，记录了家庭重要成员、日常生活，记录了重要的交游，记录了重要的所闻所见和自己的思想感情。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对他自己一生的全景观展示。

（二）作为自传，展示有重点。主要是展示安史之乱爆发后直至去世前夕其经历与生活。主要为陷贼与为官时期、避难秦陇时期、漂泊西南时期、留寓三峡时期和辗转湖湘时期。故自传的异乎寻常之处，在于记录战乱中的流寓漂泊生活。这样大量记录战乱漂泊流寓生活的诗集，是极为少见的。

（三）重要的作品在写自己时，往往都会写家事与国事。或者在写国事时，会写到家事与自己。就是说，杜甫重要的自传性的作品，很多都会写到国事，写到时局。表明杜甫的经历与生活与国家有密切的关系，与时局有密切的关系。这说明杜甫的自传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带有浓郁的时代色彩。

（四）重要作品在记录自己的经历和生活时，往往会披露自己的内心活动，表现自己的思想，抒发自己的感情。更值得注意的是，其披露内心活动细腻，表达的思想感情随自己的经历和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杜甫的作品在记录自己人生的经历时，也记录着自己的心路历程、思想与感情的轨迹。这是用自传性的作品对自己全方位的动态展示。

作品是最好的说明。为了全面印证我们的论述，我们选取了作于不同时期的四首诗，即作于秦中的《述怀》，作于成都的《恨别》，作于三峡的《返照》，作于岳阳的《登岳阳楼》。“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悯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牖。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嵚岑猛虎场，郁结回我首。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汉运初中兴，生平老耽酒。沉思欢会处，恐作穷独叟。”（《述怀》）“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楚王宫北正黄昏，白帝城西过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衰年肺病唯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不可久留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返照》）“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

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读完这四首诗，杜甫饱受战乱之苦，长期漂泊而忧国忧民的形象已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自传性的文学，归根结底是要创造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作者自身的艺术形象。《杜工部集》所以伟大，主要在于创造了在战乱漂泊的艰难困苦中，始终保持着高尚的品格，始终怀着热烈的爱国爱民赤诚的杜甫形象。这个形象有些平凡，也是无比伟大的！

文学源于生活，没有现实中平凡而伟大的杜甫，也就没有诗中平凡而伟大的杜甫。现实中的杜甫，史籍保留的史料并不多。流传的杜甫形象，就是杜甫诗所塑造的自传形象。正是诗塑造的自传形象，使现实中的杜甫光彩照人，得以永生。如果不是诗的塑造与展示，现实的杜甫形象不过是粗线条的勾勒，在历史的风雨中已有些褪色，绝不会如此鲜明，如此生动，如此有魅力。

杜甫广泛而生动地描绘自己所经历的客观世界。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杜甫非常留意身边的环境，也关注遥远的天地，都以满腔热情加以表现。他描绘乡村与城镇，描绘人文景观，描绘田园风光和大自然。他歌咏它们的美（有时也描绘自然的丑恶），也借它们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杜甫歌咏阆中和它的山水。《阆水歌》：“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怜日破浪花出，更复春从沙际归。巴童荡桨欹侧过，水鸟衔鱼来去飞。阆中胜事可肠断，阆州城南天下稀。”阆中的盛事令人断肠，山水又是那样的美，真是人间仙境。杜甫描绘春天的夜雨。《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雨贵如油，及时的春雨滋润万物，给人间增添新的美，也带给人新的喜悦。杜甫写夕阳的反照。《反照》：“反照开巫峡，

寒空半有无。已低鱼腹暗，不尽白盐孤。荻岸如秋水，松门似画图。牛羊识僮仆，既夕应传呼。”晚照无限好，照着壮丽的三峡，照着牧人和牛羊，构成一幅美妙的画图。杜甫歌唱天空的银河。《天河》：“常时任显晦，秋至转分明。纵被浮云掩，犹能永夜清。含星动双阙，伴月落边城。牛女年年渡，何曾风浪生。”秋天的银河格外美丽，牛郎织女的传说更为银河增添了神秘。依北斗望京华，诗人处边远之地，隐隐有京城恋君之思。

人与世界的万物都有联系。古人有天人感应之说，其实人与万物皆有感应。杜甫在他的诗里大量写景、咏物，表现他对环境的关注，对大自然的关注，表现出他比一般人更博大的胸怀，也表现出他比一般作家更高超、更笃实的艺术才华。

杜甫诗的最大特点，是内容的无比丰富。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可以说他把自己从记事到逝世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一切，皆写在自己的作品中。他又博学多通，非常聪明，故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涵盖了世界所有的一切和所可能有的一切。总的说来，杜甫的作品写了如下内容：人（包括杜甫自己）和社会的一切。既有人文的一切，如乡村、城市、景观、田园，也有大自然的一切。李商隐对杜甫诗的内容的概括是“三才万象共端倪”（《漫成五章》其二，见《李义山诗集》卷五）。所谓“三才”，就是天、地、人。所谓万象，就是万事万物。什么是世界？就是三才加万象。所以，李商隐的诗就是赞美杜甫的诗描绘了整个世界，包罗万象，无所不有。

文学作品的重要功能是认知作用，杜甫的诗最大限度地表现世界，最大限度地去认知世界，这已足以彰显杜诗的高超卓越。

诗言志，杜甫在描绘自己的经历与生活，在描绘复杂的社会和广阔的世界的时候，也描绘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抒发了他的思想感情。他的作品表现了拳拳的忠君爱国思想、炽烈的忧世忧

民的情怀，表现了鲜明的正义感、弥满天地的对万类博大的爱。这样的思想感情是非常伟大的。正因为如此，在封建社会，杜甫诗集被视同经书。清人龚鼎孳说：“诗之有少陵，犹文之有六经也。”“文无奇正，必始乎经。诗无平险，必宗乎杜。此少陵之诗与六经之文，并不朽于天地之间。”（《杜诗论文序》，吴见思《杜诗论文》）这是封建社会对杜甫诗所做的最高评价，其诗是当得起这样的评价的。

三

《杜工部集》是中华文化的神奇瑰宝，是巨大的精神财富。但一般人仅仅以文学的价值观来看待它，便忽略了它巨大的非文学的价值。读《杜工部集》，应该树立新的阅读和评价理念与体系。首先，应该把杜甫集放在整个民族精神与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来阅读和研究。其次，在把杜甫集作为文学作品阅读的同时，也要把它作为思想著作和历史著作来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杜甫集的精髓与价值。

杜甫的作品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具有永久的精神价值。

从精神角度看，杜甫集所表现的思想和言行都是完全儒家化的，完全体现了民族精神。但又有着与传统的儒家经典不同的特点。（一）和传统的儒家思想理论不同，杜甫作品所表现的是儒家思想的实践，所记录的是一位现实中完全践行儒家思想的醇儒的思想与言行。（二）杜甫生活在封建社会由盛变衰的转折时期，其思想与精神有着新的特点，这就是忧世的特点，也就是忧国忧民的特点。杜甫的这种忧世的思想与精神，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即衰落时期的代表。正因为此，杜甫集赢得了后世普遍的热爱与敬重。人们不是把它当做一般的文学作品来读，而是当做思想与行

为的指南。在宋代，一些人就把杜甫集视同经书，直到清代，这种观点一直流行不衰。

所谓经书，就是人们思想与言行的最高指导之书。实际上是指孔子的著作（包括孔子整理的著作）和直接相关的重要著作。明白地说，就是所谓十三经（《孟子》实际上是南宋后才称经书的）。称杜甫集为经书，是对杜甫的最高尊重与推崇，因为在封建社会，没有任何著作能有经书的地位。在上古，德与才特别卓越的，皆可称圣人。自汉代以后，渐渐地只有孔子才能称圣人（孟子在宋代也称圣人，所谓“亚圣”）。称杜甫集为经书似乎对孔子和经书有些唐突，故而说杜甫集为经书时总有点闪烁其辞，所以我们也退一步说古人将杜甫集视同经书。其实意思是一样的，视同经书与作为经书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花这么多篇幅是为了说明，杜甫集所表现的思想和精神，在封建社会后期有极高的代表性，是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体现与发展。不仅如此，杜甫集所表现的思想与精神，并非局限于儒家的思想，而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与精神。要继承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学习杜甫集，学习杜甫的思想与精神，把握住了精髓无疑会取得非常良好的效果。

杜甫的作品记录了盛唐至中唐前期的大量史实，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古代的诗大多以抒情为主，较少记录史实，因而一般的诗较少具体的文献价值（从理论上说，文学作品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或多或少都有文献价值）。文学本是创作，较少文献价值是正常的。杜甫的诗则不同，它大量记载当时的史实，像一部历史。所以早在唐代就认为杜甫的诗是“诗史”。孟棨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本事诗·高逸》）称杜甫诗为诗史，认为它有

重要的文献价值，在古代可以说是一种共识。而现代学者囿于文学多是虚构的常识，多不重视杜甫诗歌的重要文献价值。但是，如果不重视杜诗的文献价值，会使杜甫诗的利用价值大大降低，也会影响我们对杜诗的定位与评价。

就文献而言，杜甫诗集也非常有特点。（一）高度真实可靠。杜甫作品所记，皆是自己亲身经历，耳闻目见，是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个别记载，如战争进程，杜甫在西南所记，与中原真正发生的，有时略有出入，传闻如此，在所难免，但它反映的也是传闻的真实。高度的真实奠定了杜甫作品的文献价值的坚实基础。（二）杜甫作品所记的一些史实，为唐代史籍所未记，非常珍贵。如《三绝句》所写三件事（开州杀刺史、殿前侍卫抢夺百姓、入蜀流民大量死亡），史书均无具体记载。《有感五首》所记也是时代的大事，也可以补国史所未逮。杜甫诗集中像这样独创性的记载还比较多，这就使得它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三）杜甫诗集中所记杜甫本人和家庭在安史之乱中的经历，也是研究当时社会的重要资料。在盛唐和中唐时期，可以说还没有比杜甫本人和家庭更完整的资料保存下来，故而弥足珍贵。（四）杜甫诗集既不同于正史，也不同于一般野史，它的文献特点是通过记录一些政治军事的大事和一些百姓的具体情况，来反映时局的动向与发展。有时所记的史实非常具体，非常细小，却是关乎当时社会的热点和重要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五）杜甫诗集在记录史实时，也记录了杜甫的观点以及杜甫对史实的解读。杜甫的观点和对史实的解读，其实也是一种资料，也是一家之言，对我们研究文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宏观看，读杜甫诗集，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大量史料，而且还可以对杜甫诗集所记的那个时代有更完整清晰的看法与印象。这种看法与印象往往与读正史与野史所得到的不同，其间杜甫的观点和对史实的解读无疑也在起作

用，杜甫的观点和对史实的解读无疑也有不可忽视的文献价值。

杜甫的作品表现出极高的美，是诗歌艺术的瑰宝。

要论述杜甫诗的艺术，是极为困难的，因为它几乎融合了古典艺术的一切长处、一切风格，达到了古典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形成了一种五味调和、包罗万象的艺术风格。

杜甫是一位大巧若拙的伟大天才，把艺术的继承和创新都发挥到极致。他所走的艺术创作道路，就是《诗经·大序》所指的“六艺”的道路，即“赋比兴风雅颂”的道路。但他走出了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路子，这就是用叙述、议论、抒情，来写己事、家事、国事。其创作模式大致是这样，选取一个话题（题材），叙述事实，融入有关知识（现实的和历史的），发表议论，抒发感情。古代的诗大多是抒情，杜甫的诗是以叙述为诗，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以散文为诗，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具有最鲜明的风格。

杜甫诗的艺术技巧最为繁富。苏轼认为杜甫是集诗歌艺术之大成的伟大诗人，他运用了诗歌艺术的一切技巧，创造了最优异的诗歌。分析杜甫诗歌艺术技巧的构成来源，大致有三部分：其一，吸收前人一切诗歌创作艺术方法，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其二，将散文（一切散文，包括赋与箴、铭、赞、颂体散文）和其他艺术（书画等）的表现方法，引入诗歌创作中；其三，根据作品的内容，随心所欲地创造方法。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三类创作方法，几乎涵盖了一切诗歌创作方法。事实上，杜甫诗的内容是包罗万象的，他只有用包罗万象的艺术才能加以表达。其艺术技巧最丰富，实在也是一种必然。

杜甫是苦吟诗人，创作呕心沥血。“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道出了杜甫对艺术至善境界的追求。杜甫不像李白那样才思如泉涌，倚马立尽万言，

他是用丰富的技巧，生动贴切地表现丰富的内容，需要反复琢磨，艰辛创作。杜甫是最会琢磨的诗人，反复琢磨，寻求最能表现诗的最丰富的、最完美的技巧，达到自然天成的境地。这样创作的诗，艺术品位最高。变化无穷的技巧，使诗绚烂而辉煌，技巧的巧妙融和，仿佛调鼎而滋味无穷。杜甫这样投入地创作，使人既能感受艺术的天然之美，也能品味艺术雕琢的精湛之美、巧夺天工之美。

杜甫的诗兼备众体，很难把它归于一种一般意义的风格。但它又有鲜明的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最有风格。杜诗的风格可以说是宏大工丽，浑融深沉，繁富曲折，峻拔凝重。如果用古人（包括杜甫自己）的评论，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沉郁顿挫，浑涵汪茫。“沉郁顿挫”本是杜甫在上玄宗的《三大礼赋》中对自己文章（包括诗）的评论。评论至当，但不够完善。“浑涵汪茫”是《新唐书·文艺传上·杜甫传赞》对杜诗的评论中的话。我们认为二者结合，最能全面而准确地概括杜甫诗的风格。

杜甫集是杜甫留下的宝贵遗产，对我们今天的创作有非常积极的作用。首先，它是一个艺术宝库，我们可以从中学习非常多的艺术创作方法与艺术技巧。其次，它可以启发我们建立正确的创作理念。这就是，艺术创作应该打破一切框框，不受任何约束，只要是表现正确内容需要的，一切艺术创作方法和技巧都可以运用。世上没有而又需要，就要大胆创造。

四

所谓杜甫学，就是有关杜甫的学问。杜甫学的概念出现得非常早，金元时的元好问就将其所编东岩（当为其父）和元好问师友讲论杜甫的资料命名为“杜甫学”。我们所说的杜甫学，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杜甫的作品，即有关杜甫和杜甫集的材

料。如有关杜甫的生平资料，有关杜甫集的版本资料，有关杜甫的诗文。其二，有关杜甫的研究和评论，相关的一切资料。杜甫学的概念是极宽泛的，可以说凡是与杜甫有关的，皆属于杜甫学的范围之内。

在古代众多的学术领域中，杜甫学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领域。参与的研究者非常多。杜甫作品的阅读者极其广泛，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发表自己的阅读心得，谈自己的研究体会。其中一些人更是穷一生的主要精力来研究杜甫。用十多年、二十多年时间来研究杜甫的学者很多。杜甫学从杜甫身后不久即开始热，至清代一直持续不断。期间，热度虽有高低之分，但始终没有完全冷却。

杜甫学是一个有着鲜明特色的学术领域。以思想和艺术研究为主，涉及众多的研究领域。杜甫学是围绕杜甫和杜甫集展开的，而古代看待人又特别重视思想品德，而思想品德的研究又必然牵涉统治思想——儒家思想，故杜甫学中，思想的研究占最重要的位置。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阅读和创作诗歌是民族的传统。杜甫是最伟大的诗人，研究其诗歌艺术，自然也是杜甫学的重要内容。由于杜甫和杜甫集的话题极广，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故杜甫学也要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研究，几乎可以说涉及古代一切学科领域。

古人多用研究经学的方法来研究杜甫的诗。儒家经书是封建社会的最高经典，是人民思想行为的指南。因而，研究经学形成了一套较一般学术研究更高深、更严密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既然高深严密，就需要长篇文字才能谈清楚。简言之，首先，就是要对经书烂熟于心，要对经书的内容融会贯通。其次，对经书逐字逐句进行研究，对应注释的字句进行注释，准确解释句子的内容。第三，阐释经书的微言大义，解说经书的思想与主旨。在宋代，有的学者就提出用治经的方法来治杜诗。事实上，宋代和宋

以后的学者正是用研究经学的方法来研究杜诗的。学者倡导用治经的方法治杜诗，表明学者对杜诗非常重视，把杜诗当经书一样看待（视同经书），倡导下大力气，用最好的研究方法，把杜诗研究透彻。而实际上也的确如此，杜甫学是古代集部研究最深透的领域之一，也是整个古代学术研究非常深透的领域。

杜甫学的研究方法颇多创新。杜甫学是非常受学术界重视的热门领域，众多的学者都使出浑身解数，力求取得较大的成就。学者总是采用自己时代的先进研究理念与方法，并冥思苦索以创造新的方法，以求超越前人，登上新的高峰。因此，就整个学术领域而言，杜甫学领域都是一个最活跃的领域，最具创新性的领域。别的不说，研究方法创新也是一般学术领域所不能比拟的。杜甫学领域创造了很多崭新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表达方式（即著作样式），最重要的有三种。这三种中有的是与其他当时最活跃的学术领域共同创造的。其一，年谱形式。所谓年谱，就是把作家（谱主）的生平事迹和创作成果，以表谱的形式，按时间（年月）先后顺序排列。这样有助于读者了解和研究作家生平、作家创作，研究生平与创作的关系。正是北宋吕大防在杜甫和韩愈的研究中发明了年谱这种形式，作了《杜工部年谱》，同时还作了《韩愈年谱》。杜甫和韩愈研究是宋代最热门的领域，说明学术研究重大方法的创新只能在时代最热门的领域进行。其后，年谱这种形式在杜甫研究中不断发展与完善，体例更趋繁富，更趋缜密。年谱的形式发明后，被学术界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的人物研究，甚至加以发展，加以改造，运用于非人物的一些研究。年谱的形式非常有生命力，至今仍然是人物生平研究的常用方法、人物研究成果的常用表达样式。其二，评点形式。所谓评点，又称批点。对文章加以评论，加以圈点。其评论多短小精悍，自由活泼，有些带有即兴与灵感的色彩。评点是南宋道学家为评论古文

发明的。宋代刘辰翁将其广泛用于唐代诗人的诗集的研究和评论中。他评点了杜甫诗集、王维集和李贺集。刘辰翁评点的杜工部集在元代出版后，评点这种形式迅速在杜甫研究中流行，同时迅速扩展至其他学术领域。刘辰翁对评点这种评论形式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对其传播的作用也非常巨大。在明清，评点成为一种风尚，运用非常广泛。至今仍为人们所运用，所喜闻乐见。其三，详注形式。这里所谓详注形式，主要是指文学作品的详注形式。它是一种基本的体例，也可以成为模式。这种详注的形式是由宋代赵次公在杜甫研究中作《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和蔡梦弼作《草堂诗笺》初步形成的，后不断发展，至清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而定型完善，臻于细密。详注的基本模式如下：（一）文献研究。包括前人的研究和详注者新的研究。①校勘。②注。注一般读者难以理解的典故、典章制度、人名、地名、语典等。③作品的时代背景，作品系年。④阐释。阐释作者文意。（二）作品研究。包括前人的研究和详注者新的研究。①作品的内容和作家相关思想。②作品的艺术研究。③有时论述作品的地位与影响。（三）辑录。①在一篇诗之后辑录前人的有关评论。②在书前或书后辑录有关作者和著作的有关资料或评论。这种详注的特点，是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把前人研究的精华和杜甫最重要的原始材料呈现给读者，同时又把详注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它用集成和创新的方式，为读者提供了当时最好、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一种非常好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表达方式。详注这种模式为清代中后期和现代广泛运用。

杜甫学与现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学术都与现实有关系，但像杜甫学这样密切的却不多。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杜甫和杜诗与现实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杜甫学与现实关系非常密

切，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研究杜甫和杜诗，必须研究唐代相关的社会与生活，否则便无法深入研究。杜甫和杜诗最大的特点就是关心社会与生活，表现社会与生活。研究杜甫和杜诗，如果不研究唐代社会与生活，就无法把握杜甫学的脉搏，就无法深入到杜甫学的核心。整个研究无论多下工夫，都如隔靴搔痒，雾里看花，不会取得实质性的成绩。因此，杜甫学始终贯穿着对唐代相关社会的研究，贯穿着对唐代相关社会生活与杜甫、杜诗关系的研究。

（二）杜甫和杜诗的研究，与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现实有密切的关系。有些研究者正是有感于自己所处的时代与杜甫时代相似，都是动乱时代，而从事杜甫研究。有的是已经从事杜甫研究，社会发生动乱，更感到杜甫研究意义重大。有的研究者则是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需要杜甫的精神而从事杜甫研究。总之，很多杜甫学者研究的动因都是杜甫所处的时代与杜诗所表现的内容和他们的时代有着某种相似或相关，而进行研究的。在研究中，一些杜甫学者更是将杜甫与杜甫所处的社会和学者自己所处的社会进行对比，发表自己的见解，抒发自己的思想与感慨。更有甚者，借杜言志，表现自己的爱国情怀。或者用杜甫浇自己心中的块垒，抨击社会的弊病，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郁闷。或者绵里藏针，或者含沙射影，表面看其研究与研究者所处时代无关，实际暗中抨击现实社会的丑恶与弊病。

（三）更突出的是，杜甫学对现实的文学创作和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学术对人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而杜甫学对人的影响很多时候是直接的。特别是在文学方面，很多人对杜甫诗的阅读和研究，就是从现实出发的，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创作与理论。杜甫学与现实中文学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杜甫影响很多文人的思想，这种影响又通过文人的思想折

射出来，表现在文人的生活和创作的方方面面。（二）很多著名的文学理论，都是总结杜甫的创作成就而加以升华，融入其他理论成分，再提出来的。如黄庭坚主张作诗要无一字无来处，翁方纲主张肌理，都是明显的例证。（三）在杜甫的影响下产生重大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流派。唐代白居易与元稹领导的新乐府运动，明显地受到杜甫的影响。宋代的江西诗派，更是在普遍学杜风气中产生的著名的文学流派，这个诗派就是以杜甫为宗祖。（四）杜甫广泛影响他之后的诗人的创作，可以说是创作的一切方面。影响自然有大小之分，强弱之分，但杜甫几乎影响到一切文人，包括那些批评杜甫的和标榜未受杜甫影响的。

热门的学术领域自然成绩斐然。在宋代就有千家注杜之说，流传至今的尚有黄希黄鹤补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诗》。经过研究，人们认为“千家”并非实指，不过言其多而已，其实注家不过151家而已。针对具体著作，说“千家”固然是夸张，但要真的探究起来，凡是有论说或注解的人（包括只有单篇论文的人）都算一家的话，说宋代有千家杜甫学者，完全符合实际。由此推算估计，明代和清代的杜甫学者，各自都在千人左右，清代似乎更多。这是何等宏大而浩荡的队伍！他们的著作自然也是非常宏丰的。据学者研究，整个杜甫学的著作有七八百种之多，现存著作两百余种（见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前言》）。这个数字，是1986年的估计。这二十余年，杜甫学的著作又飞跃增长，估计现在整个杜甫学的著作数量已直逼1000种。这是一个何等巨大的数目！这说明杜甫学领域确实是一个研究非常广泛而深入的领域。而通过对成果的考察，我们感到杜甫学领域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研究还大有可为。

在古代，杜甫学领域始终站在思想意识领域和学术领域的前沿，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对思想意识领域和学术领域产生重要的

影响。在今天，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杜甫学已有新的定位，但它仍然是传统文化中的热门领域，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具有巨大的魅力。

五

历史是事物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发展演变的过程。我们的杜甫学史主要研究古代杜甫学的成就与特点，研究杜甫学的发展与演化，研究杜甫学与社会的关系，即社会对杜甫学的影响和杜甫学对社会的影响。

一种学术有其自身发展的轨迹与规律。但任何一种学术都是时代的产物，学术总是随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故而一种学术的成就与特点、发展与演化是这种学术的发力与时代、社会给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一种学术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往往会出现不同的面貌、不同的特点。所以，研究学术史，以时代来分段进行研究无疑是一种好方法。这是一种流行方法，要玩新花样，效果恐怕不如这种方法好。特别像杜甫学史这样与时代、社会关系尤为密切的学史。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将杜甫学发展的历程按时代、社会分为四个时期，也将《杜甫学史》分为四章：第一章唐五代；第二章宋辽金元；第三章明；第四章清。

现对杜甫学发展的四个时期做最概括的论述。唐五代是创建时期。出版了杜甫集，记录杜甫生平最重要的材料。对杜甫进行宏观研究，确立了杜甫在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地位。这个时期又称奠基时期。宋辽金元时期是杜甫学的辉煌时期。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研究杜甫和杜诗，注释和考证成就非常大，论述也有很多精彩。这个时期又称卓越期。明时期是杜甫学的流变时期。学者在宋人的成就之外寻求创新，开展“以杜证杜”（即用杜诗说明杜诗）、大量选杜诗研究。其注释和考证的成果不如宋人，但

论说的高度则超过宋人。这个时期又称变化时期。清时期是杜甫学的总成时期。清代在宋代和明代杜甫学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发展，把杜甫学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境界。这个时期又称杜甫学的巅峰时期。

事物的运动总是波浪起伏。统观古代的杜甫学历史，一共出现三次高潮。第一高潮，中唐至晚唐，即德宗时代至宣宗时代。第二高潮，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即北宋真宗时代至南宋理宗时代。第三高潮，明万历（后期）时代至清嘉庆时代。这一高潮又可分为前期（即明代）和后期（即清代）两部分。我们所以把它们算作一个高潮，是因为前期高潮是明代，后期高潮是清代，它们完全连在一起，没有明显的界限，其间的很多著名杜甫学者和著作都横跨明清两个时代，殊难划分，且划分后也不便于研究。杜甫学的高潮，有如下特点：（一）学术兴盛的时期一般是社会太平时期，而杜甫学却在明末动乱时期产生第三个高潮，可谓与众不同。这种现象的产生和杜甫学本身有很大关系。杜甫本身就生活在乱世，他的景况引起乱世学者的共鸣，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是很自然的。（二）学术的发展是需要潮流的推动的，我们惊讶地发现，几乎杜甫学的所有重要学者，几乎杜甫学的所有重要著作，都产生于三个高潮时期。没有杜甫学的高潮，就没有杜甫学的辉煌。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杜甫学的高潮，杜甫学简直就不成其为杜甫学。（三）唐、宋、明、清四个时代，每个时代都有杜甫学的高潮（明代为第三高潮前期；清代为第三高潮后期），说明杜甫学的发展是均衡的。每个时代都有重要的杜甫学者和著作，说明每个时代都有创新与成就。（四）杜甫学的高潮，无论是从时间持续的长度还是从成就的高度来考察，都是一浪高过一浪，后一个高潮胜过前一个高潮。这说明杜甫学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说明杜甫学仍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如前所述，杜甫学是一个研究范围极其宽广的学术领域，几乎涉及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和一些自然科学领域，而我们的杜甫学史虽然也要反映杜甫学的宽广特点，但我们更愿意抓住杜甫学发展的主线，来勾画杜甫学发展的基本风貌与主要精神，避免平均用力，过于宽泛，濩落不当。《杜甫学史》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杜甫其人研究史：杜甫生平研究；杜甫思想精神研究；杜甫生活研究；杜甫创作历程研究。（二）杜甫集文献研究史：杜甫集的编纂、版本、目录、校勘；杜甫作品注；杜甫作品的阐释；杜甫作品系年。（三）杜甫集的内容研究史：杜甫作品反映的现实；杜甫作品表现的思想感情；杜甫作品内容的意义。（四）杜甫集的艺术研究史：杜甫作品的艺术方法；杜甫集的艺术风格；杜甫艺术创作历程。（五）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研究：继承与创新；贡献与地位；传承与影响。这是我们的研究思路。我们把它提供给读者，是为了读者更好地了解本书的内容。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唐五代 …………………………………………………（1）
　一　唐概说 ……………………………………………………（1）
　二　任华 ………………………………………………………（7）
　三　樊晃 ………………………………………………………（9）
　四　韩愈 ………………………………………………………（10）
　五　白居易 ……………………………………………………（14）
　六　元稹 ………………………………………………………（16）
　七　杜牧 ………………………………………………………（21）
　八　李商隐 ……………………………………………………（23）
　九　五代概说 …………………………………………………（24）
　一〇　孟棨 ……………………………………………………（27）
　一一　刘昫与《旧唐书》 ……………………………………（28）

第二章　宋辽金元 ………………………………………………（32）
　一　宋概说 ……………………………………………………（32）
　二　王洙 ………………………………………………………（71）
　三　宋祁和《新唐书》 ………………………………………（77）

四　王安石 …………………………………… (80)
五　吕大防 …………………………………… (82)
六　苏轼 ……………………………………… (86)
七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 (94)
八　秦观 ……………………………………… (103)
九　鲁訔 ……………………………………… (104)
一〇　赵次公 ………………………………… (111)
一一　郭知达 ………………………………… (123)
一二　黄希、黄鹤 …………………………… (133)
一三　蔡梦弼 ………………………………… (139)
一四　刘克庄 ………………………………… (149)
一五　刘辰翁 ………………………………… (155)
一六　文天祥 ………………………………… (163)
一七　辽金元概说 …………………………… (168)
一八　元好问 ………………………………… (171)

第三章　明 …………………………………… (174)
一　明概说 …………………………………… (174)
二　单复 ……………………………………… (188)
三　邵宝 ……………………………………… (195)
四　杨慎 ……………………………………… (200)
五　唐元竑 …………………………………… (209)
六　王嗣奭 …………………………………… (218)
七　胡震亨 …………………………………… (230)

第四章　清 …………………………………… (240)
一　清概说 …………………………………… (240)

二　钱谦益 …………………………………………………（261）
三　卢世漼 …………………………………………………（276）
四　朱鹤龄 …………………………………………………（285）
五　金人瑞 …………………………………………………（295）
六　卢元昌 …………………………………………………（304）
七　张溍 ……………………………………………………（312）
八　吴见思 …………………………………………………（328）
九　仇兆鳌 …………………………………………………（336）
一〇　王士禛 ………………………………………………（348）
一一　浦起龙 ………………………………………………（359）
一二　杨伦 …………………………………………………（372）
一三　翁方纲 ………………………………………………（378）
一四　潘德舆 ………………………………………………（388）

后　记 ……………………………………………………（401）

第一章
唐五代

一　唐概说

一

唐朝自开国，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至开元时期，政治清明，经济高度发达，文化百花齐放，国力强大，社会富实繁荣，生机勃勃，史家艳称为“开元盛世”。随着统治者的日益享乐腐化，重用奸佞，政治混乱，在富庶太平的外表下，已经潜藏着巨大的危机。朝廷在军事上重用胡人为藩镇，更埋藏着致乱的祸根。天宝十四载，爆发了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安史叛军攻占了首都长安和广大地区。经过数年的战争，安史之乱才平息，而局部的战争仍然在延续。战乱重创了唐王朝，虽然中唐有元和中兴、会昌中兴，但很短暂，力度也弱，唐王朝已无法再现昔日的辉煌。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百姓沉重的负担，使王朝日益衰落。最终，唐王朝在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灭亡。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安史之乱实际上是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杜甫正是生活并创作在封建社会由极盛而大衰的盛唐至中唐时期，杜甫学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与发展的。我们只有站在封建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才能透彻解读杜甫和他的作品，才能透彻解读杜甫学。

二

唐代是杜甫生活的时代，是杜甫学初始的时期，也可以称作基础时期。

唐代的杜甫学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杜甫生前时期。

伟大文人的文章能流传万载，必定生前已名震天下。杜甫的诗在当时已有巨大影响，杜甫又与当时众多的著名文人如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等交往唱和，在当时文坛有重要地位，杜甫学在杜甫生前就已经发端，当时即有大名。李肇载“开元曰……位卑而著名者”（《唐国史补》卷下）即有“杜工部”杜甫。严武说：“也知光禄最能诗。”（《巴岭答杜二见忆》）韦迢说：“大名诗独步。”（《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任华的研究最为重要，他这样描述杜甫在当时诗坛的地位：“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杂言寄杜拾遗》，见《右玄集》上）他评论杜诗的风格和历史地位道：“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波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同上）对杜诗宏伟磅礴、浑涵汪茫的诗风有准确的把握，认为杜甫的成就远远超过前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人们已经将杜诗称为“诗史”。孟棨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

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本事诗·高逸》）所谓“当时”，按常理应该是指杜甫在世之时，或逝世不久的一段时间，故我们将此说放在这一时期。这里所谓的“诗史”，按孟棨的记载，有两层含义：其一，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和杜甫自己的经历，这就是“毕陈于诗”；其二，表现了杜甫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忧国忧民的情怀，这就是“推见至隐”。换一个角度说，所谓“诗史”，就是杜甫用诗全面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社会，记载了自己的经历与生活、思想与感情。这样来评价杜甫是非常准确、精彩的。这也说明当时的人对杜甫和杜诗的研究非常深刻，也反映出杜甫在当时诗坛的地位非常崇高。杜诗为“诗史”之说，经孟棨记载，遂一直为人们所沿用，是杜甫学史上最经典的话语之一。

第二时期为中唐时期。

准确地说，是杜甫逝世后的中唐时期。这是杜甫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杜甫学史上第一个高峰时期。重要的杜甫学者有韩愈、元稹、白居易、樊晃、刘禹锡。

这个时期的杜甫学主要是有四大成就。

（一）编辑杜甫文集和杜甫小集。

杜甫文集为六十卷。从樊晃记载“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杜工部小集序》，见钱谦益注《杜工部集》附录）看，又从郭受“新诗海内流传困”（《杜元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见《杜工部集》卷一八）推知杜甫在湖湘时尚未有文集流传，杜甫文集的编纂当在杜甫逝世后的40年内。杜甫之子宗文、宗武能文，杜甫文集当时是由他二人编成的，我们推测杜甫集编成的大致时间当在杜甫逝世后20年内。这时编成的杜甫文集是一切杜甫集的始祖。杜甫以文鸣世，杜甫文集的问世对于确立他在文坛的地位至关重要。从杜甫学的角度说，他为杜甫学提供了最重要

的资料。

在杜甫文集问世后，樊晃在未能见到的情况下，搜集杜甫作品 290 篇，编成《杜工部小集》。作序说："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为六卷，且行于江左。"樊晃编《杜工部小集》，表现了当时的人对杜诗的热爱，而到宋代它又成为人们重新编杜甫集的重要资料。

（二）确立了杜甫伟大诗人的地位。

韩愈是中唐文坛的领袖，他认为杜甫是和李白齐名的伟大作家。"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对杜甫与李白在文坛的定位最高，也最准确。韩愈还对杜甫与李白的诗歌艺术进行了形象化的论述："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调张籍》）元稹在高度评价杜甫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后，推崇杜甫是古今第一诗人。他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稹的评论作于墓志铭中，真可谓盖棺定论。实际上，杜甫逝世后，社会已经安定，历史需要对杜甫进行评价和定位。韩愈和元稹站在历史高度对杜甫的评价和定位代表了社会的公论，因而也代表了历史对杜甫所作的评价。盛唐诗是我国古代诗歌的顶峰，韩愈和元稹对杜甫诗歌的评论和定位，尽管是中唐作的，但中唐的诗歌成就没有高过盛唐的，他们的评论即便在后世来看，文字也一直是正确的，遂成为经典。自然，元稹将杜甫评为最伟大的诗人和韩愈将李杜并称，其间是有区别的。后世或宗元或宗韩，也产生了杜甫是最伟大诗人和李杜并称的区别，也产生了关于二者定位之间的争论。

（三）将杜诗的研究心得，运用于创作之中。

白居易、元稹和李绅等为了更好地使诗歌为政治服务，准备大量写作反映民间疾苦和社会弊端的诗，以引起朝廷的关注，促使朝廷改革弊政，关心民间疾苦，促进社会的中兴与繁荣。于是他们发动了新乐府运动。怎么进行新乐府的创作？杜甫的创作对他们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陈寅恪说："二公（今按：指白居易和元稹）新乐府之作，乃以古昔采诗观风之传统理论为抽象之鹄的，而以唐代杜甫即事命题之乐府，如《兵车行》者，为其具体之楷模，固可推见也。"（《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其实，杜甫对新乐府运动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新乐府运动首先是学习杜甫的忧国忧民精神，学习杜甫的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包括使用生活的语言。元稹说："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酬孝（一作李）甫见赠十首》其二，《元氏长庆集》卷一八）其次，是学习杜甫表现现实的诗歌形式与技巧。元稹说："近世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乐府古题序》，《元白长庆集》卷三〇）第三，是学习杜甫诗有深刻的寓意。元稹说："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同上）杜甫学与新乐府的密切关系说明，杜甫学一开始就注重与当时社会现实的结合，杜甫研究始终具有强烈的新的时代色彩。这是杜甫学的重要特点，也是杜甫学强大的生命力所在。

（四）中唐已将杜甫的创作经验上升为诗歌创作的理论。

刘禹锡总结杜诗的用语，提出诗用僻字要有来历。他说："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尝讶杜员外'巨颡折老拳'，疑'老

拳’无据。及览《石勒传》‘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饱卿毒手’，岂虚言哉！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学常人率尔而道也。”（方深道辑《诸家老杜诗评·〈刘宾客嘉话〉三事》）另外，从这条材料也可以看出，唐代虽然没有杜甫文集的注释工作，而有关典故等方面的文献研究，实际上早已开始。

第三时期为晚唐时期。

晚唐的杜甫学又有新的发展。杜甫学的学者更多，关于杜甫的研究又有新的开拓。李商隐认为杜甫和李白的诗内容极为丰富，无所不包。认为他们的诗是“三才万象共端倪”（《漫成五章》其二），实际上也赞美了他们经天纬地的无比巨大的才华，赞美了他们诗歌无比巨大的力量。杜牧则从接受学的角度，论述了杜诗神奇的感染力。司空图认为作家的文和诗的风格往往是一致的，他认为杜甫与李白的文均宏拔清厉，和他们的诗风是一致的。他说：“金之精粗，效其声，皆可辨也，岂清于磬而浑于钟哉！然作者为文为诗，格亦可见。岂当善于彼，不善于此耶？愚观文人之为诗，诗人之为文，始皆系其所尚，所尚既专，则搜研愈至，故能衒功于不朽。亦犹力巨而斗者，所持之器各异，而皆能济胜，以为勍敌也。……又尝睹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赞》，宏拔清厉，乃其歌诗也。……噫！后之学者褊浅，片言只句，未能自辨，已侧目相诋訾矣，痛哉！庶俾后之诠评者，罔惑偏说，以盖其全工。”（《题柳柳州集后》，《司空表圣文集》卷二）这是杜甫学史上第一次从理论高度，从诗与文比较的角度，对杜甫之文所作的崇高评价。

杜甫生活在唐代，唐代留下了很多有关杜甫生平和诗文的重要资料。最重要的是元稹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其余如李肇《国史补》、郑处晦《明皇杂录》、孟棨《本事诗》等。尽管很多记载较简略，甚至有错误，但都能从不同的角

度提供材料，供我们研究。

唐代由于人们对杜甫诗的学习和研究，杜甫产生了广泛影响。《新唐书》说："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特别是文人，从杜甫那里受益良多，包括思想、创作理念、创作方法和技巧。中晚唐的著名文人韩愈、元稹、白居易、杜牧、李商隐都受到杜甫的显著影响。

二　任　华

一

任华，盛唐时人，与李白杜甫同时。唐玄宗时官秘书省校书郎，出为桂州刺史参佐。狂狷之士。曾留书责京尹贾大夫恃才傲物，与杜中丞书责其始以文章见知而终不相顾。上御史严大夫笺，以为失在于倨，阙在于傲。任华与庾中丞书云：公幸以文章见许，以补衮相期。公顷谓李太仆曰：任子文词，可谓卓绝，负冤已久，何不奏与太仆丞？然公之相待，何前紧而后慢耶？华本野人，常思渔钓，寻当杖策，归乎旧山，非有机心，致斯扣击，但以今之后进，皆属望于公，公其留意焉。任华有当世之志，故书有干谒之意。（事见《唐摭言》卷一一，《唐诗纪事》卷二二，《全唐诗》卷二六〇，《全唐文》卷三七六）

二

任华是一位诗风独特的诗人，他擅长作长篇歌行，语言参差

不齐，有特殊的节奏与韵味。任华作《杂言寄杜拾遗》寄杜甫，对杜甫的形象作了生动的描绘，对杜甫的诗作了崇高的评价。诗云：

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与君别，别来已多时，何尝一日不相思。杜拾遗，知不知？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前年皇帝归长安，承恩阔步青云端。积翠扈游花匼匝，披香寓直月团栾。英才特达承天睠，公卿无不相钦羡。只缘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却为掾。如今避地锦城隅，幕下英僚每日相随提玉壶。半醉起舞捋髭须，乍低乍昂傍若无。古人制礼但为防俗士，岂得为君设之乎。而我不飞不鸣亦何以，只待朝廷有知己。已曾读却无限书，拙诗一句两句在人耳。如今看之总无益，又不能崎岖傍朝市。且当事耕稼，岂得便徒尔。南阳诸葛为友朋，东山谢安作邻里。闲常把琴弄，闷即携樽起。莺啼二月三月时，花发千山万山里。此时幽旷无人知，火急将书凭驿使，为报杜拾遗。

任华与杜甫有交谊，而诗又是直接寄给杜甫的，其诗内容的可信度非常高。诗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一）任华对杜诗的风格概括非常准确精彩："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写出了杜诗那种千汇万状、沧海激荡的雄奇闳深的风格。（二）任华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

诗名隆盛的情况："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足见杜甫在身前诗文之名已非常大。（三）描绘了杜甫性格狂狷的一面。杜甫为人文质彬彬，儒雅清淳，但有时却是"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里常醉卧"，"半醉起舞理髭须，乍低乍昂旁若无"，与李白的狂放颇有几分相似。任华的诗虽是诗，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

三　樊晃

一

樊晃，中唐时人。官润州刺史。

二

樊晃是杜甫身后第一个编杜甫小集的人。他将搜集到的杜甫诗290篇，以事相类，编为六卷，让其在江左流传。《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杜甫集》六十卷。又《小集》一卷，涯州刺史樊晃集。（周采泉按：涯为润之误。润州即今镇江。《嘉定镇江志》卷一四唐润州刺史条，有樊晃。又一卷应作六卷。）"《小集》在宋代尚存，今已佚。

可以说，樊晃也是第一个给杜甫以最高评价的人。他的《杜工部小集序》云："工部员外郎杜甫字子美，膳部员外郎审言之孙。至德初，拜左拾遗。直谏忤旨，左转，薄游陇蜀，殆十年矣。黄门侍郎严武总戎全蜀，君为幕宾，白首为郎，待之客礼。

属契阔湮阨，东归江陵，缘湘沅而不返，痛矣夫！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常蓄东游之志，竟不就。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为六卷，且行于江左。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续当论次云。”（钱谦益注《杜工部集》附录）从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样一些情况：（一）杜甫诗生前就在江南流传。（二）杜甫去世不久，文集六十卷在江汉之南（即今湖南湖北一带）流传。因为战乱，江东对杜甫文集知之较少。（三）樊晃认为杜甫后期的作品是大雅之作，认为杜甫是当时最伟大的诗人。（四）樊晃寻求杜甫文集，想进行研究，并进行评价。樊晃的序很有史料价值。

樊晃是早期一位重要的杜甫研究学者。

四 韩 愈

一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阳（今河南孟县）人。幼孤勤学，擢进士第。为宣武节度府观察推官。后为宁武节度府推官。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贬阳山令。累官职方员外郎。官比部郎中，史馆修撰，知制诰，进中书舍人。谏佛骨事，帝大怒，贬潮州刺史。改袁州刺史，召拜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为吏部侍郎，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后复为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卒，年五十七。（见《旧唐书》卷一五九本传、《新唐书》卷一七

六本传）

二

韩愈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他对李白和杜甫推崇备至，对他们的作品给予极高的评价，给他们在文坛上以最高的地位，以表达对他们的景仰之情。"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荐士》）"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醉留东野》）"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石鼓歌》）韩愈最有名的论李白、杜甫的诗是《调张籍》，诗云：

>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笼中，使看百鸟翔。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电下取将。流落人间者，太山一毫芒。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着织女襄。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颉颃。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韩愈最早提出"李杜"并称的观点（据笔者推测，"李杜"并称的说法，在李、杜生前可能已有，但现在找不到材料），始终把李、杜推到诗坛的最高领袖地位，从未有抑李扬杜或抑杜扬李的倾向。韩愈在中唐以后的千余年间，在中国古代文坛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他对李、杜的推崇与评论，对

于确立李、杜在诗坛的泰斗地位有着巨大的影响与作用。特别是他强烈抨击中唐一些人对李、杜的诽谤，更捍卫了李、杜的尊严，堵塞了攻击李、杜的逆流，可以说他是李、杜的保护神。但是，李白在生前名气比杜甫大得多。李杜并称，实质上提升了杜甫在诗坛的地位，提高了杜甫在诗坛的知名度。王嗣奭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自昌黎品定而月旦千古。虽然，青莲业有定价矣，少陵犹不免蚍蜉之撼，而昌黎借李伸杜，嗣后评者或驾杜于李，盖李善用虚而杜善用实，用虚者犹尽鬼魅，而用实者上画犬马，此难易之辨也。"（《杜诗笺选旧序》，见《管天笔记》外编）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韩愈始终坚持"李杜"并称，不偏不倚，是对李杜最公允的评价，表现出他过人的见识。事实上，李白与杜甫在内容与艺术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贡献，都达到了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他们理应并称。李杜并称准确而全面地表明了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当然，学术研究允许持不同观点，那种从内心深处认为杜强于李，或李优于杜者，自然也可以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过论述时要心平气和，不要意气用事，否

则，难免失之偏颇①。

① 附录：刘斧摭遗小说（见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之《集注草堂杜工部诗外集·酬唱附录》，蔡梦弼认为非韩愈所作）有韩愈《题杜工部坟》诗，未载入韩愈集中，今录如下：

何人凿开混沌壳，二气由来有清浊。孕其清者为圣贤，钟其浊者为愚朴。英豪虽没名犹嘉，不肖虚死如蓬麻。荣华一旦世俗眼，忠孝万古贤人芽。有唐文物盛复全，名书史册俱才贤。中间诗笔谁清新，屈指都无四五人。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拟伦。笔追清风洗俗耳，心夺造化回阳春。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万顷清光流。我常爱慕如饥渴，不见其面生闲愁。今春偶客耒阳路，凄惨去寻江上墓。召朋特地踏烟雾，路入溪村数百步。招手借问骑牛儿，牧童指我祠堂路。入门古屋三四间，草茅缘砌生无数。寒竹珊珊摇晚风，野蔓层层缠庭户。升堂再拜心恻然，心欲虔启不成语。一堆空土烟芜里，虚使诗人叹悲起。怨声千古寄西风，寒骨一夜沉秋水。当时处处多白酒，牛肉如今家家有。饮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无饱死。子美当日称才贤，聂侯见待诚非喜。洎乎圣意再搜求，奸臣以此欺天子。捉月走入千丈波，忠谏便沉汨罗底。固知天意有所存，三贤所归同一水。过客留诗千百人，佳词绣句虚相美。坟空饫死已传闻，千古丑声竟谁洗。明时好古疾恶人，应以我意知终始。

该诗具有两点学术价值：(一) 耒阳有杜甫之墓，诗人亲眼见过。不过这墓可能是杜甫逝世后为纪念他而建的，并非葬身之处，因为元稹所作杜甫墓系铭明言杜甫殡于岳阳。(二) 诗人对杜甫死于牛肉白酒之说进行批驳，认为“当时处处多白酒，牛肉如今家家有。饮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无饱死”，说明牛肉白酒不是杜甫的根本死因，指出牛肉白酒致死之说是对杜甫的丑化。这首诗是否为韩愈所作，难以考证。说是韩愈作，有可疑之处，但又没有从根本上推翻为韩愈所作的证据，理应视为韩愈所作。即使不是韩愈作，也可以肯定是唐宋时的诗，是最早批驳杜甫死于牛肉白酒之说的作品之一，自有其价值。

韩愈是中唐的文坛领袖，他身边聚集着不少文人。其中如孟郊、张籍，皇甫湜，也像韩愈一样推崇李白杜甫。孟郊云：“可惜李杜死，不见此痴狂。”（《戏赠无本二首》其一）张籍《送客游蜀》诗云：“杜家曾向此中住，为到浣花溪水头。”皇甫湜《题浯溪石》云：“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于一气间，为物莫与大。”（洪迈《容斋随笔》卷八《皇甫湜诗》条引）孟郊、张籍、皇甫湜都是著名文人，他们和韩愈一道，为确立李白、杜甫在诗坛的泰斗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　白居易

一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徙下邽。敏悟绝人，工文章。贞元中，擢进士、拔萃皆中，补校书郎。调盩厔尉，为集贤校理。为翰林学士，迁左拾遗。累官中书舍人，为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拜苏州刺史。以秘书监召，迁刑部侍郎。除太子宾客分司。拜河南尹，复以宾客分司。改太子少傅。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旧唐书》卷一六六本传、《新唐书》卷一一九本传）

二

白居易是我国著名诗人和文学理论家。他与元稹并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朴素清新，富赡隽永，流传很广。“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旧唐书》卷一六六本传）“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白居易是中唐诗歌创作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白居易对杜甫的诗歌有长期深入的研究，并与元稹等友人讨论读杜诗的心得和对杜甫的评价。白居易研究杜甫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杜甫诗的研究与自己

的诗歌理论的建树联系起来，把对杜甫的评价与当时的创作状况联系起来，因而他的研究往往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云：

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通过对李杜及其诗的评价，提出诗人应该努力创造出好的诗歌的观点。白居易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诗应该有兴寄，应该有广阔的社会内容与思想内容，他也用这一思想来评价杜甫的诗：

唐兴二百年，期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与元九书》）

白居易说杜甫的诗有“风雅比兴”的不过十分之三四，乍听令人吃惊，而翻检杜诗，却觉得符合事实。但问题在于，文学是表现生活和人的思想的，不能认为只有具有强烈政治性和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才是好作品。然而，如果我们知道白居易这样论述

的出发点是为了振兴诗道，是为了提倡诗歌多表现社会生活，多反映社会的重大问题，多描写民间疾苦，那么，我们认为他这样来评论杜甫并没有什么不妥。相反，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评论更表现出其理论的高超与彻底性。白居易研究杜诗，完全从实际出发。通过对杜诗的研究，提高自己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水平，表现出良好的学风。白居易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通过对杜诗的研究，提高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理论水平，更好地领导了新乐府运动。而白居易本人所创作的《新乐府》和《秦中吟》等，特别是代表作《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明显地受到杜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诗的影响。可以说，白居易将对杜甫的学术研究所得转化为创作的理论，并用以指导创作的实践，这是一种极高层次的杜甫研究。

六 元 稹

一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河内（今河南洛阳市）人。稹幼孤，九岁工属文。十五擢明经，判入等，补校书郎。元和元年举制科，对策第一，拜左拾遗。拜监察御史，奉使东蜀，劾奏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制擅赋。后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征还，为膳部员外郎。穆宗赏其才，为宦官谭峻荐，为祠部郎中，知制诰。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罢内职，授工部侍郎。拜平章事。出为同州刺史。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

入为尚书左丞。为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暴卒于镇，时年五十三。（《旧唐书》卷一六六本传、《新唐书》卷一七四本传）

二

元稹是著名才子，诗工丽绵密，富赡清雅。“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旧唐书》卷一六六本传）“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同上）作为一位诗人，元稹对杜甫的诗颇下过一番研究的工夫。而且常与友人白居易、李公垂等讨论杜甫的作品。元稹对杜甫的评价极高，把他作为最伟大的诗人，对他非常崇拜。元稹对杜甫的研究颇有独特之处，并用这种研究成果来指导当时的创作。元稹认为，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敢于直接表现社会：

> 杜甫天材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酬孝（一作李）甫见赠十首》其二）

元稹还认为杜甫作诗很少拟古题，而即事名篇，根据内容拟标题，有利于表现现实生活。“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元稹《乐府古题序》）元稹的这些观点对中唐的诗歌新乐府运动，都直接产生了有力的影响。元稹对杜甫诗的艺术风格也有精深的研究，认为杜甫的诗浑涵浩茫，寄兴深遥。他说：“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

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元稹《叙诗寄乐天书》）足见元稹对杜甫诗的风格和杜诗的地位把握非常准确，是对杜甫诗的艺术风格的精彩论述。而元稹最知名的关于杜甫的文章是《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它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现全文迻录于后：

叙曰：余读诗至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始尧舜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殷周千余年，仲尼缉拾选练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其余无闻焉。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以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至汉武帝赋《柏梁》，而七言之体具。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抑扬哀怨存离之作，尤拯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子以简慢、歙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凌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其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

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予尝欲条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适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祔事于偃师，途次于荆，雅知余爱言其大父之为文，祈余为志。辞不可绝，余因系其官阀而铭其卒葬云。

系曰：晋当阳成侯姓杜氏，下世而生依艺，令于巩。依艺生审言，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闲生甫，闲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宝中献《三大礼赋》，明帝奇之，命宰相试文。文善，授甫曹。属京师乱，步谒行在，拜左拾遗。岁余，以直言失官，出为华州司功，寻迁京兆功曹。剑南节度使严武状为工部员外参谋军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九。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匄，焦劳昼夜。去子美殁后余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

铭曰：维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子美于首阳之前山。呜呼！千载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坟。

虽是一篇墓志铭，却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首先，它简明而完备地介绍了杜甫的家世与生平。因为是墓志铭，材料都来源于杜甫之孙嗣业，非常可靠。这是保存到现代的有关杜甫生平最完备、最可靠的材料。其次，元稹对杜甫及其诗进行了全面的评价与论述。元稹从文学发展史的高度来衡量杜甫，认为他是古今最

伟大的诗人，是古今集大成的诗人。“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也承认“李（白）杜（甫）”并称的说法，自己也说“李杜诗篇敌”（《代曲江老人百韵》），但实际上他本人更爱好杜甫的诗，因而在墓志铭中明确提出杜甫诗优于李白诗，把杜甫推为古今第一诗人。对于元稹的这一观点，笔者是不完全赞成的。笔者持李杜诗并称的观点，就个人爱好而言，认为李白诗艺术更完美，但对元稹的观点仍表示非常理解。杜甫的诗比李白的诗所反映的生活更广阔，更真实，更深刻，更具有现实性。杜甫的诗比李白诗更多地表现了诗人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达也更细腻，更深沉。杜甫诗的艺术比李白更丰富，更好学，便于广大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欣赏、学习和借鉴。而李白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天才纵逸，表现生活与思想感情多用超现实主义手法，使人感到神奇美妙，但也觉得难以学习，难以亲近。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元稹认为杜甫优于李白，也不无道理。事实上，元稹的观点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特别是为杜诗爱好者所接受。元稹提出的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的观点，在杜甫研究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于确立杜甫在诗坛上的独尊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元稹在具体评价杜甫时，由于对杜甫的声律艺术成就谈得太多，以致冲淡了他对杜甫作品在内容与艺术上的评价，造成人们对他的观点的一些误解。元好问、王嗣爽都认为元稹没有看到杜甫作品思想与艺术的伟大，而只看重杜甫的排律。元好问说：“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一〇）元好问之说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全面考察元稹对杜甫的评论，可以看出，他真正看重的是杜甫作品所表现的伟大思想与高超艺术。

元稹特别爱好杜诗，一生研究杜诗，用功极勤。他的观点新

颖，极具影响力。他还在他的时代大力宣扬杜诗，与人研讨杜诗，并把研究杜诗的心得运用在创作中。元稹对杜甫研究的贡献极大，可以说是杜甫学最早的一位大功臣。

七 杜 牧

一

杜牧（803—约 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以进士擢第，又制举登乙第，解褐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为淮南节度推官，拜监察御史。转膳部、比部员外郎，出牧黄、池、睦三郡。复迁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授胡州刺史，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杜牧有经纬才略，武宗朝诛昆夷、鲜卑，杜牧上书论兵事，说："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间，盛夏无备，宜五六月中击胡为便。"上书论泽潞战事，泽潞平略如杜牧之策。杜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卒年五十。

杜牧是唐代著名诗人，"牧好读书，工诗为文"（《旧唐书》卷一四七本传），其诗俊逸豪迈，"牧于诗，情致豪迈，人号为'小杜'，以别杜甫云"（《新唐书》卷一六六本传）。

二

杜牧对李白、杜甫的诗评价很高，认为他们可与古代诗坛的泰斗相匹敌。他在劝侄儿多读书的诗中写道："高摘屈宋艳，浓熏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

梁。”(《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将李杜与屈(原)、宋(玉)、班(固)、马(司马迁)相提并论,把李杜列为最伟大的诗人之列。杜甫集是杜牧最喜欢读的。他的《读韩杜集》写道:

> 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

这不是一首普通的谈读书感想的诗,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有两点很重要:(一)将韩(愈)与杜(甫)并称绝非偶然,而是经过精心挑选与安排,把韩愈作为文坛的北斗,把杜甫作为诗坛的北斗。这对后世影响很大,特别是给宋代论诗论文定下了调子,为确立杜甫在诗坛的独尊地位,起了一定的作用。(二)着眼杜诗与自己的思想共鸣来谈论和评价杜诗。杜甫是古代正直的、有抱负的、有才华的士人的代表。在封建制度下,才德之士往往怀才不遇,穷愁潦倒,特别是遭遇战乱,更加困顿艰辛。杜甫的诗典型地表现了这些士人的境况与思想。杜甫的诗所表现的有志不获骋、有才不得用的痛苦悲愤的心情,表现的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关心,表现的困苦的生活和举步维艰的境遇,都能引起大多数士人的极大共鸣。杜牧的诗充分表现了大多数士人读杜甫的诗的感受。杜牧的诗开了从感受体验的角度来研究杜甫诗的先河。

杜牧对杜诗的学习和研究,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杜牧因而也与杜甫合称为大小杜,或被人径称为小杜。五代卢瑰说:“杜牧之绰有诗名,纵情雅逸,金陵舣舟闻倡楼歌声,有诗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寄(近)酒家。倡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风雅编缀,不可胜纪。与杜甫齐名,时人呼为大杜小杜。”(《竹庄诗话》卷二〇载《抒情诗话》)

八 李商隐

一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号玉谿生。幼能文，开成三年登进士第，为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弘农尉。王茂元镇河阳，辟为掌书记，得侍御史。郑亚廉察桂州，请为观察判官。检校工部员外郎。随郑亚在岭表累年。入朝，京兆尹卢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笺奏。以文章干令狐绹，补太学博士。柳仲郢镇东蜀，辟为节度判官、检校工部郎中。罢为郑州，病卒。李商隐是晚唐著名诗人，其诗典丽精工，宏雅深邃。

二

李商隐对杜诗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著名论点是杜诗把世界的一切都融汇于诗中。《漫成五章》其二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集仙殿与金銮殿，可是苍蝇惑曙鸡。"（《李义山诗集》卷六）李商隐持李白与杜甫并称的观点，认为他们怀才而不为世大用，都是因为小人谗毁。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隐认为杜甫和李白诗歌的最大特点是内容无所不包，把天地人与万物都摄入诗中表现。李商隐的看法是极为精彩的，也是极为经典的。事实上，在古代诗人中，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杜甫那样，摄入如此广阔丰富的情事，进行如此生动形象的表现。杜甫表现的，有天上的一切，地上的一切，人的一切，天地之间的一切。总之，杜诗是以整个宇宙为表现对象。其诗内容的博大，正表现

杜甫胸怀的博大，人格的博大。从内容的宏大来评论杜诗，没有人能像李商隐评论得这样精彩，这样准确。

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李商隐的创作也深受杜甫的影响。李商隐在古代曾以善学杜甫为世所称。李商隐与杜甫的共同之处既表现在人生经历与杜甫有某些相似，也表现在艺术风格因受杜甫影响，有某些相似。李商隐一生落拓不偶，寒饿颇似杜甫，诗风深沉婉丽，也与杜甫的沉郁顿挫颇为相通。李商隐自己说："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景物，哀上浮壮，能感动人。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人或知之。"（《樊南甲乙集序》，《李义山文集》卷四）李商隐向杜甫学习的方面很多，而最主要的是诗歌表现的基本方法。王士禛说："一日秋雨中，茂京携画见过，因极论画理，其义皆与诗文相通。大约谓始贵深入，既贵透出，又须沉着痛快。又谓画家之有董、巨，犹禅家之有南宗。董、巨后嫡派，元唯黄子久，倪元镇，明唯董思白耳。予问倪、董以闲远为工，与沉着痛快何居？曰：闲远中沉着痛快，唯解人知之。又曰：仇英非士大夫画，何以声价在唐、沈之间，征明之右？曰：刘松年、仇英之画，正如温李之诗，彼亦自有沉着痛快处。昔人谓义山善学杜子美，亦此意也。"（《带经堂诗话》卷三《微喻类》）王士禛通过论画论李商隐善学杜诗，非常精辟，非常深刻。

九 五代概说

唐末天下大乱，战争不断，神州分裂，成五代十国。

杜甫天才绝伦，遭受战乱而漂泊。这对于处于战乱中的五代

人，更觉亲切，一些文人寻访杜甫的遗迹，游览杜甫的故居、逝世处、流寓地和游览处，表现对杜甫的怀念与景仰。在成都，杜甫故居已坏，韦霭为奏记，重建杜甫故居。“虽芜没已久，而柱砥犹存。因命芟夷结茅为一室，盖欲思其人而成其处，非敢广其基构耳。”（韦霭《浣花集序》，《浣花集》）值得注意的是，重建基本保持原来的规模。在湖南耒阳，有杜甫墓。墓有祠宇，后晋黄庭翰重修。宋人张齐贤云：“图经云：工部墓在县北郭内二里。后晋开运中，县令黄庭翰重修祠宇。”（《书杜工部祠堂》，《永乐大典》卷八千六百四十八衡字韵）这反映了五代人对杜甫的崇敬与热爱。

五代大量发行杜甫集。西蜀是杜甫流寓之地，杜甫学也很兴盛。蜀本杜甫集即有两种：一种是孙光宪序本，一种是郑文宝序本。王洙《杜工部集记》云：“孙光宪序二十卷，郑文宝序少陵集二十卷。”王洙所见为杜甫集的两种残本。后晋，有官刻本杜甫集。吴若《杜工部集·后记》云：“称‘晋’（本）者，开运二年官书也。”（《钱谦益《杜工部集注》）这是见于记载的，五代实际发行的杜甫集当远不只这三种。

这一时期有许多记载杜甫的文献，有范摅《云溪友议》、王定保《唐摭言》、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冯贽《云仙杂记》。五代去杜甫生活的时代已远，很多材料来自传言，难免失真与错误，而有的记载采自其他史料，也值得重视。如《云仙杂记》载“杜甫在蜀者，以七金买黄儿米半篮，细子鱼一串，笼桶衫，柿油巾，皆蜀人奉养之粗者”（卷一《笼桶衫油柿巾》），并标明“出《浣花旅地志》”。这条材料就可作我们研究杜甫在蜀中生活的参考。

五代的杜甫学继续沿着唐代杜甫学向前发展。这时期杜甫学的大事，是官修《旧唐书》将杜甫列入《文苑传》。该书杜甫传

较为完备地记载了杜甫的生平，引用元稹杜甫墓志铭推杜甫为古今第一诗人的评论，并下结论说："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文苑传》）官修书是正史，代表了统治者对杜甫的评价，历来为社会所重视。《旧唐书》杜甫传在当世和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杜甫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五代一般将杜甫与李白并称。黄滔云："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干天。"（《答陈磻隐论诗书》，《唐黄御史公集》卷七）贯休认为杜甫诗包罗宇宙。《读杜工部集二首》云："造化无拾遗，唯应杜甫诗。岂非玄域橐，夺得古人旗。日月精华薄，山川气概卑。古今吟不尽，惆怅不同时。"（其一）"甫也道亦丧，孤身出蜀城。彩毫终不撅，白雪更能轻。命薄相如命，名齐李白名。不知耒阳令，何以葬先生。"（其二）（《禅月集》卷七）对杜甫的评价很精彩，对杜甫的遭际表示同情，并表达了对杜甫的无限崇敬和怀念。五代与杜甫生活的安史之乱时期相似，杜甫的诗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五代人也纷纷抒发忧世忧国之心。牛峤登陈子昂读书台，看杜甫的题诗，有感而作，云："北厢引危槛，工部曾刻石。辞高谢康乐，吟久惊神魂。拾遗有书堂，荒榛堆瓦砾。二贤间世生，垂名空烜赫。逸足拟追风，翔鸾已铩翮。伊余曾末学，少被文章役。兴来挥兔毫，欲竞雕弧力。虽称含香吏，犹是蓬莱客。薄命值乱离，经年避矛戟。今来略倚柱，不觉冲暝色。袁宏忧国心，谁怜鬓已白。"（《永乐大典》卷三千一百三十四陈字韵载《潼川志》）

经历五代战乱，至宋初，杜甫集都已残缺，至宋已无完本传世。有关杜甫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大量毁灭。

一〇 孟棨

一

孟棨，唐僖宗光启时在世，曾为尚书司勋郎中。著有《本事诗》。

二

孟棨对杜甫学的最大贡献，是他记载了唐人杜甫诗是“诗史”之说，而且对“诗史”说作了精彩的阐释。

《本事诗》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高逸第三》）从孟棨的记载看，关于“诗史”说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诗史”之说当产生于杜甫生前，故孟棨的记载是“当时号为‘诗史’”。当时人们的评论非常值得重视，因为当时人对作品的体验最深，感受最真切。用“诗史”来概括杜诗，最充分地说明当时杜诗最真实充分地反映了安史之乱那个时代。这也是“诗史”说最具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二）“诗史”说的定义，孟棨界定得非常好。其“诗史”说包括这样几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反映了杜甫所经历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其二，记录了杜甫自己的经历与生活。其三，是“推见至隐”，深刻揭示了社会现象的本质，充分表现了自己的见解、思想与感情。孟棨对杜诗为“诗史”之说的理解是非常全面和深透的。后世一些人对“诗史”的理解则要片面和肤浅得多。孟棨关于“诗史”的记载与论述值得后世的杜诗研究者

认真研究。

所谓诗史，就是用诗的形式表现一个时期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发展的本质。杜甫的诗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形象地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叙了其生活经历，抒发了其爱国爱民的思想感情，表现了其人生理念与生活感悟。因此，用“诗史”来概括杜甫的诗是最恰当的。“诗史”的记载一出，便得到人们高度的认同，成为杜甫学术史上最经典性的评论用语之一。应该强调的是，孟棨所载唐人所谓的“诗史”，不仅包括杜诗所表现的广阔社会生活，而且包括杜甫自己的经历与生活、内心世界与情感。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来理解“诗史”才是全面的、深刻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在宋代，“诗史”说就广泛为学界所运用，至今仍然为人们所广泛运用。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一 刘昫与《旧唐书》

一

刘昫，字耀远，涿州归义人。以好学知名燕赵间。为定州王处直观察推官，后避地沧州。唐庄宗即位，官翰林学士。明帝时，累官兵部侍郎（《旧五代史》作户部侍郎），迁端明殿学士。长兴三年，拜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废帝入立，迁吏部尚书、门下侍郎，监修国史。昫为人刚直。后罢为右仆射。晋高祖时，以昫为东都留守，判盐铁。开运中，拜司空，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复判三司。契丹犯京师，昫以目疾，罢为太保，是岁卒，年六十。（《旧五代史》卷八九本传、《新五代史》卷五五本传）

二

刘昫修《旧唐书》，在《文苑传》中列《杜甫传》，是代表当时朝廷，代表封建正统对杜甫在文坛的成就和地位的评价，在杜甫学术史上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与意义。

《旧唐书》的《杜甫传》第一次对杜甫家世、生平作了完备而简明的记叙。此前，虽有元稹所作杜甫墓志铭（《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但所言杜甫生平太简略。《旧唐书》则较为完整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大事，基本没有遗漏。只有寓夔一事未明言，隐含于“避乱荆楚”中。与元稹杜甫墓志铭比较，《旧唐书》则多载了杜甫疏救房琯寓居成州同谷事和召补京兆府功曹。“房琯布衣时与甫善，时琯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其年十月，琯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功曹。”这些材料对研究杜甫的生平非常重要。元稹所作杜甫墓志铭中已有之事，《旧唐书》的记载要详细得多。总之，《旧唐书·杜甫传》是第一篇比较完整而详细的杜甫传，且为朝廷史家所修，在学术上非常重要。

《旧唐书·杜甫传》所载杜甫生平也存在严重缺陷。一些材料采自小说家言，存在着生平事实记载失实和论述失当。大致有四条：（一）说杜甫游东蜀依高适：“永泰元年夏，武卒。……及郭英乂代武镇蜀，英乂武人粗暴，无能刺谒，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高适之卒略早于严武，杜甫不可能在严武死后去

投靠高适。（二）说杜甫褊躁，侮辱严武："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其实，从杜甫诗文和严武诗文看，杜甫与严武相处友好。杜甫对严武很尊重，很感激，绝不会以怨报德，做出侮辱严武的举动。杜甫在严武逝世后，作诗表达自己的感激思念之情，就是最好的证明。说杜甫醉登严武之床，瞪视严武而言"严挺之乃有此儿"，完全是小说家之言，而《旧唐书》杜甫传说杜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对杜甫的德行进行贬损性的评论，近乎攻击，没有事实依据。（三）言杜甫吃牛肉饮白酒而致死："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耒阳一带喜欢吃牛肉，喝白酒，杜甫到耒阳，入乡随俗，吃牛肉，喝白酒，是可能的。但吃牛肉喝白酒不可能是杜甫致命的根本原因。杜甫晚年有消渴风痹重疾，疾病才是他逝世的缘由。《旧唐书》杜甫传言杜甫"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给人的印象是杜甫贪吃嗜酒而不顾性命，贬损了杜甫的德行，损害了杜甫的形象。（四）认为李白与杜甫风格不同，李白嘲笑杜甫。"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现存的题名李白作的《戏赠杜甫》诗云："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向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这首不管是否为李白所作，就诗本身而言，是一种善意的嘲谑，谈不上什么"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旧唐书》杜甫传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以上所举四条，不能不说是《旧唐书》杜甫传的疵点。这些疵点严重地影响了杜甫传的质量。

《旧唐书·杜甫传》还引用元稹的杜甫墓志铭对杜甫作了评论。其文云："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

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同意元稹对杜甫的评论，认为杜甫是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是最伟大的诗人。同意李杜并称的说法，但又认为杜胜于李。（二）所记载的元稹说法为元稹之后的文坛所承认，认为元稹的说法是天下公论。这样，把杜甫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诗人的看法作为天下公论和正史的结论便记载下来，其影响无比巨大，自然远非元稹的杜甫墓志铭所能比。

第二章
宋辽金元

一　宋概说

一

宋代生产力加强，城市发展，经济繁荣。新儒学理学思想盛行，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流行。文化欣欣向荣，争奇斗艳。宋朝党派斗争激烈，官吏冗多，重用文人治军，军事实力不强。邻国军力却相对强盛。宋朝长期与外国进行战争，屡战屡败，大量赔款与割地致使国力虚弱。百姓负担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生活贫穷而痛苦。

金兵攻进宋朝都城开封，掳走钦宗和徽宗，结束了北宋王朝的统治。宋朝王室逃跑，渡过长江，在杭州建都。这就是南宋。南宋大致沿袭着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南宋在蒙古军的铁蹄下消失。

这是一个杜甫的时代。从北宋中叶起，杜甫就成为热门人

物。人们在儿童时代就开始学习杜甫诗，小学普遍教杜诗。那是一个诗的时代，而诗人差不多都学杜甫。学者更是“争言杜诗”，以善于谈论杜甫为荣。崇杜、言杜、学杜成为时代的风尚。宋代杜甫学之盛，令人惊叹。

二

学术的兴盛和时代的好尚与需要有密切的关系。到北宋中期，人们对杜甫的喜好已渐成风气。王琪说：“近世学者，争言杜诗。”（《杜工部集后记》）但那时，由于五代战乱将杜甫集毁坏，天下已无杜甫集完帙，人们搜求逸佚以为宝。“又人人购其亡逸，多或百余篇，少数十句，藏弆矜大，复自以为得。”（王琪《杜工部集后记》）在这种情况下，王洙将搜得的杜甫文集（包括小集）的多种残本和佚诗，去其重复，加以编排，得诗1405篇，成为《杜工部集》，后经王琪和人整理，在苏州刻印，成为第一部新生的杜甫集。它是后世一切杜甫集之祖。杜甫以文鸣世，如任其文集残缺散佚，作品传世大量减少，杜甫的影响力也会大大缩小，甚至连会不会有现在这样光辉的诗圣形象也很难说。因此，杜甫文集的重新编定，在杜甫学史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自王洙编《杜工部集》问世，各种版本的杜甫集便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一般来说，一次杜甫集的重新编排出版，就是一种新的版本。杜甫集的版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注文的注本，一类是没有注文的白本。概括而言，每印制一次，就形成一种版本。有宋一代，杜甫集有多少版本，无法统计，推想应在二百家左右。徐居仁云：“近世锓版，注以名集者，毋虑二百家。”（《黄氏补注杜诗序》）徐居仁是南宋中期人，他说已有注本至少两百家，加上白文本，加上他说此话之后的各种版本，我们可从理论上推测宋代杜甫集的版本为三百家左右。为了保险起见，我

们仅推测为二百家左右。宋代很多地方官府刻过杜甫集，如王琪刻于姑苏郡，郭知达刻于蜀中，曾噩又重校郭知达本刻于南海漕台，综合宋代的各种材料，我们认为这个推测是接近实际的。

宋代士人好杜成风，很多士人都有杜甫集。一些学者更藏有多种（不同版本）杜甫集。胡仔就藏有八种杜甫集（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因此，杜甫集发行总量非常大。杜甫集可以说是宋代的畅销书。有时一版印量多，售价高。王琪为官时，官府亏空，王琪通过印发杜甫集，弥补了亏空，还有盈余。《吴郡志》载："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诰守郡，大修设厅，规模宏壮，假省库钱数千缗。厅既成，漕司不肯除破。时方贵杜集，人间苦无全书。琪家藏本雠校素精，即俾公使库镂版，印万本，每本为直千钱，士人争购之。既偿省库，羡余以给公厨。"（范成大《吴郡志》卷一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杜甫集流行的盛况。

关于杜甫作品的辑佚。王洙编《杜工部集》，是利用多个残本杜甫文集与所搜佚诗编成，所收作品自然不全。故后来宋人不断有辑佚。今存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皆收有遗诗。宋代收录佚文，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其他书籍记载的《杜工部集》未收的作品；二是杜甫的刻石或书壁等未见于《杜工部集》的作品。这些佚文在收入杜甫集时，一般都标明是佚文，有的还标明佚文的出处。这对于研究杜甫作品的真伪非常有用。对于杜甫的佚诗，宋人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一是认为收入杜甫集的佚诗，并非杜甫的作品；二是认为有的杜甫佚诗并未收入杜甫集中。严羽云："'酒渴爱江清'一诗，《文苑英华》作畅当，而黄伯思注杜集，编作少陵诗。非也。"（《诗人玉屑》卷一一辑《沧浪诗话》）"'迎旦东风骑蹇驴'，决非唐人气象，只似白乐天言语，今世俗图画以为少陵诗，渔隐亦辨其非矣，而黄伯思编入杜

集，非也。”（同上）“少陵有《避地》逸诗一首云：‘避地岁时晚，窜身筋骨劳。诗书遂墙壁，奴仆亦旌旄。行在仅闻信，此身随所遭。神尧旧天下，会见出腥臊。’题下公自注云：‘至德三载丁酉作。’此则真少陵语也。今书市集本并不见有。”（同上）严羽的辨伪很有道理，但二诗至今仍在杜甫集中，人们仍然把它们作为杜甫的诗。因为要完全否定它们是杜甫的诗，仍显证据不足。《避地》一首从内容和风格看，确实都像杜甫诗，但严羽没有说明来源，仍未收入杜甫集中。总的说来，宋人编入杜甫集的佚文，基本上都是真的杜甫作品，误收或伪作比较少，而且现在已难以辨别。所以，宋代以后把宋人编入杜甫集的佚文，都视为杜甫的作品，宋人的辑佚是很有益的工作。宋以后，杜甫集基本上不再有辑佚，即便有，一般也不为学者所认可。

关于杜甫集的编辑与校勘。宋代杜甫集的编辑形式繁多。大致说来，可分为三类：（一）按诗体分类编排。王洙编《杜工部集》即分体编排。卷一至卷八是古诗，卷九至卷十八是近体诗。卷十九至卷二十是文。（二）按内容分类编排。佚名《分类集注杜工部诗》将杜甫诗分七十二门编排。其“杜工部诗门类”列：“月、星河、雨雪、雷云、四时、节序、千秋节、昼夜、梦、山岳、江河、陂池、溪潭、都邑、楼阁、登眺、亭榭、宫殿、宫词、省宇、陵庙、居室（上、下）、邻里、寄题、田圃、仙道、隐逸、释老、寺观、皇族、世胄、宗族、外族、婚姻、园林、果实、池沼、舟楫、桥梁、燕饮、纪行（上、下）、述怀（上、下）、怀旧、寻访、酬答、惠贶、送别（上、下）、庆贺、伤悼、鸟、兽、虫、鱼、花、草、竹、木、杂赋。”徐居仁《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也将杜诗分为七十二门，门类名称绝大部分相同，但排列却大不相同。其中徐居仁本的“绝句、歌、行”三门为佚名本所无，而佚名本的“千秋节、燕饮、疾病”为徐居仁本

所无。这样分类太琐细，也不太科学，很难将杜诗编排稳妥。（三）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在这些编辑形式中，宋人认为编年体最佳。而在实际编排中，很多编辑是将分诗体编排与分内容编排相结合。不少版本都是先分诗体，在分体下再按内容分门别类编排。从版本编排的发展看，北宋基本上是按诗体、内容两种方式编排，编年体则创自南宋。

用编年体编杜甫集，始于黄伯思。而文集编年的理论，则是苏轼提出来的。黄伯思“乃用东坡之说，随年编纂，以古律相参，先后始末，灿然可观”（李纲《重校正杜子美集序》）。黄伯思集流传不甚广，影响不甚大。其后鲁訔作《杜诗编注》，书名标“编”，可见他对编辑的重视。该书先按杜甫的生活经历划分为写作时期，按写作时期先后编次作品。能知道准确写作时间的，在题下标注具体年月。这种编排方法相当科学，操作也较为细致，编排大致准确。鲁訔书已佚，而他所编的成果完全为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和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所采用。因此，鲁訔的《杜诗编注》在杜诗编排史上有重要地位，在整个古代文集编排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王洙用唐五代多种杜甫集残本编《杜工部集》，其间多有文字差异。王洙在编《杜工部集》时，就有校勘和校语。蔡居厚说：“今世所传子美集，本王翰林原叔所校定。辞有两出者，多并存于注，不敢彻去。”（《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辑《蔡宽夫诗话》）从流传至今的宋人编注的杜甫集看，宋代的杜甫集大多有校勘。校勘的特点是一般只校异文，校于正文之下；有时也有校语，定是非；也有版本校勘不精，甚至以意改字的情况。从客观上说，宋代杜甫集的校勘各本虽有粗精之别，但总体较好。宋本杜甫集是我们校勘杜甫集最重要的依据。当然，杜甫集中有的错讹文字在宋代已无法校勘，恐怕只有存疑。而用其他方法校勘

的机会也许有，但几率极小。

三

杜甫读书破万卷，知识渊博。其作品表现的社会生活广阔纷繁，思想内容丰富深邃，各种知识灿若星汉。学者普遍感到杜甫集深奥难懂。王得臣说："予每读其文，窃苦其难晓。"（《增注杜工部诗自序》）因此，对杜甫集作文献注释，也就势在必行。

从现存资料看，杜甫集在宋代以前是没有注释的。最早为杜甫集作注的是编《杜工部集》的王洙（学术界多认为注乃出于伪托，非王洙所作。笔者认为伪托之说证据不足，详见后王洙一节）和稍晚的王得臣。王得臣在未见王洙注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杜甫集注。

宋代的杜甫注家甚多，在当时就号称千家注杜。这自然是极度夸张了。其实，所谓千家注杜，并非实指真有千人，不过夸言其多而已。《黄氏补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即自称千家注，而实际所列注者不过151人，距千家之数，实在遥远。且不说很多人并没有注，只有一两条论说而已。真正的注家，不过20家上下。说到这里，人们自然会想宋代到底有多少杜甫的注释家。

谈杜甫的注家，首先要弄清的是注家的定义。我们认为注家包括所有对语言和文字方面做注解的人。其工作包括一般意义的注、训、解、义说。宋代到底有多少杜甫的注家，文献大量亡佚，不可能做出精确的统计，但可以做出一个大致推测。在宋代，一些学者对注家的家数已做过一些估计。徐居仁说："近世镂版，注以名集者，毋虑二百家。"（《黄氏补注杜诗序》）他所说，包括集注，自然其中还有同一种注本改头换面的情况。陆游说："近世注杜者数十家。"（《跋柳书苏夫人墓志》，《渭南文集》卷三一）陆游所说是"近世"，注家数目也不确定。元好问说：

“杜诗注六七十家。”（《杜诗学引》）元好问居金地，其所见宋代杜甫注本自然有限，很不全。故我们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推测，宋代的杜甫注家应在一百家左右。其中包括集注之家，包括有注释之稿未刻印而稿亡佚者。

杜甫注家，现在考知姓名者，尚有33家。蔡梦弼云：“又如宋道次、崔德符、鲍钦止既太原王禹玉、王深父、薛梦符、薛苍舒（今按：梦符与苍舒实为一人）、蔡天启、蔡致远、蔡伯世皆为义说。其次如徐居仁、谢任伯、吕祖谦、高元之既天水赵子栎、赵次翁（今按：“翁”当作“公”）、杜修可、杜立之（今按：修可与立之实为一人）、师古、师民瞻亦为训解。”其所说共18家。我们另外知道的尚有15家：王洙、王得臣、孙洙、刘克（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言尝注杜子美集）、黄庭坚、鲁訔、师尹、杜田、鲍彪、章国华（朱熹有《跋章国华所集注杜诗》，《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三五）、郭知达、黄希、黄鹤、蔡梦弼、陈禹锡（作《杜诗补注》，见刘克庄《跋陈教授杜诗补注》，《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〇，《再跋陈禹锡杜诗补注》，同上卷一〇六），共33人。其中重要的15人为王洙、王得臣、黄庭坚、赵子栎、蔡兴宗、薛苍舒、鲍彪、师尹、杜田、赵次公、鲁訔、郭知达、黄希、黄鹤、蔡梦弼。15人中，王洙、黄庭坚、赵次公、鲁訔、郭知达、黄希、黄鹤、蔡梦弼更重要，将有专节论述。现将其余诸人的生平与杜甫注著作简介于后。

王得臣，字彦辅，自号凤台子。郧溪人。“以文学政事，扬历中外。”（王明清《挥麈录》）著《增注杜工部诗》（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姓氏》）四十九卷（其中《和杜诗》三卷）。书亡，一些注尚存宋人集注中。《增注杜工部诗》是在未见任何杜集注的情况下完成的（亦未见题为王洙的注），是最早独立完成的注本之一（如王洙注伪，则此为最早的杜诗注著作）。它是杜

诗的第一个笺注本，不仅注释典故、典章制度、人名地理等，还阐释诗的内容。王得臣《自序》云："予时渔猎书部，尝妄注辑，且十得五六。宦游南北，因循中辍。投老挂冠，杜门家居，日以无事，行乐之暇，不度芜浅，既次其韵，因旧注惜不忍去，搜考所知，再加笺释。又不幸病目，无与乎简牍之观，遂命子瀓洎孙端仁，参夫讨绎，俾之编缀，用偿夙志耳。"（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集》）

赵子栎，字梦授，宋朝宗室。元祐进士，官至宝文阁直学士。有《杜诗注》（《杜工部草堂诗笺》跋言其有训解，笺中并引注）。书亡，而一些注存宋人集注中。

蔡兴宗，字伯世（一作纪），东莱（一云蜀）人。生活在徽宗时代。著《重编少陵先生集并考异》（《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李伯纪杜工部集序》），二十卷。又名《注杜甫集》、《编杜诗》。书佚，而一些注尚存宋人集注中。

薛苍舒，字梦符，河东人，生活在北宋时代。作《杜诗补遗》五卷，《续补遗》八卷，《刊误》一卷（《宋史·艺文志》）。书亡，尚有一些注存宋人集注中。

鲍彪，字文虎，缙云人，登建炎二年进士第，官尚书郎。著《少陵诗谱论》（又名《杜诗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李伯纪杜工部集序》，又见光绪《缙云县志·鲍彪传》）。

师尹（？—1152），彭山县人，官终夔州通判。注杜诗，书名佚。魏了翁云："予幼读杜起（工）部、苏文忠公诗，于师氏注释明辩宏博，心窃好之。"（《朝奉大夫通判夔州累赠正奉大夫师尹墓志铭》，《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七）师尹书佚，其注有部分尚存宋人集注中。

杜田，字时可，一字汝耕，号樗叟。开城（嘉庆《四川通志》作安岳）人，大邑县丞。生活在南宋初期。著《注杜诗补遗

正谬集》（又名《杜诗拾遗》、《补遗正谬注》、《注杜诗》）十二卷（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李伯纪杜工部集序》）。惠栋尚谈及其《杜诗博议》（惠栋编《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此书或即《注杜诗补遗正谬集》。书已佚，一些注尚存宋人集注中。

在这里，还要谈谈杜诗伪注的问题。历来造伪的目的都是牟利与钓名。宋代杜甫学大盛，为作伪者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故宋代注杜作伪者风起，伪作泛滥。最著名的是《东坡故实》，托苏轼之名，捏造事实，解说杜诗。陈振孙说："世有称东坡《杜诗故事》者，随事造文，一一牵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其辞气首末若出一口，盖妄人依托以欺乱流俗者。书坊辄剿入集注中，殊败人意。"（《杜工部集注三十六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二）《东坡故事》被宋人辑入集注中，影响后世学者。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采信，其流毒可谓深广。另一种伪注是托名王十朋的《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是纂辑宋代已有注，伪造王十朋注而成。刘世珩云："宋人之议，杜注如'苏曰''师曰'之类，严氏羽、陈氏振孙皆直揭其伪，此注具录无遗，显为南宋坊刻。龟龄所见，不至此也。"（影宋刻本《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认为王十朋不会不识当时伪注，而采入自己集注中。洪业云："窃疑伪王集注编纂之法，乃取《六十家注》及《门类十注》等书，依鲁訔编年之目，而改编焉。"（《杜诗引得序》）揭示王十朋伪注的作伪途径。

宋代注释的特点，是北宋基本以个人注为主，而南宋则盛行集注。这是因为，到南宋时，对杜甫集大部分应注的内容都已注了，用集注的形式利用前人的成果，再加以创新，乃是必然的选择。赵次公的注本虽署名为赵彦材，但已采多家之注，带有集注性质，故周采泉说"注中亦时引同时人注，虽无集注名，已启集注之渐"（《赵次公注杜诗》，《杜集书录》内编卷一）。赵次公之

后的杜集注，基本都是集注。如郭知达的注本是集九家注，黄希、黄鹤注本是补千家集注。蔡梦弼的注本虽名为“草堂诗笺”，其注也是辑多家之注，与赵次公相似，有集注之实。

宋人注释，历来评论褒贬颇为不一。钱谦益认为宋人注释芜秽舛陋：“杜诗昔号千家注，虽不可尽见，亦略尽于诸本中。大抵芜秽舛陋，如出一辙。其彼善于此者三家：赵次公以笺释文句为事，边幅单窘，其失也短。蔡梦弼以捃摭子传为博，泛滥踳驳，昧于持择，其失也杂。黄鹤以考订史鉴为功，支离割剥，罔失指要，其失也愚。”（《钱注杜诗·例略》）诚然，宋人的注确实有很多讹误，其解杜也有很多穿凿荒唐的地方，但成就是主要的。钱谦益全盘否定宋人之注，是别有用心。他打击宋人，是为了抬高自己。更有甚者，说宋人注杜而杜亡，更是偏激之辞，不值得深辩。

宋人的注释，在整个杜集的注释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宋人注释有以下特点：

首先，杜集的注释是宋人开创的，其奠基和建设之功就足以在杜甫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次，宋人注释成果巨大。从整个杜集注释的准确与完备而言，宋人的注释总体大致已占到百分之六七十。换句话说，将整个宋代的注汇集到一起，加以去误存真，删芜留精，宋人的注已完成杜集注释准确与完备要求的大半。浦起龙说：“凡注之例三：曰古事，曰古语，曰时事。自鲁訔、王洙、师氏、梦弼之徒，援据亦略备矣。”（《读杜心解·发凡》）这个说法是客观的、符合实际的。

第三，有独特的材料与独特的注释。宋距唐较近，当时见到的很多材料，宋后不少已亡佚。宋人用唐代的资料注释杜集，解释准确，资料信实有力，非常宝贵。没有宋人的注释，杜集会有

很多不可解的地方。有些地方虽可解，但会缺乏有力的资料支撑。但后人对宋代以唐注杜和以宋注杜，重视不够，对利用宋后已亡的资料的注释认识不够，没有充分利用。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注杜集的质量，而且影响了对宋人注杜的总体评价。

第四，宋代杜集注释之作的体例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以注释为主的兼有多方面研究的综合性的研究形式。其包含的重要研究方面有：版本的编辑与校勘、作品编年、作品时代背景的资料、名物典制与事典语典的注释、作品内容的阐释、作品的内容与艺术的评论、前人有关杜甫研究资料的汇编、杜甫的有关生平材料。概括地说，这些注释著作既提供阅读研究杜甫的资料，也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赵次公的《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和蔡梦弼的《草堂诗笺》就是这样的研究著作。这种研究方式和著作形式正是在杜甫研究的不断探索与改进中形成的，是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创造。虽然这种研究方式和著作形式还刚刚形成，还不够完善，只能说是雏形，但意义重大。这种研究方式和著作形式不只是宋以后杜甫集注的主流形式，也是古代文集注的高级的主流形式。

第五，宋人的注释确有很多错误，甚至有今天看来很荒唐可笑者。宋人的学问一般都比较广博，但一些人却粗疏浅陋，加之喜欢用以意逆志和比兴说诗的方法解说杜甫的作品，真有些像指驴为马，郢书燕说。有些注释，宋人自己读着都觉得太低劣，太可笑。王直方说："近世有注杜诗者，注'甫昔少年日'，乃引贾少年；'幽径恐多蹊'，乃引《李广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绝城三冬暮'，乃引东方朔'三冬文学足用'；'寂寂系舟双下泪'，乃引《贾谊传》'不系之舟'；'终日坎壈缠其身'，乃引'孟子少坎坷'；'君不见古来盛名下'，乃引《新唐书·房琯传》

云‘盛名之下为难居’。真可发观者一笑。”(《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载《王直方诗话》)洪刍说:“余尝见一老书生，忘其姓名，自言注老杜诗，取而观之。注‘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生’云:冠:上服，本乎天者亲上，故称冠譬之君子。袴:下服，本乎地者亲下，故举袴譬之小人。虽不为无理，然穿凿可笑。”(《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载《洪驹父诗话》)大量这样低劣的注和荒唐的解，与那些精彩的注解并存，造成鱼龙混杂、玉石俱存的局面。

因此，宋代的杜甫集注释的优异成果为完善的杜甫集的注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一些注释的粗疏讹舛，也为后来重新注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四

宋人非常重视对杜甫生平的研究。生平研究本身既是杜甫研究，同时又是深入全面研究杜甫的重要基础。其指导思想就是宋人常常称引的孟子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也就是所谓知人论世。

宋代所进行的杜甫生平研究，首先是搜集杜甫的生平材料。杜甫的生平材料，新旧唐书所载较为简略，宋人便利用唐五代一切有关书籍，辛勤采摭。应该说，唐五代有关杜甫的生平资料，宋人已基本采入其杜甫研究著作中，已没有什么大的遗漏。

其次，宋人努力用所搜集的资料展示杜甫生活真实而完全的风貌。怎样用杜甫的生平材料简洁全面、生动准确地表现杜甫的生平呢？吕大防创造出年谱这种形式，作成《杜少陵年谱》。非常可贵的是，吕大防创制年谱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有很高的学术境界，那就是便于研究杜甫与社会时事的关系，研究杜甫的忧国忧民思想，同时研究杜甫艺术发展的道路，研究杜甫各时期

艺术的特点。正如吕大防自己在年谱后记中说的："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又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分门集注杜工部诗》载《杜少陵年谱后记》）吕大防的年谱所载杜甫一生的主要大事已基本具备，系年也大致合适，虽稍嫌简略，系年也有错误，但作为开山之作，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已经很了不起了。

年谱体制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它经过发展和完善，遂成为人物生平研究的一种重要形式，成为人物生平研究成果的重要表达形式和载体。年谱经改进与发展，又衍生成众多的研究和体制形式，如作品系年等。年谱体制的创作，对学术的影响是巨大的。

自吕大防作《杜少陵年谱》后，宋代产生了很多杜甫年谱。很多宋代注杜之家都作有杜甫年谱，一些不注杜的学者也作有杜甫年谱。宋代重要的杜甫年谱作家主要有吕大防、赵子栎、鲁訔、黄鹤和王应麟。赵子栎在吕大防之后，对杜甫的系事有所推进。鲁訔所作杜甫年谱已是大事基本具备，布局基本合理，系年大致正确，堪称一部较完整的杜甫年谱。黄鹤在杜甫生平的研究方法和体例上又有发展，对杜甫的生平研究深入细致，同时扩展研究范围，对其一些重要友人也进行了研究。黄鹤对杜甫生平的研究已相当细致与完美，尽管其中也有一些错误，但代表了宋代杜甫生平研究的水平。实际上，就整个杜甫学术史而言，黄鹤的杜甫生平研究，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后代的研究者主要是校正、完善、拓展他的研究，似乎还没有人能超越他。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超越。

宋代对杜甫生平研究的贡献是特殊的，成果是非常大的。

五

关于杜甫作品思想内容研究。宋人非常重视对杜甫作品的内容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杜甫的作品真实形象地表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特别是安史之乱后）的社会重大事件，表现了杜甫的生活经历。宋人最服膺唐人的诗史说，评论中运用最多，并有所发展。李复说：“杜诗谓之诗史，以班班可考当时，至若诗之序事，亦若史传矣。”（《与侯谟秀才书》，《潏水集》卷五）蔡居厚说：“子美善叙事，故号诗史。”（《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八辑《蔡宽夫诗话》）陈岩肖说：“杜少陵子美诗，多纪当时事，皆有依据，古号诗史。”（《庚溪诗话》卷上）杜诗写重大的历史事件，魏泰说：“李光弼代郭子仪，入其军，号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曰：‘三军晦光彩，烈士痛稠迭。’前人谓杜甫句为诗史，盖谓是也。非但叙尘迹，摭故实而已。”（《临汉隐居诗话》）潘錞说：“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激发而然。”（方深道《诸家老杜诗评》卷四辑潘錞《诗话补遗四十九事》）宋人详细研究杜诗叙述自己的经历与生活。葛立方说：“老杜当干戈骚屑之际，间关秦陇，负薪采梠，铺糒不给，困踬极矣。自入蜀依严武，始有草堂之居。观其经营往来之劳，备载于诗，皆可考也。其曰‘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者，言其地也。‘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者，言其时也。‘雪里江船渡，风前径竹斜。寒鱼依密藻，宿鹭起圆沙’者，言其景物也。……以史及公诗考之，草堂断手于宝应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严武卒，是年秋，公寓夔州云安县，有此草堂者，仅阅岁而已。”（《韵语阳秋》卷六）葛立方又说：“杜子美身遭离乱，复迫衣食，足迹几半天下。自少时游苏及越，以至作谏官，奔走州县，既皆

载壮游诗矣。其后《赠韦左丞》诗云：‘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则自长安之齐鲁也。《赠李白》诗云：‘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则自东都之梁宋也。《发同谷县》云：‘贤有不黔突，圣有不暖席。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则自陇右之剑南也。《留别章使君》云：‘终作适荆蛮，安排用庄叟。随云拜东皇，挂席上南斗。’则自蜀之荆楚也。夫士人既无常产，为饥所驱，岂免仰给于人，则奔走道途，亦理之常耳。”（《韵语阳秋》卷二〇）宋人认为杜诗善于描写心理活动、心路历程。黄彻说：“士人程文，穷日力作一论，既不限声律，复不拘语句，尚罕得反复折难，使其理判然者。观《赴奉先咏怀》五百言，乃声律中老杜心迹论一篇也。自‘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其心术所向，自是稷、契等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与饥渴由己者何异。然常为不知者所病，故曰‘取笑同学翁’。世不我知，而所守不变，故曰‘浩歌弥激烈’。又云：‘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当今廊庙具，建（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言非不知隐遁为高也，亦非以国无其人也，特废义乱伦，有所不忍。‘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言志大术疏，未始阿附以借势也。为下士所笑，而浩歌自若，皇皇慕君而雅志栖遁，既不合时而又不少低屈，皆设疑互答，屡致意焉。非巨刃有余，孰能之乎？中间铺叙，间关酸辛，宜不胜其戚戚。而‘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所谓忧在天下，而不为一己失得也。禹、稷、颜子不害为同道，少陵之迹江湖而心稷、契，岂为过哉！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蚤谋先定，出处一致矣。是诗先后周复，正合乎此。昔人目元和《贺雨》诗为谏书，余特目此诗为心迹论也。”（《碧溪诗话》卷一〇）宋人认为杜甫的诗是将对主观（即诗人的

思想情感）的表现与对客观（世界）的表现结合起来。张戒说：“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岁寒堂诗话》卷上）

宋人认为杜甫诗内容非常广泛，心中的一切、世间的一切皆写入诗中。胡铨说：“少陵杜甫耽作诗，不事他业，讽刺、讥议、诋诃、箴规、姗骂、比兴、赋颂、感慨、忿懥、恐惧、好乐、忧患、怨怼、凌遽、悲歌、喜怒、哀乐、怡愉、闲适、凡感于中，一以诗发之。仰观天宇之大，俯察品汇之盛，见日月、霜露、丰隆、列缺、屏翳、沆瀣、烟云之变灭，云岩、邃谷、悲泉、哀壑、深山、大泽、龙蛇之所宫，茂林、修竹、翠筱、碧梧、鸾鹄之所家，天地之间，恢诡谲怪，苟可以动物悟人者举萃于诗。故甫之诗，短章大篇，纡余妍而卓荦杰，笔端若有鬼神，不可致诘。后之议者至谓书至颜画至于吴诗至于甫极矣。”（《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宋人从表现的力度来研究杜诗，认为杜诗非常有高度和深度。郑印说：“读少陵诗，如驰骛晋楚之郊。以言其高，则邓林千岩，楩楠杞梓，扶疏摩云。以言其深，则溟波万顷，蛟龙鼋鼍，徜徉排空。”（《杜工部诗序》，《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喻汝砺则总结说：“少陵之诗……根于忠信孝弟，著于君臣、夫妇、朋友。其纡余扶疏，宛转附物，雍容而不迫，愔愔乎如揖逊议论冠佩于一堂之上，父坐子立，雝雝俞俞于闺庭燕豆礼乐之间。至夫陈古道今，劝直而惧佞，抑淫侈倖巧而崇节义恭俭，槁焉增伤，愍恻当世。妇子老儒之骚离，赋敛征戍之棘数，哀怨疾痛，愊憝隐闵无聊之声，不啻迫及其身而亲遭之。其于治乱隆废，忠佞贤否，哀乐忻惨，起伏之变，衍迤纵肆，无乎不备。忽忽乎其能化也，就就乎其能通道达物也，越越乎其总一神明而通万类也。游之于肯綮众虚之间，寓之于无所终始之际，激之以海水荡潏、飞云屑雨之声，吁不得其极也。”（《杜工部草堂记》，《成都

文类》卷四二)

研究杜甫作品的思想，实际上也是研究杜甫的思想，研究杜甫其人。

宋代是儒学思想浓厚的时代，对杜甫作品的思想研究，或者说对杜甫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儒家的立场与思想出发的。

宋人认为杜诗充分表现了儒家思想，有儒者气象。陈模说："杜诗'江清歌扇里，野旷舞衣前'，'竞将明媚色，偷眼艳阳天'，其咏丽人，亦造妙矣。然次篇终之曰：'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又如'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石角钩衣破，藤枝刺眼新'。而次篇亦曰：'谁能共公子，薄暮俱与还。'此皆所谓乐而不淫者也。《可惜》云：'花飞有底急，老去愿春迟。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说得情已极至，却又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却又宽心一着说了，所谓哀而不伤者也。《领妻子赴蜀山行》云：'物役水虚照，魂伤山寂然。我生无倚着，尽室畏途边。'末篇则云：'转石惊魑魅，抨弓落狖鼯。真供一笑乐，似欲慰穷途。'意亦如此。他人言乐，则必至于□流，言哀则必至于伤。故陆象山曰：韩退之、杜工部有儒者气象。"(《怀古录》卷上)宋人认为，杜甫之所以能成为最伟大的诗人，在于他有最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苏轼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生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书吴道子画后》，《东坡集》卷二三)宋人认为杜甫思想的核心是爱民。黄彻说："《孟子》七篇，论君与民者居半。其余欲得君，盖以安民也。观杜陵'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寄柏学士》云：'几时高议排君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广大，异乎求穴之蝼蚁辈，真得孟子所存矣。东坡

问：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予谓老杜似孟子，盖源其心也。”（《碧溪诗话》卷一）将杜甫比作孟子，可谓推尊之至。宋人认为杜甫的诗集中表现了三方面的思想：仁义、忧国和忠君。而这三者正是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具备仁义、忧国和忠君是做人的最高境界。表现这三者，使杜甫成为最伟大的诗人。李纲说：“平生忠义心，多向诗中剖。忧国与爱君，诵说不离口。”（《唐工部员外郎杜甫》，《梁溪先生文集》卷一七）楼钥说：“工部之诗，真有参造化之妙，别是一种肺肝，兼备众体，间见层出，不可端倪。忠义感慨，忧世愤激，一饭不忘君，此其所以为诗人冠冕。”（《答杜仲高（旃）书》，《攻媿集》卷六六）他们抓住了杜甫作品思想的根本。宋人认为杜甫作品的思想完全符合儒家思想，可以说是“思无邪”。张戒说：“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世儒解释终不了。余尝观古今诗人，然后知斯言良有以也。《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删诗，取其诗无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唯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鲁直虽不多说妇人，然其韵度矜持，冶容太甚，读之足以荡人心魄，此正所谓邪思也。鲁直专学子美，然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岂可与鲁直诗同年而语哉!”（《岁寒堂诗话》卷上）“思无邪”这个评价标准看似平常，实际上要求极高。张戒实际上是说杜甫的诗达到了孔子要求的最高标准，即杜甫的诗完全符合儒家的思想要求（也包括艺术要求），不杂其他不正的东西，体现了醇正的儒家思想，达到了诗的思想（也包括艺术）的最高境界。应该说，宋人对杜甫作品思想的宏观研

究是全面的，把握也比较准确，也很有深度。

宋人研究杜甫作品的思想，也存在两大缺陷。其一，研究方法生硬，喜欢用儒家思想来硬比或硬套杜甫的作品，其研究往往不够贴切，像贴标签似的，没有真正阐扬杜诗的实质与精髓。其二，穿凿附会，对杜诗的理解与解说严重偏离杜诗的主旨。宋人研究文学多用孟子的“以意逆志”的方法和比兴说诗的方法，而他们的头脑中都有一个框框，认为杜甫的诗都有着重大的政治思想意义，都是微言大义，故而对一些杜诗的解说出现很大偏差，特别是对一些咏物诗或咏物诗句，写景诗或写景诗句，其解说到了荒谬可笑的境地。在注中有这种情况，前面我们已经举了一些例子。在研究与解说中，这种情况也相当多。杜甫的《登慈恩寺塔》是登高览胜之作，抒写杜甫对政治时事的忧虑和怀才不遇的苦闷。而胡舜陟解云：“《登慈恩寺塔》诗，讥天宝时事也。山者，人君之象，‘秦山忽破碎’，则人君失道矣。贤不肖混殽，而清浊不分，故曰‘泾渭不可求’。天下无纲纪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于是思古之圣君不可得，故曰‘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是时明皇方耽于淫乐而不已，故曰‘惜哉瑶池饮，日宴昆仑丘’。贤人君子多去朝廷，故曰‘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求’。唯小人贪窃禄位者在朝，故曰‘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二辑《三山老人语录》）言诗讥天宝时事，本不错，而诗本写景，却用君等一一坐实，便失之附会。杜甫的《江村》本是写杜甫在成都的家庭生活，而释惠洪却解作杜甫写君臣关系，有人更说老妻比杨贵妃，稚子比安禄山，连宋人师古都觉得过于穿凿。师古说：“子美《江村》诗云：‘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为钓钩。’谓‘妻比臣，夫比君。棋局，直道也。针本合直而敲曲之，言老臣以直道成帝业，而幼君坏其法。稚子，比幼君也’。此《天厨禁脔》之说也。

或说老妻比杨贵妃，稚子比安禄山，盖禄山为贵妃养子。棋局，天下之喻也。贵妃欲以天下私禄山，故禄山得以邪曲，包藏祸心。此说似为得之。虽然，子美之意亦不如此。老妻、稚子，乃甫之妻子，甫肯以一己之妻子而托意于淫妇与逆臣哉！理必不然。且如《进艇》诗云：‘尽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则又将所何比况乎？此皆村居与妻子闲情以自乐，故形之诗咏，皆若托意于草木鸟兽之类，不宜区区肆穿凿也。”（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一，四库全书本）师古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大量穿凿附会的注和解说误导了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人富有创见的、精湛的杜甫学成果，仿佛在香喷喷的米饭中夹着一些沙子。

研究杜甫作品的艺术，主要是研究杜诗的艺术。

宋人对杜诗的风格有深透的研究。《新唐书·杜甫传》的论述，可作为代表。其文云：“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王得臣的论述也很精彩。他说：“唐兴，承陈、隋之遗风，浮靡相矜，莫崇理致。开元之间，去雕篆，黜浮华，稍裁以雅正。虽绨句绘章，人得一概，各争所长，如大羹元酒，则薄滋味。如孤峰绝岸者，则骇廊庙。秾华可爱者乏风骨，烂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之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今涵古，无有端涯。森严昭焕，若在武库，见戈戟布列，荡人耳目，非特意语天出，尤工于用字，故卓然为一代冠，而历世千百，脍炙人口。”（《增注杜工部诗集序》，见《草堂诗笺》）

苏轼认为杜甫诗歌集诗歌艺术之大成，达到了诗歌艺术的高峰。他说：“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书吴道子画后》，《东坡集》卷二三）所谓杜诗集大成，

就是杜甫总结古今诗歌艺术，并加以创新发展，从而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他的论述是非常精辟的。秦观发展了苏轼的观点，认为杜甫是集诸家之长，顺应社会的需要加以发展，而成为最伟大的诗人。他说："杜子美之于诗，实集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韩愈论》，《淮海集》卷四）强调社会环境对艺术创造的伟大影响与作用，远远高出封建社会一般的、单纯研究技巧的学者之上。

宋人认为杜甫诗的艺术是根据内容的需要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像一般诗人刻意追求某种风格，以至于不管什么内容的诗写出来味道都一样。杜甫的诗是艺术随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内容多样，艺术也多样。一切都可用作诗歌技巧，作诗也就游刃有余。张戒说："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苏端明诗，专以刻意为工。李义山诗，只知有金玉龙凤。杜牧之诗，只知有绮罗脂粉。李长吉诗，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间一切皆诗也。唯杜子美则不然。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故曰'吟多意有余'。又曰'诗尽人间兴'。诚哉是言。"（《岁寒堂诗话》卷上）张戒从创作理念上分析，认为杜甫的艺术观念比一般著名诗人高明，故其艺术也比他们高明。宋人认为文章华丽，并没有坏处，关键是看用得合不合理。杜甫的诗穷尽理性，其艺术巧夺天工而极美。范温《诗眼》曰："世俗喜绮丽，知文者能轻之。后生好风花，老大即厌之。然文章论当理不当理耳。苟当于理，则绮丽风光，同入于妙。苟不当理，则一切皆为长语。上自齐梁诸公，下至刘梦得、温飞卿辈，往往以绮丽风花累其正性，其过在于理不胜而诗有余也。子美云：'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岸花飞送客，

檣燕语留人。’亦极绮丽，其模写景物，意自亲切，所以妙绝古今。其言春容闲适，则有‘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其言秋景悲壮，则有‘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其富贵之词，则有‘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动炉烟转，孔雀徐开扇影还’。其吊古，则有‘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于风花，然穷尽性理，移夺造化。自古诗人，巧即不壮，壮即不巧。巧而能壮，乃如是也矣。”（《杜工部草堂诗话》，蔡梦弼《草堂诗笺》）从文章文辞华美与内容是否积极来研究杜诗，眼光独到。

宋人对杜甫的创作方法有深入的研究。张戒认为杜甫诗的重要特点是将抒情与叙事结合起来。他说：“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古诗，苏李曹刘陶阮，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于无愧，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潘陆以后，专以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大抵句中若无意味，譬之山无烟云，春无草树，岂复可观？阮嗣宗诗专以意胜，陶渊明诗专以味胜，曹子建诗专以韵胜，杜子美诗专以气胜。然意可学也，味亦可学也。若夫韵有高下，气有强弱，则不可强矣。此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世徒见子美之诗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自曹刘死，至今一千年，唯子美一人能之。中间鲍照虽有此作，然仅称俊快，未至高古。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至于卢仝，遂有‘不唧溜钝汉’‘七碗吃不得’之句，乃信口乱道，不

足言诗也。近世苏黄亦喜用俗语，然时用之，亦颇安排勉强，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子美之诗，颜鲁公之书，雄姿杰出，千古独步，可仰而不可及耳。”（《岁寒堂诗话》卷上）论述杜甫的诗善于将思想感情的表达与叙事结合，而诗的主旨又是表达杜甫的思想，而表达的语言又是天然的最有生活韵味的语言。此评论非常有见地。宋人还认为杜甫的诗的重要特点是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以文为诗。黄庭坚认为杜甫学问广博，并把学问都用在诗中。特别是语言，都可以找到书本的依据。这个说法虽然偏激，但也从一种角度揭示了杜诗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陈善说：“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世传以为戏，然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诗，则句语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谢玄晖曰：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此所谓诗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虽不用偶俪，而散句之中暗有声调，步骤驰骋亦有节奏。此所谓文中有诗也。前代作者皆知此法，吾谓无出韩杜。观子美到夔州以后诗，简易纯熟，无斧凿痕，信是如弹丸矣。退之《画记》铺排收放，字字不虚，但不肯入韵耳。或者谓其殆以甲乙帐，非也。以此知杜诗韩文缺一不可。世之议者，遂谓子美无韵语，殆不堪读，而以退之之诗殆为押韵之文者，是故足以为韩杜病乎？文中有诗，诗中有文，知者领予此语！”（《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扪虱新话》上集卷三）从理论的高度论述了杜甫以文为诗、以诗为文的特点，非常深刻。宋人认为杜甫诗绪密思深，艺术变化无穷。王安石说：“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密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寂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藉若贵公子者。盖其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遁斋闲览》载王

安石语，《诸家老杜诗评》）

六

宋代的杜甫学是宋代最热门的学术领域之一，其昌盛可以与宋代的经学相比。宋代经学的研究方法，几乎都被用到杜甫学中。因为在很多宋人的眼中，杜甫集就是未列入经典的经典。所以，很多宋人认为，只有用研究经学的方法，才能真正将杜甫研究透。而杜甫的作品又是文学作品，不同于一般的经书，还必须用研究文学的方法来研究。因而宋代杜甫学还大量使用研究文学的方法来研究杜甫。所以，宋代杜甫学的研究方法比经学更丰富。从宏观看，宋代杜甫学是宋代学术领域中最前沿、最具活力的领域。可以说，几乎一切学术理念与方法都在这里运用，很多新的学术理念与方法都在这里诞生。

现在我们就谈谈宋代杜甫学创造的学术研究方法与新的学术成果形式。

（一）年谱。

所谓年谱，就是将人物一生的重要事迹，按年月先后逐一编排的形式。这是吕大防在杜甫和韩愈的研究中，创造出的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表述形式。其名称是《杜工部年谱》和《韩文公年谱》。这里只谈杜甫年谱。杜甫年谱经鲁訔和黄鹤发展，已基本成熟和完善。对杜甫的主要生平的研究也基本定型。

年谱对研究人物（谱主）一生的经历和思想有重要的作用。有些年谱还编有时代背景材料，对了解人物与社会的关系也有重要的作用。如果人物是作家，对研究人物与创作的关系也有重要的作用。

自年谱产生后，这种形式迅速发展，广泛运用，成为古代研究人物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重要的成果表述方式。宋以后，重要的

人物几乎都编有年谱。今天很多重要的人物，人们还为他们编年谱。

年谱这种形式影响非常大。实际上，大事记、年鉴等形式的产生，应该说都和年谱有些关系。直白地说，它们都是由年谱的形式发展而来。

（二）作品系年。

所谓作品系年，是将可以确定写作时间的作品标出写作时间，以便对作品作深入的研究。如可系年的作品比较多，可将作品按写作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称作编年。这是作品编排的最高境界。

杜甫作品的系年是由黄睿思开创的。在此之前，作家有在作品下注明写作时间的，而由研究者大量为作家作品系年，应该说在学术史上黄睿思是创始者。而他又是接受苏轼的观点来做的，所以理念的创造者是苏轼。作品系年又是经鲁訔和黄鹤发展而基本定型和完善。黄鹤的杜甫作品系年在《黄氏补注千家注杜工部诗》中，鲁訔的杜甫作品系年则为蔡梦弼完全采用而保存在《草堂诗笺》中。

作家作品系年不仅有助于研究所系年的作品，而且可以结合作家的生平，对研究作家的整个创作历程、创作的发展变化非常有益。自宋代以后，作家作品系年便成为作家作品与创作历程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和成果表述方式。这种方式和成果表述形式，至今仍在广泛运用。

（三）注释与研究结合的范式。

宋人在对杜甫集的注释中，不断创造，逐渐形成一种注释的体系。这个体系是由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和蔡梦弼的《草堂诗笺》初步建立的。这个体系主要包括两方面：有关作家与作品的文献资料和作品的文献注释。注者自己有

关作家与作品的研究心得与成果。总之，这个成果不只是一般的文献注释，而是注者对作家进行的全方位的研究成果。这种注释体系有以下内容与特点：其一，以注释为主。对作品进行全面详细的注释。注释有时采取集注形式。汇集前人的优秀成果，并有自己的发明。其二，有作品编年。其三，在作品后有注者对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往往包括内容与艺术两方面。其四，附有作家年谱。其五，有前人关于作家和作品的评论资料。这种注释体系的成果虽然仍然以“注”为名，而实际上为读者提供的是最新、最全面的作家文献与研究资料。而对注者来说，也是全面展示自己学术才能与成果的极佳形式。故而在后来逐步发展，这种形式日臻细密和完备。这种注释体系与形式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喜用。

（四）评点。

评点又称批点，是一种自由而短小的作家作品评论形式，一般是直接写在作品旁边的。还有对佳作的加圈和加点，这种圈点其实也是一种评论。后来，有的评点篇幅已是洋洋数百言，甚至字数更多。

评点这种形式是南宋道学家评论故发明的。在此之前，黄庭坚研究杜甫，对杜甫集作笺注，有些笺极短而又有评论的性质，已有评点的意味。刘辰翁继承评点的方法，用来评点杜甫、李白、王维、孟浩然等诗集，对评点这种形式加以创新、丰富和发展。使其更成熟，更有表现力。

评点的最大优点是能自由快捷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故而很受学者欢迎。自元代出版刘辰翁的杜诗评点等著作后，元代、明代和清代的评点之作蜂起，蔚为大观。其评点不仅广泛用于杜诗研究中，而且普遍用于很多重要作家的研究中。只要学者愿意，可以用于任何一篇作品、一部著作的研究。评点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表达形式，至今仍有学者使用。

七

杜甫学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由杜诗的内容触发一些社会方面的学术研究。这是由杜诗的“诗史”性质决定的。杜诗真实地、具体地、细致地记录了一些社会现象，一些重要的社会事件和人物，因而可以触发广泛的学术问题的研究。宋代杜甫学由此而研究的问题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物等，十分广泛。研究的特点是由杜诗的有关内容提出一个相关的话题，伸展开去，同时以杜诗作为一种论证资料，再寻求其他的资料来论证，得出结论。比如唐代尉簿一类下级官吏被长官责打的问题。宋人谈论甚多，如陈正敏《遁斋闲览》、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四《唐参军簿尉不免杖》）。王楙《参军簿尉》云：“杜诗‘脱身簿尉中，始免棰楚辞’。鲍注：非谓簿尉受杖，杖有罪者尔。退之谓‘栖栖法曹掾’，‘敲榜发奸偷’，此岂受杖者耶？仆谓不然。子美之意，正谓属吏受长官之杖，非谓杖有罪者。官属受杖，其来久矣。且前汉王嘉为相，裸躬受笞，其他可知。司马迁谓陵夷至于棰楚之间，观此则知古人当官，有过亦必受杖。此犹有说，谓臣下有过，受人君之杖耳，非上官之杖也。仆观后汉戴宏为郡督邮，曾以职事见诘，府君欲挞之云云。《三国志》：黄盖为守长，署两掾，教之曰：若有欺奸，终不加以鞭杖，宜各尽心。此正明验古人吏属受杖之说也。自晋至唐，此类尤多。注诗者自不深考耳。姑摭数端。《世说》载：太守刘淮杖主簿向雄，后同在政府，不交言。武帝敕雄复修君臣之好。《北史》：库狄连为郑州开府，参军皆加捶挞。魏收为中外府主簿，频被棰楚。《唐书》：邕州经略史陈昙，怒判官刘缓，杖之二十五而卒。浙江观察使韩皋封杖决安吉令孙解，臀杖十下而死。刘晏考所部官六品以上，杖论而奏。杜牧之谓尹坐堂上，阶下拜两赤县令属官将百人，悉

可笞辱。其诗又曰：'参军与县尉，尘土惊劻勷。一语不中治，笞棰身满疮。'韩退之诗曰：'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举此以验，杜诗之意可见矣，岂谓杖有罪者耶？古之官属，动必加杖。加杖犹可，或致之死，如张敞弃絮掾市之类是也。上官之权甚重而属吏益卑，凛然度日，不啻君臣之相临。唐犹庶几，汉时尤甚。自入国朝，官守上下之分虽严，然此例削矣。上自宰相，下至监当，均谓比肩事主，非唯无棰笞之辱，且省廷拜之礼，正所以示一统尊王之意云。"（《野客丛书》卷二〇）考证宋以前长官笞打属吏之事精详，说明长官与属吏的关系完全像君臣关系。这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官员之间的关系，非常有益。洪迈研究唐代士人以藩镇幕府辟置为重，而其职非常繁忙。其《唐藩镇幕府》云："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从诸藩府辟置为重，观韩文公《送石洪温造二处士赴河阳幕序》可见礼节。然其职甚劳苦，故亦或不屑为之。杜子美从剑南节度严武辟为参谋，作诗二十韵呈严公云：'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简遂匆匆。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不曾寻别业，未敢息微躬。''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而其题曰《遣闷》，意可知矣。韩文公从徐州张建封辟为推官，有书上张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节目十余事来。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宽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率以为常，亦不废事。苟如此，则死于执事之门无悔也。杜韩之旨大略相似云。"（《容斋随笔》卷一）从这个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唐代藩镇幕僚工作的大致情况。宋代因杜甫诗"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而展开对酒价、货币、经济的研究很多。王观国云："说者谓祖宗朝尝问大臣当时酒价，大臣对以一斗三百。引杜子美诗'速宜相

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为据。观国窃谓古今酒价，视时而贵贱。方兵兴多事及饥馑艰食，则酒价必贵，及时平则贱，此乃常理，固不可以一概论也。《唐书·食货志》曰：乾元初，京师酒贵，盖肃宗复两京之后，不得不贵也。建中三年，禁民沽酒，官置肆酿酒，斛收值三千。贞元二年，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酒钱百五十。盖德宗时天下复富庶，故酒价不得不贱也。然则唐之酒价贵贱，岂有常耶？诗人之言，或夸大，或鄙小，本无定论。曹植《名都篇》曰：‘归来燕平乐，美酒斗十千。’此夸大之言也。设有问魏之酒价者，则有十千一斗对之耶？《前汉·昭帝纪》曰：始元六年，卖酒升四钱。盖升四钱，则斗为钱四十耳。《史记·平准书》：汉兴，接秦之弊，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今按石万钱者，米斗为一千也。苟米斗一千，则斗酒卖钱四十，可乎？此所谓视时而贵贱者也。杜子美《盐井》诗曰：‘自公计三百，转致斛六千。’夫物价低昂在反手之间，岂有定也。”（《学林》卷八《物价》）论述酒价是随物价，随社会形势动态而变化的。文中论唐宋和秦汉的币值与币制非常细致，引文太长，故此不征引。宋代由杜甫诗为话题引起的学术研究确实领域广阔，而视角也比较独特。

八

宋人研究杜甫，超越唐人的地方，在于他们首先不是着眼于文人来观察杜甫，而是站在更高层面上，首先是把杜甫作为一个人来考察，即研究他的思想、道德、品格。宋代是新儒学盛行的时代，宋人特别重视从儒家的思想道德的角度来研究杜甫和杜甫的著作。

宋人对杜甫评价极高。由于杜甫的思想与品格主要是通过他的作品来表现，关于杜甫思想与品格的较为具体的东西，我们将在

他的作品内容研究时来谈，这里只谈宋代关于杜甫的总体评价。

宋人推崇杜甫为孟子一样的圣贤。张戒称其为圣贤，称杜诗为“圣贤法言”（《岁寒堂诗话》卷上）。宋人认为，杜甫精通儒家经典，有高尚的道德，有王佐之才，有济世之心，忠君爱国，忧世忧民。李复说：“盖子美，深于经术者，其言多止于礼义。”（《与侯谟秀才书》，《潏水集》卷五）赵次公说：“杜陵野老，负王佐之才，有意当世，而肮脏不偶，胸中所蕴，一切写之以诗。其曰‘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又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其素愿也。至其出处，每与孔孟合。‘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则其迟迟去鲁之怀。‘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则有皇皇得君之意。”（《杜工部草堂记》，《成都文类》卷四二）苏轼说：“子美自比稷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稷、契辈人口中语也。”（《评子美诗》，《东坡题跋》卷二）朱翌说：“凄其忧世心，妙若医国扁。”（《读杜诗至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舟人偶来告饥似诗谶也》，《隐居通议》卷一七）李觏认为杜甫是大贤，是尧舜之道的复兴者，是儒教的复兴者。他说：“赖天启唐室，生大贤以维持之。李杜称兵于前，韩柳主盟于后。诛邪赏正，方内向服。尧舜之道，晦而复明。周孔之教，枯而复荣。”（《上宋舍人书》，《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二七）像孟子一样的圣贤，是封建社会对人所能做的最高评价，而杜甫是当得起这样的评价的。

关于杜甫在文坛的定位，宋人沿袭唐人的评价，认为李白和杜甫是古今最伟大的诗人。但和唐代略有不同的是，绝大多数宋人在同意李杜并称的同时，赞同元稹的观点，认为杜甫胜于李白。

宋人认为，杜甫所以能成为最伟大的诗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伟大的思想与道德。楼钥说：“工部之诗，真有参造化之妙，

别是一种肺肝，兼备众体，间见层出，不可端倪。忠心感慨，忧世愤激，一饭不忘君，此其所以为诗人冠冕。”（《答杜仲高（旃）书》，《攻媿集》卷六六）李纲说：“杜陵老布衣，饥走半天下。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是时唐室卑，四海事戎马。爱君忧国心，愤发几悲咤。孤忠无所施，但以佳句写。风骚到屈宋，丽则凌鲍谢。笔端笼万物，天地入陶冶。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使居孔氏门，宁复称赐也。残膏与剩馥，沾足沾丐者。呜呼诗人师，万世谁为亚。”（《读四家诗选并序·杜子美》，《梁溪先生文集》卷九）人品决定诗品，认为只有像杜甫这样的圣贤才能成为伟大的诗人。此见解是非常深刻的。

张戒将杜甫比作诸葛亮、王吉、贡禹等古代贤能的名臣，他说：“少陵在布衣中，慨然有致君尧舜之志，而世无知者，虽同学翁亦颇笑之，故‘浩歌弥激烈’，‘沉饮聊自遣’也。此与诸葛孔明抱膝长啸无异。读其诗，可以想其胸臆矣。嗟夫！子美岂诗人而已哉！其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又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方幼子饿死之时，尚以常免租税，不隶征伐为幸，而思失业徒，念远戍卒，至于‘忧端齐终南’，此岂嘲风咏月者哉！盖深于经术者也，与王吉、贡禹之流等矣。”（《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岁寒堂诗话》卷下）

九

杜甫为什么能成为最伟大的诗人，这是宋代杜甫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

宋人认为，杜甫具有醇正的儒家思想，具有惊人的文学天赋，经历极盛的开元盛世到动乱的安史之乱，是时势把他造就为

最伟大的诗人。关于这方面，宋人论述颇多。虽各个学者所论述的角度有所不同，很多时候只论述一个或两个方面，但从宏观看，从综合看，整个宋代的论述是详备的，是深刻的。这在我们前面引的材料中已经基本反映出来了，此不赘述。这里着重谈谈宋人研究杜甫对文化，特别是对诗歌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宋人认为，杜甫有极为广博的社会生活，遍读群书，真正掌握了艺术创作的规律，随意挥洒，皆是绝妙的诗。王直方认为杜甫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说："信乎，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可看杜诗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辑《王直方诗话》）施德操说："正夫尝论杜子美、陶渊明诗云：子美读尽天下书，识尽万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盘礴郁积于胸中，浩乎无所不载，遇事一触，辄发之于诗。渊明随其所见，指点成诗，见花即道花，遇竹即说竹，更无一点作为。故予尝有诗云：'子美学古胸，万卷郁含蓄。遇事时一挥，百怪森动目。渊明淡无事，空洞抚便腹。物色入眼来，指点诗句足。彼直发其藏，此但随所瞩。二老诗中雄，同人不同曲。'盖发于正夫之论也。"（《北窗炙锞》卷下）撇开陶渊明不谈，正夫的说法是非常有见地的。他说杜甫所以能成为最伟大的诗人有两点，一是理性认识。读尽天下书，认识事物的规律。二是感性认识。观天地造化，古今事物，历练生活。施德操的诗只谈了理性的一面，忽略了感性的一面。当然，这是作诗，不能把道理说得那样严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实，宋人对杜甫历练生活，有助于技巧的提高谈论很多。如杜甫诗写到自己因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顿悟，诗艺大为长进，宋人就给予很多肯定与发挥。

宋人认为，杜甫所以能成为最伟大的诗人，是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诗歌传统和一切优秀文化。晁说之说："苟不上自虞歌、周、鲁、商诗，下逮楚骚、建邺七子、陶、谢、颜、鲍、阴、何

以观杜诗，则莫知斯人平生所用心也。”（《送王性之序》，《嵩山文集》卷一七）杜甫好《文选》，实际上是对古代文学进行全面广泛的学习。郭思说：“子美教其子曰：‘熟兹《文选》理。’《文选》之尚，不爱奇乎？今人不为诗则已，苟为诗，则《文选》不可不熟也。《文选》是文章祖宗，自两汉而下，至魏、晋、宋、齐，精者斯采，萃而成编，则为文章者，焉得不尚《文选》也。唐时文弊，尚《文选》太甚。李卫公德裕云家不蓄《文选》，此盖有激而说也。老杜于诗学，世以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观其诗，大率宗法《文选》，摭其华髓，旁罗曲采，咀嚼为我。语自老杜，体格无所不备。斯周诗以来，老杜所以为独步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辑《瑶溪集》）

宋人还研究了杜甫向唐代诗人学习的情况。王得臣谈杜甫受祖父杜审言的影响：“杜审言，子美祖父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有‘雾绾青丝弱，风牵紫蔓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子美：‘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语春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风矣。”（《麈史》卷中）孙奕论述杜甫化用李义府、沈佺期、孟浩然的诗句。他说：“老杜《戏为》诗曰：‘未及前贤更无疑，递相祖述复先谁。’所谓夫子自道也。……《春日忆李白》云：‘何时一尊酒，重与李膺倾’（按：应为“重与细论文”）即孟浩然‘何时一杯酒，重与李膺倾’之体。《复愁》云：‘月生初学扇，云细不成衣。’即李义府‘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之体。”（《递相祖述》，《履斋示儿编》卷九）又说：“（杜诗）《寒食舟中》云：‘雪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用沈佺期云：‘雪白山青千万里，几时重谒圣明君。’《寒食舟中》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用沈佺期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镜中行。’”（《用古今句法》，《履斋示儿编》卷九）

这不过是举例似的引证。宋人对杜甫向唐代诗人学习的论述很多，其中包括学习创作精神、创作形式（如学习格律诗）、创作技巧，化用或袭用语言等。

一〇

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是社会的精神食粮，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宋代杜甫学对杜甫的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自杜甫生前至宋的杜甫学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为了节省篇幅，笔者将自己对宋代杜甫学的看法和宋人对唐代和宋代杜甫学的研究进行综合论述。

宋代一直把杜甫的诗看作经书。“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使居孔氏门，宁复称赐也。”（李纲《读四家诗选四首·子美》，《梁溪先生文集》卷九）张戒认为杜甫诗有《诗经》一样巨大的教育作用。他说：“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世儒解释终不了。余尝观古今诗人，然后知斯言良有以也。《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删诗，取其思无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然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岁寒堂诗话》卷上）费士戣认为杜甫有巨大的人格魅力，其影响有益于政治。《漕司高斋堂记》云：“况少陵忠义之气，根于素守，虽困踬流落，而一日未尝忘君。后之来者，傥观遗像而念其行藏，瞻斋颜而企其节义，则爱君爱国之念，油然而生，其补于政治，岂浅浅哉！”（《全蜀艺文志》卷三四下）朱熹认为杜甫诗可以作为教育女性及儿童的教材。他在给刘子澄的两封书信中说：

"文章尤不可泛。……叙古《蒙求》亦太多，兼奥涩难读，恐非启蒙之具。却是古乐府及杜子美诗，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讽咏，易入人心，最为有益也。"（《答刘子澄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五）"向读《女诫》，见其言有未备及鄙浅处，伯恭亦尝病之。尝欲别集古语，如小学之状，为数篇，其目曰正静，曰卑弱，曰孝爱，曰和睦，曰俭质，曰宽惠，曰讲学。班氏书可取者，亦删取之。如正静篇，即如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语，亦可如。"（《又答刘子澄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五）虽然朱熹所要编之书未编成，但宋代蒙童读本普遍都有杜诗（特别是南宋时期）。曾噩说："独少陵巨编，至今数百年，乡校家塾，龆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九家集注杜诗序》，《九家集注杜诗》）苏轼还用杜甫的诗教育海南父老，移风易俗。苏轼说："'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十有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当供给。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面妆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海南亦有此风，每诵此诗以喻父老，然亦未能变其俗也。"（《东坡题跋》卷二）移风易俗当然不是诵诗所能解决的，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教育方法。

杜甫的作品对宋代人的思想意识和人生理念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暗流涌动，具有根本性的。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思想，则含有对杜甫思想的汲取。《岳阳楼记》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范仲淹提倡的"忧"与杜甫的"忧国"、"忧民"、"忧世"的"忧"，完全是相通的。范

仲淹说他的朋友石曼卿“大爱杜甫”(《祭石学士文》,《范文正公文集》卷一〇),其实也是夫子自道,是他自己也大爱杜甫,受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平生爱杜诗,后兵败被俘,囚元大都。在狱中,文天祥集杜甫五言诗为绝句,共二百诗,借以抒发他的爱国情怀。其《集杜诗·自序》云:“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性情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集杜诗》,《文先生全集》卷一六)文天祥平时喜读杜诗,受杜诗的影响,受杜甫爱国思想的影响,故在危难中借集杜诗抒发爱国的豪情,甚至借杜诗来纪事,所谓“自余颠沛以来,世态人事,概见于此”。杜诗对文天祥有那么大的精神影响,又是那么具有现实意义。

诗在宋人生活中有着重要意义。宋人广泛爱诗。诗不仅是文学的一种重要样式,可以用来抒情言志,表现生活,展示诗人的才华,更重要的是诗也关乎人的社会地位、仕宦前程。作为最伟大诗人的杜甫,对宋代文坛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

首先,宋代作家仰慕杜甫的人格,受杜甫思想的熏陶,这些都直接表现在创作中。关于这方面的例证实在太多,前面谈的宋人对杜甫思想影响的论述,都可以作为例证。需要说明的是,杜甫对宋代作家思想的影响,直接关系作家的创作理念、创作方法,也直接关系着作品的题材与内容,因而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深层的、细致的、全方位的。

其次,宋代很多重要的文艺理论,都含有对杜甫创作艺术进行总结的成分。有些甚至可以说是杜甫创作艺术的理论升华。当然,这种理论总结带有宋代的时代特征,也带有总结者强烈的文艺理论色彩。黄庭坚提倡作诗要无一字无来处,就是对杜甫诗歌艺术的总结。点铁成金虽非正论,而作诗文要字字有来处却为宋

代普遍所认同，这对于宋代以学问为诗的风尚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显然，作诗文要字字有来处理论的形成，与对杜诗创作的理性认识有重要关系。叶梦得认为作诗不能太雕琢，要自然天成，也包含着对杜诗的研究。他说："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细雨着水面为沤，鱼常浮而淰。若大雨，则浮而不出矣。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唯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至'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深深'字若无'穿'字，'款款'字若无'点'字，皆无以见其精微如此。然读之浑然全似未尝用力，此所以不碍其气格超胜。"（《石林诗话》卷下）和传统理论不同，叶梦得并不反对雕琢，并不反对巧语，他提倡雕琢而至天然，巧语而到工妙，可以说这正是他深入研究杜诗悟出的道理。严羽提倡作诗要妙悟，主要就是要悟杜甫和李白的诗。杜甫、李白是严羽妙悟的最高境界。他说："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词》，朝夕讽诵，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𩕳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唯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沧浪诗话》）可以看出，杜甫与李白诗是严羽诗歌理论的基石，是严羽诗歌理论的准绳，是严羽妙悟说的灵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代重要的文艺理论，完全与杜甫无关的，几乎没有。这些重要的文艺理论，引导着宋代的文学创作，使得杜甫的作品从理论的层面上，对宋代文艺创作产生了广泛而

细致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是经过变异的，是复杂的，犹如春风化雨，滋润禾苗的生长。

第三，宋人以杜甫诗歌为诗人的最高典范，从各种角度向杜诗学习，其间各有成败得失。宋代对杜甫非常尊崇，学习杜甫诗成为社会风尚。郑卬说：“国家追复祖宗成宪，学者以声律相饬，少陵矩范，尤为时尚。”（《杜工部诗集序》，《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敖陶孙说：“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臞翁诗评》）强行父说：“六经已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二书亦须常读，所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文录》）在宋代，不喜欢杜甫的只有杨亿、欧阳修等极少数人。而欧阳修不喜杜甫，也许是时代的传言。其诗云：“昔时李杜争横行，麒麟凤凰世所惊。二物非能致太平，须时太平然后生。开元天宝物盛极，自此中原疲战争。英雄白骨化黄土，富贵何止浮云轻。唯有文章烂日星，气凌山岳常峥嵘。”（《感二子》，《欧阳文忠公集》卷九）“风雅久寂寞，吾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生为一身穷，死也万世珍。言苟可垂后，士无羞贱贫。”（《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欧阳文忠公集》卷五四）其钦迟景仰之情，溢于言表。而其诗文未尝未受杜甫的惠泽。

在艺术上，宋代文人受到杜甫艺术的全方位影响。宋人提倡学杜甫要学杜甫的根本创作精神与方法。苏轼说：“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划如太华当我前，跛牂欲上惊崷崒。名章俊语纷交衡，无人巧会当时情。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次韵孔毅甫集古人句见赠五首》其三，《东坡集》卷二三）学杜甫只要得其精髓，作诗时信手拈来皆成佳什。陈师道认为学杜最重要的是学立格、命意与用字。张表臣说：“陈无已先

生语予曰：今人爱杜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仿佛之，非善学者。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余曰：如何等是？曰《冬日谒玄元皇帝庙》诗，叙述功德，反复外意，事核而理长。《阆中歌》，辞致峭丽，语脉新奇，句清而体好，兹非立格之妙乎？《江汉》诗言乾坤之大，腐儒无所寄其身。《缚鸡行》言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于道，兹非命意之深乎？《赠蔡希鲁》诗云'身轻一鸟过'，力在一'过'字。《徐步》诗云'蕊粉上蜂须'，功在一'上'字，兹非用字之精乎？学者体其格，高其意，炼其字，则自然有合矣，何必规规然仿佛像之？"（《珊瑚钩诗话》卷二）学杜就要学杜甫的创作理念与根本方法，得其精神，而不是刻意模仿，得其形似。但事实上，大多数诗人学杜诗是学其语言，是学词采、修辞、句式、格律，模仿其表现技巧，以求外在模样像杜诗。

宋代学杜甫，至北宋中期而蔚成风气。代表人物就是当时诗坛的领袖苏轼、黄庭坚。宋代晦斋云："诗至老杜，极矣。东坡苏公，山谷黄公，奋乎数世之下，复出力振之，而诗之正统不坠。然东坡赋才也大，故解纵绳墨之外，而用之不穷。山谷措意也深，故游泳玩味之余，而索之益远。大抵同出老杜，而自成一家。如李广、程不识之治军，尤伯高、杜季良之行己，不可一概诘也。"（《简斋诗集引》，《简斋诗集》卷首）这是晦斋引陈与义的话，谈苏轼和黄庭坚受杜甫影响非常精辟。而以黄庭坚为领袖的江西诗派，更是一个以杜甫为祖的学杜的巨大诗歌流派。他们以杜甫为创作的范式，尽管没有形成共同的学杜的诗风，但各自都受着杜甫的明显影响。特别是诗派的三宗——黄庭坚、陈无己、陈与义，受杜甫的影响尤为显著。胡仔说："近时学诗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学少陵者也。故陈无己曰：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少陵，故其诗近之。今少陵之诗，后生少年不

复过目，抑亦失江西之意乎？江西平日语学者为诗旨趣，亦独宗少陵一人而已。余为是说，盖欲学诗者师少陵而友江西，则两得之矣。”（《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九）南宋受杜诗影响依然非常大，陆游可以作为代表。宋代刘应时将陆游比作杜甫，认为陆游就是杜甫的化身。其诗云：“放翁前身少陵老，胸中如觉天地小。平生一饭不忘君，危言曾把奸雄扫。周流斯世辙以环，一笑又入剑南山。酒杯汲尽锦屏秀，孤剑声锵峡水寒。万丈虹霓蟠肺腑，射虎脍鲸时一吐。”（《读放翁剑南集》，《颐庵居士集》卷上）陆游不仅忠君爱国的精神受杜甫的影响，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深沉雄浑豪放的风格，都可以看到杜甫的感染与熏陶。

读宋人为宋人集子作的序，很多都写了作者学杜的情况。我们读宋代的文集，发现化用杜甫诗句的比比皆是。深入研究，发现受杜甫创作方法与技巧影响的非常多，受杜甫思想影响的也非常多。可以说，整个宋代就是一个学杜的文学流派。宋诗的风格瘦硬生新，平易奇峭，这虽是时代的产物，但其形成也与杜诗有着密切的关系。像杜甫这样一位前代作家，那样深深地影响他之后的一个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值得我们深思。

二　王　洙

一

王洙（997—1057），字原叔，应天宋城（今河南商丘县）人。少聪悟博学，记问过人。举进士，中甲科。补舒城县尉。后

召为国子监说书，改直讲。为天章阁侍读。累迁太常博士，同管勾国子监。迁尚书工部员外郎。加直龙图阁，权同判太常寺。黜知濠州，徙襄州。徙徐州、亳州，复为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为太常博士，迁兵部员外郎。除史馆修撰，迁知制诰。擢为翰林学士，罢斥。改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得疾，卒。王洙泛览传记，至图纬、方伎、阴阳、五行、算数、音律、诂训、篆隶之学，无所不通。著《易传》十卷，杂文千有余篇。

二

王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宋代最早编辑杜甫集子的人。唐五代所编杜甫集，由于时间久远和战乱，多毁灭湮没。王洙多方搜集世间残存的杜甫集和小集，加以整理，去其重复，编成《杜工部集》二十卷，有诗 1405 篇，文 29 篇。这是宋代编的第一部杜甫集。更难得的是，它搜罗的杜甫诗文相当完备，与我们现代所存杜甫诗文差不多。王洙所编《杜工部集》后经王琪整理，雕版印行，是后世所有杜甫集之祖。王洙所作《杜工部集记》尚存，是研究《杜工部集》的重要文献，也是考索宋初和宋以前杜甫集的有关情况的重要文献。《杜工部集记》云：

> 甫初集六十卷。今秘府旧藏，通人家所有称大小集者，皆亡逸之余，人自编摭，非当时第叙。搜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王洙原注：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孙光宪序（集）二十卷，郑文宝序少陵集二十卷，别题小集二卷，孙仅一卷，杂编三卷。）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终湖南所作，视居行之次，若岁时为先后，分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合二十卷。意兹未

可谓尽，他日有得，尚副益诸。

《杜工部集》的出版非常重要，对于杜甫作品的传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杜工部集记》还记载着重要的杜甫生平材料。而这些材料主要来自杜甫诗文注和唐实录，有些是《新唐书》和《旧唐书》所没有的，也和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所载不同。故《杜工部集记》云："观甫诗与唐实录，犹概见事迹，比《新书》列传，颇为踳驳。"记文下有注，对两唐书本传多有辩证："传云：召试，授京兆府兵曹，而集有《官定后戏赠》诗注云：初授河西尉，辞，改右卫率府胄曹。传云：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而有集《喜达行在》诗，注云：自京窜至凤翔。传云：严武卒，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据适自东川入朝，拜右散骑常侍乃卒。又集有《忠州闻高常侍亡》诗。传云：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乃游襄衡，而集有居江陵及公安诗至多。诗云：甫永泰二年卒，而集有《大历五年正月追酬高蜀州》诗及别题大历年者数篇。"这些辩证及所载材料都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杜甫生平的重要参考。当然，《杜工部集记》所载杜甫生平材料也有误，但无论如何，都值得我们重视，因为这些材料主要来自杜甫诗文注和唐实录，是唐五代人的看法和材料。

王洙不仅是杜甫集的编辑者，还为杜甫集作了注，是最早的杜甫集注者。

然而，从宋代开始就有人对王洙注杜诗产生怀疑，认为署名为王洙注实为邓忠臣注，又说为尹洙注，又说为书贾依托。可是，这些说法都是无根之言，没有任何证据。邓忠臣侄儿说是邓忠臣注，不需要任何事实，王洙注就成了邓忠臣注，学界这样偏听轻信，令人吃惊。尹洙注说和书贾依托说更是揣测之辞，不足

取信。我们认为，署名为王洙注的杜诗注，应该确定为王洙所注，不容贸然怀疑。第一，王洙注杜诗，是杜诗的第一个注本，是巨大的创造。这样的创造，没有人会用别人的名字，没有人会去依托别人。这是傻瓜也不会干的事。第二，有人说，王洙编杜甫集的序中，没有说注杜诗的事，说明王洙没有注杜诗。这个说法站不住脚。王淇既然不愿说王洙的杜诗注，他为什么不能删去王洙记中有关注杜诗的内容。退一步说，即使王洙在记中没有说注杜诗的事，并不能说他就没有注杜诗。第三，宋代的注家和重要的杜甫学者并没有人否定王洙注杜诗的事实。相反，注家都在自己的注中大量辑录王洙注。重要的杜甫学者均评述王洙注。胡仔说："《注杜工部集》，则内翰王原叔所注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并对王洙注的不足之处作了指正。胡仔是王洙注出版的那个时代的人，他的话是有分量的。总之，现存的材料，无法否认王洙注杜诗的著作权，要否认就需要有真正有力的证据。

王洙所做的杜诗注原作已佚，这给我们研究王洙注带来了困难，好在宋代保存下来的一些注本尚有一些王洙注。这些注本是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又名《九家集注杜诗》）、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而《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保存王洙注更多，其中有的诗注保存王洙注相当完整，为了使读者能了解王洙注的具体情况，兹录黄希、黄鹤《补注杜诗》（台湾影印《四库全书》本）卷二三中两首诗保存的王洙注。

《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汲黯匡君切，（洙曰：《前汉》汲黯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迁于东海太守，武帝曰，古有社稷之臣，如汲黯近之矣。）廉颇出将频。（洙曰：《史记》廉颇赵之良将，频为赵将，兵破齐魏。）直词才不世，雄略动如神。（洙曰：取汲黯之直言，廉颇之雄略，以美严公也。）政简移风速，

(洙曰：《史记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故五月而报政成。周公曰：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诗清立意新。层城临媚（洙曰：一作暇。）景，绝域望余春。（洙曰：层城，高城也。绝域，远域也。言蜀与京畿远绝。）旗尾蛟龙会，楼头燕雀驯。（洙曰：《礼》：蛟龙为旗。）地平江动蜀，天阔树浮秦。帝念深分阃，军须远算缗。（洙曰：冯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将也。汉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缗钱，李旻曰：缗，丝也，以贯钱出算二十也。）花罗封蛱蝶，瑞锦送麒麟。（洙曰：蛱蝶麒麟罗锦，伤丝绣也。）辞第输高义，（洙曰：《霍去病传》：上为治第，令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由此上益重爱之。）观图忆古人。（洙曰：《马援传》：显宗图画建武名臣列将于云台，以椒房故不及马援。东平王苍观图言于帝曰：何故不画伏波将军像？帝哭而不言。）”《严中丞枉驾见过》（洙曰：严自东川除西川，敕令两川都节制。一本云：严黄门枉驾见过。）：“元戎小队出郊垧，（洙曰：《诗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启行。注：元，大也。夏后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尔雅》曰：邑外谓之郊，林外谓之垧。）问柳寻花到野亭。川合东西瞻使节，（洙曰：元宗在蜀合东西两川为一道，以武为尹。）地分南北任流（洙曰：一作孤。）萍。扁舟不独如张翰，（洙曰：《晋·文苑传》：张翰，字季鹰，会稽贺循赴命入洛，经吴阊门，于船中弹琴。翰初不相识，乃就循言谈，便相钦悦。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载。即去，而不告家人。后为齐王曹冏掾，因见秋风起，思篿鲈，遂命驾南归。）白帽应兼似管宁。（洙曰：魏青龙中征命管宁，不至，居海上，常着白帽布襦袴而已。）寂寞（洙曰：一作今日。）江天云雾里，何人道有少微星。（洙曰：《隋·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处士。明黄，则贤士举。）”

两首诗的王洙注释简洁明晰，较为正确，大体完备。黄希、黄鹤所辑其他注家的注比较少，二人补注的也比较少，而且辑注和补注多是补充说明性质的，没有新注，也没有更正。

通过对王洙注的全面研究，我们认为王洙注杜诗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精美的校刊。王洙对不同版本的杜诗异文，作了详细校勘，并作了校勘记。由于是杜甫集散佚后第一个所编集的校勘，故无比珍贵。（二）较全面注释。注释包括写作时间或背景；典故；名物制度，包括人名、地名；语典。应该说，一般该注释的地方，大多都做了注释。注释的总体风格是简明扼要。（三）阐释诗意。对难以理解的诗、具体的诗句进行解说，使读者能懂。对于隐含深意的诗，阐明微言大义。

统观现存的王洙的注，我们认为其水平是相当高的。最能显示其水平的是语典的注。如《到村》"顽疏惑町畦"注"顽疏"："洙曰：嵇康云：非降自天，实由顽疏。"又"还入故林栖"注"故林栖"："洙曰：王正长：人情旧乡客，鸟栖思故林。"（黄希、黄鹤《补注杜诗》卷二三）这样的注都不是一般的学者所能注出来的。正因为王洙注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故其注中的很多精彩之处才能长期流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正是王洙注精彩的一面。事实上，王洙注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如注释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注释有一些过简，而杜诗需要详细注释；有些应该注的地方而未注。对于王洙注的错误与不足，宋人已多有批评。公允地说，学术的发展都是由粗至精，由简而繁，由浅入深。杜诗本来难注，王洙注作为杜诗注的开山之作，有那样出色的表现，已经很不容易了，已经是高起点了。王洙注的种种缺陷，实际上为后世的杜诗注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如果王洙注太完美了，后世的杜诗注也就不会那样生机勃勃了。

作为杜甫集散佚后的第一位编辑家，作为杜甫集的第一位注

家，王洙在杜甫学史上的地位是极高的。其功绩之伟，无论我们给予怎样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三　宋祁和《新唐书》

一

宋祁（998—1061），字子京，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县）人，后徙开封之雍丘。登进士第，释褐复州军事推官。迁太常博士，为尚书工部员外郎、同修起居注、权三司度支判官。为龙图学士、史馆修撰，修《唐书》。累迁右谏议大夫，充群牧使。复为翰林学士。出知许州，召为侍读学士，迁给事中兼龙图阁学士，出知亳州。徙知成德军，迁尚书礼部侍郎。徙定州。特迁吏部侍郎、知益州，寻除三司使。加龙图阁学士、知郑州。《唐书》成，迁左丞，进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承旨，复为群牧使，寻卒。祁所至，治事明峻。尤能文，善议论。预修《籍田记》《集韵》，又撰《大东图》二卷，文集百卷。（《宋史》卷二八四本传）

二

宋祁对杜甫和杜诗很喜爱，常在诗文中言及。比较出色的是《和贾相公览杜工部北征篇》，诗云："唐家六叶太平罢，宫艳醉骨恬无忧。阿荦诟天翠华出，模糊血战腥九州。乾疮坤痍四海破，白日杀气寒飕飕。少陵背贼走行在，采梠拾橡填饥喉。眼前乱离不忍见，作诗感慨陈大猷。北征之篇辞最切，读者心陨如摧辀。莫肯念乱小雅怨，自然流涕袁安愁。才高位下言不入，慨气

郁屈蟠长虬。今日奔亡匪天作，向来颠倒皆庙谋。忠骸佞骨相撑拄，一燎同烬悲昆丘。相君览古慨前事，追美子美真诗流。前王不见后王见，愿以此语贻千秋。”诗对杜甫的《北征》和杜甫的爱国作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安史之乱的史鉴作用。宋祁关于杜甫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他作的《新唐书·文艺传·杜甫传》中。

《新唐书·文艺传·杜甫传》虽作于《旧唐书·杜甫传》之后，但它并不是简单地重复抄袭前者，而是有着自己的材料和观点，有学术创见，在杜甫学术研究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首先，《新唐书》杜甫传新增了一些材料。如“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其奇材，先往见之”，“擢河西尉，不拜”。这些都是《旧唐书》杜甫传所没有的，说明《新唐书》杜甫传下过一番搜集材料的功夫。但是，像《旧唐书》杜甫传一样，《新唐书》杜甫传也误信小说家言，采入传中，贬损了杜甫的形象。突出的是杜甫侮辱严武，严武怀恨在心，寻机杀杜甫。传载：“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入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不以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与《旧唐书》杜甫传相比较，《新唐书》杜甫传走得更远。《旧唐书》说严武受杜甫侮辱后“不以为忤”，而《新唐书》则改为“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以至于要杀掉杜甫。而《新唐书》的“冠钩于帘三”也更富有小说家的编造意味，更不可信。因此，我们说《新唐书》杜甫传记载了其他书籍没有记载的材料，对了解和研究杜甫生平有自己的贡献，但也误录了小说家言，降低了作为正史的品位和价值。

其次，《新唐书》杜甫传对杜甫和杜诗发表了自己的评论。

（一）评论杜甫云："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这个评论不大切合实际，从现存材料中，我们看不到杜甫放浪形骸的材料，相反，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具有浓厚儒家思想，遵守礼法的人。早年放荡齐、赵间，但似乎也没有到"不自检"的程度。我们认为杜甫的狂放是有节制的。说杜甫"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没有材料可以证明。相反，杜甫集中所存之文，如《东西两川说》、《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等所论皆切合实际，并非无用之空言。杜甫诗文发表的政治军事见解，是非常杰出的。而《新唐书》杜甫传所论杜甫"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则完全符合实际，是对杜甫为人的大节和诗歌的主旨的简明而准确的评述。

（二）对杜甫诗的风格与特色作了极好的评论，对杜甫在诗坛的地位作了极好的评论。现全文征引如下：

> 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赞对杜甫的诗歌作了最高、最准确、最精彩的评论。特别是对杜甫风格的评论，堪称古今最佳评论。而"诗史"之说，虽采自他

书，论述也极为精当，影响极大。

《新唐书》杜甫传作为正史，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关于杜甫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杜诗风格的论述，影响尤为深远。

四　王安石

一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再调知鄞县，通判舒州。后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俄直集贤院。神宗时命知江宁府，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变风俗，立法度。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八年，复拜相，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屡谢病求去，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江宁府。明年，改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屡乞还将相印。元丰二年，复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六。（事见《宋史》卷三二七本传）

王安石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学者。

二

王安石笃好杜甫的诗。他对杜诗作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杜甫的诗力敌造化。他的《杜甫画像》诗云："吾观少陵诗，为与元

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死所羞。所以见公画，再拜涕四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临川先生文集》卷九）王安石有安邦治国的伟大抱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杜甫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境界和诗篇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所以他对杜甫很崇拜。他又是一位著名学者和文学家，认为杜诗力敌造化。这是他深入研究杜诗得出的结论。元气是天地未形成之前的混一之气，是形成万物的真气，是生命力的本原。王安石说杜诗“为与元气侔”，就是说杜诗内容与艺术结合，产生无极的力量，具有无限的美。这样的评价，堪称最高的评价。这是创造性研究的评价话语，在宋代产生了很大影响。刘克庄云“前辈论李杜云‘与元气侔’，又云‘横披六合，力敌造化’”（《黄有容字说》，见《后村大全集》卷一一二），就是推崇王安石的评论。

王安石对杜诗的艺术性也有研究，特别称道杜诗的用字功夫。他说：“‘无人觉来往，疏懒意何长’，下得‘觉’字太好。足见吟诗要一字、两字功夫也。”（《诸家老杜诗评》卷一引《钟山语录》）文学的艺术就是语言的艺术，善于使用语言，是作家非常重要的修养。杜诗善于使用语言，字字见功夫，表现出伟大作家的风范。

王安石曾搜集过杜甫诗的佚文。他在《杜工部后集序》中说：“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诗，世所不传者二百余篇。观之，予知非人所能为而为之实甫者，其文与意之著也。然甫之诗，其完见于今日，自余得之。世之学者，至乎甫而后为诗，不能至，

要之不知诗焉尔。呜呼，诗其难，惟有甫哉，自《洗兵马》下，序而次之，以用示知甫者，且用自发者。”（《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四）王安石特别爱好杜甫诗，认真研究，故发现佚诗二百余篇。这些诗或因仔细考证确定不是佚诗，或后来正式收入集中，其详情已无法得知，但由此可见王安石对杜诗的喜好与关注。

王安石编《四家诗选》，首列杜甫诗，表现了他对杜甫诗的特别推崇。其《杜工部后集序》云：“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临川先生文集》八四）其《四家诗选》的排列顺序是：第一，杜甫；第二，欧阳修；第三，韩愈；第四，李白。王安石是事实上推尊杜甫为中国第一诗人的学者。

王安石的杜甫研究成果不太多，但很有影响，是杜甫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五　吕大防

一

吕大防（1027—1097），字微仲，其先汲郡人，家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大防进士及第，调冯翊主簿，永寿令。迁著作佐郎、知青城县。熙宁元年，知泗州，为河北转运副使。后除知制诰。除龙图阁待制、知秦州。哲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权开封府。迁吏部尚书。拜尚书右丞，进中书侍郎，封汲郡公。超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大防朴厚戆直，不植党朋。立朝挺挺，进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声誉。知颍昌府，知随州，贬秘书监，分司南京、居郢州。贬舒州团练副使，安置循

州。著有《吕汲公文录》。

吕大防的杜甫研究著作有《杜工部年谱》。

二

吕大防是一位非常有修养、有操守的人，“自少持重，无嗜好，过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对宾客。每朝会，威仪翼如，神宗常目送之”（《宋史》卷三四〇《吕大防传》），又忠君爱国，所以也非常喜欢研究杜诗。

吕大防研究的主要是作家的生平与作品的关系，他认为作家的生活和思想的发展变化，影响到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造成作品的变化。从这样的角度来研究杜诗，可谓高瞻远瞩。因为站得高，思路开阔，研究方法也就有创造。他创造了将作家的生平大事进行系年，具体、简明、确切概括作家一生生平的方法，以便对照研究作家的作品，所谓知人论世，以便充分理解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其《杜少陵年谱后记》云：“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云，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又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汲郡吕大防记。”（见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用年谱的形式将杜甫的主要生平事迹罗列出来，再来看杜甫生平思想与诗内容的关系，看社会与诗的关系，可以更深刻而细致地理解杜甫诗的思想内容，也可以更好地感受杜甫伟大的人格。不仅如此，将杜甫的诗与杜甫的生平对照研究，可以看出杜诗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色，有不同风格。通观杜诗，就可以看到杜甫艺术发展变化的轨迹，看到杜甫艺术发展的道路。进而还可以领悟艺术发展的某些规律。吕大防发明了以年谱的形式为工具，研究作家生活与社会和作家作品内容和艺术，确实是一种非常高明的研究方法。在千

年前的宋代，颇具远见和卓识。这种研究方法在今天的学术界仍然被广泛使用。

《杜少陵年谱》原名似应为《诗年谱》（或为“杜少陵诗年谱”）。方深道《诸家老杜诗评》为吕丞相“诗年谱”，鲁訔所作杜甫年谱亦为“诗年谱”，可以为证。今全文逐录于下：“睿宗先天元年癸丑（“癸丑”应为“壬子”，谱所标甲子均误，不一一更正）：甫生于是年。按甫《志》及《传》皆云：年五十九，卒于大历五年辛亥故也。玄宗开元元年甲寅。开元三年丙辰：《观公孙弟子舞剑器》诗序云：‘开元三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按甫是年才四岁，年必有误。开元二十九年壬午。天宝元年癸未：集有《天宝初南曹小司寇为山》之作。时年三十一。天宝十一载癸巳：《上韦左丞》诗云：‘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是年玄宗即位四十年。时有《兵车行》。天宝中诗《丽人行》。天宝十三年乙未：是年有《三大礼赋序》：‘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时年四十三。天宝十四年丙申：是年十一月初，自京赴奉先，有《咏怀》诗。是月有禄山之乱。天宝十五载丁酉：是年七月，肃宗即位，改至德元载。是年避寇于冯翊，有《白水高斋》、《三川观涨》诗。六月，帝西幸。七月，至蜀郡。时有《哀王孙》诗。至德元二载戊戌：是年自城中窜归凤翔，拜左拾遗。有《荐岑参》、《谢口敕放推向壮》。八月，墨制放往鄜州，有《北征》诗。乾元元年己亥：是年移华州司功。有《试进士策》、《为郭使君论残寇状》。时有《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留花门》、《洗兵马》诗。乾元二年庚子：是年弃官之秦州。自秦适同谷，自同谷入蜀。时有《遣兴三首》。上元元年辛丑：是年在蜀郡，有《百忧集行》云：‘即今倏忽已五十。’按，是年年四十九。时有《杜鹃行》、《石犀行》、《古柏行》、《病桔》、《病柏》、《枯棕》、《枯楠》、《忆昔》各

一首。上元二年壬寅：是年严武镇成都，甫往依焉。宝应元年癸卯：诗有元年建巳月，乃是年也。代宗广德元年甲辰：是年有《祭房相国文》。严武再镇西川，奏甫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永泰元年丙午：是年严武卒，蜀乱，甫游东川，除京兆功曹，不赴。大历元年丁未：移居夔。大历三年己酉：离峡中之荆南，至湘潭。大历五年丁亥：有追酬高适《人日》诗。是年夏，甫还襄汉，卒于岳阳。”年谱不足千字，比起现代三十余万字的《杜甫年谱》来，实在太简单。但是，作为世界第一部年谱（与韩愈年谱并列），却可以说是高水平的。首先，它已具备年谱最基本的三大要素，即将谱主的生平大事系年，重要时事和重要友人大事系年和诗系年。从体例来说，已堪称完备。其次，不仅爬梳罗列准确的、可供系年的材料，还通过考证，对没有明确标明时间的杜甫生平事迹及诗进行系年。第三，年谱已能勾画杜甫一生的主要事迹的全貌，罗列杜诗的很多重要代表作品。系年除甲子疏忽而误外，主要事迹和诗系年错误较少。因此，吕大防的《杜工部年谱》确实是一部了不起的开创之作。

学术的创新，往往是从最热门的学术领域开始的。杜甫研究是宋代的显学，因而产生了吕大防《杜工部年谱》这样新的研究载体与形式，有力地推动了杜甫研究，在当时就引起高度的关注和赞美。其后产生了多部杜甫年谱，如赵子栎、鲁訔、王应麟的年谱，他们发展了年谱的体例，系年事迹也更细致，更丰富。而年谱这种新的学术形式，也为当时和后代学术界所认同，广泛运用于与人物相关的学术领域，此后年谱便成为中国学术界一种常用的学术样式。杜甫研究对学术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吕大防《杜工部年谱》创自杜甫学研究领域，而影响波及整个学术研究，就是最显著的例证。

六　苏　轼

一

苏轼（1036—1101），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比冠，博通经史。嘉祐二年，试礼部，为第二，殿试中乙科。五年，调福昌主簿。复对制策，入三等。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还朝，以判官告院。反对新法，请外，通判杭州。徙知密州、徐州、湖州。以诗托讽新法，逮赴台狱，欲置之死，后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筑室东坡，自号东坡居士。移常州。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迁起居舍人、中书舍人。除翰林学士。请外，知杭州，有惠政。为翰林承旨。出知颍州。徙扬州。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为礼部尚书。出知定州。知英州。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宋史》卷三三八本传）

二

苏轼学识渊博，对杜甫和杜诗有精深的研究，有很多很精辟的见解。

苏轼认为杜甫所以伟大，在于他的诗能发乎情，止乎忠孝。苏轼在《王定国诗集叙》中说：

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耳，乌睹诗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乎发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忠孝是古代做人的最高准则，也是衡量人的思想和著述的最重要的标准。苏轼用忠孝这一最重要的标准来研究杜甫及其诗歌，认为杜甫之所以成为最伟大的诗人，就在于他身处困境，流落饥寒，不为社会所用，而能拳拳爱国，一饭不忘君，表明他的忠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而他这种极高的忠，用极高的艺术表现在生活和情感中，就成了最伟大的杜诗。苏轼高屋建瓴，从做人，从作品的思想，来探索杜甫所以伟大的原因，真正触及了杜甫的本质，其对杜甫和对杜诗思想的宏观研究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每饭不忘君（“一饭未尝忘君”）作为学术的论述，太诗意化和形象化，看起来不够准确，故不时引来一些批评，说苏轼说得太过。然而，就根本而言，苏轼论述杜甫和杜诗的忠君爱国是最准确的，加上其言诗意化、形象化，故而特别为广大杜甫和杜诗的喜爱者所传诵，成为对杜甫和杜诗最经典的论述之一，成为杜甫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论述之一。

苏轼非常重视对诗的思想内容的认识和理解。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常常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苏轼往往结合杜甫所表现的社会背景来理解杜诗，结合史实来认识杜诗，所谓以史证诗。《杂书子美诗》就用史实来解说杜甫的《悲陈陶》和《悲青坂》：

《悲陈陶》云“四万义军同日死”，此房琯之败也。《唐

书》作陈涛斜，不知孰是。时房琯临败，犹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邢延德促战，遂大败。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书与我军，留待明年莫仓卒。"（《杂书子美诗》，《东坡题跋》卷二）

苏轼结合史实，认为房琯兵败陈涛，仍拥大军，等待时机，反击安史乱军。而当时用宦官邢延德督军，催促房琯仓促作战，导致青坂大败，使朝廷义军元气大伤。杜甫有感而发，认为作战应该沉着，才能反败为胜。这就是"焉得附书与我军，留待明年莫仓卒"的写作背景。苏轼这样来解说杜诗，使人们对杜诗的了解更具体，更深刻。有时，苏轼还结合史实，用比兴理论来解说杜诗。如《辨杜子美杜鹃诗》：

南都王谊伯书江都驿垣，谓子美诗历五季兵火，舛缺离异，虽经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缺者。谊伯谓"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盖是题下注，断自"我昔游锦城"为首句。伯谊误矣。且子美诗备诸家体，非必牵合程度侃侃然者也。是篇句落处凡五杜鹃，岂可以文害辞，辞害意耶？原子美之意，类有所感，托物以发者也。亦六义之比兴，《离骚》之法欤！按《博物志》，杜鹃生子，寄之他巢，百鸟为饲之。今江东所谓"杜宇曾为蜀帝王，化禽飞去旧城荒"。且禽鸟至微，犹知有尊，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礼若奉至尊"。子美盖讥当时刺史有不禽鸟若也。唐自明皇已后，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于君者，可一二数也。严武在蜀，虽横敛刻薄，而实致职以资中原，是"西川有杜鹃"。其不虔王命，负固以自抗，擅军旅，绝贡赋，如杜克逊在梓州，为朝廷西顾忧，是"东川无

杜鹃”耳。至于涪、万、云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谓有也，怀贰者为无也，不在夫杜鹃之真有无也。谊伯以为来东川闻杜鹃声繁而急，乃始叹子美诗跋寋纸上语，又云子美不应叠用韵，何耶？子美自我作古，叠用韵，无害于为诗，仆所见如此。谊伯博学强辩，殆必有以折衷之。

杜甫的诗本有很深的兴寄，含义深邃。苏轼用比兴说诗，能真正探寻杜诗的意蕴，理解杜诗的主旨。有时用比兴说诗，难免牵强，但努力去认识杜诗深刻的思想和含义却是正确的。

苏轼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深入研究杜甫诗的艺术，颇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杜诗长于写现实中的景物：

“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此老杜云安诗也。非亲到其处，不知此诗之工。（《书子美云安诗》，《东坡题跋》卷二）

只有细味杜诗描写之处，才能真正体会杜诗描绘之美妙，这种研究是独特的，真正说出了杜甫艺术的特点。苏轼认为杜诗的妙处不单在于写景，而更在于善于抒情，把杜甫本人的情态写活了。

子美诗云：“黄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东坡云：此诗虽不甚佳，可以见子美清狂野逸之态，故仆喜书之。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而托此诗不朽。可以使览者一笑。（《书子美黄四娘诗》，《东坡题跋》卷二）

苏轼还与友人谈论杜诗。受友人的启发，他在艺术上体会更深。苏轼《记董传论诗》写道：“故人董传善论诗，予尝云：杜子美不免有凡语，‘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岂非凡语耶？传笑曰：此句殆为君发，凡人用意深处，人罕能识，此所以为独苦，岂独画哉！”（《东坡题跋》卷三）受董传的启发，他才体会到杜诗“已知”二句艺术之妙。苏轼《听林道人论琴棋》说：“杜子美论画云‘更觉良工心独苦’，用意之妙，有举世莫之知者，此其所以为独苦欤！”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苏轼对杜诗时时品味研究，以寻求杜诗艺术的奥秘，故而常有与众不同的见解。苏轼对杜诗的艺术也有批评，《记子美陋句》云：

> “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向来云涛盘，众力亦不细。呀坑（帆）瞥眼过，飞橹本无蒂。得失瞬息间，致远疑恐泥。百虑视安危，分明曩贤计。兹理庶可广，拳拳期勿替。”杜甫诗固无敌，然自“致远”以下句，真村陋也。此最其瑕璃，世人雷同，不复讥评，过矣！然亦不能掩其善也。（《东坡题跋》卷二）

苏轼的评论表现出他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表现出他过人的胆识。杜诗千汇万状，难免有轻滑与笨拙处。苏轼指出杜诗艺术上的缺点，有益于破除对杜诗学习研究中的迷信，有助于学习和研究的深入，有利于获得杜诗的精髓。

苏轼对杜甫诗的学术态度非常严肃，反对人们以自己的眼光随意乱改杜诗。他说：“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从而合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自余少时及前辈，皆不敢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庄子》云，用志不分，乃疑（凝）于神，此与《易》

阴疑于阳《礼》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本皆作‘凝’。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盖灭没于烟波间耳。而宋敏求谓余云：鸥不解没，改作‘波’。二诗改作此两字，觉一篇神气索然也。”（《书诸集改字》，《东坡题跋》卷二）不随便改古书，无疑是我们对待古代文献应有的态度，这是科学的态度。苏轼对杜诗的文字态度非常慎重。《书子美骢马行》云：“余在岐下见秦州一马骙如牛，颔下垂胡侧立倾倒，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骙马也。乃知《邓公骙马行》云‘肉骙硠礌连钱动’当作‘骙’。”（《东坡题跋》）他在有充分校勘依据的情况下，提出自己的见解，但也不轻易改字。

杜诗喜欢写实，多用史实入诗，用现实名物入诗，又喜欢化用前人诗文，不加以注释，故读者很难理解杜诗的含义。苏轼对杜诗有些精辟的注解和阐释。他的《书子美自平诗》注解杜诗“自平宫中吕太一”云：

> 杜子美诗云：“自平宫中吕太一。”世莫晓其义，而妄者至以唐时有自平宫，偶读《玄宗实录》，有宫中吕太一叛于广南。杜诗盖云自平宫中吕太一，故下有取珠之句。见书不广，而以意改文字，鲜不为笑也。（《东坡题跋》卷二）

苏轼的解释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不是苏轼用《玄宗实录》来解“自平”之诗，恐怕人们会一直在迷惑中徘徊。苏轼释杜诗之“荨草”也颇为精当。《荨草诗》云：“杜子美有《除荨草》一篇，蜀中谓之毛荨。毛芒可畏，触之如蜂虿。治风疹，以此草点之，一身失去。叶背紫者入药。杜诗注云：荨音潜，山韭也。”（《仇池笔记》）杜诗作于蜀中，苏轼为蜀人，以自己的见闻来解释荨

草，非常准确。

苏轼对杜甫在诗坛的地位，也作了崇高的评价。他认为李白、杜甫是古今最伟大的诗人。“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东坡集》卷二）“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书黄子思诗集后一首》，《东坡集》卷二三）像元稹一样，苏轼也认为杜甫更卓绝，“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认为杜甫的诗达到了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

> 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书吴道子画后》，《东坡集》卷二三）

苏轼把杜甫推为古今诗歌第一人，认为杜甫之后，诗人难有作为，因为杜甫已是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书唐氏六家书后一首》，《东坡集》卷二三）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是中国文化名人，他对杜甫的崇高评价，对于加固杜甫在诗坛的独尊地位，有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对造就宋人对杜甫的崇拜，有特殊的作用。

苏轼认为杜甫和李白诗登上了中国诗歌艺术的高峰，但也是诗歌艺术衰落的开始。苏轼云：“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晋以来高风绝

尘，亦少衰矣。”（《书黄子思诗集后一首》，《东坡集》卷九）物极必反，这是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杜甫与李白的诗也无法逃脱这一规律。苏轼的见解是极为独到、深刻的。杜甫、李白继承、综合一切诗歌艺术创作的技巧，并加以极大的创新，使诗歌艺术登峰造极。既然要达到极限，难免用力太过，失去诗的天然风致。既已经达到极限，自然就会给人达到尽头的感觉。事实上，我们今天回顾整个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更体会到苏轼论断的正确性，更体会到苏轼哲人的睿智。

宋代好杜诗成风，学杜诗也成风。但真正学到杜甫人格的人很少，学到杜甫现实主义精神的人很少，学到杜甫艺术风格的人也很少。针对这种情况，苏轼指出，人们应该努力学习杜甫的精髓：“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次韵孔毅甫集古人句见赠五首》其三）这对于促进人们对杜甫的学习和研究始终沿着正常的轨道前进，非常有益。

苏轼是一个关注社会、关爱百姓的官吏，他也把杜诗用在为政中，用在教化百姓中。他在海南时，看到海南乡村妇女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极度劳累，而家庭却很贫困，与杜甫写的夔州女子极为相似，便诵杜诗教化当地父老。苏轼自己记叙道：“‘夔州女子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十有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当供给。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面妆手（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到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海南亦有此风。每诵此诗以谕父老，然亦未易变其俗也。”（《书杜子美诗后》，《东坡题跋》卷二）

将杜诗的研究与现实结合起来，用在教化中，用在政治中，是苏轼的发明，是一个伟大的举措，也是杜诗研究的重要开拓。

苏轼是中华民族著名的文化巨擘，他对杜甫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开拓也是多方面的。他是杜甫学术研究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七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一

江西诗派是宋代最大的文学流派，也是宋代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它是在宋代杜甫学非常繁荣的背景下产生的，其成员成分颇为复杂，诗风也有很大差别，但其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即以杜甫为宗祖。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领袖，最提倡熟读杜诗、研究杜甫、学习杜甫，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创作中有所建树。江西诗派中的人物，当时都是杜甫学的著名学者，都有杜甫学的成果传世。据吕本中所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江西诗派共 26 人，在黄庭坚之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检黄希黄鹤《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之《集注杜诗姓氏》，江西诗派成员共 26 人，除江端本一人外，其余 25 人（黄庭坚、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杨符、谢迈、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皆在其

中。此书号称“千家注”，其《集注杜诗姓氏》所列注家151家。而江西诗派即占去25家，即占整个注家的六分之一。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比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江西诗派在宋代杜甫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其领袖黄庭坚，在宋代杜甫学中的地位更是非常高。

为了论述方便，现将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其他成员分别加以论述。即将黄庭坚单独论述，将江西诗派除黄庭坚外的成员集中论述。

二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幼警悟。举进士，调叶县尉。教授北京国子监。苏轼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世之表，世久无此作。知太和县。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迁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实录》成，擢起居舍人。为秘书丞，提点明道宫。绍圣初，出知宣州，改鄂州。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以亲嫌，遂移戎州。徽宗即位，起监鄂州税，签书宁国军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员外郎召，皆辞不行。后主管玉隆观。复除名，羁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闻名而卒，年六十一。

黄庭坚对杜诗评价极高，认为杜诗达到了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他说：“杜子美一生穷饿，作诗数千篇，与日月争光”（《题韩忠献诗杜正献草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文章韩杜无遗恨”（《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七，《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七）。他像元稹一样，认为杜甫是诗坛第一诗人。这对牢牢树立杜甫在诗坛的独尊地位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黄庭坚认为杜诗表现出强烈的忠义，表现出强烈的是非，具有伟大的意义。他看重杜诗，首先就是重视杜诗所具有的强烈的

政治内容。据记载：“孙莘老尝谓老杜《北征》诗胜韩退之《南山》诗，王平甫以谓《南山》胜《北征》，终不能相服。时山谷黄鲁直尚少，乃曰：‘若论工巧，则《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二，又见《竹庄诗话》卷一二）足见黄庭坚是把政治思想内容的评价放在第一位的。其诗云：“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帝阍悠邈开关键，虎穴深沉样爪牙。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潜知有意升堂室，独报遗篇校舛差。”（《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四）。黄庭坚认为杜诗表现出忠义，表现出纯正的儒家思想，这正是杜诗伟大的根本所在。

黄庭坚认为杜诗所以能成为伟大的作品，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汲取一切文化的精华，无一字无来处。《论作文》说：“作诗句要须详略用事精切，更无虚字也。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熟读三五十遍，寻其用意处，则所得多矣。”（《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六）强调诗要有实际内容，要“言近而旨远”。《答洪驹父三首》其二云：“所寄释权一篇，词笔从（纵）横，极见日新之效。更须治经，深其渊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琐祭文，语意甚工，但用字时有未安处。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杜甫学识广博，转益多师，“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造就杜诗伟大风格的重要原因。黄庭坚用“无一字无来处”总结杜诗，确实点明了杜诗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当然，“无一字无来处”并非学术研究的精确表述，而是文学形象化的话语。虽然认真看，有些说过了头，但

事实上，杜诗从内容到艺术，都有很多创造，没有依傍，有些东西来自民间，不全是“无一字无来处”，故黄庭坚的话也引来一些批评。另一方面，黄庭坚指出杜诗从学问中来，是非常有创见的研究成果。

黄庭坚笺释和校勘杜诗，使更多的人阅读到文字正确的杜诗，真正领会杜诗。黄庭坚著《杜诗笺》，对杜诗的注解多有发明。如：《已令请急会通籍》条释“请急”：“晋令，给假者五日一急，一岁以六十日为限。书记所称急、取急、请急，皆请假也。”《石尹行》条释“石笋”：“《华阳国志》：蜀王妃物故，哀念之，遣五千至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九尺，盖石，俗名为石笋。”《蚕崖雪似银》条释“蚕崖”：“蚕崖在茂州带雪山。”其余，如《杂论》释“腹腴”：“燕人切鲤方寸，切其腴以啖所贵。腴，鱼腹下肥处也。故杜子美诗云：‘偏劝腹腴贵年少。’”又如释《至日》“一线”为女工“一线之功”而非日影一线之长：“《至日》云：‘愁日愁随一线长。’释者谓：《岁时记》云：‘宫中以红线量日影，至日日影增一线。’而《唐杂录》谓：宫中以女工揆日之长短，冬至后日晷渐长，比常日增一线之功。此说为是。”（《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七）又如释《戏赠阌乡秦少府短歌》的“潦倒”：“《戏赠阌乡秦少府短歌》云：‘昨夜邀欢乐更无，多才依旧能潦倒。’注引《嵇康传》，浅陋。乃魏天保以后重吏事，谓容止温藉者为潦倒，出此也。”（同上）在校勘方面，黄庭坚根据杜甫的诗意来确定文字，亦可见其深厚的学养和校勘功力。如：“黄独无苗山雪盛”不少版本作“黄精”，黄庭坚认为应为“黄独”，其校勘记云：“老杜云：‘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往时儒者不解‘黄独’义，改为‘黄精’，学者承之。以予考之，盖黄独是也。《本草》‘赭魁’注：‘黄独肉白皮黄，巴汉人蒸食之，

江东谓之士芋。余求之江西，江西谓之土卵，蒸煮食之，类芋魁。’”（《杂书》，参见《杜诗笺》之“黄精无苗山雪盛”条）这样的校勘很好。其余如：校“只今年才五六十”应为“只今倏忽已五十”：“《百忧集行》云：‘只今倏忽已五十。’旧本云：‘只今年才五六十。’此语似方五六十，才五六十也。”又如，校“减”应为“检”：“‘看题减药囊’，一作‘检’，‘检’字乃合意。”（《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七）当然，黄庭坚的有些解释和校勘也有过分拘泥的地方。如“‘野航恰受两三人’别本作‘航’，航是大舟，当以‘艇’为正。”（同上）显然，此处应以“航”字为优，诗人作诗用词不一定取本意，而取其基本意思，因而词意往往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然而，就总体来说，黄庭坚博学多识，距唐较近，对唐代的史实、典章和文化多有了解，他见到的唐和唐以前的书籍比现代多得多，他对杜诗的注释和校勘多有精彩之处，值得我们充分利用。黄庭坚的一些笺释，短小精悍，颇似后世的诗文评点。这对于评点这种文学评论样式的产生有开启作用。尽管这种笺释还不能算评点，但可以说它是评点的鼻祖。

黄庭坚热衷杜甫研究，在杜甫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而他自己的文学活动也受着杜甫的巨大影响。

首先，他的文学理论的建立和杜甫研究的心得有密切的关系。他“点铁成金”的著名文学理论，就源于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研究结论。黄庭坚认为，杜甫、韩愈诗文无一字无来处，故诗文皆登峰造极，进而推导出“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当然，“点铁成金”的理论并非文学创作的好理论，因为它引导人们在前人作品中讨生活，而不去创造。这样，势必造成因袭守旧、剽掠稗贩，把文学创作引入死胡同。王嗣奭云：“诗意无穷，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能尽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

法，规模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余谓换骨夺胎不离于窃，巧则骗人，拙则败露。高人偶合，原非袭也。请箴以一语：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管天笔记外编》）批评虽然尖刻，却中肯綮。推求黄庭坚所以提出这样错误的理论，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点，和他研究杜诗继承前人的创作成果，得出过头的结论——所谓“无一字无来处”，有很大的关系。

其次，他的创作风格也和杜诗研究有密切关系。他对杜诗烂熟于心，深入研究，其创作自觉或不自觉受到杜诗的影响，加之创作思想受杜甫的影响，因而他的诗风和杜甫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实际上黄庭坚并非一位只知道点铁成金的方士，而是一位有创造才能的作家，他能在杜甫的影响下，创造自己奇险健雅的独特诗风。他虽然没有完全学到杜甫的精髓，没有学到杜甫的善于创新，没有学到杜甫善于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但他也并不简单模仿杜甫，而是总结杜甫创作的某些经验，加以运用发展。所以，“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学甫而不为者”（《宋史》卷四四四《黄庭坚传》）。

黄庭坚热衷于宣传杜甫，提倡学习杜甫。黄庭坚始终提倡熟读杜诗。他在《论作诗文》中说：“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熟读三五十遍，寻其用意处，则所得多矣。”（《豫章黄先生别集》卷六）黄庭坚创立的江西诗派，就是一个崇奉杜甫的创作团体，一个学习杜甫的诗派。

黄庭坚努力促进杜诗的保存流传。他在蜀中做官时，亲自书写杜甫蜀中诗，由杨素翁请人刻石，建高屋保存。其屋取名大雅堂，并作《刻杜子美巴蜀诗序》和《大雅堂记》。其序云：“自予谪居黔州，欲属一奇士而有力者，尽刻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六）

其记云："丹棱杨素翁，英伟人也。其在州闾乡党有侠气，不少假借人，然以礼义不以长雄也。闻余欲尽书子美西川夔峡诸诗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请从事焉。又欲作高屋广楹庥此石，因请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七）从刻石可以看到黄庭坚保存杜诗和促成杜诗流传的良苦用心。

黄庭坚在宋代文化界有崇高地位，一生致力于杜甫研究和扩大杜甫的影响，对宋代杜甫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杜甫学史上占有非常光辉的地位。

三

江西诗派成员研究杜甫的资料保存不多，我们就现有资料进行简要论述。

从种种资料看，江西诗派对杜甫的研究是全面的，包括思想内容的研究，如谢逸《故朝奉大夫渠州使君季公行状》言季公"尤爱子美，以为唐之治乱，备见于此"（《溪堂集》卷五）。江西诗派最注重杜诗艺术研究。陈师道认为，杜诗艺术无所不有。"余登多景楼，南望丹徒，有大白鸟飞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鸟过林分外明。'谢朓亦云：'黄鸟度青枝。'语巧而弱。老杜云：'白鸟去边明。'语少而意广。余每还乡里，而每觉老，后得句云：'坐下渐人多。'而杜云：'坐深乡里敬。'而语益工，乃知杜诗无不有也。"（《后村诗话》）杜诗一切皆好，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诗歌其好，则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而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后山诗话》评论简略而具体，非常中肯，非常全面，极具新意。

江西诗派研究杜甫的典故词语，并进行阐释。如释黑暗为犀角。洪刍："老杜诗'黑暗通蛮货。'黑暗，犀角也。波斯国谓象

牙为白暗，犀角为黑暗。二事并见段成式《酉阳杂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载《洪驹父诗话》）释桑落酒为桑落河之美酒。王直方：“老杜有‘坐开桑落酒’句，《世说》谓桑落河多美酒，而庾信有《从蒲州刺史乞酒诗》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九引《王直方诗话》）认为杜诗“紫逻”即汝州紫逻山。王直方：“老杜《送贾阁老出守汝州》云：‘云山紫逻深。’世之注云：逻，塞也，取巡逻之意。而余观《九城图》乃云：汝州有紫逻山。”（《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九载《王直方诗话》）这些阐释都较准确，且有创见。

江西诗派对自己生活的时代的杜甫学进行研究。洪刍批评当时有的杜诗注荒唐可笑，并认为世所谓王洙注非王洙注，也非传言的邓慎思所注。洪刍说：“世所行注老杜诗，云是王叔原，或云邓慎思所注，甚多疏略，非王邓书也。其甚纰缪者，佛经称善巧方便，僧璨、惠可二祖师名，故诗曰：‘何阶子方便。’又曰：‘吾亦师璨可。’注乃云：子方，田子方。璨可，诗僧。顾恺之小字虎头，维摩诘是过去金粟如来，故《乞瓦棺寺顾恺之画维摩诘像》诗卒章云：‘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注乃云：虎头，僧像。金粟，金地当饰。此殊可笑也。余尝见一老书生，忘其姓名，自言注老杜诗，取而观之。注‘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云：冠，上服，本乎天者亲上，故称冠，譬之君子。袴，下服，本乎地者亲下，故举袴，譬之小人。虽不为无礼，然穿凿可笑。”（《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载《洪驹父诗话》）王直方云：“近世有注杜诗者，注‘甫昔少年日’，乃引贾少年。‘幽径恐多蹊’，乃引《李广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绝域三冬暮’，乃引东方朔‘三冬文学足用’。‘寂寂系舟双下泪’，乃引《贾谊传》‘不系之舟’。‘终日坎壈缠其身’，乃引孟子少坎坷。‘君不见古来盛名下’，乃引《新唐书·房琯赞》云：‘盛名之下为难居。’

真可发观者一笑。”他们严肃批评了当时杜诗注释中的错误，因其穿凿、繁琐。

江西诗派还研究杜甫在当时人创作中的影响。李彭记苏轼喜欢杜诗。他说：“东坡先生喜诵杜少陵‘五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之句。其在峤南，列置五章，仆盖诵之不离口。欲效其仿佛而不可得。”（《次韵东坡五更山吐月》，《日涉园集》卷七）苏轼曾自言不甚喜李杜诗，从李彭的材料看，苏轼自言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宋代一些诗人喜欢模仿杜甫。王直方云：“秦少章不见十年，忽一日见访，书一篇为惠云：‘不到王家近十年，子猷风韵亦依然。旧时朋友今何在，别后新诗谁与传。’余戏曰：‘莫太犯老杜所谓：不见旻公三十年，封书寄与泪潺湲。旧来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诗谁与传。’”（《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九载《王直方诗话》）说秦少章模仿杜诗，证据非常有力。王直方又说自己诗派中的潘邠老喜欢用杜诗的语言，几近剽掠。他说：“潘邠老诗多犯老杜，为之不已，老杜亦难存活。使老杜复生，则须共潘十厮炒（吵）。”（《类说》卷七五载《王直方诗话·潘邠老诗》）这些材料都生动地反映了宋代作家学习杜诗的方方面面的情况，反映了杜诗在宋代的巨大影响。

江西诗派作家对杜甫的创作也有批评。洪炎批评杜甫有些诗缺乏兴托之致。他说：“诗人赋咏于彼，兴托在此，阐绎优游而不迫，其所感遇常微见其端，使人三复玩味之，久而不厌，言不足而思有余，故可贵尚也。若察察言，如老杜《新安》、《石壕》、《潼关》，《花门》之什，白公《秦中吟》《乐游园》《紫阁村》诗，则几于骂矣。”（《豫章黄先生文集后序》，见《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〇）这种评论表明，江西诗派有自己的文学创作主张。他们的文学理论与杜甫的文学理论有很大不同，完全读不懂杜甫即事名篇、直写时事的诗。同时也说明，江西诗派并没有真正去学习

杜甫的文学创作精神，没有真正学习杜诗的艺术精华，所以江西诗派尽管以学杜出名，但对杜甫研究并不深，所得杜甫的精华并不多。其诗歌创作虽在艺术上力学杜甫，诗风明显受到杜甫的一些影响，其代表作家黄庭坚、陈师道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总体而言，江西诗派在杜甫学上有很大建树，但没有能将杜甫的思想和艺术发扬光大，创造出伟大的作品。

八 秦 观

一

秦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苏轼以为有屈、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王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登第，调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苏轼以贤良方正荐于朝，除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迁正字，复为兼国史院编修官。绍圣初，坐党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刘拯论其增损实录，贬监处州酒税。又削秩徙郴州，继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复宣德郎，放还，至藤州卒，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事见《宋史》卷四四四本传）

二

秦观认为杜甫在诗坛的地位像孔子在儒家的地位，提出杜甫是领导诗歌潮流的集大成者。《韩愈论》云：“然则列、庄、苏、

张、班、马、屈、宋之流，其学术才气，皆出于愈之文，犹杜子美之于诗，实集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淮海集》卷二二）秦观的观点在后世有重大影响。

杜甫所以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正在于他继承古代一切优秀的诗歌遗产，同时又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进行艺术创新，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诗人。他处的时代又是一个社会发生剧变的时代，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的时代，而他用集众家之长又带有创新精神的艺术，表现社会的巨大变化和他在巨变中的生活和感受，创造出最伟大的艺术。秦观的评论正抓住了杜甫诗歌最本质的特点，即领导时代艺术潮流、富有独创而兼有众家之长的风格。因此，杜甫之集大成成为杜甫学史上最经典的话语之一，为学者广泛应用，在杜甫学史上有重要影响。

九　鲁　訔

一

鲁訔（1099—1175），字季钦，秀州嘉兴人，徙海盐之五原。

起家左迪功郎、临安府余杭县主簿。丁忧免丧为广德军教授。因荐改宣教郎知衢州江山县。善于理政，迁奉议郎、大宗正司主管财用，分治于越。为吏部员外郎。是岁浙西水灾，民大饥疫。使浙西，所过发仓廪，人人被实惠。进太府少卿，兼权大理少卿。感激奋励，遇事可言，不以非其责弗言。如论海盗备御蕃舶事宜、缗钱会子轻重相权、催科纲运致弊不一，咸得要领。至言徇私植党、请谒交通，辞尤激切。请补外，除直敷文阁、江西转运副使。徙浙东提点刑狱公事，又徙福建提点刑狱公事。力请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观。以直敷文阁致仕。鲁訔与其兄如晦“学问词章，一时竞爽”，当时“比之二陆”。鲁訔淳熙二年八月十日以微疾卒，享年七十有七。

鲁訔著述甚多。有《易说》二十卷，《论语解》十卷，《蒙溪已矣集》四十五卷，《后集》二十卷，《须江杂著》六卷，《会稽酬唱》二卷，《刍狗集》十卷，《刍荛编》十卷，《南征录》二卷，《自警录》四卷，编集《祖宗训典》五十卷，《杜少陵诗集编注》十八卷，《年谱》一卷。鲁訔是一位才华出众、学识渊博、勤于著述的人。（事见周必大《直敷文阁致仕鲁公訔墓志铭》，《文忠集》卷三十四）《杜少陵诗集编注》（包括年谱）似已出版，大约在元以后亡佚。

二

鲁訔《杜少陵诗集编注》是他对杜甫诗集所作的新的编和注。他在《杜工部诗年谱原序》中说：“名公巨儒谱叙注释，是不一家，用意率过，异说如猬。余因旧集，略加编次，古诗近体，一其先后，摘诸家之善，有考于当时事实及地理、岁月与古语之的然者，聊注其下，若其意律，乃诗之六经，神会意得，随人所到，不敢易而言之。叙次既伦，读之者如亲罹艰棘虎狼之惨

为可惊愕，目见当时甿庶被削刻转涂炭为可悯。因感公之流徙，始而适，中而瘁，卒至为少年辈侮忽以讫死为可伤也。”《杜少陵诗集编注》以“编注”命名，乃是特别标明其编和注的特色。它实际上在三方面着力研究：一、编集；二、注解；三、年谱。

先说编集。

《杜少陵诗集编注》采用编年体，按年编排。元姚桐寿云：“杜少陵集自游龙门至过洞庭诗目次第，为此州先正鲁訔季钦编次，大都一循少陵生平行迹，亦可见其诗法，升降亦随其年，自少而壮而老，愈入于细而化也。”（《乐郊私语》）原著已佚，而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署“鲁訔编次”，即完全采用鲁訔的编年进行编排，明白地说，《杜工部草堂诗笺》（除卷四〇《逸诗拾遗》外）乃鲁訔《杜少陵诗编注》所编之旧。不过鲁訔编为十八卷，蔡梦弼编为三十九卷。笔者的这种推测应该不误。《杜工部草堂诗笺》编次的目录是：“开元留东都所作。”“天宝以来在东都及长安所作。”“至德元载公自鄜州赴朝廷遂陷贼中在蓝田县所作。”“至德二载夏至贼中达行在所授拾遗后所作。”“八月还鄜州及扈从还京所作。”“乾元元年春至夏五月在谏省作。”“乾元元年夏六月出为华州司功冬末以事之东都乾元二年七月立秋后欲弃官以来所作。”“乾元二年秋七月弃官居秦州以后所作。”“乾元二年至秦州如（入）同谷十二月一日纪行所作。”“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至陇右赴剑南纪行所作。”“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广德元年至梓暂往阆。”“广德二年至梓再往阆中。”“春再至成都所作。”“再至成都所作。”“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永泰元年在云安所作。”“大历元年在夔州所作。”“大历元年自赤甲迁瀼西所作。”“大历二年秋在瀼西所作。”“大历二年秋在夔州所作。”“大历三年移居公安下岳阳所作。”“大历四年秋至潭州所作。”“大历四年在潭州所作。”“至衡州所作。”从《杜工部草堂诗笺》

看，鲁訔的编集虽言为编年体，其实是以杜甫生平行迹的时间和地域为纲来编排，在分地域编排后，再根据诗的写作先后来按年编排。不完全是按年编排的，在写作的地域范围内，则体现出诗大致的写作时间。老实说，这是杜甫诗编年相当科学的方法。为什么说这种方法相当科学呢？因为杜甫诗有很多是无法完全系年的，如果强行系年，势必牵强附会。如果不按地域编，势必将很多能大致系年的诗排斥在系年之外，从而降低了诗的编年质量。因此，我们认为鲁訔的《杜少陵诗集编注》有非常大的创新，显现出非常高的编年水平。而从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推测，鲁訔可能将未能编年的诗未编入《杜少陵诗集编注》，这就造成所编的诗不完全，使人无法读到杜甫全部的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当然，以上论述都是建筑在推测基础上的，不能断定完全符合实际。

次言注解。

《杜少陵诗集编注》的注解，也因为原书的亡佚而无法深入研究。根据现存资料分析，注解有创见，很扎实。姚桐寿云："注脚多所补益，极为后学借资。"（《乐郊私语》）评价很高。鲁訔的注在黄希黄鹤《补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和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中均有保存。不过，保存得比较少，保存的注也比较短。很可能鲁訔的注原本就比较简明。鲁訔的注也有一些错误。姚桐寿批评说："第音切类多吴音，其他注释如以'铁马汗常趋'为'昭陵石马果常有汗'，以'空同小麦熟'为'不近武威'。（今按："昭陵"及"不近"二处文字似有误。）'林间踏凤毛'，'踏'字为'跨'字之误。'汝与山东李白好'，以'山东'为'东山'。（今按：鲁訔"东山"之说实不误。）'天阙象纬逼'，以'天阙'为'天窥'。'江月满江城'以'江月'为'秋月'。'赤骥顿长缨'以'缨'为'鞜'之类，

不免为杜集增累。"(《乐郊私语》) 从批评看，版本文字与注音有错误，注释也有错误。不过这都不是大问题，姚桐寿的批评也不一定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訔注的质量是比较高的。

三

鲁訔所作《杜工部诗年谱》是他编注和研究杜诗的心得与成果，大概是独立于《杜少陵诗集编注》流传（故周必大《直敷文阁致仕鲁公訔墓志铭》将《年谱》与《杜少陵诗集编注》分开著录。或《年谱》与《杜少陵诗集编注》合刻流行，后有人将其独立使用或抄录)，故保存至今。

《杜工部诗年谱》是鲁訔长期对杜甫生平研究的总结，也是他长期研究杜甫的结晶。

从《杜工部诗年谱原序》所署时间"绍兴癸酉五月晦日"可以推测，《杜工部诗年谱》当作于此前不久。其时正是鲁訔学术创作上的黄金时代，所以《杜工部诗年谱》质量很高，是宋代一部非常好的杜甫年谱。

《杜工部诗年谱》有以下特点：

(一) 写作目的明确。鲁訔作年谱就是有助于了解杜甫和阅读杜诗。"如陪公杖履而游四方，数百年间犹对面语，何患于难读耶?"(鲁訔《杜工部诗年谱原序》)

(二) 系事明白而较为详实。系杜甫生平事迹的有二十六年，杜甫人生的各个时期皆有事系，大致勾画了杜甫生平的轮廓。比鲁訔之前的人所作的年谱详细明了。如"十载辛卯公年四十：公奏《三大礼赋》。元稹《志》曰：赋奏，命宰相试文，授右卫率府胄曹。吏（按：疑作"史"）云：奏赋，帝奇之，命待制集贤院，相试文，授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公《官定后戏赠》曰：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奔走，率府且逍遥。

《莫相疑行》曰：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煊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史集皆以为十三载。按《帝纪》十载行三大礼，十三载未当。《郊况表》云：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故知当在今岁。原叙云：《新书》作召试京兆府兵曹。《新书》乃今《旧书》也。今书作胄曹。《进西岳赋表》乃云：委学官试文章。皆不同。《除夕曲江族弟位宅守岁》曰：四十明朝过。《年谱》云：《上韦左相》诗云：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壮游》曰：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则公归自齐赵乃应诏，奏赋又数年间事也。”这是天宝十载的年谱全文。主要系杜甫献《三大礼赋》，皇帝命宰相试文章，释褐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所引材料详细，论证有力。对前人将献《三大礼赋》系为天宝十三载的错误进行了辨证。自创新说，符合史实。至今仍为作杜甫年谱者所沿用。

（三）体例大致完备。年谱主要有以下内容：以帝王年号、甲子作为系事的时间；系当时重大事件、杜甫生平大事；主要诗系年；对于前人的不同观点进行评议、辨证；对于前人的年谱或著述进行引证。其基本架构已与现代年谱无异，不过在执行体例时还不严格。如“十五载丙午：公年四十五（是年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禄山僭帝于东京。公在奉先，以舅氏崔十九翁为白水尉，故适白水。有《高斋三十韵》。六月辛未，贼入潼关，驾幸剑外。七月甲子，肃宗即位灵武，公渐北。《过彭衙行》曰：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冯翊界），月照白水山（属同州）。少留周家洼，欲出芦子关。七月，寓于鄜州，有《三川观涨》诗（鄜州属县）曰：我经华原来（长安北），公羸服走灵武，贼得之，故《赠韦评事》诗曰：昔没贼中时，潜与子同游。公没贼中有《九日蓝田崔氏庄》以下十三首。”对前人所论或所载杜甫生平的错误多有辨证。前面的引文中已有一些

例证。又如上元二年："公放诞不乐吏检，虽郑公礼宽心契，尤每见意。史云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子！武亦暴猛，外若不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旧》史不载。以公诗考之，武来镇蜀，彝已交印入觐。公再依武，相欢恰无限意。史当失之。"驳严武杀杜甫之说，有理有据，甚是有力。对于有异说而难于判断的或尚未考清的事则系以某年，以提出疑点。如《年谱》："十三载甲午公年四十三：《玄宗纪》秋八月甲子朔，文部侍郎韦见素拜中书门下平章事，公赘见韦左相诗云'龙飞四十春'，又曰'愚蒙但隐沦'，则此诗似未献赋前。《封西岳赋表》云'臣本杜陵诸生，年过四十'，又云'盖长安一匹夫耳。次岁回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制于集贤，委学官试文章，再降恩泽，送隶有司，参例选序，则此赋又在《三大礼赋》后。诗文以为十二载，未详'。《纪》二月丁丑杨国忠为司空，公《表》云：'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斯文不可寝已。'则此赋当在未封西岳前，而《纪》封华岳在九载，又当考也。"这样的存疑在《年谱》中尚多。

由于《杜工部诗年谱》质量高，在当时与后世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内容为学者所运用，其体式为后世所仿效。虽有个别失实处，但瑕不掩瑜。《四库全书提要》说："姚桐寿《乐郊私语》云，杜少陵集自游龙门至过洞庭诗目次第为季卿编定，一循少陵平生事迹，可以见其诗法。近时滏阳张氏、吴江朱氏所注杜诗，其年谱大率仿此。而推拓之，知密于赵子栋《谱》多矣。虽间有附会，又乌可以一眚掩乎？"评价非常公允。

《杜工部诗年谱》作于宋代，所用资料有些现已亡佚，有些也与现在的版本有异，所以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如"天宝十载"下，"《除夕曲江族弟位宅守岁》曰'四十明朝过'"。此诗题

一般作《族弟位宅守岁》，没有写作时间、地点。而依《年谱》的诗题，则可将此诗系于天宝十载除夕长安作，对诗系年大有益处，而且使我们对此诗内容的理解更准确，更丰富。又如“至德二载”下保存着吕大防《杜甫年谱》的内容：“吕汲公考云，八月墨敕放还鄜州，有《北征》诗。《旧史》云，肃宗怒，贬甫为华州司功曹，非是。”房琯罢相，杜甫上书说不宜免大臣，肃宗怒，诏三司推问，史皆言以张镐言帝解赦之。而鲁訔《杜工部诗年谱》言：“《实录》言御史韦陟言，当考。”唐《实录》纪实性很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年谱》引《实录》提出异说，颇值得研究。

一〇　赵次公

一

赵次公，字彦材，蜀人。生活在南北宋之间，孝宗隆兴时任隆州司法。

赵次公是宋代学者，有苏轼注的著作。其杜甫研究著作为《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是宋代最佳的杜甫研究著作。原书已佚，今有林继中所辑《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辑录较为完善。

二

书名《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有“新定”和“先后”二语，考察注解内容，有时一首诗注有相近的内容同时

出现，正是先解与后解并存书中的有力证明。我们认为，赵次公的著作当在北宋时出版，明抄本有“宣和元刻”的题识就是证据。后赵次公又修订补充，在南宋时出版，名曰《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我们所以特地提及这个问题，是想说明，赵次公对杜甫的研究非常投入，非常执著，花费了一生大量的时间与心血。

从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进行推断，赵次公所著《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当是百万字左右的皇皇巨著。（林继中《辑校》为九十万字，去掉林继中的文字约十万字，赵次公的文字约八十万字［包括杜甫原著］。）显然，赵次公原著文字比所辑的要多得多，因为有些已完全亡佚了，不可能辑入。从现辑佚文考察，原著亡佚甚多，赵次公原著在百万字以上。在杜甫学史上，百万字的巨著并不多见，在宋代更是凤毛麟角。更可贵的是，它的学术质量非常高。

赵次公的研究正值杜甫学深入发展的初期，前辈学者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创新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赵次公在继承前人研究项目的同时，又大大地开拓了新的项目。他的著作有以下研究项目：（一）按时间分期对杜诗进行编排。如：“卷一　开元间留东都所作”；“卷二　天宝以来在东都及长安所作”。（二）对能系年的诗进行考证系年。（三）对文本进行校勘，并作校语。（四）对难字注音。（五）说明一些诗的写作背景。（六）全文注释。用集注的形式。前人有好的注，则辑录前人的注。没有好注，则创立新注。①注名物，包括人名、地名。②注典章制度。③注典故。④注语典。⑤注其他一切该注的地方。（七）解。对需要说明的地方加以解说。（八）对于长诗分段，并说明段意。（九）论述一些诗的艺术。（一〇）论述一些诗的思想内容。（一一）辑录一些重要的评论和有关资料。（一二）批评一些错误的

研究。(一三)有重要的总结性的研究成果。如《句法义例》，虽现存赵次公的文字已不可见，但赵次公本人在自己的注中多次提到。从赵次公注的文意分析，《句法义例》当是对杜诗句法的全面性的总结研究，是总结杜诗句法特点的成果。考察宋代的杜甫学史，我们认为赵次公的研究项目是最多的。大量宋代杜甫学著作已亡佚，我们这样说似乎不够稳妥。但通过对亡佚著作的分析，通过宋人对赵次公著作的评论，通过现存杜甫学著作的比较，我们认为我们的结论是符合事实的。进一步说，赵次公的研究项目实际上已具备后世杜甫研究完善项目的雏形，实际上已基本涵盖后世的杜甫研究项目，因而在杜甫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从赵次公的注解看，他学识高明，精通古代典籍与文化，对杜诗烂熟于心，能融会贯通，且注解时非常审慎细心，故其注解总是妥帖、精细、笃实，具备有力的材料证明，分析深入透辟，较少穿凿附会。全书呈现博雅精微的学术风格。赵次公生在南北宋之交，在他之前只有几位出色的杜甫集的注家，他们为杜甫集注做了大量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杜甫集非常难注，他们也有很多未注之处，并留下一些错注。这就为赵次公的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时势造英雄，赵次公遂成为杜甫学史上注和解品位最高而发明尤多的学者。(请注意，我们说的是注与解，不包括评论，即不包括对杜诗内容与艺术的研究方面。在杜诗内容与艺术的研究方面，赵次公尚不能称为最杰出的。)

《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虽以"解"命名，而最主要的内容却是注，最用力的也是注。不过，与一般注不同的是，它的注不是用通常注的格式，而是用解的格式。

赵次公注人名、地名、典故，多进行考证，力求符合诗意，有助于诗的理解。《遣兴五首》其三："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注云："东坡先生云：明皇虽诛萧至忠，然常怀之。侯君集

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耶？故杜子美云：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因先生之言乃知此篇为萧至忠而言也。按本传，萧至忠在朝有夙望，容止闲敏，见推为名臣。斯可比之漆、膏、兰、桂者矣。又云，外方直，纠擿不法，而内无守，观时轻重而去就之。参太平公主逆谋。主败，至忠遁入南山。数日，捕诛之。考其生平：景龙元年九月相睿宗，景云元年六月贬。是月复相，七月罢。明皇开元元年正月复相，七月诛。此漆之割、膏之煎、兰之摧、桂之折也。虽已诛矣，然明皇贤其为人，心爱之终不忘。后得源乾曜，亟用之。谓高力士曰：若知吾进源乾曜乎？吾以其貌似萧至忠。力士曰：彼不尝负陛下乎？帝曰：至忠诚国器，但晚谬尔。其始不谓之贤哉！此可推见，当杜公时，犹为人所怜也。旧注便差排作萧望之，非是。”（《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甲帙卷之四，以后均略书名。）摈弃旧说，定萧京兆为萧至忠，较符合杜诗本意。赵次公注释详明。《天育骠骑歌》注：“伊昔太仆张景顺，考牧攻驹阅清峻。”云：“太仆，官名。《唐·兵制》云：其官领以太仆。今公诗所谓‘太仆张景顺’，自是开元时太仆姓张名景顺者也。旧注便差排作张万岁字景顺，误学者矣。万岁为太仆，自是贞观时人。今按，张说作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之碑序》云：元年牧马二十四万匹，十三年乃四十万匹。上顾谓太仆少卿兼秦州都督监牧都副使张景顺曰：吾马几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对曰：帝之力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其颂曰：有霍公之掌政，择张氏之旧令。霍公，王毛仲也。张氏，景顺也。”（甲帙卷之五）引张说所作碑序，注杜诗“太仆张景顺”为开元太仆少卿张景顺，而非旧注所谓贞观张万岁，非常有力，可谓定论。赵次公注地名亦切合诗意。《曲江三章五句》题下注云：“此诗盖游曲江感事之作。按《剧谈录》：曲江本秦时隑州。隑即崎字，巨依切。唐开元中疏凿为胜景，南即紫云楼，芙蓉

苑，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列，烟水明媚。都人游赏胜于中和、上巳节。今公高秋而往，草木变衰，触事感怀。一章叹齿发之迟暮，二章判富贵之无心，三章喜生计之可乐也。旧注引元和中曲江关宴事，去此自五十余年，在公死三十余年之后，与此事并无相干。”注曲江引《剧谈录》，内容简明周全，与诗意的解说完全融为一体，显出非凡的学识与注释功力。赵次公善解方言与俗语，所注都很好。《寄题江外草堂》：“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注“断手”云：“断手字，晋魏以来之语。《齐民要术》言种小豆：初伏断手为中时，中伏断手为下时。本朝《淳化法帖》中载唐高宗敕云：使至，知玄堂已成，不知诸作早晚得断手。凡营造了，当言断手者矣。”（丙帙卷之九）释“断手”清楚，引例证翔实。《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其三：“斫畬应费日，解缆不知年。”注“斫畬”云：“斫畬两字，是楚人语。楚人烧榛种田曰畬，先以刀芟治林木曰斫畬。其刀以木为柄，刃向曲，谓之畬刀。刘禹锡《畬田行》云：何处好畬田，团圆漫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又云：下种暖灰中，乘阳拆牙蘖。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故公于《夔府咏怀》又有‘烧畬度地偏’，又有‘烧畬费火声’之句，畬音式车反。”（戊帙卷之八）所注明晰而细致，表现出作者深厚的语言知识功底。

最精彩的是杜诗语典的注。首先是语典的注堪称详尽。不仅三字以上的语典尽可能做了注，就是两字（词）或一字（词）确为用前人之语（词）亦做了注。赵次公说：“余喜本朝孙觉莘老之说，谓‘杜子美诗无两字无来处。’”“稍近其诗，乃知非特两字如此耳，往往一字繁切，必有来处，皆从万卷书中来。”（《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自序》，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三〇）由于对杜诗语典有理论上的认识，注语典的指导思想明确，所以该注的地方都注到了。《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

首》："幽意忽不惬。"注云："《世说》云：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思意甚不惬。摘而用之。"（甲帙卷之二）认为杜诗"幽意忽不惬"是摘自《世说》"初思意甚不惬"，甚是。《送殿中杨监赴蜀见相公》："风物长年悲。"注云："'长年悲'三字，出《淮南子》云：木叶落，长年悲。"（丁帙卷之七）言杜诗"长年悲"语典出自《淮南子》，甚确。《独酌》："步屧深林晚。"注"步屧"云："《宋书》：袁粲为丹阳尹，尝步屧白杨郊野间，道遇一士人，便呼与酣饮。"（丙帙卷之三）注"步屧"的语典，对理解杜诗"步屧"有益。《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欲起时被肘。"注"肘"云："'肘'字，使《史记》：魏威子肘韩康子于车上。旧注非是。"又："月出遮我留。"注"遮"云："'月出遮我留'，使《汉祖纪》：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丙帙卷之五）虽"肘"、"遮"各一字，然《史记》皆为杜诗二字出处，却不容置疑，这对于理解杜诗的语言来源和文化背景，无疑是非常有好处的。其次是用解的形式注语典，不仅注明了语典的出处，同时还说明杜甫在运用前人语言时的变化与创造。《促织》："悲丝与急管，感激异天真。"注云："暗用《晋书》：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渐近自然。故丝管之声不若虫声之天真也。"（乙帙卷之七）赵次公注极好，使我们注意到杜诗不仅用《晋书》之语，更重要的是用《晋书》之意，用得极有变化，极为巧妙。《旅夜抒怀》："月涌大江流。"注云："'大江流'三字，亦仲宣：'大江流日夜。'而五字一句，东方璆尝与卢照邻分韵，有云'汹涌大江流'。公换一'月'字，点铁成金矣。"注出了杜诗的语典，同时指出杜诗用语的创新达到了新的艺术境界，这对于理解杜诗的艺术非常有益。可以说赵次公的注也超越一般的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通观整个杜甫集的语典注，赵次公所注语典是最多的，也是面最广的，所注也是准确度最高的。其语典的注不仅超越前人，也使后

世的注家仅能望其项背。

对杜诗的内容进行解说，是赵次公著作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解说一般是针对那些不容易完全理解的诗进行。赵次公往往采取补充有关材料和细细分析的方法来解说，使读者获得透彻的理解。《杜位宅守岁》："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解云："过，逾过也。公所以感慨，颇有深意。盖《记》曰：四十曰强而仕。公于天宝九载三十九载之冬，预献明年《三大礼赋》。表云：甫行四十载矣，沉埋盛时，则亦急于仕矣。故下云：飞腾暮景斜。而［揆］（末）句付之醉也。"（甲帙卷之二）用杜甫的人生经历来说明杜诗"四十明朝过"的深意，材料翔实，分析深入，解说很到位。《晦日寻崔戢李封》题下解云："此篇初段盖叙事耳。下段因物感怀而终付之于酒以自遣也。当春有事乎田畴之际，而甲兵不休，忧国念君不能无慨乎中矣。"解说通过对诗意的归纳分析，揭示诗的主旨是忧国念君，有利于读者对全诗的理解。《夔府书怀四十韵》题下解云："此篇谓之书怀，公铺叙其初赐官逢乱，至在夔州时仍以备乱之故。首尾所言，唯伤时忧国者耳。自昔罢河西尉，至战瓦落丹墀十四韵，先言肃宗时至代宗时皆有兵乱，是一段。自先帝严（灵）［虚］寝至答效莫支持十韵，专追言肃宗上升，付授今上代宗事，又是一段。自使者分王命至蜀使下何之八韵，言今日遣使，当在寡诛求、除盗贼之事，又是一段。自钓濑疏坟籍至凡百慎交绥八韵，言身在夔之事，又是一段。"（戊帙卷之七）解说诗的主题既精炼明白，又分段解说大意，更有助于对诗的内容做全面而详细的把握。总的说来，赵次公对杜诗非常熟悉，其解说大多准确、精彩，较少穿凿附会。无论是详细或是简明，都恰到好处。

解中对杜诗时有评论。评论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即关于思想内容的评论和关于艺术技巧的评论。关于思想内容的评论：

《缚鸡行》:“鸡(蛊)[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评云:“一篇之妙,在乎落句。盖鸡之所以得者,(蛊)[虫]之所以失。人之所以得者,鸡之所以失。而人之得失如鸡如(蛊)[虫],又且相仍,何时而了乎?至于注目寒江倚山阁,则所思深矣。”(丁帙卷之七)对该诗所表现的世事隐含的哲理深表赞许。《壮游》题下评云:“公之生平出处,莫详于此篇,而史官为传,当时之人为墓志,后人为集序,皆不能考此以书之,甚可惜也。”(戊集卷之十一)特地指出《壮游》所述杜甫生平的史料价值,极有见地。关于杜甫诗的艺术评论:《渼陂西南台》:“知归俗可忽,取适事莫并。”评云:“此等句皆外枯而中腴。盖言知所归宿则世俗可忽,取适于己,则凡事无可得而并。夫世俗之事可胜言哉,此不尽之意也。”(甲帙卷之四)所谓外枯中腴,即诗句外表平淡,而内里含义丰盈。评论非常中肯。《徐步》:“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评云:“公此数篇诗皆道景为新句,前篇云:‘仰蜂粘花蕊,行蚁上枯梨。’今云:‘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真冠绝古今矣。”(丙帙卷之三)前篇题曰《独酌》,前篇之前篇曰《落日》。《落日》:“芳菲缘岸圃,樵爨倚滩舟。”评云:“芳菲之圃,缘岸而为,樵爨之舟,倚滩而泊。此于义本是缘岸芳菲圃,倚滩樵爨舟,而句法藏巧。”(丙帙卷之三)三诗皆在“此数篇”之内。评论杜诗的语言极富创新性,有独到的眼光。《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其五:“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评云:“剩水残山,杜公之新语。”“上句义言风折笋垂绿,下言雨肥梅绽红。句法以倒言为老健。”(甲帙卷之二)这些评论都说到杜诗的语言的创新和妙处。从这些评论看,赵次公对杜诗的语言有着非常深的研究。

赵次公对杜诗的系年也特别下功夫。最有发明的是通过对诗题涉及的人物和诗的内容的考证,确定诗的写作时间。《严中丞

枉驾见过》自注（今按，杜甫自注）："严自东川除西川敕令两川都节制。"题下注云："按《通鉴》于广德二年春癸卯载：剑南东川为一道，以黄门侍郎严武为节度使。""公自注云：严自东川除西川，敕命都节制。则是未合为一道时，故称为中丞。当是宝应元年权令两川都节制时作。若广德二年，武再尹成都时，公已入幕府，不应有张翰、管宁之语。"（丙帙卷之五）通过考证严武为两川都节度的时间和杜甫诗的隐居内容，确定诗当为宝应元年作，比较合情合理。《送殿中杨监赴蜀见相公》题下注云："相公者，杜鸿渐也。句云'送子清秋暮'，则诗作于九月也。何以知其为大历元年之九月，盖鸿渐以是年二月壬午授命剑南西川节度使以平蜀。至明年夏四月，请入朝奏事，许之。既去，不复来蜀。则九月乃元年之九月甚明。"（丁帙卷之七）以杜鸿渐在蜀为官的时间来考证诗的写作时间，方法得体，结论精确，颇见功力。

《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批评前人杜甫学的错误中，建立自己的学术见解。不破不立，学术正是在不断清除已有的错误中发展的。而赵次公的杜甫学发明甚多，故清除前人的错误也特别多。清除前人的错误究竟有多少条，无法准确统计，因为原著已佚。估计不下千条。其内容可以说涉及杜甫学的各个方面，重点是纠正注的错误，其余如阐释、评论、校勘、编年，是正也颇多。这里举一些纠正注的错误的例证。《览柏中丞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作歌挹盛事，推毂朝孤骞。"注云："下句则公自负其诗所称美，可以推柏公而使之孤骞也。推毂之义，盖取《郑当时传》耳。当时推毂士及官属丞吏。注言荐举之人如车轮之运转也。旧注却引《冯唐传》：王者遣将，跪而推毂。又别一义，非也。"（己帙卷之三）杜诗旧注"推毂"为推车之义，虽释意本身

并不错，但用来解释杜诗则不通，故是错误的。赵次公引《郑当时传》，释为荐举之意，则符合杜诗原意。《小寒食日舟中作》："佳辰强饮食犹寒，隐几萧条带鹖冠。"注"鹖冠"云："鹖冠者，隐人之冠也。袁淑《真隐传》：鹖冠子，或曰楚人，隐居幽山。衣敝履空，以鹖为冠。莫测其名，因服成号。著书言道家。冯谖常师事之，后显于赵。鹖冠子惧其荐已也，乃与谖绝。旧注引汉虎贲武骑皆鹖冠，误矣。"（己帙卷之四）赵次公注鹖冠为隐人之冠，甚是。而旧注言鹖冠为武人之冠虽也是事实，但不符合杜诗之意，赵次公指出其错误，是完全必要的。《夜宿西阁晓呈二十一曹长》："门鹊晨光起，樯乌宿处飞。"注云："门鹊，则门之鹊也，如城鹊之类。义在'起'字，则可见其为门前之鹊。古本《庄子》曰：鹊上高城之绝，而巢于高树之颠。城坏巢折，凌风而起。故君子之在世也，得时则蚁行，失时则鹊起。以晨光而起，义在'起'字。杜田引谢玄晖诗：金波丽鳷鹊，以鳷鹊名门也，大为非是。盖鳷鹊本殿名，其所从入之门因亦得名鳷雀门也。谢玄晖之诗，其言月色之所丽，岂专指门邪？信使杜公用鳷鹊专为门，乃是天子宫殿事，今夜宿夔州之西阁，岂可用天子宫殿事乎？樯而系之以乌，公屡使矣。此乌非真是屋上乌之乌也，特樯竿上刻为乌形，以占风耳。晋令车驾出入，相风在前。正是刻乌于竿上，名之曰相风。晋傅玄《相风赋》云栖神乌于竿首，俟祥风之来征是已。船之樯竿，其上刻乌，乃相风之义。谢灵运《广陵殿送北使》诗云：亭嘶背枥马，樯转向风乌。于义尤明。故公有云：樯乌相背发。危樯逐夜乌。而今云樯乌宿处飞，杜（诗）［时］可不省，乃云樯挂帆木，而乌泊其上，假使真乌泊樯上，何至背发与夜相逐，而于宿处飞乎？况公诗又有曰：燕子逐樯乌，则真燕逐樯上之乌而飞也。次公以杜时可之误，费辞如此，详见《句法义例》。"（丁帙卷之七）在自己对杜诗进行正确

的注释后，又用详细的考证和辨析厘清前人的错误，而对前人错误的批驳，又是对自己正确注释的进一步的阐释和支持。从赵次公对前人错误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杜诗诗意的领悟和把握之精准超越一般的杜甫学者，他的学识和注释之精准也超越一般学者。他在深入研究杜甫的同时，对杜甫学特别是杜诗的注释也有全面的研究。

金无足赤，赵次公的著作也有缺陷。首先是注释有错误。如注“锦官城”云：“蜀人以江山明媚，错杂如绣，故多呼锦官城也。”（《春夜喜雨》，丙帙卷之一）显系错误。虽然可能是沿袭前人错误，作为蜀人，也不应该。其次是很多后世的常用语和口语，也注出处，完全没有必要。如“白发”“雨打”“相与”一类，加注反而降低了注的品位。不过，这是白璧微瑕，大醇小疵。

在宋代，赵次公的杜甫学著作是一部影响非常大的著作，宋代凡是集注性的杜甫学著作，都集有赵次公的注。郭知达的九家注本更将其作为最主要的一家。即是在宋以后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也许是由于著作部帙浩繁而有残缺，学者研读相对较少，其影响不如在宋代巨大。赵次公的杜甫学著作在宋代就好评如潮。刘克庄云：“杜氏《左传》，李氏《文选》，颜氏《班史》，赵氏《杜诗》，几于无可恨矣。”（《跋陈教授杜诗补注》，《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将赵次公的杜诗注著作与宋以前几位最负盛名的注家相提并论，足见对其推重。刘克庄对赵次公的杜诗注著作评价虽然极高，但基本符合实际，而非溢美之词。通观整个杜甫学发展的历史，杜诗的注家可谓多矣，而就注释（不包括对杜诗的评论）品位与质量而言，尚无出其右者。林希逸说赵次公注“用工极深”，是“误者正之，遗者称之，且原其事因，明其旨趣，与夫表出其新意”（《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三〇《学记》），完全

符合实际。综合品评，赵次公是杜诗注释方面成就最大的学者。有关赵次公的批评，留下来的似乎不多，故钱谦益的贬斥就特别引人注目。其酷评的影响甚至超过宋人的褒扬，我们不厌其烦，将他对宋人的总评引在这里："杜诗昔号千家注，虽不可尽见，亦略具于诸本中，大抵芜秽舛陋，如出一辙。其彼善于此者三家：赵次公以笺释文句为事，边幅单窘，其失也短。蔡梦弼以捃摭子传为博，泛滥踳驳，昧于持择，其失也杂。黄鹤以考订史鉴为功，支离割剥，罔失指要，其失也愚。"（《钱注杜诗·例略》）钱谦益这段话被当今学者广泛引用，大多作为正确的评论。而在我们看来，他对宋代注释的全盘否定，是出于抬高他自己注释的目的，完全不符合事实。"短"、"杂"、"愚"是概括不了宋人的杜诗注释的。从《例略》的行文看，他没有读过赵次公的杜甫学专著，只读过诸本所辑赵次公的注释，就以此来评论赵次公的注，近乎瞎子摸象，痴人说梦。沈增植说："（钱谦益）语若曾见次公书者，然检《绛云楼书目》无之，而逸诗附录且沿旧本之误，书赵次公为赵次翁，则受之固未见也。次公此注，于岁月先后，字义援据，研究积年，用思精密。其说繁而不杀，诸家节取数语，往往失其本旨，后人据以纠驳，次公受枉多矣。"（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明抄本［残卷］后记）沈增植对钱谦益的反批评是非常有力的。我们之所以用这样巨大的篇幅来批评钱谦益的谬论，目的是还赵次公一个公道，提醒学者重视《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赵次公的杜甫学著作在宋以后流传不广，其杜甫学的精华并没有被明清学者广泛知悉和吸收，并没有反映在明清的杜甫学中。我们当今的学者应该充分吸收赵次公的研究心得，使杜诗的注释和研究更深入，更精微。这对于推动杜甫学的新发展，是很有益的。

一一 郭知达

一

郭知达，成都（今四川成都）人，生活在宋孝宗时代，为富顺知监。《明一统志》载："郭知达知富顺监，富顺旧以盐移赡遂宁生徒，岁为镪八十万缗。知达以公养不丰，请于漕台，俾归之监学，自是岁获二十三万五千。"（卷六九《叙州府·名宦》）可见他是一位敢于建言的正直的官吏。他可能在州郡做过官，大约为蜀地郡守。他在《杜工部诗集注序》中说"大书锓版，置之郡斋，以公其传"，即可证明。郭知达著有《杜工部诗集注》。宋代州郡刻书风气甚盛，《杜工部诗集注》可能就是他任郡守时策划集注并雕印行世的。

二

郭知达在谋划和作《杜工部诗集注》集注之时，杜诗注家论家已多，时号千家注杜。郭知达集注的本意，是要从众多的注家论家中精选九家，集注成书，其余诸家皆不取。所选注家论家为王安石、宋祁、黄庭坚、王洙、薛梦符、杜田、鲍彪、师尹、赵次公。郭知达序说："杜少陵诗，世号诗史。自笺注杂出，是非异同，多所牴牾。致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穿凿附会，设有事实，托名东坡，刊镂以行，欺世售伪。有识之士，所为浩叹。因缉善本，得王文公安石，宋景文公祁，豫章黄先生庭坚、王原叔洙、薛梦符□、杜时可田、鲍文虎彪、师民瞻尹、赵彦材次公，凡九

家。”“如假名氏，撰造事实，皆删削不载。”序文明确宣布只集九家注，特别强调删削如标榜为苏东坡注的《杜诗故事》（宋人亦作《东坡故实》）一类伪注。由于是作者序宣称的集九家注和无伪注，故历来目录学家和读者都认为《杜工部诗集注》为九家注和无伪东坡《杜诗故事》。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云：“《杜工部诗集注》，三六卷，蜀人郭知达所集九家注。世有称东坡《杜诗故事》者，随事造文，一一牵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辞气首末若出一口，盖妄人依托以欺乱流俗者，书坊辄抄入集注中，殊败人意，此本独削去之。”而《四库全书》所用《杜工部诗集注》的版本径名为《九家集注杜诗》，所作提要多引郭知达序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认为郭知达所集为九家注和无伪东坡《杜诗故事》。

然而，在我们仔细检阅了《杜工部诗集注》后，发现九家集注所集并非九家，而是远远超过九家。除郭知达所标明的九家外，尚有八家。其中明确标名的有六家：苏轼、王深父、蔡元度、吕本中、范元实（一作宝，当误）、胡仔（标《苕溪渔隐丛话》）。未标明而可考出的有两家：王彦辅、鲁訔。伪东坡《杜诗故事》也颇有删削未尽，赫然在集注中者。

由于宋本无缘得见，以上的钩稽只能依据四库全书本《九家集注杜诗》。其实，四库本卷二五、卷二六尚有五位未辑录的注家，即王禹偁、王十朋、修可、黄鹤、蔡梦弼。但这两卷可能散佚过，现存者殆为后人重新集注，故本文存而不论。另外，本文论述《杜工部诗集注》九位注家外尚有八位注家时，也不用卷二五、卷二六的材料，以免引起读者的误会。

先将九家注之外的八位注家所注，各引一两条材料：

苏轼：《自平》（《九家集注杜诗》，[四库全书本] 卷一一，以后略去名书和版本）：“东坡诗话：‘自平宫中吕太一’，世莫晓

其义：妄者以唐有自平宫。偶读《玄宗实录》，有中官吕太一叛于广南。诗盖云‘自平中官吕太一’，故下文有南海收珠之句。见书不广，轻改文字，鲜不为笑。”《除草》（卷二三）：“苏东坡云：蘱草：蜀中谓之毛蘱，毛芒可畏，触之如蜂虿。治风疹，以此点之，一身失去。背紫者入药。蘱，山韭。”

王深父：《兵车行》（卷一）：“王深父云：此诗盖托于汉以刺玄宗。”《石壕吏》（卷三）：“王深父云：驱民之丁壮，尽置死地，而犹急其老弱，虽秦为闾左之戍，不甚也。呜呼，其时急矣哉！”

蔡元度：《饮中八仙歌》（卷二）：“蔡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异，虽重押韵无异，亦周诗分章之意也。”

吕本中：《陪郑公晚秋北池临眺》（卷一六）：“本中曰：‘何补参军乏’，一作：‘参军事’。”

范元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卷一）：“范元实（原作宝，当误）《诗眼》曰：必言所以见韦者，于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为传诵其诗也。”《登岳阳楼》（卷三五）：“范元实《诗眼》云：《望岳》诗云：‘齐鲁青未了。’《洞庭》诗云：‘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语既高妙有力，而言东岳与洞庭之大无过于此。后来文士道之，终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孟浩然《岳阳楼》诗诗（衍一诗字）‘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楼’，然气蒸者云梦泽而已。杜云‘吴楚东南坼’，则《子虚赋》所谓‘吞云梦者八九而不芥蒂也’。且学者指为佳句者，以‘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而已，殊不知‘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两句尤是含蓄有意之对。邵溥泽民侍郎云：晁以道以此为俯仰格，次公采其说，盖若桔槔之势相引也。其义以既在洞庭之际，亲朋相去之远，虽无一字见及，然于老病中，尚赖有孤舟可以浮泛，而生涯自知也。”

胡仔：《羌村三首》（卷三）：“《渔隐丛话》载：《冷斋夜话》

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更相秉烛照之，恐尚是梦也，当作'更'，若使侧声字读，则失其意甚矣。"《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得寒字》："苕溪渔隐曰：待（律）诗之作，用字平侧，世固有定体，众共守之。然不若用时变如兵之出体（体宇当衍）奇，变化无穷。杜公此篇，即七言律诗之变体也。韦苏州诗：'南望青山满禁围，晓陪鸳鸯正差池。共爱朝来何处雪，蓬莱宫里拂松枝。'如《上严公寄题锦江亭》诗'漫向江头把钓竿'，亦是变体。唐人如此甚多，学者不可不知。"

王彦辅：郭知达集注本：《义鹘》（卷三）题下注："感鸟兽犹见义而动也。"黄鹤补注本：《义鹘》题下注："彦辅曰：感鸟兽犹见义而动也。"又，郭知达集注本《溪鹣》（卷二三）题下注："《异物志》：溪鹣，水鸟，毛有五色，食短菰，其在溪中无毒气。"黄鹤补注本："补注：彦辅曰：《临海异物志》：溪鹣，水鸟、毛有五色，食短狐（当作孤，即菰），其在溪中无毒气。"将两种本子中两篇对应的诗注加以对比，可以看出，注文是相同的。郭知达集注本两篇所集的注皆为王彦辅所注，不过未载王彦辅之名。而《溪鹣》将《临海异物志》简称为《异物志》。

鲁訔：郭知达集注本：《游龙门奉先寺》（卷一）题下注："龙门在西京河南县。地志曰：塞阙山一名伊阙，而俗名龙门耳。"黄鹤补注本：《游龙门奉先寺》题下注："鲁訔曰：龙门在京西河南县。地志曰：塞阙山一名伊阙，而俗名龙门。"将两种本子加以对比，可以看出注文大致一样，可知郭知达集注本所集为鲁訔注，只是未标其名。

从黄希、黄鹤《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可以看出，宋人所谓注家，就是其人有著述材料采入集注中，并非其人一定有杜诗注释之作。故有宋一代注杜者数十人，而号千家注杜。用此注家标准来衡量，我们完全可以说，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实际有

注家 20 人左右。从现存材料看，王彦辅、王深父、吕本中、鲁訔四家皆有杜诗注释之作。而苏轼、胡仔、范元实皆有不少杜诗之论，蔡元度留下的材料少，八人皆足称杜诗注家。

事实说明，九家注之外，确实尚有至少八位注家的注存在。由于《杜工部诗集注》很多地方未标原注者姓名，准确统计具体的注家非常难，估计应在 20 家以上。当然，郭知达序中所说的九家仍是最主要的注家。

标名为“东坡”的伪东坡注，集中也有多条，今亦举两条：《后出塞》其五（卷五）：“坡云：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其将有脱身归国，而禄山尽杀其妻子者。不出姓名，亦可恨也。”《八阵图》（卷三一）：“东坡先生云：仆尝梦见人云是子美，谓仆世人多误会吾《八阵图》诗云‘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世人皆以为先主武侯欲与关羽复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我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所以能取吴者，以蜀有吞吴之意，以此为恨耳。此理甚长。然子美死仅四百年，而犹犹（衍一犹字）不忘诗，区区自列其意者，此其书生习气也。”

我们认定这两条为伪东坡注，根据有三。（一）两条注皆不见于苏轼全集中。（二）所注见识低下，立意与杜诗的本旨不合。杜甫《后出塞》并非如注所言，是咏安禄山的叛将脱身归国之事。而苏轼并不一定认为“晋之所以能取吴者，以蜀有吞吴之意”。注所表现的是庸人的眼光和胸次，并非苏轼的见解。（三）文辞拙劣。“其将有脱身归国，而禄山尽杀其妻子者。不出姓名，亦可恨也。”谁“可恨”？为什么要出其将“姓名”？完全莫名其妙。“然子美死仅四百年，而犹不忘诗，区区自列其意者，此书生习气耳。”有点令人不知所云。而杜甫死距苏轼在世，仅三百年多一点，谈不上四百年，有明显的破绽。全文皆小说家口吻，故可肯定为伪东坡注。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实际注家与郭知达所说的注家不符的矛盾？为什么序说删削尽伪注而实际未删尽呢？这自然引起我们对《杜工部诗集注》成书过程的探索。

《杜工部诗集注》署名为郭知达集注，其实他只是策划与组织者，而并非具体的集注者。郭知达在集注序中说："属二三士友各随是非而去取之。"从序可以看出：（一）郭知达是集注的组织者与主编，没有具体参加集注；（二）集注是几个人共同完成的，成员殆即郭达达任职之郡的士人（包括郡的官吏）。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杜工部诗集注》的成书过程。它不是像一般的集注那样，先搜集各注家的注释材料，然后汇集材料，剪裁、组织加工而形成集注，而极有可能是利用含有九家注的多家集注本（近似黄希、黄鹤用以补注的《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删削、增补而成。说得详细一点，就是选一个含有九家注（含有其中一部分）的多家集注本作底本，把九家注保留下来，而将其余的删去。九位注家的注不全，再搜集材料，重新增删，组织安排，撰成集注。

知道了《杜工部诗集注》的成书情况，也就找到了九家注为什么会实际是20家左右的注的答案。因为底本原本是多家注，在删削非九家注时，难免删削未尽。更有甚者，集注者是多人，各有所好，有意将一些非九家注保存下来。加之有的注没有标明注家，无法判别是否为九家注，也将一些非九家注保存下来。至于伪东坡注存留，主要是伪东坡注很容易迷惑人，不仔细辨别，往往误以为真。总之，九家注之外的十家左右的注和伪东坡注保留在《杜工部诗集注》中，是集注者对有多家集注的底本有意或无意删削未尽造成的。如果《杜工部诗集注》是按体例自行逐一搜集九家注的材料而整理、剪裁、撰集成书，是不会含有20家左右注和伪东坡《杜诗故事》的。从规范的角度说，利用多家集

注而又删削未尽，破坏了《杜工部诗集注》自定的九家注体例，但从质量上看，保留非九家注，弥补了九家注的不足，更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注释成果，提高了《杜工部诗集注》的质量。

三

作为一个集注本，《杜工部诗集注》最大的学术特色和价值主要体现在集注上。可以说，就注释的完全与准确而言，《杜工部诗集注》是宋代最好的。

首先，集注者富有卓见，精选注家。郭知达时代，杜诗注家已非常多。郭知达精选其中有创见的、注释较好的九家，既能集中宋代研究（注）杜甫的主要优秀成果，又防止集入平庸粗滥的注。这是保证集注质量高的根本。

其次，特重赵次公注。赵次公是比郭知达略早的注家，他的注代表了郭知达那个时期新近的杜诗注释水平。宋人很推崇赵次公注。刘克庄《跋陈教授杜诗补注》说："杜氏《左传》、李氏《文选》、颜氏《班氏》、赵氏《杜诗》，几于无可恨矣。"郭知达本特重赵次公注，汇集了杜诗注释的新成果，富有时代气息。郭知达本所集赵次公注的分量，估计约占整个集注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比例甚大。《登岳阳楼》除题下注集《诗眼》外，其余所注皆集赵次公注。《送李煜卿》一首，所集更全是赵次公注，没有一条他人所注。大量集注水平高的赵次公注，可以将集注的质量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

第三，注释比较准确，简明扼要。集注水平的高低与集注者的学识成正比。《杜工部诗集注》充分以众注（主要是九家注）为材料，根据注释的需要，精心裁剪，组织成精当的注本，真正集众家注之长，而避单家注之短。有比较才有鉴别，这里将郭知达集注本与黄鹤本的《哀王孙》题下注加以比较。郭知达本注：

“天宝十五载，明皇西狩，肃宗即位，改元至德，在七月甲子。是月丁卯，禄山使人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等。己巳，又杀王孙及郡县主。诗此时作。《史记》：漂母饭韩信，信曰：吾必重报。母怒曰：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王孙，如言公子。”黄鹤本注：“彦辅曰：韩信至城下钓，漂母哀之，饭信，信谓漂母曰：吾必重报。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无补注。郭知达本注了三方面的内容：写作的时代背景；“哀王孙”的语典；王孙的语意。而黄鹤本只注了“哀王孙”的语典。对比之下，可以看出黄鹤本失之太简略，没有达到当注则注的要求。郭知达本则是该注的都注了，注得准确简洁。当然，这是黄鹤本与郭知达本注释局部比较，并非郭知达本的所有集注都优于黄鹤本。

第四，有集注者之注，纠正纰缪，救补阙失。集注也需要创造性的劳动，这集中体现在集注者的自注上。郭知达集注本的自注并不太多，但集注者之注往往高于所集注的注。从体例看，集注者自己的注一般用“新添”二字标出。《江畔寻花绝句》（卷二三）“诗酒尚堪驱使在”，没有现成的注可集，集注者新添：“王羲之云：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以王羲之之语注“驱使”二句的语典，甚确，对深入理解原诗有益。《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牙堂赀》（卷二一）“昔来寻一老，破愁是今朝”下集注：“杜补遗：汉初应曜隐于淮阳山中，与四皓俱征，曜独不至。时人语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阳一老。曜即应劭八代祖也。又管宁书曰：唯陛下听野人山薮之愿，使一老者得尽微命。赵云：一老，公自谓也。祖出《右》（应为左，指《左传》）：鲁哀公诔，孔子曰：天下不憖，遗一老。松（应为“杜”）所引是，又谓无祖也。”集注者认为杜田和赵次公次所注虽是，但并非“一老”的最早出处，故自己“新添”：“以今考之，《诗·十

月之交》曰：‘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赵岂不见乎?”集注者所注《诗·十月之交》确实是“一老”的最早出处，比杜田、赵次公高明。这些集注者之注，提升了集注的质量，为集注生色不少。它表明，集注者不仅眼界很高，擅长集他人之注，而且学识渊博，自己注释也堪称行家里手。

当然，《杜工部诗集注》的注释也有缺陷。突出的有两点：(一）很大一部分集注没有标明原注者。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使用的集注的底本原就没有全标集注者。不管什么原因造成，对集注来说都是大缺陷。它不利于读者了解原注的注者，不利于阅读注文，降低了《杜工部诗集注》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二）有的注文不正确，有的集注抉择注文不精，有的集注注文失之冗长。如《不见》“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下集：“杜《补》：范传正李白新新（衍一新字）暮（墓）碑云：白厥先避仇，后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有大小匡山，白读诗（书）于大匡山，有读诗（书）台尚存。其宅在清廉乡，后废为僧房，号陇西院，盖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唐绵州刺史高忱及崔令钦记。所谓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匡庐山。”注匡山甚确，而前尚集有：“白始隐岷山，后客任居徂徕山山（衍一山字)，而不载匡山。”这条注释水平低下，本不该取，集于此，画蛇添足，降低了集注的水平。《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卷一三）题下集注：“赵云：此篇极难解，姑以意逆之。似是公泊船处，一美士文采风流，有司马相如挑卓文君之作，公见其人，又见有搜求其人而去者，佳士岂薛文子弟亲戚乎？故及丈人安坐之语，且言国家轻刑以宽之，又言此士俊乂以勉之。尝观《太平广记》载严武一事云：武少时任侠于京城，与一军使邻居。军使有室女容色艳艳，武窥见乃诱至宅，月余遂窃以逃。东出关，将匿于淮泗间。军使觉，穷其迹，亦讯其家人，乃暴于官，亦以上

闻，有诏遣万年县官捕捉。乘递驿行数日随路，已得其迹。武自巩县方雇船下，闻制使至，惧不免，乃以酒饮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弦缢杀之，沉于河。明日使至，搜武之船，无踪乃已。公诗意有类于此，当俟博闻。”所集赵注既言此篇难注，又引小说家言，不足征信，不仅于理解该篇主旨无补，反而添乱，治丝益棼。集注理应对赵注进行删削。不过这样的例证并不太多，可谓瑕不掩瑜。

除集注方面的价值外，《杜工部诗集注》在版本的选择及校刊方面也多有可取之处。郭知达非常重视版本，集注序说要辑“善本”，故集注本基本符合善本的条件。《杜工部诗集注》为三十六卷，底本与黄鹤补注本属同一系统。作为版本，郭知达本优点有四：（一）搜罗杜诗比较完备。杜甫集子经五代而散佚，至宋代编杜甫诗集，有一个逐渐辑佚的过程。郭知达本反映了北宋至南宋初杜诗辑佚的新成果。凡当时新搜集的杜诗，都用“新添”二字标注题下（所谓“新添”，当不是郭知达新添，而是底本的“新添”）。如《腊日》（卷一九）、《投简梓州幕府简韦十郎官》（《卷二四》）皆标“新添”。（二）杜诗文字比较好，错误比较少。（三）辑有杜甫友人的唱和诗。其中有的也是“新添”辑佚的。（四）杜诗中有杜甫自己的注文，有的用“公自注”标明。杜甫的自注和杜甫友人的唱和诗是重要的资料，对研究杜甫和杜诗皆有用处。与宋代其他版本相比，郭知达本也有自己的特点与优势，值得重视。

在校刊方面，郭知达本也做得比较好。郭知达在集注序中说“精其仇校，正其讹舛”，大致符合实际。在校勘中，尽量罗列异文。如《龙门阁》：“高”校：“一作白。”“（危途）中萦盘”校：“一云萦盘道。”“吹过雨”校：“一云过飞雨。”在集注时，也集录注中有关校勘之语。《春夜》（卷二二）“风色萧萧暮”下集：

“赵云：一本作‘萧萧风色暮’，则错字眼矣。又一本作‘萧萧风色暮’却无义矣。师民瞻本作‘风色萧萧暮’，是。”其校勘材料丰富，有的还有断语，便于读者研读。

总的说来，《杜工部诗集注》是宋代一个质量很高的注本。在南宋时代即很受重视。淳熙八年，该本刻印后，宝庆元年曾噩又刻于广州漕司。陈振孙对其非常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对该书进行了很高的评价。其文云：“宋人喜言杜诗，而注杜诗者无善本。此书集王洙、宋祁、王安石、黄庭坚、薛梦符、杜田、鲍彪、师尹、赵彦材九家之注，颇为简要。”“知其别裁有法矣。”隐然以其为宋代注杜善本许之，评价高而允当。郭知达集注与黄希、黄鹤《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的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各有千秋，而总的价值大致相当。黄希黄鹤补注本有诗系年，为郭知达本所不及，而就注释的精要而论，郭知达集注本似乎要略胜黄希、黄鹤补注本一筹。

一二 黄希、黄鹤

一

黄希，字梦得，宜黄（今江西宜黄）人。（《万姓统谱》谓临川人，亦谓其为宜黄人。因为临川即古抚州，宜黄隶抚州，即临川。）孝宗乾道二年进士（《万姓统谱》谓乾道三年进士）。官终永兴令。事见《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

黄鹤为黄希之子，字叔似，著《北窗寓言集》。

黄希学识渊博，善作诗，酷好杜甫诗，对《千家集注杜工部

诗史》进行补注，没有注完就去世了。黄鹤继承父业，继续补注，并对诗进行系年，是宋代杜诗注释的一部力作。书在当时就受到赞许。杨万里说："梦得之学，奄有古今。晚年作诗，慕少陵句法，有《补注杜诗》，搜剔微隐，皆前人所未发。未成而卒，子鹤续成之。重定年谱，名曰《黄氏补注杜诗》。"(《天禄琳琅书目》卷三载）黄希黄鹤补注杜诗是与赵次公和蔡梦弼注杜诗比肩的名作。黄氏父子《补注杜诗》确实是宋代学术价值较高的杜诗注本。

二

黄希、黄鹤《补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为三十六卷本，与郭知达本属同一系统，但又有所不同。比如郭知达本中很多诗有题下注，黄氏补注本则少有。又如有些新添诗又各不同。如《补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卷二六《陪郑公秋晚北池临眺》和《登高》两首诗题下均标"新添"二字，而郭知达本则未标二字。

该书版本作过认真校勘。如《望岳》(《补注杜诗》卷一九，以后略去书名）"崚嶒"下校："一云棱危。""立"下校："一作列。""归路"下校："一作回。"《示侄佐》(卷二〇）下校："补注：鹤曰：一本题下注云：佐草堂有东阿（按：当为"柯"）谷。"足见黄鹤又做过一些补校。在注文中亦有校语。如《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愁日随愁一线长"下注："洙曰：一云'日日愁随一线长。'"正文和校语之文皆可通，读者可自行抉择。

通过黄希黄鹤补注杜诗，可以了解宋代杜诗版本的一些情况。

《补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作为一个注释本，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大量的宋人注释材料。其号称千家，实则有151家。虽

名不符实，但数量亦不小。很多注家的注赖此书得以保存片鳞只爪，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作为注，这样大量集注，难免精粗并存，芜杂不当。如还有伪造的苏轼的注《东坡故事》也在其中，就是显著例证。作为一个集注本，应该说有严重的缺陷。然而辩证地看，保留这么多宋人的注，包括伪东坡注《杜诗故事》，对于研究宋人的杜诗注释，实在有着其他注本无法相比的史料价值。

黄希黄鹤的补注对原有的集注匡正讹误，补救遗失，发明较多。由于集注并非黄氏父子所作，大约是刻书家请人完成，所集水平不高，留下很多补注的天地。而黄氏父子又比较博学，勤于用功，故发明甚多。其补注在地名、职官、时代背景等方面更突出。《上牛头寺》（卷二四）下集注："牛头山，在梓州，《九州记》云：葛仙翁尝游于此，衮衮上牛头。"所注虽是，但不详细，下补注："希曰：《寰宇记》云，牛头山在梓州郪县西南二里，高一里，形似牛头，四面孤绝，下有长乐寺，楼阁烟花，为一方胜概。"补注简洁明了，甚好。《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五原空壁垒"，下集注："洙曰：五丈原，地名，近长安，时贼退败，故壁垒空。赵曰：长安县之外有毕原、白鹿原、少陵原、高阳原、细柳原、正德原，谓之五原也。旧注谓五丈原非是。"赵次公认为王洙所注不对，是有道理的，但他本人的注也不合适。补注："鹤曰：五原属盐州，侨治灵州。贞观元年州省，县隶灵州，二年复置州，天宝元年更郡曰五原。谓肃宗即位于灵武，今次凤翔，渐可还京，所以五原空存壁垒。若如赵注，长安有六原矣。"五原应为郡名，所注甚确，驳斥赵注非常有力。《送高司直寻封阆州》题下补注："鹤曰：司直，大理寺官。后魏永安三年，高穆奏置司直十人，覆理御史检核事。唐制六人，寺有疑谳则参议之。"对司直一职所属体系、设置缘起、唐代职责，所注非常简

明。《送章留后新亭会送诸君》“新亭有高会，行子得良时”下补注：“希曰：《汉书·项羽传》：饮酒有高会。‘行子得良时’，亦《楚辞》‘曰吉兮良辰，又历吉时兮吾将行’之义。”补注语典甚好。黄希黄鹤所补注，佳处甚多。但也有不少瑕疵。如《羌村三首》（卷三）“峥嵘赤云西”下补注：“云一作城。孔灵符《会稽记》曰：赤诚，山名，色皆赤状，如云霞，今借用也。”以“云”作“城”，句不可通，误。而又以赤城为词条，以《会稽记》为注，其误更甚。《游龙门奉先寺》（卷一）题下注：“开元二十四年作。鲁訔曰：龙门在京西河南县。地志曰：阙塞山，一名伊阙，而俗名龙门。”所注已经清楚，而作补注云：“鹤曰：《唐志》，河南自龙门山，东抵天津有伊水，然《后汉·志》《唐志》俱云冯翊有龙门山。按，冯翊与河中府为邻，而河中有龙门县，又有龙门山。《志》云即导河至龙门之地。《土记》云，梁山北有龙门，并在河中之境，故河中有龙门关、龙门仓。《薛仁贵传》云：绛州龙门人。则绛州亦有龙门。公自秦赴同谷道经龙门镇，则秦成间又有龙门。尝考绛至河中不满三百里，冯翊至河中不满百里，两地相接。又《地理志》，河南即春秋时属魏地。后魏兼置雍州，乃属秦州，宜此山之跨数郡。是诗乃公开元二十四年后游东都时作。”黄鹤补注除系年可采外，所注天下龙门之地，皆与杜诗的内容无关，纯系附赘悬疣，毫无可取。这类缺陷，说明黄氏父子注释之学尚不精湛。

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对杜诗有认真的系年。首先，黄鹤系年，有切实严密的考证。他善于把杜诗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善于从杜诗中详细寻求内证，善于从杜甫的社会关系中寻求证据，系年方法正确。其次，利用前人如鲁訔、梁权道等人的系年结果，认真鉴别，反复推敲，故多有发明，系年多正确。他的系年不仅具体将诗系在具体的年月上，而且说明具

体系年的依据，可供读者深入研究。《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至德二年作。补注：鹤曰：诗云：燃脐郿坞败，指安禄山死，则是此诗在至德二载作。盖禄山以是年正月为安庆绪所弑，公是时陷贼中，而郑驸马池台在河南新安县，不闻公陷贼时至东都，岂张敦儒拘诸官于东都时，公以陷贼亦暂居东都，故得与郑虔相遇而同饮？诗所以有‘握节汉臣回’之句，期禄山死后，皆可以全身而归也。梁权道编在乾元元年，然至德二载已定从伪者之罪，虔在其中，贬台州司户，公在谏省，不应乾元元年尚与之同饮为留连之舞。”又与诗云“‘握节汉臣回’不叶。再味‘别离经死地，披写忽登台’之句，是公未为拾遗前作无疑”。系年大致正确，考证精详，令人不能不信。他的有些诗的系年和考证还可以订正史书所载之误。《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补注：“鹤曰：《新》《旧》史皆以适由太子少詹事出为蜀州刺史，迁彭州，而考公前后诗，则有不然者。以适如史云先刺蜀而移彭，则何为乾元二年，公在秦州有此诗题云《寄高彭州》，又有‘彭州剑门外’之句，而适《赠杜拾遗》诗云‘传道招提客’，又具官云‘蜀州刺史高适’，又有《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诗，而适云：‘人日题诗寄草堂。’盖‘招提客’指公上元元年方到成都时居浣花寺，而是年人日未有草堂。当是二年寄之。以此三诗论，则是先刺彭而后移蜀。然公有《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诗又云‘百年已过半’，则上元二年后五十一岁所作也，何为适又却在彭？是可疑者。尝考二史，适以至德二载二月永王败后为李辅国数短于上前，左授少詹事，则下除当在是年之夏，而公有《寄高詹事》诗云‘安稳高詹事，干戈久索居’，谓其索居之久，则诗是乾元二年作，是时未出为刺史也。史又云乾元二年贬李岘为蜀州刺史，而此诗亦是年秋作，既题云‘寄高彭州’，又中不言刺蜀，第云‘诸侯非弃掷’，则是初得刺彭无疑。

柳芳《历》亦云适乾元初刺彭州，盖史误其先后耳，当以诗为是。其《寄高彭州》一绝云‘秋至转饥寒’与此诗云‘今我独凄凉’意亦同，又俱是秋作，殆与此诗作时相去不远，正不必以‘百年过半’为上元二年后疑之。凡近五十皆可谓百年过半也，如乾元元年作《立秋后题诗》，是时公年方四十七，亦云‘惆怅年半百’。”不仅对杜诗系年作了正确的系年和说明，而且对高适任彭州、蜀州刺史的时间提出了新的看法，进行了严密的论证，纠正了史书之失。这说明黄鹤的杜诗系年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黄鹤还作了鲁訔杜甫年谱辩证，对其错误有所是正，但也有鲁訔本来是正确的，而黄鹤进行了辩驳。如杜甫的生年，鲁訔系年是正确的，黄鹤系年错误，其辨析自然也是错误的。

三

黄氏《补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还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因为它是宋人的著述，而当时用作著述的很多书籍，现在都已亡佚，赖是书得以保存。其主要价值有：（一）关于宋代版本的丰富的材料。（二）关于宋人的杜诗注释材料。这两点在前面已有详细论述。（三）关于唐代社会的材料，特别是有关杜诗写作的背景材料。（四）有关杜甫的研究材料和杜诗的研究材料。如谓杜甫到成都先寄居草堂寺，再建草堂。（五）保存大量已亡佚的文献资料的内容片段。如唐实录（即玄宗实录）有关玄宗的内容。《骢马行》（卷二）“初得花骢大宛种”下注：“希曰：……《洛中记异》：天宝中，大宛进汗血马，其六曰桃花叱。”《石笋记》（卷七）题下注：“彦辅曰：《成都记》：石笋及林亭池石之地，雨过必有小珠，或青黄如粟者，亦有细孔可以贯丝。”《成都记》和《洛中记异》则是已亡佚的典籍，注中所引，虽是只言片语，但也很宝贵。

总之，黄氏《补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是一部有很高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的著作，对后世的杜诗研究产生过巨大影响，仇兆鳌《杜诗详注》从其中吸收了大量营养。今天研究杜甫和杜诗，也不可不读这本书。

一三　蔡梦弼

一

蔡梦弼，建安（今福建建瓯一带）人，生活在南宋中后期。著有《杜工部草堂诗笺》。

二

《杜工部草堂诗笺》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宏观体例上的创造。

《杜工部草堂诗笺》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名儒嘉话》，其内容为所辑宋代学者关于杜甫和杜诗的论述“二百余条”。蔡梦弼生于南宋中后期，所辑关于杜甫和杜诗的论述又比较全面，可以说宋代有关杜甫和杜诗的主要的有代表性的论述，基本上都辑在书中了。主要内容为：论述杜甫的伟大人格，论述杜甫诗与时代的关系、杜诗对社会和人民的表现，论述杜诗的主要内容，论述杜诗的艺术特色，论述杜诗对传统诗歌的继承与发展、杜诗在诗歌上的地位与发展，论述杜诗对宋代文学的影响。试举两则佳话：“《遁斋闲览》曰：杜子美之诗，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奔驰骤

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思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元稹谓兼人所独专，斯言信矣。”“《扪虱新话》：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杜诗有高妙语，如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可谓深入理窟。晋宋以来，诗人无此句也。‘心地初’乃《庄子》所谓‘游心于淡，合气于漠’之义也。”

在一些诗的篇题之下，还集有宋代学者有关杜诗具体诗篇的评论。《北征》笺释：“苏轼曰：《北征》诗识君臣之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黄庭坚曰：此书一代之事，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也。”所引评论简略，但非常精辟，对于读者阅读理解，可起导航的作用。

蔡梦弼辑录这些佳话的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从宏观上把握杜甫其人和杜甫其诗，也就是要人们以这些佳话为纲，来阅读和研究杜诗。

第二部分为《杜工部草堂诗年谱》，实际上就是杜甫年谱。也就是对杜甫一生的主要事迹系年。希望读者通过年谱，对杜甫一生的主要经历（或活动）有一个基本了解。文学来自生活，了解了杜甫的经历，可以更好地了解他的思想，认识他作品的内容与艺术。《杜工部草堂年谱》分上下两部分：上为赵子栎所作杜甫年谱；下为鲁訔所作杜甫年谱。赵子栎所作年谱是现存第二早的杜甫年谱，较为简略，错误也较多。鲁訔所作杜甫年谱应该说是宋代最好的年谱，有关杜甫的大事，能系年的，基本上都系在谱中了。蔡梦弼把两个年谱都收入集中，则充分考虑了两个年谱的代表性，让读者互相参考，自己抉择，对杜甫生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第三部分为《杜工部草堂诗笺》四十卷。即利用鲁訔的编年成果，将诗按年代先后编排，故署“鲁訔编次”，并用集注形式加以笺注。其编排情况如下：卷一：“开元留东都所作。”卷二至卷八：“天宝以来在东都及长安所作。”卷九：“至德元载公自鄜州赴朝廷遂陷贼中在蓝田县所作。”卷一〇：“至德二载夏至贼中达行在所授拾遗后所作。”卷一一：“八月还鄜州及扈从还京所作。”卷一二：“乾元元年春至夏五月在谏省作。”卷一三至卷一四：“乾元元年夏六月出为华州司功冬末以事之东都乾元二年七月立秋后欲弃官以来所作。”卷一五至卷一六：“乾元二年秋七月弃官居秦州以后所作。”卷一七：“乾元二年至秦州如（入）同谷十二月一日纪行所作。”卷一八：“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至陇右赴剑南纪行所作。”卷一九：“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卷二〇：“广德元年至梓暂往阆。”卷二一：“广德二年至梓再往阆中。”卷二二：“春再至成都所作。”卷二三：“再至成都所作。”卷二四（原卷二四误作二五，卷二五误作二四）：“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卷二五：“永泰元年在云安所作。”卷二六至卷二七：“大历元年在夔州所作。”卷二八：“大历元年自赤甲迁瀼西所作。”卷二九至卷三〇：“大历二年秋在瀼西所作。”卷三一至卷三五：“大历二年秋在夔州所作。”卷三六：“大历三年移居公安下岳阳所作。”卷三七（原误为卷三八）：“大历四年秋至潭州所作。”卷三八（原误为卷三七）：“大历四年在潭州所作。”卷三九：“至衡州所作。”卷四〇：“逸诗拾遗。”从大致系年编次看，基本是正确的。这种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有助于知人论世，在杜甫研究史上是一种创造。缺点是不够完善，有些诗本可编入而未编入，使人感到遗憾，也不利于阅读了解杜甫的全部诗作。

第四部分为《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十卷，外集一卷。以黄希黄鹤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为依据，搜集鲁訔编次之外的杜

诗。即将鲁訔编次之外的杜诗依据鲁訔系年加以编次，“酬唱附录”。同时，利用千家注和黄希黄鹤补注。其前有记云：“杜工部之诗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所谓圣于诗者也。蔡梦弼尝集工部诗而笺注之，取信海内已久。然期间犹有遗逸，观者不无沧海遗珠之憾。今得黄氏父子集千家注诗史补遗，计十一卷，意梓以传，非但有以备前编之遗阙，亦所以集诗史之大成欤?”这部分是在前一部分编年编次完成印行后很久才完成的，主要是利用黄希黄鹤补注的成果，略有增补。

从以上所谈的宏观体例可以看出，《杜工部草堂诗笺》是一部内容和体例上均有创造的著作（尽管很大部分是利用他人的成果）。

《杜工部草堂诗笺》的主要成果为笺注，其注法多少带有集注的性质。他的注以自己的意见为主，在前人已有现存的见解时，则先用前人的，而很多时候也将他人的见解运用到自己的叙述和论述中，不列他人之名，所以他的注不像一般集注那样以集他人的注为主。因而他的注虽有自己大量的创造性的见解，而又在很大程度上总结性地吸收了那个时代杜甫研究的成果。

《杜工部草堂诗笺》主要有以下特色：

对可以系年的诗进行系年。《北征》（《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一一，以下略去书名）：“归至凤翔，墨制放往鄜州作。鲍钦止曰：至德二载，公自贼中窜归凤翔，谒肃宗，授左拾遗。时公家在鄜州，所在寇多，弥年艰窭，孺弱至饥死者。有墨制许自省视。八月之吉，公始北征，徒步至三川，迎妻子，故作是诗。”诗系年准确，系年证据有力。《卜居》（卷一八）：“乾元二年，岁在己亥，甫至成都，明年改元上元，岁次庚子，公年四十九，剑南节度使右揆冀国公裴冕为卜成都西郊浣花溪作草堂以居焉。诗

所谓主人，谓裴冀公，或以主人为严武，非也。草堂在江上锦官城西，万里桥左，浣花溪前。按集有《寄题江外草堂》云‘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是也。”系年清楚，笺注就是一篇系年考证，其中尚有辩证，显出学术功力与价值。

非常注重对诗进行笺释，特别注意在题下注释诗的写作背景，发明诗的主旨。有些诗结合诗写作的地点、人物、时间加以注释，恰似一篇完整的解题。如《石壕吏》：“壕音毫，城壕也，属邠州宜禄县，即汉鹑觚县地，北狄曾侵太王及此，故筑城壕以御之，因名石壕。卞圜云：地志：石壕，陕东戍其地新安西。石壕即石崤也。王深父云：驱民之丁壮尽置死地而犹役其老弱，虽秦为宫左之戍，不堪也。呜呼！其时急矣哉。余按，至德二载秋，甫往鄜州迎家，夜投宿于石壕村，因感吏捉人以守河阳，伤之而作是诗也。”诗笺注受《诗》序和郑笺的影响，特别注意阐发诗的微言大义，阐发诗的深刻意蕴。《新安吏》：“收两京后作。虽收两京，贼犹充斥。《后汉·志》弘农郡新安注：《博物记》曰：西汉水出新安入洛。地志，新安县，洛西邑。《唐·志》新安县隶河南府。《汉·高帝纪》：急守函谷关。文颖曰：是时关在弘农县衡岭，今移东在汉南谷城。颜师古曰：古城即新安。王深父云：乾元元年九月，中书令朔方关内河东副元帅郭子仪等九节度之师围安庆绪之师于邺，时以中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师遂溃于城下。诸节度各还本镇，三月壬申，官军败滏水，子仪收兵断盟津，退保河阳，诏留守东都，此诗盖哀出兵之役。夫古者遣将有推毂分阃之命，今弃师于敌，至于无告，如诗之所感，岂无刺焉。然子仪犹宽度得众，故卒章关焉。师古云：乾元元年时，九节度兵围安庆绪于相州，大败而还，朝廷调诸郡兵益急，虽次于尽行。秦之谪戍，无以加此，唯郭子仪能抚士卒，有诏留守东都。故甫于首章讽朝廷重困民力，末章美子仪善养士卒，惜

乎肃宗任之不专，权分于九节度，总统不一，以至于败也。”总体说来，这些笺释提供了诗写作的详细背景资料，对诗的解说也大致符合诗的本意，有利于读者阅读和理解原诗。《潼关吏》：“《史记》，魏文侯三十六年，齐侵阴晋。《前汉·地理志》曰：高帝改曰华阴。《吕氏春秋·九薮》：潼关，故属秦之华阳，高诱曰：或在华阴西。诱又曰：桃林县西长城是也。《后汉·志》：弘农郡潼关故属京兆。晋《地道记》：潼关是也。柳宗元曰：自万年至于渭南，其驿六，其蔽曰华川，其关曰潼关。安禄山反时，哥舒翰守潼关，为火拔归仁执以降贼，由是贼陷长安。后肃宗收复京城，又增修阨险处以为守御之命。甫意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将得其人，加以士卒将校豫附，虽无形胜之地，守则人以为营，岂可得而破哉。哥舒不才，举二十万之师，不战而自溃，使将帅得人如斯辈，虽增修城堡，何益。只以劳民敛怨耳。”蔡梦弼受儒家说《诗》思想的影响，论诗注重怨刺，竭力挖掘诗的深层次的含义。《新婚别》：“《采绿》，刺怨旷，幽王之时，兵革不息，男女怨旷。肃宗遣九节度围相州，败而还，以至捉老妪以供军之役，是穷民无告者不得其所，岂知文王发行施行必先于斯乎。又新婚者不得安其匹偶，岂非幽王之时，男女怨旷，《采绿》之诗所由作也。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存焉。是时虽有所怨，犹止乎礼义，不以私恩而害公义。其与《殷其雷》能劝以义，此所以为仲尼之所取也。赵傁云：“《石壕吏》《新婚别》有《诗·采薇》之旨。”应该说，蔡梦弼的笺释像“三吏”、“三别”这一类现实重大题材的诗，背景材料丰富，阐发诗的内涵深刻。但是，另一方面，在笺释一般咏物言景诗，或一般泛泛致感言情的作品时，往往以比兴说诗，以意逆志，求之过深，硬要挖掘刺的含义，结果违背诗的本旨，成为附赘悬疣，反而使诗意晦涩难懂。《遣兴五首》（卷七）其（朔风飘胡雁）笺：“胡雁，喻

禄山也。禄山本胡人，故以比之。”（惨淡带砂砾）笺：“砂砾，小石也，言禄山起兵叛而扬沙尘也。”（长林何萧萧）笺：“喻大材当乱世萧条，不获用也。”（秋草萋更碧）笺：“草喻小人，草逢秋宜凋瘁，今乃凄凄而更碧，喻小人之得其时也。”（北里富熏天）笺：“言武夫悍卒，当禄山之乱，而能立功取富贵，是以富贵之势重炙天地。”（高楼夜吹笛）（焉知南邻客，九月犹絺绤）笺：“南邻客，甫自言也。甫于斯时不得志，以九月授衣而犹絺绤，盖公贫而无御寒之服故也。”（今按，笔者引用时略去了有关典故等注释）本来诗的旨意很明白，写富人气焰熏天，而自己不得志，连御寒的衣服也没有。蔡梦弼以比兴解说，如此，诗杂胡人小人，芜杂丛脞，使人不知所云。《成都府》（卷一八）（翳翳桑榆晚）笺：“桑榆，谓暮景也。桑榆乃柔肥之木，喻老年将衰朽也。”（照我征衣裳）笺：“日薄桑榆，而其光翳翳，止足照我衣裳，而不能远照，以喻明皇以太上皇居西内也。”（侧身望川梁）笺：“冀知己有所利济也。”……（初出月不高）笺：“喻肃宗初即帝位也。”（众星尚争光）笺：“喻史思明之徒尚与天子抗衡也。”（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笺：“自古圣贤不遇，如孔子孟子之流，托迹侯国，所不能免，况甫乎！此乃自宽之辞。时裴冕尹成都，甫是以卜居浣花里也。”（引用时略去了有关典故的注释）杜甫的诗本是写初到成都的景物和漂泊羁旅之感。而蔡梦弼的笺释把此诗说成一首政治诗，玄宗、肃宗、史思明皆在诗中，牵强附会，近乎痴人说梦。这样笺释杜诗，反而离杜诗的本旨更远，真不如不解说的好。蔡梦弼对于杜诗不含比兴的诗句的笺释也有错误。总的说来，蔡梦弼对杜诗的有关历史背景笺释得很好，而将一些写景抒情诗与政治硬拉在一起，以比兴解说，往往非常荒谬。

《杜工部草堂诗笺》关于地名、人名、事件和一些典故的注

释非常好。其地名之注往往能用方志注一般注家所未注。《羌村三首》题下注："鄜州图经：州治洛交县。羌村，洛交村墟，按集，公有忆骥子诗曰：涧水空山道。又有窜归凤翔诗曰：山中漏村屋。皆谓羌村寓居也。"明确注出羌村为鄜州州治内的村落。而郭知达集注本和黄希黄鹤补注本皆无注。郭知达本集注："赵云：蔡兴宗云：至德一载岁在丁酉秋闰三月，奉诏至鄜迎家过九成宫，徒步行至玉华宫，北征及此。羌村岂在鄜州，乃公寄家之地耶，当得鄜州图经考之。"对羌村的地理位置和杜甫寄家情况乃在揣想中，而蔡梦弼则用方志明明白白地注出来了。《杜工部草堂诗笺》对地名的有关史料和地理沿革所注甚详。前所举的"三吏"的地名注已可以为例。又如《桔柏渡》（卷一八）题下注："《寰宇记》：龙州济顺庙，本张恶子战死而庙存。唐书云广明二年僖宗幸蜀，神见于利州桔柏津，则知桔柏属利州也。王洙云：'桔柏乃文州、嘉陵二江合流处也。余按地理志，文州，古氐羌之境，汉开西南夷，置阴平道。蜀后主建兴七年，诸葛亮定之。钟会伐蜀，姜维来请备阴平桥头，即此渡也。'"所注材料丰富，脉络分明，行文简洁。

《杜工部草堂诗笺》注人物也非常清晰简要，有根有据。《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卷八）题下注："宰画丹青绝伦。朱景玄《画断》：王宰家于西蜀，贞元中，韦令以客礼待之。画山水树石，出于象外。《名画记》：王宰多画蜀山，珍笼嵌空，巉嵯巧峭。胡仔谓按《益州画记》，王宰大历中家于蜀川，公与宰同时，此歌又居成都时作，其许与盖不妄发矣。"着重注人物的贯里、名声、绘画风格、与杜甫的交往，突出人物的著名画家的身份，史料繁富，注释得体。《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王时牧蜀》（按，"王时牧蜀"当为题下注）题下注："王侍御乃王维之弟缙也。维有别业辋川，裴迪从之游。辋川荆棘，迪乃从缙剑外，缙

节度蜀川，盖在高适之后。按王维文集中‘裴十秀才迪’是也。能诗，与维最善，余见前王中允诗题中。”注王侍郎、裴迪皆非常简要与清楚，有考证，有创见。《阆州别房太尉墓》（卷二一）题下注：“阆州太守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常与武等交结，贬邓州刺史，上元元年为汉州刺史，宝应二年拜刑部尚书。在路遇疾，广德六年卒于阆中僧舍，年六十七也。按唐书，上皇入蜀，琯建议，请分诸王镇天下。其后贺兰进明以此谗之肃宗，琯坐是卒废，不专以陈陶之败也。司空图房琯尉汉中诗曰：物望倾心久，匈渠破胆频。注谓禄山初见分镇诏书，拊膺叹曰：吾不得天下矣。图博学多闻，尝谓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来。今唐书不载此语，惜哉，不为图白之也。”用人们不留意的罕见史料来注人物，非常有创见，有价值。《章梓州水亭》（《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补遗》卷五）题下注：“时汉中王兼道士席谦在会同用荷字韵（按当为题下注）。予按，唐奕家小堂图有肃明观道士席谦弈棋第一品。按集有《存殁口号》‘席谦不见近弹棋’是也。”以图画的题字来注释人物，材料极为稀少，极为珍贵，提升了注释的质量。

注诗的内容材料丰富，解释贴切，行文精炼。《垂老别》（卷一三）“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笺注：“西京外郭城朱雀街东第三街，皇城之东第一街进业坊有慈恩寺，即隋无漏寺之故地，有杏园、土城，去京城七十里。”“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笺注：“史思明已杀安庆绪，自立为帝，土门杏园皆设备以御思明，故李光弼郭子仪皆持兵自土门出收恒山。李郭以忠义自奋，善抚士，得士心。戍守之兵，皆戮力以守，壁垒甚坚，为难度越。不比相州九节度，总统不一，易以败北，故曰势异邺城，纵死犹宽。所以特美李郭之功也。”比较黄希黄鹤《黄氏补注千家集杜工部诗》的《垂老别》“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注：“洙曰：

《史思明传》，李光弼出土门，收常山郡。郭子仪以朔方蕃汉二万人自土门而至常山，军威遂振。赵曰：时土门杏园以待史思明。时思明已杀安庆绪，自立为帝矣。与天宝十五载，潼关既溃之后，思明为安禄山攻土门，陷常州时事皆相远。补注：鹤曰：土门县，按《旧史》，土门旧属宜州，贞观十七年废，咸亨二年又割富平、华原、蒲城县，宜改为美原，属京兆。若颜鲁公乾元元年岁次戊戌十月庚申祭伯父濠州刺史云：二兄杲卿，任常山郡太守，忠义愤发，首开土门，擒斩逆竖，唐置镇州，常山郡获鹿县有土门关，即旧井泾关。哥舒翰至土门军入浴遘疾及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门救常山，皆在常山之西，却非此诗所指者，此与杏园俱在长安。乾元元年十月，郭子仪引兵自杏园济河南是也。公诗多用土门事，各不同，当以诗意详之。”其所注冗长，拉杂，不得要领。相比之下，更显出蔡梦弼笺注的准确、丰富、简洁与得体。

《杜工部草堂诗笺》在注释上也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春夜喜雨》（卷一八）“花重锦官城”笺注：“蜀城，人以江山明媚，错杂如绣，故呼为锦官城。”以蜀城错杂如锦，称为锦官城，是望文生训。锦官为主治锦之官，成都旧有大城、少城，少城在大城西，即锦官城，见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水经注》卷三三《江水》。后泛指成都。杜甫诗的锦官城即此意。不过宋人的锦官城注皆错，郭知达本、黄鹤补注本皆与蔡梦弼相似。《白小》（卷六）“白小群分命”笺注：“白小即白萍也。”以白小为白萍，也是误解。白小即白色小鱼。杜甫此诗已说得非常明白：“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这说明蔡梦弼的笺注还没有达到精善的程度。

综上所述，可以说《杜工部草堂诗笺》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笺释性的杜甫和杜诗的研究著作。（一）它是一部体例严密的集大

成式的著作。它汇集了宋代有关杜甫和杜诗的论述和杜甫生平研究成果，汇集了杜诗编注和注释的优秀成果，可以说，它是对宋代杜甫研究成果具有选择性的展示。（二）它又是一部富有创造性的笺释著作。它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很多诗的主旨和写作背景进行了新的解释和探索，有些是正确的、深刻的、全面的，有些对诗的主旨和写作背景的理解和探索则失之穿凿附会。而有的注释新颖、准确、材料丰富，颇有发明。这正反两方面的成果都堪称宋代的代表，都对后世发生重大影响。

一四　刘克庄

一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以荫仕。淳祐六年，赐进士出身，官龙图阁直学士。咸淳五年卒，谥文定。有《后村大全集》。

二

刘克庄是一位系统研究杜甫的人。他的研究特点是对杜甫的每首诗具体进行研究，或将有些诗一首首地评论，或多首综合评论，来阐扬杜诗一首或几首的思想内容特色或艺术上的特色，有时也综合论述杜诗的创作倾向或艺术风格，或进而论述杜甫的思想品格。他论诗颇有眼光，常常出新意，发前人之所未发。

刘克庄从微观出发，论述杜诗宏观的特色，阐扬杜诗的伟大之处。他认为杜甫诗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感时伤世：“杜五言感时

伤世，如‘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如‘敢料安危体，犹多老大臣。’如‘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其用字琢对，如‘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如‘竟无宣室召，徒有茂陵求。’如‘鲁卫弥尊重，徐陈略丧亡。’八句之中，着此一联，安得不独步千古。若全集千四百篇，无此等句为骨气，篇篇都作‘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道了，则似近人诗矣。”（《后村大全集》卷一七三《诗话》前集）杜甫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善于跟随时代的节拍，记录下社会和他的家庭及其自身的变化和对这种变化的心灵感受。因此，刘克庄的评论是很有见地的。刘克庄还认为杜诗反映了中唐肃宗、代宗时代繁重的徭役："《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诸篇，其述男女旷怨、室家离别、父子夫妇不相保之意，与《东山》、《采薇》、《出车》、《杕杜》数诗，相为表里。唐至中叶以后徭役调发为常，至于亡国。肃代而后，非复贞观、开元之唐矣。新旧唐史不载者，略见杜诗。”（《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一《诗话》新集）从宏观着眼，综合研究“三吏”“三别”，透过诗反映的现象，看出肃宗代宗时期朝廷因战争而采取繁重的徭役政策，是造成当时百姓痛苦的重要根源，而这也正是“三吏”“三别”的主要价值所在。这些都表明刘克庄的研究很有深度。刘克庄还认为杜诗反映了当时一些重要的社会现象，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史实，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天边行》云：‘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大麦行》云：‘大麦干枯小麦黄，妇女行泣夫走藏。’‘问谁腰镰胡与羌。’《苦战行》云：‘苦战身死马将军，云是伏波之子孙。’任马璘也。《去秋行》云：‘去秋涪江木落时，臂枪走马谁家儿。到今不知白骨处，部曲有去皆无归。’‘战场冤魂每夜哭，空令野营猛士悲。’此数篇皆可补史之阙文。但遂州白骨不归，失其姓名，当考。”（《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二《诗

话·新集》）

刘克庄对具体的诗进行研究，其议论多有发明。他重点评论杜诗所表达思想的新颖与深刻之处，或者由诗进而探讨杜甫的思想与品格，以加深人们对杜诗的理解。（一）阐述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谒玄元庙》、《次昭陵》二诗，巨丽骏壮，为千古五言律诗典则。其归美开基，则望守成，伤今思古，有无穷忠爱之义。”（《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这两首诗前人较少评论，刘克庄的论述简明扼要，对理解二诗极有好处。“《闻河北节度入朝口号》云：‘喧喧道路多歌谣，河北将军尽入朝。始是乾坤王室正，却教江汉客魂消。’又云：‘北道诸公无表来，茫然庶事遗（遣）人猜。’又云：‘燕赵休矜出佳丽，宫闱不拟选才人。’读杜集至三十卷，多遭乱离愤疾跋扈之作，此口号十二篇，以河北节度将入朝为喜，以北道无表为猜，欲渔阳突骑邯郸儿之归，欲主上如周宣汉武，欲诸公为孝子忠臣，真一饭不忘君者。天宝祸乱，至燕赵始，今安史已无噍类，燕赵佳丽可开选色之场矣，子美方有‘宫闱不拟选才人’之句，所谓举笔不忘规谏者耶！”（《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评论非常精辟，把杜甫作诗的用意和诗的用意分析得非常透彻。杜甫每每在诗中规劝皇帝，可见杜甫是以治理天下为己任，可见他的忠君爱国完全出于至诚，出于天性。（二）阐释杜诗表现百姓的贫困，谴责官吏的冷酷。“《遣遇》篇云：‘石间采蕨女，鬻菜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夫死于役，仅存妇女采蕨，鬻菜以输官，夫民之穷甚矣，而官吏刻剥尤甚于锥刀，此独不指里胥亭长辈，内自租庸使，外自观察使，不得不受其责，故有‘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之句，录之以告居大位者。”（《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论述深刻，而且用诗警示当代的达官显贵，希望

他们关心百姓疾苦，视民如子，使杜诗发挥现实作用。（三）阐扬杜诗心存忠厚。谈论缺点，不忘人优点，说别人的不足，是为了激励人前进。“《负荆行》言夔州俗重男而轻女，至有四十五十无夫家者。末云：‘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最能行》云：‘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此乡之人气量窄，误竞南风疏北客。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始言夔峡二邦之陋，末以昭君、屈原勉励其世俗，公诗篇篇忠厚如此。”（《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一《诗话·新集》）刘克庄在这里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杜甫胸怀广，品德高尚，他爱人，他与人为善，故其诗的境界与一般诗人大不相同，这也是杜甫成为伟大诗人的重要因素。（四）论述杜甫的兄弟友爱之情。“《忆弟》云：‘丧乱同吾弟，饥寒傍济州。人稀书不到，兵在见何由。’又云：‘百战今谁在，三年望汝归。’又《元日寄妹》云：‘近闻韦氏妹，迎在汉钟离。’‘春城回北斗，郢树发南枝。不见朝正使，啼痕满面垂。’公流落颠沛而一念不忘弟妹，内云：‘百战今谁在，三年望汝归。’又云：‘不见朝正使，啼痕满面垂。’读之感慨，不但隆友爱而厚纪伦，其厌离乱而思升平，以不见朝正使为恨，言四方表章未达行在，恐未有见妹之期耳。”（《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姊妹情谊也表现出人的思想品格，杜诗所反映的姊妹情谊，正表现了杜甫重人伦的思想，也表现了战争带给社会和家庭的灾难，更深层次地揭露了战争的罪恶和反对安史之乱的思想。（五）阐扬杜甫在诗中所表现的卓越思想和品格。阐扬杜诗所表现的高洁的品格。“《张舍人遗褥段》云：‘开缄风涛涌，中有棹尾鲸。’‘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领客珍重意，顾我非公卿。’‘服饰定尊卑，大哉万古程。今我一贱老，短褐更无营。煌煌珍宫物，寝处祸所婴。’‘昔闻黄金多，坐见悔吝生。奈何田

舍翁，受此厚贶情。锦鲸卷还客，始觉心和平。’可见子美一介不取之意。”（《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一《诗话·新集》）高洁是人重要的品格，诗确实反映了杜甫崇高的思想境界。杜甫重视保护野生动物，反对暴殄天物。“《前打鱼篇》于丛鱼中独云：‘赤鲤腾出如有神。’又云：‘鲂鱼肥美知第一。’而徐州秃尾，汉阳槎头，皆不足数。又云：‘既饱欢娱亦萧瑟。’末云：‘君不见朝来割素鬐，咫尺波涛永相失。’《后打鱼》云：‘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半生犹戢戢。大雨伤损皆垂头，屈强沙泥有时立。东津欢鱼已再来，主人罢鲙还倾杯。日暮蛟龙改窟穴，山根鳣鲔随云雷。干戈兵争斗未已，凤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两篇末句皆不忍暴殄天物之意，公诗深得风人之义。”（《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一《诗话·新集》）这些阐述充分展示了杜甫的博爱精神。以上刘克庄的评论从多方面挖掘了杜诗所蕴含的崇高思想和精神境界。

刘克庄还论述了杜诗思想内容的创造。阐述杜诗的新见解。“《写怀》篇云：‘祸首燧人氏，厉阶董狐笔。君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注云：燧人火化，而争欲之心生；董狐直笔，而是非之端起。其说甚新。”（《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杜甫的诗当是有为而发，但他毕竟是一种新意，这也是杜诗的一种重要魅力。“《咏怀古迹》内先主孔明庙云：‘古庙松杉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又云：‘万古云霄一羽毛。’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卧龙公没已千载，而有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许之。如云‘万古云霄一羽毛’，如侪之伊吕间，而以萧曹为不足道，此论皆自子美发之，考亭、南轩近世大儒不能发也。”（《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对诸葛亮进行崇高的评价，反映了杜甫非凡的历史和政治见解，表现了杜甫丰富的知识。刘克庄指出，杜甫的卓识

是有眼光的，卓越的见解也是造成杜诗成功的重要因素。

刘克庄对杜诗的艺术性进行有创见的评论。“《壮游》诗押五十六韵，在五言古风中，尤多悲壮语。如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人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又云：‘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又云：‘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虽荆卿之歌，高渐离之筑，音调节奏，不如是之跌荡豪放也。”（《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评论是新颖的，完全阐发了杜诗的妙处。

刘克庄对于杜甫作品的研究和注释，也有很好的意见。他认为注杜甫应以经典为指导，用义理来注杜诗，不要字字求出处，句句求意义。注杜要实事求是，如杜诗语意未安，也要敢于指出。他说：“第诗人之意，或一时感触，或信笔漫兴，后世既远，云过电灭，不容追诘。若字字引出处，句句笺意义，殆类图像罔而雕虚空矣。予谓果欲律以经典，裁以义理，虽杜语意未安，亦盍商榷，况赵氏。禹锡勉之，毋为光焰万丈所眩也。”（《跋陈教授杜诗补注》，见《后村大全集》卷一〇六）说的是注释，其精神却适用于所有的杜甫研究。刘克庄还认为称杜诗为诗史，如果事事都要与史书所载相合，难免牵强附会，何况注杜者已远，史书记载又有误。他认为注杜诗，主要是阐发杜甫的思想。他说：“禹锡专以新旧唐史为案，诗史为断，故自题其书曰：史注诗史。此其所以尤异于诸家者欤？然新旧史皆舛杂，或采摭小说笔记，不必皆实，前辈辨之甚详。而禹锡于三家书研寻补缀，必欲史与诗无一事不合，至于年月日亦下算子，使之归吾说而后已。昔胡氏《春秋传》初成，朱氏云：直须夫子亲出来说，方敢信。岂非生千百载之下而悬断千百载而上之事，虽极研寻补缀之功，要未免于迁就牵合之疑乎？然杜公所以光焰万丈，照耀古今，在于流

离颠沛，不忘君父。禹锡于此等处，尤形容发越得出。使子美出来说，不过如是。”（《再跋陈禹锡杜诗补注》，《后村大全集》卷一〇六）刘克庄提倡的是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是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这种见解不仅在当时出类拔萃，就是对于今天的杜甫研究，特别是杜甫集子的注释，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一五　刘辰翁

一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景定三年进士。以进士对策言济邸无后可恸，忠良戕害可伤，风节不竞可撼，因此忤贾似道。曾为临安府学教授，后以亲老请为濂溪书院山长。江万里荐除太学博士，固辞。宋亡，逃之方外。杜甫学著作为评点杜甫集。其著作有《须溪集》，还有评点王维、李贺、陆游诸集之作。

二

在杜甫学术史上，刘辰翁可谓一枝独秀，是一位有特殊贡献与特殊影响的人物。

刘辰翁的最大成就是创造用评点的方式来评论杜诗。所谓评点的方式，即用短小精炼的语言（往往是三言两语）来评论杜诗。

评点这种形式大约是受黄庭坚用简短的语言笺注杜诗和南宋道学家批点古文等的启发，而加以创造性地运用而形成的文学评

论形式，创造者即刘辰翁。刘辰翁的评点著作有多种，由于杜甫是诗圣，影响极大，而刘辰翁的评点又非常用力，故刘辰翁最有影响的评点之作也是杜诗的评点之作。

评点，一般认为多是读书的即兴之感。这个看法本不错。但是，刘辰翁的评点是建立在对杜诗的长期研究之上，而评点时也是多次阅读而反复评点。这从他的评点中，就可以看出来。《乐游园歌》（《杜子美诗集》刘辰翁会孟评点，明天启本，卷一。以后略去书名、版本）“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下云：“每诵此结，不自堪。”又云：“吾尝隋（堕）泪于此。”尽管只十三字，表达的是多次读杜诗的体会，而且评点也不止一次。《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三云：“吾读再四，感叹甚多，以其首尾备至故也。”多次阅读，有很多心得，厚积薄发，发为评点的却很少，使其尽量精彩。《南邻》（卷七）云：“看几过后，见朱韦斋举此，倍觉有怀，有浓有淡，当由实历故见。”刘辰翁反复阅读杜诗，又读他人的研究之作，然后评点，态度极其认真。因此，刘辰翁的评点并非率尔之作，而是长期研究的心得，加上一时的灵感，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力与灵感突来的顿悟结合之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刘辰翁的杜诗评点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对前人对杜诗理解错误和难以理解的地方加以解说。刘辰翁往往用儒家思想来理解杜诗，加之他熟悉杜诗，熟悉杜诗所表现的时代，因此，能融会贯通，对杜诗的深刻含义有准确的把握。他评点杜诗，常单刀直入，切中要害，往往使读者如拨云见日，心中豁然明亮。《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卷二）云：“忠爱兴至。”“崆峒，指阔远而言，犹言溟涬，非必其地也。若曰一大地麦熟，岂欠少许，王师徒妨刈麦耳。《洗兵马》‘崆峒’亦此意。”指出此诗充分表现了杜甫的忠义，而理解“崆峒”不

能太死，应作“阔远”理解。这对于我们正确阅读这首诗，提供了良好的钥匙。《哀王孙》（卷三）云：“忠臣之盛心，仓卒之隐语，备尽情态。”评点认为，读这首诗，要抓住杜甫的忠爱之心，抓住诗所写的仓卒之意，只有抓住这两点，才能深刻了解杜诗的精髓。刘辰翁的评点有时是解释疑难文意。《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卷一）“经传拱汉皇”下云：“在周时为柱史星矣，然能使后代拱而师事之，此诗意也。”阐释准确而显豁。《故武将军挽词三首》其三“匈奴气不骄”下云：“匈奴尚畏其部曲，则逝者可知，书生善颂者也。”评点一语中的，歌颂武将军部曲，正是为了歌颂武将军。杜诗有很多难于理解处，经刘辰翁评点阐释，便使读者觉得豁然贯通。刘辰翁的评点还纠正了前人的错误理解。《赠李白》（卷一）云：“‘飞扬跋扈’，亦谓太白耳，正是妙意。旧注以为禄山，且没交涉。”旧注认为“飞扬跋扈”指安禄山，完全讲不通，因为诗的内容与安禄山无关，从文意看，完全是指李白，刘辰翁的解释完全是合理的。《过宋员外之问旧庄》（卷一）“吟诗许更过”下云：“谓之向往矣，一任作诗过之，追慕前辈，自歉（谦）之辞。赵注何足以知。”认为赵彦材原来的注错误，而自为新解，其说符合杜诗的原意。刘辰翁的评点还善于发掘杜诗明白晓畅的语言意蕴，使其精彩顿出。《饮中八仙歌》（卷一）“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下云：“浙人不喜骑马，而喜乘船，杜盖嘲之。”评点指出杜甫有戏谑之意，故用乘船比贺知章骑马，读后觉得诗具浪漫性，更形象，更有意味。《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卷一）“圣情常有眷，朝退若无凭”下云：“言其不藉贵势，语独精嫩。”评点说明汝阳王虽贵为皇室，而不仗势骄横，正显示出汝阳王崇高的品格。同诗“谁敢向山林”下云：“山陵指祖宗，此十字最有体，气味甚长。”评点认为此句表现了对皇帝祖宗的尊重、忠诚，读来很有味道。《奉赠韦

左丞丈二十二韵》（卷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下云：“此语本夸大，但得‘破’字，犹言近万。”评点非常好，不仅解释出“破”字的含义，而且经这一解释，两句诗更觉精彩。刘辰翁在评点中也阐述读杜的方法。他认为，读杜诗有时不能死抠字眼，而应从大处把握。《望岳》（卷一）“荡胸生层云”下云：“荡胸语不必可解，登高意豁，自见其趣。”文学创作要运用形象思维，理解自然也不能按理性思维一一索解。“荡胸生层云”看似没有道理，而其实是很有创造性、很有意境的诗句，刘辰翁的评点是很有眼光、很有意味的（尽管他在此把望岳理解成了“登高”）。《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卷三）“巢父掉头不肯住”至“春寒野阴风景暮”下云：“不必有所从来，不必有所指，玄又玄，众妙门。”《巫峡弊庐奉赠侍御四舅别之澧朗》“江城秋日落，山鬼闭门中”下云：“语不必其尽，不必可解，漫发此意。”评点说得有点玄，但意思很明白。文学创作是运用特殊的思维方式，语言表达也不同于一般的方式，我们解读它自然也应用特殊的方式。透过这些评点可以看出，刘辰翁深谙文学创作的特殊性，他提示要根据文学创作的特殊性来解读文学作品，对于读者正确理解文学作品，无疑有重要理论意义。因此，这些看似玄言的评点，其实蕴含着高深的文学理论。

（二）对杜诗的艺术也有很多精彩的阐述，往往发前人所未发。刘辰翁具有很高的文学理论修养，又有创作的亲身体验，对杜诗高超的艺术往往能心领神会。刘辰翁特别赞美杜诗的现实主义。他认为杜甫的诗所以特别有艺术性，特别感人，是他善于将现实生活的经历和心灵感受非常真实形象地表现出来。《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一云：“荒村歧路之间，望树而往，并山而折，或见其背，或见其面，非身离颠沛，不知其言之工也。”其三“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下云：“独行中路，间关忧患，累百言

不自憩者，一见垂泪。”“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下云：“只‘影静’‘心苏’字，每日跋涉扰扰，危不自保，皆可想见，而此喜亦未易自言。他人无此苦，有此苦，无此言，又不知前人已言耳。”评点认为，杜诗超越一般作者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善于描写一般作者所没有的人生经历与感受，并且描写得极好。刘辰翁认为杜诗还能写一般诗人所不能写或不愿写的。《北征》“生理焉得说”下云：“北征精神，全得一段画意。他人窘态有甚，不能自言，又羞置勿道。”评点说得很好。杜甫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首先在于他作品内容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其他作者。特别是敢于写那些最能表现生活特征与本质的事物，而又写得非常生动，在眼光、胆识和功力上就高出一般作者。《南邻》（卷七）“野航恰受两三人”下云：“浅溪小艇，本是实景，然写此有自足之味。”结尾云：“看几过后，见朱韦斋举此，倍举有怀，有浓有淡，当由实历故见。”《无家别》（卷五）“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下云：“经历多矣，无如此语在目前者。”评点都着眼于杜诗描写的鲜明的形象性。刘辰翁的评点还注意阐发杜诗艺术的真。《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卷二）其六“兴移无洒扫”下云：“五字自真。”《同元使君舂陵行》（卷一七）云：“其首尾如此，情事甚真。”真是艺术的灵魂，杜诗的成功和它表现出特别的真有重要关系。刘辰翁的评点有利于读者具体而深入地把握杜诗的真。

（三）善于从意境的角度看待杜诗。《登岳阳楼》（卷一九）“乾坤日夜浮”下云：“气压百代，为五言雄浑之绝，下两句略不用意，而情境适等。”认为“亲朋无一字”二句在意境方面与“乾坤日夜浮”二句有同样高的意境，很有见地，对读者很有启发。《陪裴使君登岳阳楼》（卷一九）“湖阔兼云雾，楼孤属晚晴”下云：“远近浓淡，暮色有情。”这也正是从意境着眼来批点，因

而非常新颖。

（四）善于对诗中字、句和段的艺术进行评论。评点虽三言两语，但针对具体诗句来评论，实实在在，把作品的佳处告诉读者，往往有画龙点睛之妙，令读者佩服。《望岳》（卷一）“齐鲁青未了”下云：“望岳而言，即‘齐鲁青未了’，五字雄盖一世。‘青未了’语好。‘夫’字谁何跌荡，非凑句也。齐鲁跋涉广。”评点说“齐鲁青未了”雄，说“青未了”有创见，说“夫”有韵味，都很有见解。《李监宅二首》（卷一）“杂花分树映，娇燕入檐回”下云：“点缀纤媚。”《夜宴左氏庄》（卷一）“风林纤月落”至“春星带草堂”下云：“景语闲旷。”《赠卫八处士》（卷一）“世事两茫茫”下云：“‘阳关’之后，此语为畅。”《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卷四）“宫殿风微燕雀高”下云：“壮丽自是。若非‘微’字清洒，不免痴肥矣，谩发此义。”《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卷二）其四“藤蔓曲藏蛇”下云：“又极幽僻。”其一“出门游水住”下云：“水自无住，但出何氏林便觉境别如此，最是妙意。”这些关于艺术的评点，有的一语中的，读来有醍醐灌顶之感；有的则启发人思索，令人回味无穷。

（五）对杜诗整首诗的艺术特色也有评论，特别着重于诗的艺术创新。《饮中八仙歌》（卷一）云：“不伦不理，各极其平生醉趣。古无此体，无此妙，谓为八仙甚称。八篇近之，吾意复如题画，人目一二语，集之成歌，像其醉中出口而成，更见佳趣。第难为拘检者道耳。”认为杜甫有意不讲条理，运用近似醉态的语言，近似题画诗的笔法，集中用一两句诗勾画人物形象，是艺术上极大的创造。从诗的语言、结构、人物形象和诗歌发展的历史来评价，高屋建瓴，以小见大，其评点非常精妙。《羌村三首》（卷三）其一云：“当时适然，千载之泪，当在人目，《诗》三百不多见也。”认为杜诗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具有感染人的艺术力

量；认为《羌村三首》的艺术性不亚于《诗经》。《诗经》在古代被认为是艺术的最高典范。刘辰翁的评价是很大胆的。《新婚别》（卷五）云："曲折详至，缕缕凡七转，微显条达。"对杜诗研究精细，见解自然超越一般评论者。

（六）对杜诗的艺术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批评杜诗不可解。《一百五日夜对月》"仳离放红蕊"下云："五字本不可解。"《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其一"青春不假报黄牛"下云："难解。"批评杜诗用词不当或语言笨拙。《览柏中丞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卷一四）"作歌挹盛事"下云："'挹'亦无谓。"《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卷一四）"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张骞"下云："'途中''查上'语何拙也。""披拂云宁在"下云："亦不可解。"批评杜诗在艺术上存在多种缺陷。《往在》（卷一三）"天子唯孝孙"下云："无味。""罘罳行角弓"下云："罘罳下着角弓，颇无意谓。"结尾云："虽大篇，无甚肉也。如'天子唯孝孙''元元归始终'，一似牵补，末更衰乏。"这里，整篇艺术上否定甚多。客观地说，刘辰翁对杜甫是非常尊崇的，他对杜甫的批评没有什么恶意，他心中怎么想，评点就怎么写。因此，我们对评点的批评应持理解与宽容的态度。分析评点的批评，应该说刘辰翁为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文艺理论所局限，有些批评是错误的（如认为"'挹'亦无谓"即是错误），但也有些批评很有参考价值。至少，它启发人们换个角度来欣赏和评价杜诗。杜甫在宋代被视作圣人，杜诗被奉为作诗的圭臬，刘辰翁是历史上第一位比较多的具体批评杜诗的学者，表现出非凡的胆识。

（七）还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杜诗和杜诗研究作了很多评论。谈版本文字的正误。《游龙门奉先寺》（卷一）云："若'天阙''天阔'，岂不牵强？"（今按刘辰翁评点本作"天阙"）认为他本

作“天阅”、“天阔”误。《题郑十八著作丈》（卷四）云：“伤悼之作，谓之‘题’，何也?”虽是提出问题，但也非常好，此“题”字，文字当有误。《奉赠韦丞相二十二韵》（卷一）“白鸥没浩荡”下云：“‘没’字本不如‘波’字之趣，但以上下语势，当是‘没’字相应。”认为“波”字有意味，但从句式来看，应该作“没”字，分析得极有理。注解文意，指出旧注的错误，自创新意。《画鹰》（卷一）“素练风霜起”下云：“素练如霜，谓未画时绢色耳。注误。”认为未画之绢颜色如霜，甚是。《送韦书记赴安西》（卷一）“白头无藉在”下云：“‘藉在’如‘聊赖’语尔，谓无人复慰藉如韦也，故与‘哀怜’为对，以为通藉，殊舛。”释“藉在”为“聊赖”，很新颖，而且文意通畅。《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卷一）“方丈三韩外”至“诣绝古今迷”下云：“言其出使荒远绝迹，特非常语，故未易谕耳。旧注皆误。建标：犹立柱，仿佛其持节之意。”释文意，释词“建标”皆有新意。足见刘辰翁的评点在文献学方面也有很多发明，订正了不少旧注的错误。

（八）对历来的杜甫的生平研究也提出了一些看法。杜甫生平研究，历来有杜甫安史之乱陷贼中，为乱军所拘一说，刘辰翁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可能是人们对杜诗的误解造成的。《述怀》“去年潼关破”至“脱身得西走”下云：“诗中未见为贼所得一节，岂非以‘脱身西走’语致误耶？但自鄜州出即脱身也。”刘辰翁的说法很有道理，杜甫是否为贼所拘，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两唐书杜甫本传认为杜甫饮牛炙白酒而死，刘辰翁对此也表示怀疑。他认为从杜甫诗看，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卷二〇）“兴在北坑赵”下云：“子美将死，犹愤愤诗辞。‘兴在北坑赵’，殊不衰飒，此岂甘以醉饱失身命者。”评点从杜甫胸襟和修养说明，杜甫绝不可能因贪嘴丧生。虽然证据显得薄弱，但

所说道理却值得人们研究与思考。

刘辰翁的评点是杜甫研究史上的一枝奇葩、一块里程碑。可以说，它是杜甫研究史上第一部重要的评论著作。就评论的精湛和论述作品的广泛而言，宋代没有第二部。同时，它所涉及的杜甫研究问题十分广泛，可以说杜甫研究的一切重要方面均涉及了，并且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此同时，刘辰翁创作了评点这种独特的评论形式。它短小精悍，自由活泼。刘辰翁运用这种形式，使他的评论内容如鱼得水，相得益彰，而使得有些评论有如格言，耐人寻思。有些评论带有生活和感情气息，更有韵味。这样，刘辰翁的评点既是杜诗评点的创始之作，也是首部评点的经典之作，故而也就成为后代评点的开风气之作。自元代印行刘辰翁的杜诗评点之作后，评点之作很快便风行天下，云蒸霞蔚，其著作可谓浩如烟海，其间关于杜诗的评点之作尤多。因此，刘辰翁关于杜诗的评点之作流传甚广，影响极大。人们对刘辰翁的评点之作评价甚高。

一六　文天祥

一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今江西吉安市）人。举进士，帝亲拔为第一。累官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湖南提刑。德祐初，诏天下勤王。文天祥起兵，有众万人。以江西提刑安抚使召入卫。除知平江府，除知临安府。宋降，仍除枢密使，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闻益王未立，乃上表劝

进，以观文殿学士、侍读召至福，拜右丞相。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奔循州。后驻军南岭。卫王立，加少保、信国公。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为元军所执。被送至元大都囚禁。不惧威胁利诱，坚贞不屈。至元十九年，英勇就义，文天祥是伟大的爱国者。其著作有《文山先生全集》。

二

文天祥在战争中被元兵俘虏，囚于大都。狱中，他研读杜甫的诗。其《读杜诗》云："平生踪迹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耳想杜鹃心事苦，眼看胡马泪痕多。千年夔府有诗在，一夜采（耒）江如酒何。黄土一丘随处是，故乡归骨任蹉跎。"（《文山先生集》卷一四《指南后录》）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觉得杜甫的诗完全写出了他的心里话。于是，他突发灵感，决定用集句诗的形式，用杜甫的诗句来表现宋末的政治时事，表现自己抗击元军侵略的历程，抒发自己坚贞的爱国思想感情。文天祥《集杜诗自序》云："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因为五言，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性情同哉！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以其咏歌之辞，寓纪载之时，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六）

集句诗本是一种特殊的创作作品，但由于它是建立在对原诗的深入研究基础上的，故也有很强的学术性。文天祥的《集杜诗》是文天祥重要的作品，也是重要的杜甫学成果。

从学术的角度说，文天祥的集杜诗之所以作得特别好，是他在三方面下了特别深的功夫：

第一，熟读杜诗，至烂熟于心。要作二百首杜诗绝句，数量非常大。只有将杜诗全部读熟，将诗句理解透彻，集句时才能得心应手，表现准确精致，如自己创作的一般。

第二，掌握杜诗的主要思想，寻求自己与杜甫思想的契合，再寻求杜诗的相应的诗句来表达。从而从整体上保证集句完美深刻地传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做到集句不仅形同自己的创作，而且神也如自己创作的一般。

第三，掌握杜诗的艺术特点，特别是它“诗史”式的特点，并充分运用来表现宋末社会的政治与抗元斗争，表现自己的抗元经历和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从创作的角度来说，《集杜诗》也有三大特点：

首先，诗人在确立集句诗表现宋末的政治时事、表现自己抗击元军侵略的历程、抒发自己坚贞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后，用标题和序表现宋末的“世变人事”（文天祥《集杜诗自序》），确立了诗的“诗史”性质。

其次，将所集杜甫诗句精心组织成诗，既用来描写，也用来议论和抒情，使集句诗与诗题和序完全融为一体，珠联璧合，最终将所集的杜诗，完全变成文天祥自己的诗。

再次，文天祥的集杜诗成功的根本是文天祥抒写了其伟大的人格、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经历与爱国主义思想感情。集杜诗以现实的文天祥为基础和背景，使诗的艺术形象和现实的文天祥融为一体，因而比一般的诗的形象更鲜活，更丰满，更有魅力。而集杜诗又将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文天祥的爱国主义精神融合在一起，这更增加了诗的感染力与魅力。

《集杜诗》二百首是政治诗。诗总结了宋末的政治，总结了

宋朝灭亡的原因。朝廷重用权臣，而权臣弄权开边战，是结祸的重要原因。《误国权臣》写道："似道丧邦之政，不一而足。其羁敌开边衅，则兵连祸结之始也。哀哉！苍生倚大臣（《送韦中丞》），北风破南极（《北风》）。开边一何多（《前出塞》），至死难塞责（《吴侍御江上宅》）。"前方将领不抗敌，残害骚扰百姓，敌人如入无人之境。而朝廷政治混乱，用人错误，失去扭转乾坤的机会。兵败如山倒，人心涣散，哀鸿遍野。《阳罗堡》云："夏贵自阳罗堡之败，顺流而下，沿江南岸纵兵放火。归庐州，解甲。当是时，其心已无国矣。似道建督至江上，夏贵不得已出见，斩以衅鼓，东南再造之机也。失此，不图社稷为墟。哀哉！日色隐孤戍（《发秦州》），大江声怒号（《大雨》）。朝廷任猛将（《又上后园山脚》），宿昔恨滔滔（《送王砅使南海》）。"《京湖宣阃》云："开庆己未，江陵阃帅自上而下，奔救鄂渚。令朱禩孙任宣阃，乃自鄂渚走还岳阳。朱与夏通任长江之责，一上而一下，使中流荡然。敌行无人之境，安得不亡。呜呼，痛哉！正当艰难时（《送樊侍御》），岂无济时策（《遣兴》）。连樯荆州船（《雨》），悠悠回赤壁（《过南岳》）。"《鄂州》云："先时，李雷奋为郡守。十月，以台论罢。至是无正官。张宴然以城降。金汤重镇，正风寒中去正守，当国者独何心哉！鄂渚分云树（《过南岳》），春城带雨长（《入行军六弟宅》）。惜哉形胜地（《怀锦水居止》），河岳空金汤（《入衡州》）。"

乱世出英雄。越是危难之际，爱国主义越是得以彰显，民族精神越是得以发扬。《集杜诗》记录了可歌可泣的为保卫祖国而壮烈牺牲的官吏，表现对他们殉国的哀痛、崇敬与赞颂。《江丞相万里》记录江万里的殉国："先生居饶州，敌入城，先生投府第中池水而死。其弟万顷于厅事上被执，杀死。哀哉！星坼台衡地（《送苏州李长史》），斯文去矣休（《送王信州》）。湖光与天远

（《过洞庭》），屈注沧江流（《奉同郭给事》）。”《将军王安节》写王安节被俘不屈而死：“常州败，敌生获王安节，不屈而死。敌谓过江以来，武人忠义者唯王安节一人。安节乃节度使王坚子也。激烈伤雄才（《金华山观》），直气横乾坤（《别李义》）。倜傥汗血驹（《别张封建》），见此忠义门（《柏中丞除官制》）。”《李安抚芾》表现李芾一家殉国：“肯斋先生，蜀人，寓居衡阳。己亥，留梦炎为潭帅，梦炎归相，始起先生为代。先生仓卒运掉，城守甚备。及城陷，先生杀其家人，乃自焚死。哀哉！杀气吹沅湘（《入衡州》），高兴激荆衡（《李八判官》）。城中贤府主（《课伐木》），千秋万岁名（《梦李白》）。”《姜都统才》赞美姜才被俘斥敌被杀的气节：“淮东猛将，扬州前后主将，皆其人也。及秦州破，被执。敌爱其才勇，啖以官爵，不肯降，骂诸负国者。临刑含血以喷，骂敌不绝口。其英风义烈，淮人言之无不伤感，惜哉！屹然强寇敌（《王思礼》），古人重守边（《后出塞》）。惜哉功名忤（《薛少保》），死亦垂千年（《义鹘》）。”

《集杜诗》详细记录了文天祥自己自起兵后抗击元蒙军的重要战斗和爱国经历，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感情和高尚的民族气节。

文天祥兵败被俘后，表现出爱国者的堂堂正气和以身殉国的决心。《集杜诗》第一百七十：“天长眺东南（《郑公虔》），衰谢多酸辛（《汝阳王》）。丈夫誓许国（《前出塞》），直笔在使臣《李光弼》）。”第一百七十二：“济时肯杀身（《寄唐使君》），惨淡苦士志（《送樊侍御》）。百年能几何（《别唐诫》），终古立忠义（《陈拾遗故宅》）。”第一百八十三首：“名贤慎出处（《自施州归》），志士怀感伤（《赠李四丈》）。犹残数行泪（《登牛头山》），引古惜兴亡（《壮游》）。”第一百八十七首：“丈夫四方志（《前出塞》），丧乱饱经过（《寓目》）。清心听鸣镝（《听许十一诵诗》），衰老强高歌（《别唐诫》）。”第一百八十九首：“天地有逆顺（《崔

少府》)，悯然难久留(《发秦州》)。当歌欲一放(《寻崔戢》)，河汉声西流(《登慈恩塔》)。”第一百九十一首：“高官何足论(《佳人》)，寂寞身后事(《梦李白》)。物理固自然(《盐井》)，愿闻第一义(《谒文公上方》)。”

总之，《集杜诗》是杜甫学极为重要的成果，也是诗歌史上非常重要的成果。它是用诗写的历史，生动形象地记录了元蒙南侵、宋朝灭亡的具体史实，记录了宋朝爱国者抵御侵略、以身殉国的史实。很多资料为当时的史书所未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它表现了文天祥高尚的品格和爱国主义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正义观和民族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集句诗》在后世影响很大，流传很广。从传播学的角度看，《集句诗》以集句这种特殊的形式展现了杜诗超强的表现力，展现了杜诗超强的艺术魅力，并以独特的角度诠释了杜诗，以独特的方式扩大了杜诗的传播与影响。文天祥对杜诗学的贡献是巨大的。

一七　辽金元概说

一

辽是契丹族建立的国家。辽国统治者学习汉族文化，吸收汉族制度。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也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很多汉族著作被翻译成契丹文字。辽尊崇孔子，儒家思想有着广泛的影响。在文学方面，辽喜欢唐宋时代的文学，白居易和苏轼的影响尤为巨大。苏轼家集流行于辽都，苏辙使辽，相识的人都问苏轼的情况。杜甫在辽代的影响并不特别大，推其原因，可能因

为杜诗深奥复杂，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和地域的偏僻，很难理解其奥妙。（当然，河北、山西一带除外。）在这种状况下，杜甫学自然不会有突出的成就。

二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国家，先后灭掉辽并攻占宋朝淮河、秦岭以北地区，成为中国北部的统治者。虽是异族统治，但金借才异代，文化上多用辽宋之人，故其文化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

在金统治的北宋旧土，人们继续着北宋对杜甫的尊崇。元好问估计当时杜甫集的注家有五六十家，说明当时有很多版本的杜甫集流传。人们依旧喜欢阅读杜甫的作品。杜甫依然在北宋旧地传承与发展。元好问有《杜诗学》一书，反映金代杜甫学的昌盛。

三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国家，民族众多，土地非常辽阔。农业在经历游牧式的破坏后，迅速发展，手工业也很发达，商业贸易也很繁荣。元朝对汉人和南人实行严酷统治，在暗中吸收和利用汉文化的同时，对汉文化进行严厉打击和摧残。在这种背景下，杜甫学虽然仍有发展，但受到压抑，并没有耀眼的成就。

范梈《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六卷。此书《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是伪作，其著作权是否属范，有待进一步考证。范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今江西清江）人。游京师，荐为左工教授，迁翰林院编修官。为地方官，后选翰林供奉，改福建闽海道知事，授湖南岭北道廉访司经历。为元代“四大诗人”之一，有《范德机诗集》、《木天禁语》、《诗学禁脔》。该书选杜诗311篇加以批注，非常简略。注多用前人旧注，批多是读杜的感想，或谈艺术，或谈内容，或谈读杜方法，多少有些

见解。当时人对此书评价很高。虞集作序说："分章析理，发其奥章，犁然当乎人心。"又作跋说："先生之点选是编，灿然表句法之精，截然得章法之妙。其批切而要，其注简而明，其有补于学者不少也。"明代单复说读范梈"分段批抹杜诗观之，恍若有得，则向所谓莫知而可疑者，如释然矣"（《读杜愚得序》），可见其影响。范梈《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为刘辰翁批杜诗后第一个批杜诗，对后世评点杜诗之风的兴盛有重要作用。

张性《杜律演义》二卷。张性，字伯成，临川金溪（今江西金溪）人，进士，生活在元代。著有《尚书补传》。《杜律演义》是七言律选注本。选七言律诗一百五十一首，分前后集，前集分八类，后集分十三类。该书称"演义"即以解释杜诗诗意为主。注释典故明白，阐释诗意周详，时有创见。樊近久序云："如吾乡先进士张氏伯成《七言律师演义》，训释字理，极其精详，抑扬情趣，极其切当，大抵仿佛朱子《诗传》、《楚辞解》，而折中众说焉。盖少陵有言外之诗，而《演义》得言外之意也。"该书为最早的七律选本，实开后世选杜之风，特别是选律（更是选七律）之风。此书又为《杜律虞注》的原本。

题虞集《杜律虞注》。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先世为武州宁远（今山西五寨）人，后居临川崇仁。大德初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累官奎章阁侍书学士。著有《道园学古录》、《道园遗稿》。《杜律虞注》实为张性《杜律演义》而题名虞集，略加变化而成。姚际恒定此书为伪书，云："《杜律虞注》，称元虞集注。杨用修曰：'本不出自伯生笔，乃张伯成为之，后人驾名于伯生耳。恒案伯生集有《杜诗纂例序》一篇，想以此讹为伯生耶？'"（《古今伪书考》）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云："检虞集《道园学古录》五十卷，无《杜诗纂例序》文。杨慎《闲书杜律》既定为张伯成作，并揭其注文尤纰缪者若干条。"此

书虽被认为是以张性《杜律演义》为根本的伪书，但反复印行，影响很大。而张性原作流传不广。《杜律虞注》颇受后人称道，首先在于注释多有可取之处，其次，开杜诗选本先河，特别是选七律之先河，在杜甫学史上自有其地位，故不因其伪书而弃之，今特论列于此。老实说，前人定虞集《杜律虞注》为伪书，笔者认为证据并不充分。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待，《杜律虞注》应为虞集著作。要确定其为伪书，应寻求更充分而有力的证据。

赵汸《杜工部五言赵注》。赵汸（1319—1369），字子常，休宁（今安徽休宁）人，为黄泽门人，隐居著述。明代洪武时，诏修元史，力辞。有著作《东山存稿》、《周易文诠》、《师说》、《左氏补注》、《春秋集传属辞》。《杜工部五言赵注》所选为五言律，有注有批。注多引原始出处，详备而精炼，批文简略，而有自己的见解。瞿镛说："案嘉靖中章美中重刻杜律二注，序云：'关中旧本有虞赵二注本，最为详明，支分句解，挈旨探源，宛然朱子释《诗》家法。'"（《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一九）此书与题虞集《杜律虞注》并行，为杜诗最早的五律选本，也是最早的评点之一，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在杜甫学史上有自己的地位。

一八　元好问

一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鲜卑族，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淹贯经传百家。礼部赵秉文见其所作，以为近代无此作，名震京师。中兴定五年第，历内乡令，南阳令，

擢尚书省掾。除左司都事，转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著述甚勤。以诗最知名。其诗奇绝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金亡，构亭于家，撰金代之史，因名之曰“野史”。录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则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万余言。今所传有《中州集》及《壬辰杂编》。

元好问对杜诗有精深的研究，编著《杜诗学》。

二

元好问对杜诗研究的最大贡献，是记录东岩（当为其父）与元好问师友讲论杜甫的资料，编著成《杜诗学》。这样，他便最早提出“杜诗学”这个概念，至今仍是人们有关杜甫学术运用特多的名词。元好问《杜诗学》一书极难见，现《杜诗学引》尚存集中，今移录于下：

> 杜诗注六七十家，发明隐奥，不可谓无功。至于凿空架虚，旁征曲引，凌杂米盐，反为芜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赵次公作《证误》所得颇多。而托名为东坡者为最妄。非托名者之过，传之者之过也。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固学者之所以动心而骇目。及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则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所以膏润其笔端者，尤可仿佛其余韵也。夫金屑、丹砂、芝术、参桂，识者例能指名之。至于合而为剂，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盐之相入，有不可复以金屑、丹砂、芝术、参桂而名之者矣。故谓杜诗无一字无来处，亦可也，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也。前人论子美用故事，有着盐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

九方皋之相马，得天机于灭没存亡之间，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为可略耳。先东岩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为今人读杜诗，至谓草木鱼虫，皆有比兴，如商度隐语然者，此最学者之病。而山谷未尝注杜诗（今按：此句文当有误），试取《大雅堂记》读之，则知此公注杜已竟。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乙酉之夏，自京师还，闲居崧山，因录先东岩君所教与闻之师友间者为一书，名曰《杜诗学》。子美之《传》《志》《年谱》及唐以来论子美者在焉。俟儿子辈可与言，当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好问引。（《元遗山集》卷三六）

从这篇引可以看出，《杜诗学》的内容是元好问受东岩讲授杜诗的讲义，外加元好问师友对杜甫的论述。元好问编著的目的，是作为教育儿子的教材。实际上，元好问全面教育儿子的杜诗学应该包括如下内容：（一）杜甫诗和有关的精注。（二）两唐书的杜甫传、元稹作的杜甫的墓志和杜甫的《年谱》。（三）自唐至元好问时有关杜甫的论述。（四）东岩和元好问师友关于杜甫的讲论。元好问所搜集的杜甫资料是非常全的。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当时杜甫教育和研究的重要信息。

这篇引对杜诗的评论也非常精彩。（一）认为杜诗从民族文化中来，但又具有创造性，似乎与一切文化不同。这就是杜诗的特别之处，伟大之处。（二）认为杜诗如元气，如大海，如祥光庆云，其风格是随物赋形，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千变万化，不可名状，是天籁之音。

元好问有很高的文学理论素养，对杜诗有深入的研究。他高瞻远瞩，目光如炬，对杜诗的宏观论述非常新颖，意蕴非常丰富、深奥。

第三章 明

一 明概说

一

明朝统治严酷，法令峻急，宦官权重，锦衣卫钳制天下。具有新儒学特点的理学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社会生产力在一些方面虽有所增强，农业生产并没有更大的发展。商品经济不断滋长，城市经济日益活跃，“商贾既多，土田不重”，“金令司天，钱神卓地”。封建体制开始衰落，资本主义逐渐萌芽。杜甫学本来就是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产物，明代这样的社会自然也是它发展的适宜土壤。明朝朝廷非常重视杜甫和杜诗。民间也非常尊重杜甫，奉杜甫为“诗圣”。明代杜甫学依然欣欣向荣，但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从明代万历至明末，是明代杜甫研究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杜甫研究的学者多，如林兆珂、郝敬、卢世漼、胡震亨、杨德

用、唐元竑、薛益、王嗣奭，都生活这一时期。经过明代两百多年的发展，杜甫学终于放出灿烂的光辉，彰显出自己时代的特色。卢世㴶的《杜诗胥抄》、胡震亨的《杜诗通》、唐元竑的《杜诗捃》、王嗣奭的《杜臆》，都是明代杜诗学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各有特色，与宋代的杜诗学不同，都能各开生面，自成一家。其中《杜臆》尤为特出，超过宋代和明代的其他杜甫学著作，成为明代研究杜甫水平最高的著作。

二

明代杜甫学的一个新特点是评点之风盛行。

刘辰翁评点杜诗在元代出版，这种新的杜诗研究成果表达方式，在杜甫学界引起巨大震动和惊喜。元代范梈仿效，作《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到明代，评点这种研究方式为学者所喜好，作者蜂起，蔚成风气。

明代学术比较空疏，而评点这种研究方式的最大优点是可以自由发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与思想，无需对杜甫作长期系统的研究。而同时，评点可以天马行空，涉足杜甫学的一切领域，即便校勘、注释这些文献学领域，也能进入，天地非常广阔。总之，评点者可以扬长避短，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因此，评点作为明代杜诗学的一种研究风尚，便不足为奇了。

明代杜甫学的评点著作有几十种，不可谓不多。真正有研究心得、有影响的学者主要有王世贞、钟惺、王慎中、杨慎、徐渭、郑继之。他们评论杜甫诗的思想和艺术，见解非常精辟。有的对杜诗进行注释，也很有发明。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是评点而轻视它们。

当然，明人的杜甫学评点确实有很多平庸之作。其中很多缺乏学术性，失之轻率、调侃，有的甚至是谬见。

明代杜甫学的另一大特点是杜诗选本很多。杜甫诗很多，也很难读，普通读者要读杜甫全诗很困难。为了杜甫诗的普及，大量杜诗选本便应运而生。杜诗的选本分两大类，一类是选取杜甫的优秀作品，如王寅《杜工部诗选》、闵映壁刻杨慎批《杜少陵诗选》。卢世漼《杜诗胥抄》则选取杜甫十分之七八的诗，可谓最大的选本。另一类则是律体诗的辑本和选本，也有其他诗体的辑本和选本。律体诗的辑本和选本的品类是最多的，在整个选本中所占的比重也最大。

社会文化需求的热点，也往往是学术研究的热点。明代文人喜欢创作律体诗，和士人交往喜欢用律体诗，而科举考试也要考律体诗，这就使律体诗在社会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杜甫是作律体诗的圣手，其律体诗是律体诗的最高典范。因而用杜甫的律体诗和相关研究来传播和提升律体诗的理论，提升律体诗的评论和创作水平，自然也成为杜诗学的责任。大量学者对杜甫律体诗进行研究，编辑大量的律体诗辑本和选本。因此，杜甫律体诗的研究成为明代杜甫学的热点。

明代编的杜甫律体诗和研究杜甫律体诗的著作很多，有陈明纶《杜律》、张三畏《杜律韵集》、冯惟讷《杜律删注》、王维桢《杜律颇解》、张綎《杜律本意》、董光升《杜律注解》、邵傅《杜律集解》、颜廷渠《杜律意笺》、谢杰《杜律詹言》、孙矿批选《杜律》、范濂《杜律选注》、汪瑗《杜律五言补注》、薛益《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这在整个明代现存杜甫学著作中占五分之二多的数量，确实堪称热点。所用的研究杜甫律体诗的方法和对杜甫整个集子的研究方法是基本相同的，其特点是更细致，有些著作的论述要通俗化一些。从学术研究发展看，明代对杜甫律诗的研究超过了宋人的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在整个明代杜甫学中，是研究很深入的一个领域。

明代杜甫学的第三大特点是产生了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在学术成果表述的形式上，代表著作对杜甫具体诗篇的总体论说时往往采取一种札记的形式。这种札记篇幅可长可短，可根据需要，尽情发挥，把需要论述的话题说深说透。王嗣奭的《杜臆》和唐元竑的《杜诗捃》，都采用札记的论文形式。因此，明代代表性的杜甫学著作更有学术性，更能客观分析，严密论证。减少了宋代一些杜甫学著作中即兴的成分、随意的议论和太多的感情色彩。宋代杜甫学有很多高论，可惜都没有充分论证。从分析和论证的角度说，明代的杜甫学又前进了一大步。

杜甫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新的时代，有新的杜甫学理念、新的研究方法。

三

明代对杜甫作品的文献研究有所减少，但也有所创新。

宋代关于杜诗的注释的专著相当多，流传至今的都是注释性的专著。而明代对全部杜诗进行注释的，只有单复的《读杜愚得》。单复的注释发明较少，也称不上精湛，但讲解杜诗通俗明白，比较忠实原意。单复是明代初期的学者，是开明代杜诗学一代风气的人物。胡震亨的《杜诗通》也是对全部杜诗进行注释的，但它并不对每处需要注释的地方注释，而只注释他认为有必要注释的地方。直白地说，就是他有新见的，才注释。胡震亨的注释在明代是水平很高的，其中确实有一些发明。明代对全部杜诗进行注释的专著较少，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宋代大量注杜诗，杜诗应该注的，宋人基本都已经注了；其二，宋人注释疏略的，或注释错误的，则需要很高的水平才能匡补。明人的文献学比较粗疏，所以很少专门的注释著作来进一步把杜甫的作品注释向前推进。但明代学者也有明代学者的长处，也有文献学功力深

厚的学者，他们在杜诗的注释方面有不少创新，如杨慎、王嗣奭，在注释方面也有很多发明。一些选注的著作中，也有一些发明。就有明一代而言，在注释方面还是有不小的创获。不过，相对于宋人和清人，明人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还是显得小了一些。

明代注释除有自己的发明外，另一个成就是淘汰了宋代大量穿凿附会的注释。大浪淘沙，明人在注释的时候，是站在宋人的肩膀上的，宋代大量荒唐可笑的错误注释被扬弃，大量平实正确的注释被采用，这本身就是学术的一种进步。当然，明代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穿凿附会。因为明人仍然用的是孟子“以意逆志”的基本方法，用的是比兴说诗的研究方法。虽然研究者也试图探求杜甫诗的真正思想，但杜甫的诗是非常形象化的，而对这些形象的理解，实际受着研究者思想的左右，很难客观，很难把握杜甫的原意。加之研究者有意求新求深，理解差之毫厘，注释谬以千里也就不足为怪了。

明代在杜诗阐释方面，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就是运用一种近乎将古文翻译成白话的方法，将杜诗阐释成较为准确的完整易懂的散文，较为忠实于杜诗的原文。这种方法是单复在《读杜愚得》中创造的。它的最大意义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解说中的穿凿附会，帮助读者直接接近和领略杜诗的原意。后来，张綖《杜律本意》的阐释也用这种方法。邵宝《分类集注杜诗》加以发展，阐释杜诗内容较为准确、完整，语言洗练、生动、优美。虽系散文，而有诗的韵味。如邵宝注《花石戍》云：“公行花石戍，途中有感而赋此诗。言午自空灵启行，夕至化石城宿，途中所经见者。岸通开辟以来之水，木杂古今所植之树。南风盛而地气郁蒸，日落而春色方暇。因思四时之序，本各平分，而气候代迁，何其回互。是知茫茫大造之间，治乱兴亡，岂无常数，我今系舟

盘藤，策杖樵路。时值乱离之时，但见人罢（疲）征役，皆不在村。野圃流泉，空自下注。处处柴门，虽多芜没，家家农器，尚皆固完。可恨山东残逆，犹且横行。唯夫吴楚，尚守王度。当今之时，民穷财尽。如此，未知谁人能扣君门，一朝下令，以减征赋也。”（《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卷一）注释先用简洁的语言概括诗的主旨，然后对杜诗全文进行白话翻译，比较准确而完整。虽是散文，而有些像散文诗，基本上完善地传达了杜诗的意境。这种阐释方法，是一种创造，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在明代，用这种近乎将古文翻译成白话的方法来阐释杜诗的著作比较多，逐渐成为一种时代风尚，也成为明代杜诗学的一大特色。

四

明代杜甫研究的著作不如宋代多，但研究的水平与著作的学术高度却超过宋代，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明代依旧是理学盛行的时代，杜甫学的学者更明确、更自觉地把儒家思想运用到杜甫研究中。杜甫的思想本来就是唐代的儒家思想，是具体化的儒家思想。用孔孟的儒家思想来研究杜甫的思想，认识准确而深刻。王嗣奭就明确表示自己的研究是以儒家思无邪的诗教作指导的。其实，唐宋杜甫学者已标榜用儒家思想来研究杜甫和杜诗，但没有充分贯彻在自己的研究中，没有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充分表现出来。

很多学者在杜甫的研究上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更多，研究方法也更好。王嗣爽潜心杜甫研究二十余年，唐元竑、胡震亨和卢世潅也都长期专注研究杜诗。他们对杜诗非常熟悉，能融会贯通。而宋人虽然对杜诗也非常熟悉，一些人甚至能背诵杜诗，其熟悉的程度超过很多明人，但研究时，或出成果的时候，往往是即兴的，或者是凭印象，不如明人融会贯通。而只有融会贯通，才能

把握杜甫思想的根本，把握杜诗的主要内容与艺术特点，其研究也就不会浮浅，不会见木不见林，其研究也才会深入本质，有所发现。

五

明代研究杜甫，善于把杜甫放在唐代的社会背景中研究。时势造英雄，任何伟大的人物都是时代的产儿，也是时代的代表。只有研究杜甫生活的时代，才能真正读懂杜甫。王嗣奭研究杜甫，就是用知人论世的方法，去研究杜甫思想发展的时代背景，研究杜诗产生的具体的社会背景，再来解读杜甫，解读杜诗，其见解自然高远。宋人研究杜甫和杜诗，已很注意研究社会背景，但研究时杜甫和杜诗多少还是与时代背景有点脱节。明代杜甫学者则前进了一大步，完全把杜甫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故其研究也就细致得多，深刻得多。

研究杜甫，要把杜甫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研究。研究其经历，研究其生活，更重要的是研究其思想，研究其政治，研究其理想抱负。一句话，就是研究其人品。在杜甫其人的研究中，明人像宋人一样，非常重视其忠君爱国的思想，认为这是杜甫其人的根本，也是封建社会做人的根本，研究杜甫就要把握这个根本。王嗣奭说："今之诗人满天下，识其诗诀者少。诀恶乎在？夫子所云'一言以蔽之'者，正授人以诗诀，而人不知也。思苟无邪，则子为真孝，臣为真臣。喜怒哀乐必无妄发，而发之于诗，理趣盎溢，即眼前山光水色，鸟韵花香，皆为理趣之助，而愈玩愈佳。故老杜诗极多忠君爱国语而人不厌，发自真心也。后人无其心，而仿效其语，人遂厌之。而近有好新异者，以谈及君国为戒，犹之惩噎废食，可笑也。"（《管天笔记》外编卷上）明人研究杜甫的忠君爱国，从杜甫的生活出发，从具体的诗出发，

突出一个“真”字，故其研究又有新的开拓与成就。

明人非常重视杜甫政治抱负的研究，认为杜甫有深厚的政治素养、杰出的政治才能，批评了宋人普遍认为杜甫好议论天下事，高而不切的说法。王嗣奭认为杜甫可比诸葛亮，“亦应以葛杜称之”（《管天笔记》外编卷上）。他完全赞同杜甫“自比稷与契”，说“杜少陵自许稷契，人未之信。今读其诗，当奔走流离，衣食且不给，而于国家理乱安危之故，用人行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军机之胜负，地势之险要，夷虏之向背，无不见于诗。陈之详确，出之恳挚，非平日留心世务，何以有此”（《管天笔记》外编卷上）。王嗣奭对杜甫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是非常推崇的。其实，宋代也有人认为杜甫有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但仅提出了观点，缺乏深入的研究。明代则结合具体的诗，结合具体的史实进行研究，细致而深入，相当有说服力。

明代的杜甫研究抓住杜甫思想与人格的根本，拓展了广阔的空间，研究也细致深入，在宋人之后，取得了新的成绩。

在内容上，明人认为杜诗既是真实深刻地表现了社会现实的作品，也是强烈抒发自己思想感情的作品。也就是说，杜诗既是史实，也是言志之作。宋人认为杜诗为诗史的非常多，认为杜诗是言志的也非常多，但很少有人认为杜诗既是诗史，也是言志的诗。明代甚至一些人为强调杜诗为言志之作，而否定诗史之说。杨慎即是如此。他就主张杜诗乃抒情之作，而反对杜诗是诗史之说。明人认识到杜诗既表现社会现实，又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是学术上的一大进步。王嗣奭说：“杜之诗往往与国史相表里，故人以‘诗史’称之。然岂足以尽少陵哉!”（《管天笔记》外编卷上）王嗣奭不否定杜诗是诗史之说，更强调杜诗为抒情之作，这个见解是正确的、全面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明人既重视对杜诗表现广阔社会现实的研究，也重视对杜诗表现杜甫思想感

情的研究。无疑，这样的研究才是全面的、完善的。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充分展示杜诗的全貌和价值。

借杜甫学以言志，抒发自己忠君爱国、忧世忧民、怀才不遇之感，也是明代杜甫学的重要特点。

明代的主要杜甫研究者多为处士或下层官吏，他们对杜甫的遭际多所同情，对杜甫的人格多所景仰，他们与杜甫的思想颇多共鸣，因而研究非常透辟，表述常带感情，有些甚至借杜甫研究来抒发自己的思想。谢省在《杜诗长古注解》自序中说："子美生于乱世而不见用，予生于治世而不能用，则予不逮于子美远甚，岂独诗哉！虽然，予以违众戾俗之怀，与之无异，故取长古诗一百四十二首注释，非所以申杜，乃用以自发焉。"明确表示自己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借杜以表现自己的不得志，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

明代在杜甫的作品艺术方面，在唐宋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开拓。

明人认为杜甫的诗所以伟大，是杜甫人品伟大。王嗣奭说："作诗文须先树品，人品高而诗文自成家，断然传矣。若其人无品，而欲取重于诗文，则古来名家车载斗量。我辈安所措趾耶？诗文各有法，既为之，须按其法，即道学先生不得谓诗文余绪而不加之意，此亦有物有则之理也。但为诗而只以诗人自待，诗文纵佳，减一格矣。李杜以诗名，韩苏以文名，其所重者，有在矣，可曰诗人之诗，文士之文而已耶？"（《管天笔记》外编）认为决定作品价值的，不单是艺术技巧的高低，更重要的是作品的内容，是作家的人品、作家的思想。

只有人品伟大的作家，才能创造出伟大的技巧、高超的艺术。只有伟大的人品，才能成就伟大的作家。卢世㴶说："其（杜甫）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广大精微，最关痛痒，

从来论文，当以此语为首唱。”“抑余因是而有感于识气之义焉。大凡物之卓者，莫不有气，况文章为天地精气，诗又文章之精者乎！子美生来浩气独完，加以十年读书，十年观物，十年省身，故其发为诗歌，横绝古今，元气淋漓，莫可名状。强而名之，约有数种。……他人得一，足以自豪，子美兼收并包，左右逢原（源），一言以蔽之曰真气。天降时雨，山川出云，木叶尽脱，石气自青，子美固以发尽光明之藏，出以示人矣。”（《杜诗胥抄·余论》）他又说：“况大凡专论杜之人品而间及于诗，余论概论杜之诗品而想见其人，此两者同出而异名，交含而互映者也。”（《杜诗胥抄·跋》）所论杜甫伟大的诗品是由他伟大的人品创造的，与王嗣爽所论相表里。他们的论述充分反映了明代杜甫学学者从作家人品的高度来研究作品艺术的理念。这样来论文学的品位，论文学的艺术，远远高出一般的论文者之上，对杜诗艺术的总体把握也是高屋建瓴，得其根本。

明代一方面运用传统的儒家温柔敦厚的标准，运用道家道法自然的美学思想，一方面也用当时流行的意境理论等来解读杜诗的艺术，有很多新的创获。王嗣奭论杜甫诗歌艺术总的成就与特点曰：“少陵起于诗体屡变之后，于书无所不读，于律无所不究，于古来名家无所不综，于得丧荣辱流离险阻无所不历，而才力之雄大，又能无所不挈，故一有感会，于境无不入，于情无所不出，而情境相传，于才无所不伸，而于法又无所不合。当其搦管，境到，情到，兴到，力到，而由后读之，境真，情真，神骨真，而皮毛亦真。至于境逢险绝，情触缤纷，纬缅相纠，榛楚结塞，他人掴指告却，少陵盘礴解衣。凡人所不能到，不敢道，不经道，甚而不屑道者，矢口而出之，而不必道人之所常道。其绝尘而奔者以是，舞交逐曲者以是，间有堕坑落堑者亦以是。偶失之，则任其瑕。瑕玉不掩者固不乏玉之采，即瑕掩其玉者，犹不

失玉之瑕。诗之有少陵，犹圣之有夫子，可谓金声玉振，集其大成者矣。”（《管天笔记外编》）对杜诗艺术的论述很全面，也很精彩，颇有新意。

明代对杜诗艺术的研究视角多样，方法多样。卢世漼结合杜甫的艺术理念与审美情趣，从诗歌体裁的视角来研究杜诗的艺术。《论五七言排律》谈杜甫五七言排律的艺术云：“排律是诗中别局，大类鼓吹，在子美尤为余事，然盛莫盛于子美，妙莫妙于子美。元微之谓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观其云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似专此排律而论。夫铺陈排比，千言数百，凡有物料，有笔力者皆能之。正非子美之独绝也。子美所独绝者，在不以排律为排律耳。原其执笔觅纸，初无斗富取盈之心，犹水着地，纵横流漫，任其所止而休焉。自六韵以至百韵，无不可者。顾此犹未足为奇也。试取其五言排律一部，从容研玩，翻觉锋发韵流之际，暗有空翠扑人，冲襟相照，如长筵广座，绝不杂一喧客，绝不杂一饾饤，投壶散帙，行酒赋诗，而奇错间陈，妙香静发，因以尽洗排当之习，一空纷呶之陋矣。故有时孤出一语，天地顿宽，全篇于此复命。有时徐布数联，机神更紧，定局以斯转关，此子美排律中极大法门。亦天授，非人力也。所谓‘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殆先生自作题词耳。”“《寄高彭州适岑虢州参》……且高岑从来并举，据寻常之论，若专以爽垲归高岑者。子美独曰‘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看得又别。诗之道，温柔敦厚，旁见侧出，一言以蔽之曰缓。缓则曲，缓则闲，缓则宁，缓则可以运完神，缓则可以蓄余力。‘缓’之一义，诚□（作）诗之门也。”（《杜诗胥抄·大凡·论五七言排律》）这些分析视角独特，但又很有道理，给人很大的启发。

明代盛行八股文，学者又将八股文的理论用到杜甫作品的艺

术研究中。用后代出现的新的特殊的文体理论来研究数百年前的杜甫艺术，难免有些蹩脚，但艺术在根本上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这种研究有时还有妙解，振聋发聩。

六

明代杜甫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诗圣杜甫进行批评。批评杜诗的内容，也批评杜诗的艺术。一些批评相当激烈，直指要害。杜甫是一位集大成的伟大作家，其作品含有各种艺术元素，所表现的思想性格也有复杂的一面，故批评者代不乏人。唐代已有群儿辈“谤伤”（韩愈《调张籍》），宋代杨亿斥杜甫为“村夫子”，洪炎说“若察察言如老杜《新安》《石壕》《潼关》《花门》之什，白公《秦中吟》《乐游园》《紫阁村》诗，则几于骂矣”（《豫章黄先生文集后序》，《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〇）。刘克庄批评杜甫较多，如“古人不及见后世之偶然比兴，风刺之作，至列于经。后人尽诵读古人书，而下语终不能仿佛风人之万一，余窃惑焉。或古诗出于情性，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闻，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跋韩隐君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杜《八哀》诗，……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称不敢议，其病盖伤于多”（《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四《诗话》前集）。刘辰翁在杜诗评点中对杜甫也颇有批评。本来，一位作家不管他如何伟大，作品如何完美，都会受到批评，这是很自然的事。社会是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有时比人与普通动物之间的差异还大。出于各种原因，有人对杜甫提出批评，非常正常。宋代虽有人批评杜甫，而就社会潮流说，崇杜尊杜是主流。在多数人眼中，只要是杜甫的，就是最好的、最美的。人们对杜甫已经产生了迷信，有一种只要见到杜甫二字，就顶礼膜拜的心理。而到了明代，由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人们的思想和审美情

趣也较唐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对杜甫也由迷信转为尊重。圣人也不是完美无缺，批评杜甫也是为了维护杜甫的诗圣形象。如果说在唐宋，批评杜甫还只是个别现象，那么到明代中后期则是一种风尚。比如杨慎，一边认为杜甫与李白都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边也指出杜甫诗的一些不足。仇兆鳌说："至嘉隆间，实有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诸人，严驳杜诗，几令身无完肤，真少陵蟊贼也。杨用修则抑扬参半，亦非深知少陵者。"（《杜诗详注·凡例》）斥批评杜甫者为"蟊贼"，完全是意气之言。事实上，这些杜甫的批评者，内心都是非常崇敬杜甫的，评论杜甫时也是冷静的，他们认为杜甫好的时候，毫不吝惜溢美之辞，他们说杜甫不好时，也都是肺腑之言，尽管言辞激烈，但并不是恶意攻击。郭正域《批点杜工部七言律》是明人中批评杜诗较早的。有些评语很精彩。《柏学士茅屋》"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评点云："何作此等语？"表现评点者对杜甫看重富贵的世俗观念的不满，评点非常好。《曲江二首》"细推物理须行乐"评点云："此等语似宋人。"揣摩非常细致。这样的诗句，无论是思想方式，还是表达方式，都开启了宋诗。评点非常精彩，既是批评，又不是批评，完全符合实际。关于杜诗艺术的批评，则言辞更激烈。如"蠢而嫩"、"无味"、"凑句"。郑善夫是批评杜诗甚力的一位评点者。他认为杜甫的诗有时简直不成诗。《寄韩谏议》结尾评点云："全不成章。"《可叹》评点云："杂乱，钝拙，都不可读。"《奉送二十三舅录事之摄郴州》评点云："太不成调。"《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评点云："五诗都不可读。"这是用明人的理念来看唐诗，不知时代诗歌特点，不知诗人的风格，所以评论都是荒唐可笑的。郑善夫还不知杜甫诗的创新。《石犀行》评点云："何大复谓诗法已亡于杜，虽不可谓亡，然如《石笋》《石犀》等篇，体已大变矣，宜其起宋人一种村恶诗派也。"

《杜鹃行》评点云："《凤凰台》《石笋行》《杜鹃行》皆不是诗家本宗，虽刻苦出奇，难以为训。"否定杜诗的创新，认为这种创新不足取，带给后世的是不良影响。这也是一种保守与偏见，不足取。但有时候，也会提供一种新思路、新视角。如《锦树行》评点云："信是杂乱，但次第无端由处，见一种感叹。"启发读者理解杜诗看似杂乱，但其中有很深的感慨。这种貌似杂乱的章法，又很好地表现了杜甫思绪的起伏变化，尽管我们这样理解并不符合评点者的本意。《郑驸马宝宴洞中》评点云："变体至此，都不是诗。用意可谓过矣。"评点者认为此诗不是诗，批评是错误的。但如果从积极方面来理解，这首诗在体制上确实不同于当时一般的诗，有巨大的变革，这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启发。胡震亨是唐诗研究大家，对杜甫诗也多有批评。他的《杜诗通》不仅大量辑录刘辰翁、郑善夫等批评杜甫之语，而且在诗题或诗中标"删"或在诗中画黑线表示贬斥。他在批语中对杜诗颇有批评，有时对刘辰翁和郑善夫等赞美者亦加以驳斥，而对杜诗加以批评。胡震亨评《壮游》云："郑善夫以此诗豪宕奇伟，无一字一句不稳贴，此等乃见老杜之神力。愚谓末后十余句，亦未见神力在。"胡震亨评《望岳》云："起语无谓，只'荡胸''决眦'一联，艰苦入奇。此望泰岳也，可无大篇酬之，而小哉其言？刘辰翁谓雄盖一世，过矣。"胡震亨批评杜甫有时非常尖锐，如评《又上后园山脚》云："本上后园山脚耳，却从昔登东岳，俯望中州，转及时事，迂曲不可为训。"（《杜诗通》卷六）胡震亨评《山寺》云："穷子受顾，除秽不净，见《华法经》。突然复引用（按，指"穷子失净处，高人忧祸胎"句），正未妥。'忧祸胎'，岂谓教事不宜兴邪？佛门语，总非此老所长耳。"（《杜诗通》卷五）胡震亨的批评并不一定对，但可以提供一种不同的参考意见，可以启发人思考。总之，明人批评杜甫的甚多，大多数批评

是错误的，是不可取的。造成错误的原因，是明人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艺术观念有局限，对杜甫和杜诗研究不深，认识有误。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明人对杜甫和杜诗的批评也有积极的意义。首先，历来的杜甫研究，几乎都是唱颂歌，有些甚至有吹捧的成分，影响了学术应有的研究与分析。明人对杜甫的批评，促进了学者冷静地对杜甫进行研究与分析，有利于发扬实事求是的研究学风。其次，明人对杜甫的批评，有一些可取的成分，有利于活跃杜甫学的气氛，形成百家争鸣的态势，从而促进杜甫学的高度繁荣。

二 单 复

一

单复（一名单复亨），字阳元，剡原（今浙江嵊县）人。明洪武四年举怀才抱德科，为汉阳湖泊官，为汉阳县令。

单复研究经典，有诗歌创作。对杜诗的研究非常用力，作《读杜愚得》十八卷。殆成稿于洪武壬戌，谋刻印未果，后由江阴朱氏（善继、善庆）兄弟刊印行世。

二

《读杜愚得》是明初杜诗研究非常重要的成果。

首先，对杜甫的生平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颇有发明创造。

单复在宋人编杜甫年谱的基础上，重新编定杜甫年谱。他编杜甫年谱的指导思想是“以次序其诗，且以见游历用舍之实，考

究地理时事，以著其当时所见所闻之实及用事之妙”（《读杜愚得·凡例》）。也就是说，他编杜甫年谱，完全是为了知人论世，更好地阅读和理解杜诗。从这样的目的出发，他在体例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增添一些前人没有的年谱义项，成为一部体例非常完备的年谱。其主要体例为：（一）对杜甫生平及年谱的体例进行简要说明。（二）附杜甫世系。从杜甫远祖杜预开始，重点从杜审言（杜甫祖父）到杜甫后代的世系。（三）录杜甫生平的重要材料。先引《新唐书·杜审言传》，再列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新唐书·杜甫传（文艺传）》。（四）时代与社会背景。主要列政治、军事大事，重要人物的活动，社会大事，重要亲友的大事。（五）对杜甫重要的生平事迹系年。（六）对杜甫的诗进行系年。这样的体例，不仅比宋人年谱的体例大大丰富了，而且与我们现在体例最完备的年谱也大致差不多，着实令人称奇。

从总体看，《读杜愚得》的《重定杜子年谱》非常详尽，材料丰富，而表述又相当简洁。“（天宝）二年癸未：春正月，安禄山入朝［上宠甚厚（小字注）］。三载甲申正月，改年为载。始祀九宫神。李白入长安。夏五月，公之祖母卢氏卒。公并在东都。（诗系年：）《龙门》、《过宋元（员）外之问旧庄》、《临邑舍弟书苦雨黄河泛滥因寄诗》、《假山植慈竹》、《李监宅二首》、《覆舟二首》。”“（天宝）十四载乙未：春二月，安禄山请以蕃将代汉将，从之。哥舒翰入朝得疾，遂留京师。冬十月，帝如华清宫。十一月，安禄山反。十二月，封常靖与贼战，败绩，遂陷京师。以哥舒翰为副元帅，军于潼关。翰病不能治事。公在奉先。”“（大历）五年庚戌：夏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杀其团练使崔瓘，澧州刺史扬子绯、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阳济讨平之。公年五十九，春在潭州，率舟居。夏避臧玠乱入衡州，欲往郴州依舅氏，因至耒

阳闻贼平，回潭州，欲归襄阳，道卒，殡于岳阳。”读这样的年谱，对杜甫的生平、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都可以有清楚的了解。

在具体系年上，《重定杜子年谱》也有很多不同于一般系年的地方。如李白被赐金还山，单复系于天宝六年，而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在天宝三年。杜甫《戏为六绝句》，单复编在天宝九年，而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作于入蜀之后，难以确切系年。但是，不管单复的系年正确与否，他都是一位勇于探索的学者。不过，单复将杜甫所有诗进行系年，并将所有诗的目录纳入《重定杜子年谱》中，则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杜甫很多诗确实难以确切系年。然而，《四库全书总目》谓“是编冠以‘新定年谱’，未免附会”，则未免把它的缺点看得太重。事实上，《重定杜子年谱》是有创新的、扎实的年谱，是明代杜甫年谱中的佼佼者。

第二，《读杜愚得》的注采用集注的方法。

单复生长于明初，对于宋人的注广泛搜辑，包括诗话和笔记，间用明人的材料。如王洙、王得臣、王深父、赵彦材、黄希、黄鹤、薛苍舒、薛梦符、鲁訔、蔡梦弼、鲍彪，其余如黄庭坚、苏轼、沈括、蔡绦、修可、蔡宽夫、唐寅、王十朋、杨万里、刘辰翁、天觉、定功、默翁、郑、田、邹等（有些标注姓者，具体名字不详）。而所用的注释主要为王洙、赵彦材、黄希、黄鹤、蔡梦弼几家。应该说，这几家基本上代表了宋代注杜的水平，而利用其他注家的注释和诗话笔记，又广泛吸收了前人的杜诗研究成果。在集注时，注意甄别，尽量采辑正确的注释；同时注意文字的简明，尽量不繁琐重复引证材料。其指导思想是：“集诸家注释，或著其用事之出处，或指其立言之来自，或说其作诗之旨意，凡此皆取之。若其穿凿附会及重复见长者，皆删之。”（《读杜愚得·凡例》）

单复的注释也有自己的发明，主要是关于杜甫诗中一些重要

人物的生平。《八哀诗》（《读杜愚得》卷一二，以后略去书名）在哀严武的诗下注："严武，华州华阴人，挺之之子，幼豪爽，读书不甚究其义。初历阴补，其后自致身。累迁殿中侍御使。从玄宗入蜀，至德初赴肃宗行在，房琯荐为给事中，收长安，拜京兆少尹。坐琯事贬巴州刺史。久之，迁东川节度使。上皇合剑南为一道，擢武成都尹，剑南节度使。还，拜京兆尹，为二圣山林桥道使，封郑国公。迁黄门侍郎，复节度剑南。破吐蕃于当狗城，遂收盐川。加检校吏部尚书。永泰元年薨，年四十，赠尚书左仆射。"注释准确、精要，显出人物注释的功力。

单复的集注也有很多因误辑而沿袭错误的地方。《戏作徘谐体遣闷二首》："［沈存中曰］乌鬼：鸬鹚也。"实际上乌鬼是一种饲养的类似乌鸦的黑色水鸟，俗称鱼老鸦。《巳上人茅斋》（卷一）："［欧阳公曰］僧齐己也，善吟诗，知名于唐。""己"与"巳"是两个不同的字。齐己为晚唐人，与杜甫的时代相隔久远，其说甚误。杜甫诗中的"巳上人"并非僧齐己。

第三，对杜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特色进行解说，也有一些创造。对杜诗的解说，宋儒已做了很多工作。单复的创造在于，对杜诗的思想内容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解说，同时对杜诗的艺术特色也进行认真的解说。

《读杜愚得》的解说也带有集注性质。其解说如已有好的前人的评论，则用前人的评论。具体说来，所辑主要是默翁和刘辰翁的评论。不过总体说来，辑评较少，更多的是单复自己对杜诗的评论。

单复对待前辈学者的态度很端正。对于前人好的成果充分肯定，加以吸收。对于自己认为不对的，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对默翁的评论多有辑入，多是赞同，有时辑入后也发表不同意见。"［默翁曰］前四句卧病不得出游，而又多风雨也。况味亦无聊

矣。后四句羡花柳禽鸟之得时适性，而吾乃卧病。赋而兴也。”单复评云：“诗言卧病峡中，且值风雨拥塞，欲之荆岳，不可得，故曰‘潇湘洞庭虚映空’。至于暮春柳暗莲红之时，见鸳鸯之立洲渚，且挟（蛱）子翻飞还依一丛，殆叹己不若彼，得以遂其生耳。赋而比也。须溪谓此等诗可以不作，此评毋乃大（太）率乎?”单复的阐释更清晰，更符合杜诗的原意，同时对刘辰翁的批点提出了批评，是有发明的。单复对前辈学者的态度往往一分为二，批评其错误，肯定其成绩。在对待刘辰翁的态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单复对于刘辰翁批点杜诗，有时批评很严厉，但有时也很肯定，并辑录其批点。单复云：“且近世咸重视须溪刘氏批点杜诗，家传而人诵，亟取读之。其开卷第二首《赠李白》诗曰：‘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刘评云：野人所喜者蔬食，第对膻腥，故思青精饭耳。余疑未解。又《望岳》诗曰：‘荡胸生层云。’评曰：登高意豁，自现其趣。余益疑矣。及观评《上韦左相》‘八荒开寿域，一气转洪钧’云：颂相业多矣，未有如此轩豁快意者。余乃知须溪所评，大抵只据一时己见而言，亦未明作者立言之旨意，然颂相业语实误后学。”（《读杜愚得自序》）批评是尖锐的。但在《读杜愚得》中多次辑或引刘辰翁批点。如《新婚别》：“［须溪］谓‘曲折详至，缕缕几数转，微显条达’者是矣。”

单复本人的评论占所作的解的大半。其主要内容为三方面：(一）论杜诗的思想内容；（二）论杜诗的艺术；（三）标赋比兴体。长诗分段进行解说。标赋比兴体和长诗分段解说是受朱熹说诗骚体例的影响。实际上，单复解的体例乃是直接受默翁的影响。单复《读杜愚得》所辑默翁的评语的体例正与我们前面所讲的单复评论的体例完全相同，就是最好的说明。

《读杜愚得》在内容解说方面尽量按杜诗文字本身的含义来

解释杜诗，不深求，少附会。解释中力求突出杜甫的忠君仁爱思想，突出杜诗的社会意义。在艺术解说方面，主要解说篇章结构、艺术手法、语言艺术和基本风格。对内容与艺术的解说，往往融为一体。《早发射洪县南途中作》（卷八）云："此诗公自叹衰老，一破愁颜，又难屡得，是以有阮籍、杨朱之哭泣也。是诗写征途早发及跋涉苦乐之事，委屈详尽，读者详之。赋也。"《日暮》（卷八）云："此诗主意在首一句，其下三句应风起，后四句应日落，言日落风起而乌尾讹，云未动而水扬波。当是时，羌妇哭，胡儿歌，则将军拥雕戈别，上马而夜出焉。赋也。"对短篇的分析，很多都简洁明白。《洗兵马》云："此诗厌乱思治，欲天洗兵而作也。首一节喜皇威之清海岱，而言捷报已收山东。唯邺城未下，不日可得，以及独任郭相并宴劳回纥之事。'已喜皇威'言肃宗今收山东，以成中兴之业。'常思仙仗'言明皇岁幸骊山，以致蒙尘之祸。是故，三年士卒暴露悲笛里，关山月，万国生民涂炭，伤兵前草木之风。第二节纪车驾还京，而言成王、郭相、光弼、思礼二三豪俊能济时，而苍生已宁，紫极已正。第三节，喜中兴之业已成，而言'攀龙附凤'之从，当知蒙帝力以致为侯王，莫夸身强而妄想，戒之之词也。且关中留萧相，幕下用张子房，以致乱臣贼子之灭迹，而中兴之业喜其已成。谕之之词也。末一节结上三节而言，远人贡琛，诸山呈瑞，'隐士休歌紫芝曲'而遁世，'词人解撰河清颂'以纪瑞，奈何布谷催春而田家惜雨。今虽邺城未下，不日可克。苟克之，则琪上健儿当急归以慰城南之思妇可也，不宜久劳于外，故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厌乱思治之词也。"紧扣诗的语言文字与内容进行解说，又用分段的形式，解说正确，清楚细致，非常有利于读者了解杜诗的本意。有些诗也注意挖掘杜诗的忧国忧民思想，但仍然不脱离诗歌文字表达的内容。《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

诸公得柳字韵》云：“此诗公自言留蜀之久，今将之吴楚，留别章梓州及幕府诸公，既自道其所以，又忧中原盗贼之多、乘舆播迁及别后寄书相忆之事。赋也。首言入蜀之久，常恐有酒失而辞酒徒，今将适吴楚，吾知免夫。次自言今昔之不同，而行止复何有耶。今将适吴楚，且相逢有新故，相知有深浅。是以取别随薄厚焉。其曰‘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言之吴楚也。次言章梓州饯别而宾客留欢之厚。次言此行三峡波涛之险，未足为畏，而盗贼之多，衣冠之走中原，君王之安否，消息未闻，为可忧耳。末言拜东皇，上南斗，以适荆蛮。有使即将寄书，否则，唯长忆不忘而已。吾于是诗见公之自道其真，忧国尤至，章彝诸公闻此亦有感焉者与。”解说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仍然是从杜诗本身的内容出发，故不使人觉得牵强附会。

古人解说杜诗，总难免有偏离杜诗本意的地方，单复也是如此。究其原因，古人评诗，喜欢以意逆志，解诗时难免求比兴，求讥刺，求褒贬。单复解诗也用这样的方法，自然也容易违背杜诗原有的旨意。《奉寄高常侍》云：“此公殆讥高之无功而朝除，且伤己之迟暮而滞留，故作是歌欤。言我与高相交于汶上，年已久矣，而其飞腾为尤甚，盖以其为节度也。为节度则其总戎，楚蜀应未全全乎，言其出师之无功也。为文章则方驾曹刘，不啻过之，言其文辞之藻丽也。今日须汲黯之在朝，中原忆廉颇之为将，言其朝除而别思良将也。今我在蜀，惟春色催其衰老耳，故别泪如水之东注也。”题曰“奉寄”，本是尊敬之辞，而诗称其为汲黯、廉颇，言其方驾曹刘，皆是赞美恭贺之辞，而解为“讥”，真谬以千里。殆受黄鹤讥刺说之影响，加以发挥，更觉荒谬。单复对杜诗艺术的解说，不少也嫌过于简略，过于浅俚。

总之，单复是明代一位重要的杜甫研究学者，《读杜愚得》是一部重要的杜甫研究著作。它在著述的体例方面有所开拓，在

杜甫的生平研究和诗的注释研究方面，也有自己的贡献。杨士奇云："考事究旨，必归于当。其疑不可通者阙之。""简直明白，要其得杜之心为多。"（《读杜愚得序》）评价是公允的。

单复的研究著作出版于明代前期，无论是他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著作体例，对明代的杜甫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是明代杜甫学开风气的重要人物。他的《读杜愚得》为明代学者所重视。陈明更辑其五言律注成《杜律单注》行世。其《重定杜子年谱》更成为学者的重要参考，张綖《杜诗通》、周甸《杜释会通》、邵傅《杜律集解》都用过。其解用类似古文翻译白话的方式解说杜诗，可以说在杜诗学研究上开了一种风气，也可以说开创了一种解说杜诗的流派。后来明代学者邵宝、张綖、谢杰等均是走的这条杜甫学路子。

三 邵 宝

一

邵宝（1460—1527），字国宝，无锡（今江苏无锡）人。成化二十年进士，授许州知州。正德四年擢右都御使，总督漕运。后巡抚贵州，寻迁户部右侍郎，进左侍郎。命兼左佥都御史，处置粮运。拜南京礼部尚书，再疏辞免。久之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邵宝学以洛闽为的，尝曰："吾愿为真大夫，不愿为假道学。"为诗文，典重和雅。至于原本经术，粹然一出于正，则其所自得也。博综群籍，有得则书之简，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

日格一物”之义，名之曰日格子。著《学史》、《简端》、二《录》、《定性书说》、《漕政举要》。学者称二泉先生。

《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署名为邵宝著，学术界对此署名有怀疑，认为非邵宝所作，然检证据似嫌不足。故我们认为《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应定为邵宝所作，可存疑，待以后做进一步研究。

二

《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对杜甫的研究做了多方面的工作。概括说来，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对杜诗进行分体分类编排。先将诗按五古、七古、歌行、五绝、七绝、五律、七律的顺序排列，也有古体和律体互参的。分类按内容分为纪行、述怀等五十三类。颇为重复杂乱。

其次是注释。注释体例：（一）在诗题下简单标明诗写作的时间、地点。（二）仿效朱熹注《诗经》的体例标明诗的赋、比、兴之体。有时标“赋而比也”（如卷二〇《百舌》）。有时标“兴而比又赋也”（如卷一〇《君不见》）。（三）对难字注音。（四）对典故、名物制度进行注释，对难懂或有诗意的诗句进行解释。《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的注释体例是相当完备的。邵宝书中有的虽题为“邵二泉先生集注”，其实未标所集注者之名，所注也比较简略，故不能完全看成集注之作。而实际上是注者利用前人的成果，加上自己的发明来注释的。

第三，对每首诗都进行了完整而简明的阐释。

从以上列举可见《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所包含的研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而其主要内容和有特点的内容是注和释两部分。

先谈注。

《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中注的最大特点是简明扼要，较为准确。书名虽是“详注”，实际上其注较为简洁。但注者其实下

过一番认真的功夫。对于前人的注释择善而从，又加上自己的见解，融会贯通。注不旁征博引，只是注明所应该注明的内容，但其间仍有一些学术发明。过栋序云："悉加训诂。虽列分类，井然不紊。参之国史，质之家乘，事则核而不讹，词则质而易解，取喻显而无艰深之病，据理近而寡牵合之嫌。"（《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卷首）

《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的注时有新意。《宿次空灵岸》注"空灵岸"云："在今长沙府湘潭县，有谓在归州者，非也。"（卷一）注释准确，纠正了注"归州"的错误。注"霞石岭"云："空灵岸下水深五六丈，其清见底，五色石子鲜明，可见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此云'霞石'，亦指岸石如朝霞也。"注释细腻，不仅注出了"霞石岭"，而且特地注明霞石也指岸石如霞，有助于对诗的理解。《遣兴五首》，学术界一般认为作于秦州，邵宝注云："乾元二年在秦州作。"诗其二是怀念孟浩然的。"遥望东南云，令人几悲咤"注云："东南云：梁瑄不归第，璟每见东南白云，即立望惨然久之。几悲咤：《曲礼》：毋咤食。以舌口中作声曰咤。咤似于气之怒也。浩然襄阳人，襄阳在秦州东南，时公思而不见，故望云悲咤耳。"学术界多以为此诗是杜甫居三峡时所作。邵宝定于乾元二年秦州作，不同于众说。而注出梁璟望东南云思梁瑄之典，注出襄阳在秦州东南的地理位置，非常贴切。而注的内容也恰恰说明乾元二年秦州作的系年的正确性。反观学术界的三峡之说，与"遥望东南云"的内容不合，则无法使人心服。《东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在注完陈子昂生平事迹后，注云："按，拾遗与公之祖审言亦为交游。审言常贬吉州司户，拾遗亦有序送云。"这个注释很有新意，通过考证说明陈子昂与杜审言有很好的交谊。说明杜甫对陈子昂的敬仰固然出于对其人品事业的推崇，同时还有个人感情的因素。这包

含了注者对诗理解的深刻和新见解。

其注对诗的有关内容进行了考证。《君不见》（卷一〇）题下注："大历元年，苏傒摧颓太甚，故公以弃池折桐为比而赠此诗。"对诗的写作时间和背景进行考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前人错误的说法进行辩证。《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至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卷一）注："按史云公至耒阳，聂令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今以诗考之，公是秋下洞庭湖，欲归襄阳，尚有《别湖南幕府亲友》及过洞庭湖、适汉阳等诗。其孙始改葬于巩县，元微之为志，则其牛酒之诬，不攻而破矣。"以诗的内容，对杜甫死于牛酒之说进行批驳，非常有力。

《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的释是对每首诗的写作目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思想进行说明。其特点是：

（一）以杜证杜，就杜诗本身的深入理解、融会贯通来阐释杜诗，不离开杜诗本身，曲征旁引，穿穴附会，以发所谓言外之旨，以发隐秘，力求忠于杜诗本身。其方法近似现代的作品赏析。由于历来研究杜诗多是以意逆志，对诗的主旨求之过深，反而失却杜诗的真正本意。《剑门》（卷一）云："公过剑门而赋此诗。言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而剑门乃天设之险以壮西南者也。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今也斯民困于诛求，恓惶之气见于岷峨，则生民又将如何。盖三皇五帝之前，不通中国，虽鸡犬亦不容入关，况珠玉之可宝者乎？后王虽尚柔远，状职贡之道，已或间阻。至今奸雄之徒，辄欲高视以图王霸，并吞割据，若不相让。故吾深为此虑。直欲罪真宰而削平迭嶂，使不险固，今亦不可得已。所以临风而默然惆怅者，盖恐偶有复为割据之，或一时无以御之耳。"对诗的阐释完全符合杜诗的本意，既不肤浅，也不附会。《遣兴五首》（卷二）其二云："诗又言庞公有济世之策，

且素怀刑而不肯出仕，故处士之中，其节独苦。盖林茂水深，则鱼鸟皆有所归宿。今也天地闭而贤人隐，是以举家隐于鹿门，虽刘表亦不能屈致矣。此公自比以自遣耳。”对诗的解释完全符合杜诗的实际，而结尾说杜甫自比庞德公以遣兴很有新意，发前人所未发。

（二）解说杜诗诗意的部分，往往用通俗而优美的语言逐句解说杜诗，形成美好的意境。其代表性的解说，所形成的意境与杜诗本身的意境相当接近。《宿次空灵岸》云：“公自岳之潭，纪其空灵山水之胜而作。言沄沄逆浪之中，从容展夫清眺，适逢逆水舟迟，得以观经历之妙，但见空灵霞石峻拔，栝柏掩映奔峭，唯夫春意无私，而日光犹有偏照。身逢此地，山水颇佳，可营居室，少舒闷怀。山川毒瘴，亦何足畏。但恐兵戈扰攘为可忧耳。因思向日遗恨，耻为达人所嗤诮，而回舟卜居，诚亦延赏山川佳处，岂不领略其要妙哉！”（卷一）阐释非常准确、生动、明白，完全传达了杜诗的意蕴，传达了杜诗的神韵。《君不见》阐释云：“公简旧友苏徯之作。言道旁之池，虽曰旧水，人所共弃也，而不知一斛之深，蛟龙藏焉。摧折之桐，虽曰死树，人皆以为薪也，而不知百年之材，琴瑟中焉。用此以比苏徯。今虽与世相违，然有才无命，终有得遇之时。故又申告之曰：丈夫事业，盖棺始定。今君未老，而有隐遁之情，山谷之中，诚不可处。风雷得以震荡其心胸，魑魅得以惶惑其志意。为此言者，正以勉其显拔而立身行道也欤。”（卷一〇）阐释较为准确地复述了诗的内容，又点明了诗的主旨，帮助读者准确深入地理解杜诗。

《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解说杜诗，总的说来，可谓忠实、准确、优美。过栋《序》云：“其说深沉典雅，清融鬯达，意与境适，情随事惬，取材定格，一一本之于杜。”（《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卷首）这个评价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杜诗博大精深，完全准确地注释不容易。《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的注和释都有一些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宏观而言，它是明代研究杜甫的高水平的著作，也是一部影响很大的杜甫集注释之作。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释简明而符合杜诗本意。张缙彦说："古今注杜诗者，有赵氏虞氏数十家，独邵氏二泉颇简实有据。"（《杜诗分类全集序》）张缙彦站在杜甫学历史的高度，对邵宝的著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个评价是客观的、符合实际的。

从学术发展的渊源上说，邵宝《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的以杜解杜的阐释方法，是直接继承单复《读杜愚得》的阐释方法，并加以发展，而达到完善的境地。它既是一种文献阐释方法，也是杜诗研究的方法。其要点是准确把握杜诗的主旨，并加以表达。对杜诗全诗用古文翻译成白话式的方法，加以解说。它的最大优点是比较忠实于杜甫诗歌的原意，引导读者去领略杜诗的思想。在杜诗学穿凿附会风气弥漫的情况下，这种以杜解杜的方法，显得尤为可贵。这种以杜解杜的方法，在明代成为杜甫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对后世的杜甫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 杨慎

一

杨慎（1488—1559），字用修，新都（今四川成都）人，少师廷和子。正德六年试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世宗即位，起充经筵讲官。嘉靖三年，帝纳桂萼、张璁言，召为翰林学士，慎偕

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帝怒，后贬云南永昌尉。长期生活在永昌。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

杨慎幼警悟，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好学穷理，老而弥笃。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著有《升庵集》八十一卷，《外集》一百卷，《遗集》二十六卷。杂著多种。《明史》卷一九二有传。

杨慎的杜甫研究著作，有杨慎刻《李杜诗选》的《杜少陵诗选》批点，（《杜少陵诗选》六卷，《四库全书总目》的总集类存目评此书说："杜甫诗凡二百四十余首，前后无序跋，多载刘辰翁及慎评，其去取殊无别裁，盖闵氏以意抄录，取配李氏并行耳。"）其余关于杜甫的研究散见于他的诗话和其他著作中。

二

杨慎是明代著名的学者，也是重要的杜甫学家，在杜甫学上有很大的建树。闵映璧《杜少陵诗选》序说："我朝杨太史用修阅上批骘之，才致所关，但经拈出，偶一寓目，辄欲搔首问天。是少陵之神得诗以传，诗之神复得用修以传。"（《杜少陵诗选》）对杨慎捧得太高，不能令人信服。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人对杨慎杜诗学的推崇。

杨慎研究杜诗有自己的视角。他特别注重从"言志"的角度来研究杜诗。他认为杜甫是屈原似的伟大诗人，其诗是雅士骚人的诗。他说："杨诚斋云：'李太白之诗，列子之御风也。杜少陵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宋则东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余谓太白，仙翁侠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丹铅总录》卷一八《评李

杜》）杜甫确实是封建社会最具有儒家风范的饱经忧患的诗人，他的作品正是写他的社会经历和思想，具有雅士骚人的韵致。杨慎的说法很有新见。

杨慎特别强调杜诗的抒情性，故强烈反对杜诗为“诗史”之说。他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谓史者，左记言，右记事，古之《尚书》《春秋》也。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芣苢’‘夭桃’‘秾李’‘雀角’‘鼠牙’，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为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如刺淫乱，则曰‘雝雝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敛，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家寡妇诛求尽’也。叙饥荒，则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干’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与讪讦，乃其下乘，而宋人拾以为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丹铅总录》卷二一《诗史误人》）虽然杨慎反对“诗史”说太偏激，批评杜诗太露也表现出他文艺批评中保守胶固的一面，但他强调杜诗是抒情诗，强调杜诗像《诗经》一样“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却是非常正确的。

杨慎认为杜甫在艺术上有绝大的开拓，把诗歌艺术推向了极致。他说：“诗歌至杜陵而畅，然诗之衰飒，实自杜陵始。经学

至朱子而明，然经之拘晦，实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担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鸾辂生于椎轮，龙舟起于落叶，山则源于覆篑，江则源于滥觞。今也，譬则乞丐沾其剩馥残膏，犹之瞽史诵其坠言衍说，何惑乎！道之日芜，而文之日下也。”（《升庵集》卷六《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所谓“畅”即可随心所欲地表现思想。艺术极为丰富，极为成熟，涉笔成趣，天地广阔。物极必反，最盛的时候也是衰微的开始。说古诗从杜甫开始走下坡路，也是事实。

杨慎注意对杜甫创作道路和经验的总结。他认为创作需要多读书，杜甫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主要的经验之谈。他说：“杜子美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子美自言其所得也。读书虽不为作诗设，然胸中有万卷，则笔下自无一点尘矣。今日士夫，争学杜诗，不知读书果曾破万卷乎？如其未也，不过拾《离骚》之香草，丐杜陵之残膏而已。又尝记宋宣政间，文人称翟汝文、叶梦得、汪藻、孙觌四人。孙尝自评曰：‘吾之视浮溪，浮溪之视石林，各少十年书，石林视翟忠惠亦然。’识者以为确论。今之学文者，果有十年书乎？不过抄《玉篇》之难字，效红勒之轧辞而已。乃反峻其门墙，高自标榜，必欲晚古人而薄前辈，何异‘蚍蜉撼大树’乎？”（《丹铅总录》卷一九《读书万卷》）深刻阐发杜甫重视读书对创作有重要作用的思想。

杨慎认为杜甫诗的艺术，是在学习《文选》艺术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发展，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杜子美亦多是效《选》诗，后渐放手；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逸不可当。”（《升庵诗话》卷七《学选诗》）“须溪徒知尊李杜，而不知《选》诗又李杜之所自出。”（《升庵诗话》卷七《刘须溪》）“谢宣远诗：‘离会须相杂。’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别筵’之

句，实祖之。颜延年诗‘春风壮风涛’，杜子美‘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风涛’之句，实衍之。故子美谕儿诗曰‘熟精《文选》理’。”（《升庵诗话》卷八《杜诗本选》）《文选》所选的作品，是齐梁以前作品的精华。杜甫正是在继承前代文学精华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而成为伟大诗人的。杨慎总结了杜甫继承和发展的创作思想，总结了杜甫所走的创作道路，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杨慎一般是将杜甫和李白并称的，把李杜看作诗坛并峙的双雄。但由于文艺理念、审美情趣、艺术好尚等因素，也表现出抑杜尊李的倾向。杨慎说：“盛弘之《荆州记》巫峡江水之迅云：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杜子美诗云：‘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李太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虽同用盛弘之语，而优劣自别。今人谓李杜不可以优劣论，此语亦太愦愦。白帝至江陵，春水盛时，行舟朝发夕至，云飞鸟逝，不是过也。太白述之为韵语，惊风雨而泣鬼神矣。”（《升庵诗话》卷七《巫峡江陵》）单就这里所举的李白和杜甫的诗而言，李白确实胜过杜甫，杨慎的话不无道理。但从宏观来说，李白和杜甫的诗各有所长，各有成就，总体上旗鼓相当，难分轩轾。杨慎有意标新立异，强分优劣，以偏概全，无意中落到了“谤伤”杜甫的境地，有时对杜甫诗有激烈的批评。仇兆鳌说：“杨用修则抑扬参半，亦非深知少陵者。”（《杜诗详注·杜诗凡例》）公允地说，杨慎对杜甫是非常尊崇的，推杜甫为最伟大的诗人。但对杜甫的某些评论失之片面与偏颇，影响了他在杜诗学上的成就。

杨慎是明代最博学的学者，他对杜诗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在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成绩卓著。

杨慎对杜诗有关内容进行了考证。考证杜诗中的“罗些城”即南诏乐些城，明代作“摩些”。他说：“《唐书》：骠国之地‘南尽冥海（即今滇海），北通南诏罗些城，东北距阳苴咩城六千八百里。’乐些，即杜诗所谓‘和亲罗些城’是也。今作‘摩些’。其字虽异，地一也，音一也。”（《升庵诗话补遗·乐些城》）认为杜诗的《赠花卿》为赠当时蜀中猛将花敬定，讽刺他僭用天子礼乐。他说：“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花卿名敬定，丹稜人，蜀之勇将也。恃功骄恣，杜公此诗讥其僭用天子礼乐也，而含蓄不露，有风人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旨。公之绝句百余首，此为之冠。唐世乐府，多取当时名人之诗唱之，而音调名题各异。杜公此诗在乐府为《入破第二叠》。……杜子美七言绝近百，锦城妓女独唱其《赠花卿》一首，盖花卿在蜀颇僭，子美作此讽之。当时妓女独以此诗入歌，亦有见哉。”（《升庵诗话》卷八《子美赠花卿》，另《绝句衍义·杜子美赠花卿》与此条内容大致相同）杨慎此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很多注本皆引此说为《赠花卿》之解。杨慎以花敬定为花卿，可备一说。而详诗意，花卿应是歌妓。杨慎之说不能作为定论。

杨慎对杜诗也作了一些很好的校勘。他的校勘往往结合其他版本，结合诗的内容进行考证，方下断语，故非常精确。校“舍”应作“社”：“韦述《开元谱》云：‘倡优之人，取媚酒食，居于社南者，呼之为社南氏。居于社北者，呼之为社北氏。’杜子美诗‘社南社北皆春水’正用此事。后人不知，乃改‘社’作‘舍’。”（《升庵集》卷六十八《社南社北》）校“短褐”应作“裋褐”：“杜少陵《冬日怀李白》诗：‘裋褐风霜入。’惟宋元本仍作‘裋’，今本皆作‘短褐’。裋音竖。二字见《列子》。”（《升庵集》卷五八《裋褐》）校“天阙”不作“天阅”：“杜工部《龙门奉先

寺》诗‘天窥象纬逼’，或作‘天阅’，殊为牵强。张表臣《诗话》据旧本作‘天窥’，引《史记》作‘以管窥天’之语，其见卓矣。余又按《文选》潘岳《秋兴赋》‘窥天文之秘奥’注引陆贾《新语》‘楚王作干溪之台窥天文’。杜子美，精熟《文选》者也，其用‘天窥’字，正本此。况‘天文’即‘象纬’也，不但用其字，亦用其义矣。子美复生，必以余为知言。‘天窥’，窥天也。‘云卧’，卧云也，此倒字法也，言窥天则星河垂地，卧云则空翠湿衣，见山中之殊于人境也。”（《升庵集》卷五七《天窥象纬逼》）校“握节”应为“秃节”：“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书杜少陵诗一卷，‘握节汉臣归’乃是‘秃节’。‘新炊间黄粱’乃是‘闻黄粱’。以道跋云：‘前辈见书自多，不似晚生，但以印本为正也。’慎按《后汉书·张衡传》：‘苏武以秃节效贞。’杜公正用此语。后人不知，改‘秃’为‘握’。晁以道徒知宋子京之旧本，亦不知‘秃节’之字所出也，况今之浅学乎？”（《升庵集》卷五七《秃节》）校“山东”应为“东山”：“杜子美诗‘近来海内无长句，汝与东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山东李白’。按乐史序《李白集》云：‘白客游天下，以声妓自随，效谢安石风流，自号东山，时人遂以东山李白称之。’子美诗句正因其自号而称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统志》遂以李白入山东人物类，而引杜诗为证，近于郢书燕说矣。噫，寡陋一至此哉！”（《升庵集》卷一〇《东山李白》）这些校勘虽不一定作为杜诗文字定本的依据，但可作为重要的校勘异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杨慎对于杜诗的注释有很多创获。释“写”：“杜诗：‘数回细写愁仍破。’写，洗野切。《礼记》‘器之溉者不写，其余皆写’注：‘谓传之器中。’《史记》始皇三十五年，‘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三十六年，‘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左传》注：‘写器令空。’《东观汉记》：‘封车载货，写之权门。’晋

郗夫人语二弟云：‘倾筐倒写。’又，四夜切。《石鼓文》：‘宫车其写。’义与‘卸’通。舍车解马曰写，舟车出载亦曰写。”（《升庵集·数回细写愁仍颇》）释《止观经》（止、观）：“杜诗‘白首重闻《止观经》。’佛经云：‘止能舍乐，观能离苦。’又云：‘止能修心，能断贪爱。观能修慧，能断无明’‘止’如‘定而后能静’，‘观’则‘虑而后能得’也。”（《升庵集》卷五七《止观之义》）释“绿沉”：“杜少陵《游何将军山林》诗：‘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竹坡周少隐《诗话》云：‘甲抛于雨，为金所锁。铁卧于苔，为绿所沉。’有‘将军不好武’之意。’此瞽者之言也。薛氏《补遗》：‘绿沉，精铁也。’引《隋书》文帝赐张奫绿沉之甲。赵德麟《侯鲭录》谓绿沉为竹。引陆龟蒙诗‘一架三百竿，绿沉森杳冥’。虽少有据，然亦非也。予考绿沉，乃画工设色之石。《邺中记》云：‘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绿沉色，或木兰色，或紫绀色，或郁金色。’王羲之《笔经》云：‘有人以绿沉漆竹管见遗。’《南史》梁武帝西园食绿沉瓜。是绿沉即西瓜皮色也。梁简文诗：‘吴戈不服箭，冀马绿沉弓。’虞世南诗：‘绿沉明月弦。’刘邵（一作劭）《赵都赋》：‘弩有黄间、绿沉。’若如薛与赵之说，铁与竹，岂可为弓弦耶？杨巨源诗：‘吟诗白羽扇，校猎绿沉枪。’与杜少陵之句同，皆谓以绿沉色漆饰枪柄。”（《升庵集·绿沉》）驳斥前人的种种谬说，解释精当。释舞马：“杜诗‘斗鸡初赐锦，舞马使登床。’马舞，古有之。《山海经》述海外大药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之马。杜氏《通典》：‘凤花厩有蹀马，俯仰腾跃皆合节，奏明皇，尝令教舞马百驷。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抃转如飞。或命壮士举榻，马舞其上。”观此说，则杜诗‘登床’之语，盖纪实也。”（《升庵集》卷五八《舞马登床》）释“口脂”：“杜子美《腊日》诗：‘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李峤文集有《谢赐口脂表》云：青牛帐里，未辍

炉香；朱鸟窗前，新调铅粉。揉之以辛夷甲煎，然之以桂火兰苏。'刘禹锡有《代谢赐表》云：'宣奉圣旨，赐臣腊日口脂面脂，紫雪红雪。雕奁既开，珍药斯见。膏凝雪莹，合液腾芳。'令狐楚《谢腊日赐口脂红雪表》云：'雪散凝红紫之名，香膏蕴兰麝之气。合自金鼎，贮于雕奁。'其子令狐绹《谢紫雪表》云：'灵膏有琼液之名，仙散拟雪花之状。职当喉舌，匪效鲁庙之三缄；任在燮调，请献谢庄之六出。'此可补杜注之遗。"（《升庵集》卷六〇《口脂面药》）以唐代史料注杜，准确详明。释"左担"："杜子美《愁坐》诗曰：'高斋常见野，愁坐更临门。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气昏。葭明氐种回，左担犬羊存。终日忧奔走，归期未敢论。'葭明、左担皆地名也。葭明人知之，左担人罕知也。注者不知，或径作'武担'，又改作'立担'，皆可笑。按《太平御览》引李充《蜀记》云：'蜀山自绵谷、葭明，道径险窄，北来担负者，不容易肩，谓之左担道。'又李公胤《益州记》云：'阴平县有左肩道，其路至险，自北来者，担在左肩，不得度右肩。'常璩《南中志》云：'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宫水，至险难行。步道，度三津，亦艰阻。故行人为语曰：'楢溪赤木，盘蛇七曲。盘羊乌栊，气与天通。庲降贾子，左担七里。'又有牛叩头坂、马持颊坂，其险如此。据此三书，左担道有三：绵谷，一也。阴平，二也。朱提，三也。义则一而也。朱提，今之乌撒，云贵往来之西路也。"（《诗话补遗》卷二《杜诗左担之句》）释"步檐"："杜子美诗'步檐倚杖看牛斗'。檐，古簷字。《楚辞·大招》'曲屋步櫚'注：'曲屋，周阁也。步櫚，长砌也。'司马相如赋：'步櫚周流，长途中宿。'櫚亦古檐字耶。又梁陆倕《钟山寺》诗：'步檐时中宿，飞阶或上征。'沈氏满愿诗：'步檐随新月，挑灯惜落花。'杜公盖袭用其字。后人不知，妄改作'步蟾'。且前联有'新月'字，而结句

又云步蟾，复矣。况‘步蟾’乃举子坊牌字，杜公诗宁有此恶字耶？甚矣，士俗不可医也。”（《丹铅余录》卷一八《杜诗步檐字》）释“天棘”：“杜诗：‘江莲摇白羽，天棘蔓青丝。’郑樵云：‘天棘，柳也。’此无所据，杜撰欺人耳。且柳可言丝，只在初春。若茶瓜留客之日，江莲白羽之辰，必是深夏，柳已老叶浓阴，不可言丝矣。若夫蔓云者，可言兔丝玉瓜，不可言柳，此俗易知，天棘非柳明矣。按《本草索隐》云：‘天门冬，在东岳名淫羊藿，在南岳名百部，在西岳名管松，在北岳名颠棘。’‘颠’与‘天’声相近而互名也。此解近之。”（《丹铅余录》卷二一《杜诗天棘》）像这些解释都非常正确，引证材料丰富，论证清晰有力，或更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或补救了前人注释的不足，甚为有益。

五　唐元竑

一

唐元竑，字远生，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万历举人。有节义，明亡，不食而死。著有《杜诗捃》。

二

《杜诗捃》是唐元竑读杜集的随笔。唐元竑对杜甫和杜集非常推崇，但不迷信，故而他的研究多能从实际出发。他的研究也较少框框，因此能研究一些前人未涉及的问题，其研究也有自己的心得，较少人云亦云，而随笔的形式又可以使他在表述时充分

发挥。这样,《杜诗捃》具有自己的学术特色与价值。

唐元竑往往根据杜甫具体的作品,结合唐代的社会现实和杜甫的生平,研究一些社会现象、文学现象,提出自己的观点。谈论安史之乱,评论唐玄宗和安禄山:“开元帝固是英才,自郭元振以社稷功坐练兵不振,几死纛下,是后军政一变,几复贞观之初矣。然实内耽逸乐,未尝以身率之则,委任之人宠过而骄,亦思效尤,从令从好,势所必至。且禄山天性鸷悍,严而寡恩,士卒畏之,其一时边功亦非幸致,不如此,何以能作贼耶?”(《杜诗捃》卷一,以后略去书名)谈杜甫喜欢在诗中自我称颂:“赠韦左丞诗……至‘纨绔不饿死’一篇,高自标置,抑又甚矣。然终于难撼东入海,西去秦,所谓何天不可非也。当时士子干谒公卿,惯用此法,谓之捭阖。……虽士子恶习,然终是盛世事,盖必海宇右文,公卿下士时始有之。其初始于一二豪杰,急于自见,稍露锋锷,适遇当道,虚怀爱才,倾盖纳交,遂成佳话,于是不安贫贱者群起效之,遂相沿,有傲妄之目。然傲则非妄,妄则非傲。傲者有而不能藏,如瘦人多骨,妄者无而诈为有,如病人浮肿,相去天渊。世人极言傲妄,所谓泾渭不分,故使伪者售而真者绌也。如公有激之言,虽稍不逊,要非妄也。乃其后,妄人竟为当道所厌恶,故杜佑之客至召与食而面数之。甚者如陈少游,杀之矣。致使韦布胆寒,变为称颂功德,胁肩谄笑,以觊余沥,而‘一剑霜寒十四州’,欲改为‘四十’,始许相见,摛词家复何所容其足乎?此可以观世变也。”(卷一)认为杜甫喜欢自我标榜,其目的是用世,是受了时代风尚的影响。他对杜甫没有贬斥,也没有掩饰,分析符合实际,深刻而令人信服,使我们对杜甫与社会的关系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在研究杜甫和杜甫作品的时候,唐元竑往往对传统的诗歌理论有新的认识,有更深的感悟。他认为杜甫、李白的诗之所以超

乎一般诗人，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豪气超越一般人。他说："论诗当以气为主。气之豪，上无过青莲，而少陵直欲过之。观其喜则手足欲旋，闷则发狂大叫，乃至'新松''恶竹''莺语''花开'等句，虽小景细事，并有一种鸷猛之性溢于言外。而搜其心曲，则青天白日迄于老困没齿无改变。如此人，安得不千古乎！青莲豪而畅。少陵豪而郁，凡其笔端奇恣横溢，皆郁所为也。摩诘天资近道，其见地超乎李、杜，然评者谓其诗高者似禅，下者似僧，终逊李、杜一筹者，以其气平和不能雄耳。"（卷二）这里所谓气，就是感情，是指诗人对社会和人生的强烈关照和感悟，并把它浓烈而真挚地表现在诗中。这样来理解诗的气，理解李白、杜甫的气，具体而新颖。历来论诗都强调真实，唐元竑认为诗贵真。诗的真最重要的是情真，以真情写真事，出自天性，不因袭。他说："诗无妙诀，但贵真耳。愁即真愁，喜即真喜，流自至性，无所因仍，则不待冥搜，自然警策。如《新安吏》诗：'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新婚别》诗：'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垂老别》诗：'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无家别》诗：'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又'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等语，真觉肠为生断，鬼亦夜哭，然皆得自目击，有类纪事。初非爱其悲切，特撰为此等句也。'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对则工矣，亦有何致。有文无情，事必至此。无病而呻，词家所忌也。"以杜诗为范例，谈诗之真首先是情真，很有新意。文学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没有新的思想，没有独特的感受，即使描写穷形极象，惟妙惟肖，也不能算好作品。唐元竑在明代能有这样的见解，是很难得的。唐元竑从禅喻诗谈到诗忌直说。他说："昔人以诗喻禅，唯然有之。禅家有言，切忌道着。诗非训诂，最嫌直说。即如'天寒'二语，寻其文句，'翠袖''修竹'以当绝代

姿，并是仙人手中扇耳。着眼仙人当在何处。《丽人行》‘肌理细腻骨肉匀’，可谓亲切，乃此语殊不为佳，明此者始可与言诗家三昧也。或曰：‘婉兮娈兮，季女斯饥。非直说乎。’曰：然。叙事贵真，毋论《新安》诸诗，即如‘天寒翠袖薄’，何尝不真。言情贵婉，《新安》诸诗，语虽直叙，原其微旨，盖欲居上位者闻之耳。然此意隐隐字句外，试取数篇读之，无一语显然及此，所谓切忌道着也。若乃‘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便与‘肌理细腻’无异，不为人所称矣。”（卷一）这里所谈的是诗的形象思维的问题。文学作品是用艺术形象来表达思想，故思想应隐含在艺术形象之中。如果把思想直接说出来，思想也就游离于艺术形象之外，思想与形象失去了统一，也就大大地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唐元竑提倡用艺术形象表达作品的思想，确实抓住了诗歌创作的根本，是非常有见地的。唐元竑对赋、比、兴三种创作方法的运用也有很好的见解。他说：“诗之比兴赋，天然有之，下笔自来，不须有意撰造，亦不得截然分别孰兴，孰比，孰赋。多有兴而比，比而兴，比兴而即赋者。妙正在此。有意撰造，即不能佳。如《凤凰台》《石笋》《萬苣》诸诗是也。”（卷二）诗人平时应该进行创作方法的研究与培养，而在创作时则应全力进行构思和内容的表达，而不能在此时尚想什么地方应用什么表达方法，这就是所谓得意忘筌的道理。唐元竑所谈的确符合创作的实际，符合创作的规律。

唐元竑不仅宏观研究有心得，微观研究也有深入的体会。论杜诗“读书破万卷”的“破”：“‘读书破万卷’，此‘破’字颇难解。犹谚云破财，虽未罄，已经消耗曰破。万卷未必首尾皆诵通，已无不寓目者。此虽夸语，却甚斟酌。”（卷一）言破字的含义，言用破字的准确，体会精微，确实是独到的见解。谈《望野》诗的艺术也很精彩。他说：“《望野》诗字字如画。‘独鹤归

何晚，昏鸦已满林。’但‘鸦’‘鹤’对举，意已自浓，何必更有所比。”（卷一）谈杜诗用赋法，而诗却具有浓郁的诗意，也是很有见地的。

唐元竑还对关于杜诗的传统的说法或注释提出不同的看法。如关于《前出塞》和《后出塞》诗的写作时间问题。传统的看法多认为是杜甫安史之乱后作于秦州，而唐元竑则认为应是安史之乱前所作。他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他说：“前后出塞诗，公集中最烜赫者，人人诵习。然皆从旧注，乾元时公在秦州思天宝间事而作。更无异说，亦不言大将为谁。独东坡云详味末篇，盖禄山反时，其将校有脱身归国而禄山尽杀其妻子者。姓名不可传，可恨也。坡信具眼，然亦以为乾元后作。盖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皆已有明证，故不疑耳。不知正此是淆讹处。当通前后细参其意。前九首云‘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又‘苟能制侵凌’，又‘何时筑城还’，又‘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又‘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后五首云‘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又‘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军’，又‘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又‘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又‘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又‘将骄益愁思’，累累诸言，咸太平全盛时，乘障备边，拓土俘馘，或取功名耳。至于大将止忧其骄，何曾一字及叛逆与乱离耶。然则‘坐见幽州骑’二语何谓？曰此乃公先见，假逃将口决其必叛。‘坐见’云者，犹抉眼吴门观越兵之入耳。此诗必作于天宝末年，禄山未叛时无疑。注非也。不然公刚肠疾恶，乾元间笔底每及叛逆，必以蛇豕虎狼叱之，岂有贼骑已长驱河洛而犹称为大将，铺叙边功，且极夸其治军严肃者耶？况追叙前事诗至十四首，而竟无一语及目前，亦断无此体格也。不可不辨。”（卷一）这里考证详明，说理透彻，《前出塞》和《后出塞》诗为安史之乱前所作无疑，旧注错误。

《赠花卿》一首驳斥讽刺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之说，赞同胡元瑞认为花卿乃歌者姓名。他说："'锦城丝管'一绝，题云'赠花卿'。解者谓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此诗讽也。近世胡元瑞驳之，谓花卿乃歌者姓名偶同耳。或问二说孰是，曰元瑞是也。节度使僭妄，当时诚有之，敬定偏裨也，胡不思至是。然花卿之为敬定，旧注已然，亦不始于用修。如元瑞，真具眼也。且如解者言，题当云'花卿席上闻乐'，岂得但言赠花卿哉。即如'成都猛将'一篇，题云'戏作花卿歌'，盖旁观持论，亦非投赠，与同杯酒接殷勤之欢也。敬定虽骄恣，然一时定乱功高，赏不酬劳，死后血食。'人道我卿绝世无'，虽止赞其勇，意当时蜀人之论必有不同于朝廷者。公虽心是朝廷，篇中极口揄扬，亦未尝没其功也。天子礼乐谈何容易，假使显然僭逾至此，公固一饭不忘君者，尚肯垂涎其酒食，从容宴会，交纳赋诗乎？"（卷二）分析颇中肯綮，对于正确理解《赠花卿》的内容极有好处。唐元竑认为"脱身薄尉中，始与捶楚辞"，应该理解为不作薄尉这样的小官，才免去自己被长官的责打。他说："'脱身薄尉中，始与捶楚辞'，谓唐时参军薄尉受杖者是。鲍引昌黎诗驳之，非也。诗意了然，不烦他证。此与'饥鹰侧翅'、'跨马触热'，下语皆带轻薄。从古豪杰皆取功名于涕唾之间，此亦何足讳且耻。而公固深不满之，亦由其性固然。汉世祖所谓狂奴故态也。"（卷一）从历史事实和文意本身来说明"脱身"二句的含义是脱离做参军和薄尉等小官，从而免受长官责打。唐元竑的辩说至今仍有价值，仍有不少学者至今抱守旧注谬说。

唐元竑对前人改杜诗也有批评和是正。宋、明一些人喜欢按自己的想法篡改原作的字句，这是不良的风气。它侵犯了原作者的著作权，使原作失真。其甚者更使原作造成不可解读。杜诗的遭遇也是如此。唐元竑说："'风吹沧江树，雨洒石壁来。''树'

字是‘去’字之误。晦翁创造之，可谓少陵功臣，至‘朝廷烧栈北，鼓角满天东’，初无误字，倘因蜀有漏天之说，遂改‘满’为‘漏’，则‘烧栈’字对‘漏天’亦须为之说始得，岂可使杜句偏枯至此耶？今集中因晦翁语竟改‘满’为‘漏’。又‘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须溪谓‘失’字好，盖据‘云归拥树’例耳。不知在彼则字工，在此则意晦矣。今集中亦竟为‘失’字。其余妄改未能悉数。昔山谷欲改东坡‘白头’字为‘日头’张文潜以告，坡曰：黄九欲改作‘日’字，我亦无奈他何。吾欲援此语为公叫屈。至如‘新炊间黄粱’改‘闻黄粱’，‘行蚁上枯梨’改‘倒蚁’，‘娟娟细蝶过闲幔’改‘开幔’，‘把君诗过目’改‘过日’，‘因知贫病人须弃，能使韦郎迹也疏’，一小说改上句云‘不知贫病关何事’。改尽如此，九原有知，当亦齇然。”（卷二）朱熹所说系理校，而其余例证皆系妄改。这些批评虽然严厉，但完全是正确的。唐元竑对杜诗也有所批评。如《少年行》批评杜诗意与题不合。他说：“少年行‘老瓦盆’一首，意亦佳，然与题不合，几于失旨，吾无取于此。”（卷二）批评“流落剑三千”辞不达意。他说：“《寄贾严二阁老》诗：‘苍茫城七十，流落剑三千。’梦弼注：剑阁三千余里。是也。洙注引《庄子》‘剑士三千’，非是。但‘剑南’、‘剑北’、‘剑外’字单用皆可，‘剑三千’不可。”（卷一）所批评甚是。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元竑研究杜诗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得他不被历来注杜和说杜者的牵强附会所蒙蔽，努力体会杜诗的真意，求得杜诗的真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元竑所论，虽未必全得杜意，而刊除附会，涵泳性情，颇能会于意言之外。”（《杜诗捃提要》）这个评论是大致符合实际的。

宋明时评论杜甫的作品，一般只评诗，不评文。唐元竑评诗也评文。评文，是对杜甫研究领域的重要拓展。唐元竑论杜文像

论杜诗一样，也往往由对作品的论述而进到对杜甫的论述。论《天狗赋》等，进而认为杜甫性刚负气，颇似陶渊明。他说："公所进《天狗赋》《雕赋》在《三大礼赋》之先，皆引以自况。使其见用，风概可想。昔靖节自谓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公仿佛似之。晦翁云：隐士大多负性气，当知儒门自曾子以下，无论隐显，必有一副劲骨。不如是，如何表见千万世耶。独自颜子，其劲骨无从而见之，故仲尼称其好学。比其死也，曰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于时。曾子现在《大学》传。曾子，仲尼尚未许其能好也。《易·乾》曰：自强不息。《坤》曰：厚德载物。刚盖用以自克，岂用克人哉，则圣门所谓学可知矣。"（卷四）进而论述儒者的刚，是用以自励，是自强不息，是好学。这也是对杜甫的刚的诠释。唐元竑还通过分析杜甫的《东西两川说》认为杜甫有经世之才、良吏之才。他说："《东西两川说》欲分诸羌部落，各自统领，不使羌王得专其命。此论最妙。汉晁贾之策亲王也，尚曰众建诸侯而小其国，况蛮夷乎！至于蛮夷畏汉法治之，诚宜宽大，勿轻扰之。赋敛宜薄，非宽富人，宽富人乃以宽贫人也。观其处分，井井谭兵羌，利弊亦甚悉，岂得谓非良吏才乎。昔人谓右军具经世略，惜为书法所掩。唯公亦然。今人但知其能诗耳。"（卷四）历来人们都沿袭新唐书的说法，认为杜甫喜谈论时事，高而不切。唐元竑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我们认为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从杜甫的《东西两川说》看，他对时局的认识是清楚的，提出的对策是有力的，具有可操作性，说明杜甫并非不谙政治的夸夸其谈者，而是有政治才能的。唐元竑还通过《皇甫淑妃神道碑》的研究，探讨了唐代的妃子制度和杨贵妃专宠以前宫中后妃的情况。他说："《皇甫淑妃神道碑》题称'唐故淑仪赠淑妃皇甫氏'。按，唐因隋制，皇后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为夫人，正一品。开元中，玄宗以一后四妃，本法帝喾，而后妃

四星，一为正后。今既立正后，复有四妃，非法。乃于皇后下立惠妃、丽妃、华妃三位以代三夫人，为正一品下。此即不称妃，此武惠妃所以礼秩一同皇后也。今妃卒于开元二十三年，惠妃尚在，应用三妃之号，而制曰‘宜登四妃之列，式旌六行之美，可册赠淑妃’。其后太真亦仍称贵妃，盖复依旧制矣。据碑文，妃薨时年已四十二，而文中云‘上以服事最旧，佳人难得，送药必经于御手，见寝始回于天步’，亦可谓宠幸不衰者。考其时，武惠妃正承恩宠。年亦四十，又未已亦卒，而太真始进，遂至专宠。其后六宫无复进御，即江妃不得分宫中一席地矣。然则妃死于二十三年，亦不幸之幸乎。”（卷四）考证精详，有裨于史学。

综上所述，《杜诗攟》对杜甫和杜甫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进而还对相关的唐代社会、政治、军事、文学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多有开拓与创新。

《杜诗攟》也有明显的缺陷。首先是见解与判断有明显的错误。杜诗“白鸥没浩荡”本是正确的，而认为不符合句法，反赞成“白鸥波浩荡”。他说：“‘白鸥没浩荡’宋敏求定作‘波’字，极是。东坡说非也。毋论鸥不解没，但‘没浩荡’无此句法。”（卷一）“没”即消失之意，为动词，用“没”字正构成一标准的主谓宾句子。而“波”用在句中，没有谓语，则句不成句矣。苏轼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其次，在论说中大谈命运，宣扬迷信。他说：“《赠郑广文醉时歌》，精妙不必言，事后追考之，颇似一篇挽诗。与其生平历履，句句贴合。公无前知术，何由得此。昔人画龙点睛则飞去，画女子刺心即痛。伎艺到绝处，岂有神灵凭其笔端耶？诗有谶若此，毋怪今人动多忌讳，见贫病老死字，弃去不肯竟读也。然郑之饿死命也，不因公此诗。其千古犹有生色，则实以此诗故，殆难为俗人言。”（卷一）唐元竑生在一个迷信气氛很浓的时代，自己又不得志，故特别信命运，也喜欢从命

运的角度论杜诗，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已非常荒唐，故也就成为他论杜诗的重要瑕疵。第三，版本不好，多受误导，多发谬论。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唐元竑所读殆为黄鹤补注本千家集注杜工部诗版本，本为坊刻，错误较多，一不留神，便跟着误本犯错误。《赠田九判官梁亡》“宛马总肥春苜蓿，将军只数汉嫖姚”，认为“春苜蓿”不对“汉嫖姚”，实际上是刻本误刻“秦”为“春”。而论文中所引的苏轼议论，其实并非苏轼议论，而是注中的伪东坡《杜诗故实》。如本文前所引，即可作为例证。伪《杜诗故事》本来低劣，引入文中，无论赞成、反对其观点，都降低了自己论文的质量。不过这些瑕疵是次要的，无法掩盖其论文的重要价值与光辉。

六 王嗣奭

一

王嗣奭（1566—1648），字右仲，一字于越，别署偁翁，观贞居士。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世居甲邨。少有异才，擅文名。万历中乡举，赴吏部谒选，署浙江黄岩教谕。为浙江宣平教谕，任江南宿迁知县。降为福建建州经历，崇祯时补永福知县。任四川涪州事，与上官有矛盾，被劾罢官。清军南下，拒不薙发，为民，年八十三卒。

王嗣奭年幼即好诗。他自己说：“因忆先子永福公好讽古人佳诗，花前月下，小酌半醺，辄曼声歌之以自娱。奭幼戏膝前，为之踊跃，歌罢又为讲解，故奭未成童谙音律，私学为诗。”

(《杜臆原始》) 王嗣奭研究杜诗是在中年和晚年。四十三岁居父丧，开始潜心研究杜诗。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一) 他说："居先子忧，始遍阅古人诗。阅及老杜，觉有心会，随覆阅之，光景又别。愈阅愈深愈远，若探渊海，汹然不得其涯，靓然不测其底也。然于诗之为道，似觉憬然自信，而泓然入有余地。"(同上)(二) 在宣平时，读杜拟选杜并笺语，未完成。"至己未，吏隐宣平，复阅杜集，妄欲精选一帙，附以笺语，业撰弁言，而竟不能就。"(同上)(三) 在涪州时笺杜诗。"乙亥承乏涪牧，以公事与上官左，绁议戴盆。偶得杜集以遣日，间用笺语，忆旧笺茫如矣，而暗合尚多。"(同上)(四) 罢官后研究杜诗，完成《杜臆》。所著《管天笔记外编》中，也有很多论杜的精辟见解，与《杜臆》相发明。他说："归而友人杨南仲究心杜诗，方著《水中盐》，又索观余笺本，而窜改混淆，欲手录畀之，而多所未安，且寥寥不成书也。偶有触发，遂逐章作解。易解者解之，不易解者姑置之。解及之章，十可七八，引申触长，往往得未曾有。盖精之所注，行住坐卧，无非是物，夜搜枯肠作真人想，朝拈枯管作蝇头书，八十老人不知倦也。草成而名之曰臆。"(《杜臆原始》)《杜臆》的具体写作时间是甲申 (1644) 九月望日，乙酉正月初度，撰写过半。端二日竣事。冬日，撰《管天笔记外编》。丙戌 (1646) 重九次日，覆阅《管天笔记外编》。仲秋又阅《杜臆》有所改补。季冬又阅过。王嗣奭的《杜臆》和《管天笔记外编》(有关论杜诗部分) 虽成书较快，但成书在其晚年，是他一生研究杜诗心血的结晶。其写作准备，从最早作杜诗研究札记算起，有近四十年。有的心得则是他一生思索的结果。他在《新安吏》中说："余年二十而读此诗，年八十而于枕上得此解 (解指："据注，谓郭子仪时已进中书令，而称其旧官，盖功著于仆射时，且御士卒宽，郭仆射熟于人口，就其易晓者言之，俾无所惧而勇

往收功，报效朝廷，非指宽慰士卒而已。"），为之一快。"（《杜臆》卷三）《杜臆》是他学术研究最辉煌的成果，也是他人生的寄托所在。晚年，甘做遗民，效伯夷叔齐，说："吾以此（《杜臆》）为薇，不畏饿也。"足见《杜臆》是他生活的精神支柱和精神食粮。

二

王嗣奭研究杜甫和杜诗，以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的文学思想为其基本的指导思想。

他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杜臆》，就是明确表示自己运用儒家以意逆志的文学评论和研究方法。他说："草成而命名曰臆。臆者，意也。'以意逆志'，孟子读诗法也。诵其诗，论其世，而逆以意，向来积疑，多所披豁，前人谬迷，多所驳正，恨不起少陵于九京而问之。"（《杜臆原始》）注重研究杜诗的思想，研究杜诗所表现的社会，从而对杜诗作出恰如其分的评论，这个研究方法基本是正确的。他评论诗的内容的基本标准就是儒家的思无邪和忠君爱国思想。他说："今之诗人满天下，识其诗诀者少。诀恶乎在？夫子所云'一言以蔽之'者，正授人以诗诀，而人不知也。苟思无邪，则子为真孝，臣为真忠，喜怒哀乐必无妄发。而发之于诗，理趣盎溢，即眼前山光水色，鸟韵花香，皆为理趣之助，而愈玩愈佳，故老杜诗极多忠君爱国语，而人不厌，发自真心也。后人无其真心，而仿效其语，人遂厌之，而近有好新异者，以谈及君国为戒，犹之惩噎废食，可笑也。"（《管天笔记外编》）所谈是作诗的方法，也正是他始终坚持的评诗的标准。因此，"思无邪"是王嗣奭评论杜诗的最高准则，而在具体评论中常用儒家的"温柔敦厚"作为衡量的尺度。他在《萤火》中说："《麂》诗似作于放逐之时，'衣冠''盗贼'语犹似微有芥蒂，此

诗作于飘零之后，心平气和绝无尤怨，温柔敦厚之意自在。前后数作皆然。余以此公为闻道，非谀也。”（《杜臆》卷三）他对杜诗的温柔敦厚极为称赏，有时对杜诗有违温柔敦厚也有指责。他在《玉华宫》中说：“赵云：‘……太宗创业之主，劳人费财，废时逸豫，故诗人讳之曰不知何王殿也。’其言凿凿有据。然‘不知何王’，似非忠厚语，说到‘美人黄土’‘故物石马’，俱非臣子所忍言，此犹不决之疑也。”（《杜臆》卷二）批评杜诗违背温柔敦厚，也不留情面。王嗣奭是儒家思想的卫道士，他始终坚持用儒家的正统思想来评论杜甫和杜诗。

王嗣奭对杜甫和杜诗的研究是多方面的。

首先，王嗣奭对杜诗的思想内容有创造新的深入而细致的研究。

王嗣奭生活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信奉儒家思想，和杜甫的经历与思想有相似之处。他研究和揣摩杜诗的思想内容，往往很细很深，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创见。

从宏观来看，王嗣奭对杜诗思想内容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方面：

（一）研究杜诗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研究杜诗对现实社会的反映。其一，杜诗非常及时、真实、深刻地表现社会生活，特别是当时的政治局势。其二，坦诚表现了杜甫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和看法。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洗兵马》云：“至德二载九月十日，复两京。次年，改元乾元。十月，郭子仪渡河拔卫州。此唐时所称山东地，而极于海岱皆是也。卫州拔而安庆绪走邺，入城固守，然有破竹之势矣，故云‘收山东’，下云‘收海岱’，实过情语也。此时明皇还京几一年矣，而‘犹思仙仗过崆峒’，岂痛定思痛意耶？复京师后帝宴回纥叶护于宜政殿，而云‘馁肉葡萄宫’，盖为朝廷讳，故用汉元帝待单于事，而且以禽兽畜之，此

老杜春秋笔也。禄山反经三年矣，避乱离乡者亦三年，故云‘三年笛里关山月’，悲之也。‘万国兵前’，如风卷叶，暗用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事，喜之也。帝还京在去年十月，而云‘青春’‘冠冕入’‘紫禁’‘烟花绕’，言京城复见繁华，非必其时。抑公为华州掾，尝以事至东都，或以春时还京师，咏所见者耶？上皇初还，帝备法驾迎之，释黄袍趋拜，欲仍为太子。此时事往矣，而犹曰‘鹤驾通宵’‘问寝龙楼’，必谓既复位后尽人子之礼，与太子时无异也。‘天下尽化为王侯’，微有风刺。当时封爵太滥，甚至以官赏功，给空名告身，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公实痛之。故先言‘攀龙附凤’，明谓其凭藉宠灵，而又以‘蒙帝力’申言之，所谓‘君之制也，君何力之有焉’。此公识大体处，非事外语也。人臣明此义，虽功盖天下而不骄矣。公极称张镐，有‘扶颠’‘筹策’语，而人疑之。余考史，至德二载四月，罢房琯而相镐。至次年二月，因论史思明凶险不可假威权，又论许叔冀多诈，临难必变。上不喜，且不事中要，故罢相。已而思明果反，而叔冀果降思明，其料事之审如此，至收复两京，俱在相镐之日，即宰相之功也。蔡宽夫谓收复两京时不闻别有奇功，非‘见与儿童邻’耶？史思明、安庆绪尚在，故云‘青丝白马复何有’，谓无能为耳。……‘健儿归莫懒’，速其成功也。思妇愁梦，从《东山》诗‘妇叹于室’脱来，盖以思家之至情动之，欲其乘破竹之势也。云‘独任朔方无限功’，又云‘郭相谋深古来少’，当时收山东者，诸将也，而公独注意于郭，见公识高虑远。使肃宗果能‘独任朔方’，而不间于阉竖，则太宗之业可复完矣。即此一语，系唐室安危，可以诗人目之哉？”（《杜臆》卷三）王嗣奭用丰富的史料，印证和分析了杜诗所描写的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分析了杜甫对当时宰相张镐和郭子仪的评价，肯定了其提出的独任朔方郭子仪以平定战乱，实现天下安定的政治观点。王

嗣奭的分析使我们对杜诗所表现的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和深刻的政治主张有了深入的了解，对杜诗博大精深的内涵有了深入的认识。王嗣奭对《登楼》也有精辟的分析。他说：“此诗妙在突然而起，情理反常，令人错愕，而伤心之故，至末始尽发之，而竟不使人知，此作诗者之苦心也。万方多难，固可伤心，意犹未露，不过揭出‘登临’二字耳。首联写登临所见，意极愤懑，词却宽泛，此亦急来缓受，文法固应如是。言锦江春色与天地俱来，而玉垒浮云与古今俱变，俯仰宏阔，气笼宇宙，可称奇杰。而佳不在是，止借作过脉起下。云‘北极朝廷’如锦江水源远流长，终不为改，而‘西山之盗’如玉垒之云，倏起倏灭，莫来相侵。曰‘终不改’，亦幸而不改也。曰‘莫相侵’，亦难保其不相侵也。‘终’‘莫’二字，有微意在。按《名胜志》：玉垒山在灌县西，众峰丛拥，远望无形，唯云相关也。又按史，广德元年十月，吐蕃陷长安，代宗幸陕，郭子仪击之遁去。十二月，帝还长安，吐蕃以是月复陷松、维、保三州及二城，而剑南西山诸州，亦入吐蕃矣。公诗盖作于此时。而‘北极’一联，盖实录也。至结语忽入后主，必非无为，而未有能知之者。盖后主初年，亦无他过，而后来一用黄皓，遂至亡蜀。肃、代之任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正与后主之任皓无异，虽有贤臣如李泌、子仪辈，而不得展其略，盖幸而不亡耳。公因万方多难，深思其故，不胜愤懑，无从发泄而借后主以泄之。公屡游先主庙，后主从祀，亦素怀不平，故有感而发。且云日已暮矣，天下事无可为矣。‘聊为梁父吟’，为当时有孔明之才而不得施者一致慨焉，此其所为伤心者也。伤心之极，故高楼之花最堪娱目，而反以为恨也。余游先主庙，配享者只北地王与孔明、关、张、而无后主，岂后人因公诗而撤去耶？钟、谭收此诗入《诗归》是矣，其评犹然说梦，公诗岂易读哉！”“尾句用《梁父吟》，盖伤其时无诸葛也，

若有诸葛，则后主虽庸，而黄皓自不敢肆。如此看，较前笺似胜。"（《杜臆》卷六）王嗣奭结合当时的政治和边境形势，阐发了杜甫对国家似北极而不改的信念，对朝廷不能用贤、小人当道的忧虑。分析非常透辟，很有说服力。

（二）研究杜甫所写的"性情"，即杜诗所表达的思想与感情。王嗣奭认为杜诗是千百年来最善于表现自我的诗，是"以我为诗"（《杜诗笺选旧序》）的诗。因此，他认为"史诗"的说法不能完全概括杜诗的特点。事实上，杜诗虽然对社会现实有广泛、准确、生动的表现，但它并非叙事诗，而是抒情诗。它主要是表现杜甫的思想感情的，表现自己的生活理念、人生体验和政治见解。王嗣奭用儒家观念对杜诗进行了观照，认为杜甫深明儒家之道，具有儒者博大的思想感情与襟怀。他说："余谓古来诗人无如少陵，余旧序似得其概，而因诗悟道，则近始得之，要亦穷所炼也。"（《杜臆原始》）王嗣奭对杜诗所表现的浓厚的儒家思想颇多阐扬。认为杜甫写鱼的诗表现了仁。《白小》云："起来二句，仁心蔼然，真有万物一体之思。物虽细微，同为水族，乃俗当园蔬用之，贱也。乱肆、倾箱，取之多也。虽他鱼亦以充腹，而此鱼尤为可闵也。按张平子《西京赋》云：'上无遗飞，下无遗走，攫胎拾卵，蚳蝝尽取。'公乃节取四字，谓此群分之命，亦属造物生成，今犹'拾卵'而'尽取'之，是何义耶?"（《杜臆》卷八）《又观打鱼》云："然作诗本意，全在干戈兵革上起，盈城盈野，见者伤心，而不知暴殄天物，其痛一也。故至诚尽人之性，即能尽物之性，一视同仁，初无二理。"（《杜臆》卷五）深刻阐释了杜甫仁者爱人和爱万物的胸怀。王嗣奭认为杜甫的诗大量表现了杜甫热爱人民、忠君爱国的思想感情。他最具创造性的研究是，杜甫有伟大的政治抱负、惊人的政治见解和杰出的安邦治国才能，这些都表现在他诗文中，表现在他对时局和人物的

分析与议论中。这正是杜诗热爱人民、忠君爱国思想最充分的表现，也是杜诗最有魅力的地方。他说：“杜少陵自许稷契，人未必信。今读其诗，当奔走流离，衣食且不给，而于国家理乱安危之故，用人行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军机之胜负，地势之险要，夷虏之向背，无不见于诗。陈之详确，出之恳挚，非平时留心事务，何以有此？杜之诗往往与国史相表里，故人以诗史称之，然岂足以尽少陵哉！”（《管天笔记外编》）他论《北征》说：“余谓诗中作爱君忧国语，谁不能之。观下文所以为君国虑者，如言回纥云：‘其王愿助顺，其俗喜驰突。’二语曲尽夷情，所以却之难，而禁之不易。而‘少为贵’三字，深得处置之宜。又‘官军请深入，蓄锐伺俱发’，见不可全恃夷兵，但借为先驱耳。语语经济中款，此必平日所熟筹于心者，始知怵惕未出，恐君遗失，非口头语也。自比稷契，岂欺我哉。”“公深以借回纥兵为非计，故云‘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后回纥果为唐患。至于收复河洛，则欲长驱幽蓟，故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当时郭子仪、李泌诸臣，亦欲乘河阳之胜，捣贼巢穴，然后还京，惜肃宗不能从，而河北迄不为唐有，以至于亡。观此二事，杜公经纶概见。其云‘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盖谓此。”（《杜臆》卷二）王嗣奭认为杜甫有卓越的政治眼光，非常善于评估政治风云人物。他对郭子仪、李光弼、李泌的评论，就是绝好的证明。王嗣奭对流行的杜甫好论天下事高而不切的说法进行了批驳，认为杜甫确实有稷契之能。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杜甫的一些咏物诗，也是写其政治理想和政治见解的。他说：“子美善咏马，亦善咏鹰，皆借以写其用世之志与经世之略。《鹰诗》云：‘一世自猎知无敌，百战争能耻下鞲。’具见英雄本色，当时如郭如李，若假之权，而不掣其肘，何忧乎安史，而亦无藩镇之横矣。”（《管天笔记外编》）像这样的评论都体会深微，颇有发明。

王嗣奭对杜甫的缺点也有仔细的分析。《催宗文树鸡栅》云："此诗处分极细，不免迂腐。盖成大事者不宜小察，而钟、谭一味称之，可笑。公因病故养鸡，因养鸡故生出许多琐碎来。既欲养鸡，安得复顾蝼蚁，养鸡多，安免斗争？而欲分别长幼，此皆可笑。即公亦知其不可为常，故云'倚赖穷岁晏，拨烦去冰释'。'其流则凡鸟，其气心匪石'，有万物一体之思。"（《杜臆》卷七）生活中的杜甫确实有点迂腐，批评完全是从诗表现的思想出发，符合实际。总之，王嗣奭多角度地、全面地、细致入微地剖析了杜诗展现的思想品格、政治抱负和济世之才，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并认识了杜甫其人，创获很多。

王嗣奭封建正统思想浓厚，又是用以意逆志和比兴说诗的方法来研究，故解说杜诗也有明显的错误。他说："老杜咏物皆诗之比，与他人就物赋物者不同。"（《杜臆》卷三《归燕》）"公凡单咏一物，必有所比。"杜甫的咏物诗虽皆有言外之意，但不一定具体有所比拟。在具体解诗时，也有很多穿凿之处。《曲江》云："翡翠不屋栖而巢于小堂，比小人之处非其据，石麒麟乃天上之物，而卧于高冢，比正人在位而志不得展。总谓人主昵宵小而疏远正士。'蛱蝶''蜻蜓'俱比小人，而'深深见''款款飞'，则君心受其蛊惑，而病已中于膏肓矣。"（《杜臆》卷二）"江上"二句，如果说是写景寓人世沧桑之感的话，"穿花"二句则近乎纯粹写景。王嗣奭用人主和正人、小人的关系加以解说，牵强附会，完全违背了杜诗的本意。《春夜喜雨》云："三四用意灵幻，昔人以此为相业，有味其言之矣。"（《杜臆》卷四）把写雨的诗硬用相业来解，实在太穿凿了。

王嗣奭非常重视对杜诗艺术的研究。他论诗重视情境的完美，善于从与内容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艺术，既从宏观着眼，又从微观着手，因而他对杜诗的研究新见迭出，巨细皆妙。

他评论杜诗的艺术风格和成就说："当其搦管，境到、情到、兴到、力到，而由后读之，境真、情真、神骨真而皮毛亦真，至于境逢险绝，情触缤纷，纬缅相纠，榛楚结塞，他人掘指告却，少陵盘礴解衣，凡人所不能道、不敢道、不经道、甚而不屑道者，矢口而出之，而必不道人所常道，故其绝尘而奔者以是，舞交逐曲者以是，间有堕坑落堑者亦以是。得之则全瑜，偶失之则任其全瑕。瑕瑜不掩者，固不乏玉之采，即瑕掩其玉者，犹不失玉之瑕。诗之有少陵，犹圣之有夫子，可谓金声玉振，集其大成者矣。"（《杜诗笺选旧序》）又说："若以世俗之矩矱语诗，则少陵亦有在绳尺之外者。然钩深撷奇，穷变极化，刻画幽眇，攫拏龙螭，如入武库，五兵纵横，可探海屋，万宝璀璨，固辞擅百代之雄也。盖祖汉魏，轶六朝，包四唐，孕宋元，无不入其范围，所以谓之大家。"（《管天笔记外编》）他认为杜诗是杜甫经历、才力、学识的充分体现，是杜甫艺术创造力与传统诗歌艺术的完美结合。在分析具体诗篇的艺术时，往往从与内容结合的艺术表现视角，阐发一点或几点。《晚出左掖》谈杜诗的气象："老杜诗妙在气象，此于退食时写出委蛇气象。"《月夜》分析了杜甫构思独特，表现曲折。他说："意本思家，而偏想家人之思我，已进一层。至念及儿女之不能思，又进一层。须溪云'愈缓愈悲'是也。'云鬟''玉臂'语丽而情更悲。至于'双照'可以自慰矣，而仍带泪痕说，与泊船悲喜，惊定拭泪同，皆至情也。孟子言穷民无告，盖人处苦难，若有亲人讲话，犹可过日，若寡妇无夫，苦向谁说？今闺中看月者，儿女尚小，虽与言父在长安，全然不解，有夫而与无夫同，其苦可胜道耶？月本伤神，而偏说到'香雾''清辉'，'香雾'与'云鬟'相宜，而无奈其'湿'也，'清辉'与'玉臂'相映，而不胜其'寒'也。以看之久也，月似可快而实苦也。至他日相会，并倚虚幌，香雾、清辉，不减于今，

然追思今日苦，亦必先堕泪而后干，虽乐而不能忘其苦也。然不厌于久看矣。意亦两层，描写情事曲尽。”（《杜臆》卷三）《新婚别》分析了杜诗的语言艺术和民歌表现手法：“起四句是真乐府，是三百篇兴起法，‘暮婚晨告别’是诗柄。一篇都是妇人语，而公揣摩以发之。有极细心语，如‘妾身未分明’二句，‘妇人在军中’二句是也。有极大纲常语，如‘勿为新婚念’二句，‘罗襦不复施’二句是也。真无愧于《三百篇》者。……‘洗红妆’加‘对君’二字，精妙。”（《杜臆》卷三）这些评论都是真知灼见，非常精彩。

王嗣奭对杜诗也有一些很好的注释和考证。如注事典：《覆舟二首》注“姹女凌波日”云：“‘姹女凌波日’，按唐诗：‘谢氏海边逢姹女’。注曰：‘谢端于南海上得大螺，中有美女，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天矜卿贫，令我为卿妻。’公之姹女本此。而兼用《洛神赋》‘凌波’语，总谓水神耳。”（《杜臆》卷八）《即事》注“三寸柑”云：“宋文帝时，义康专朝权，四方馈遗，以上品荐义康，以次品供御。上尝啖柑，叹形味并劣，义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还东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三寸柑当本此，然亦供御之物也。”（《杜臆》卷九）所注都颇有新意。注语典认为《海棕行》“移栽北辰不可得”是受“天上种白榆”诗的启发。《海棕行》云：“‘焉知身出群’奇，‘移栽北辰’更奇，此从‘天上种白榆’脱来。”（《杜臆》卷五）认为《即事》的“断肠秦川”用陇山俗歌。《即事》云：“《三秦纪》：陇山俗歌云：‘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断肠秦川’正用此语。”（《杜臆》卷九）其说皆能发前人所未发。王嗣奭也有一些考证。《水宿遣兴奉呈群公》认为“童稚频书札”是因杜甫右臂不能书字，而让儿子代书。他说：“‘童稚频书札’，谓儿子代书，公右臂偏枯，有诗。”（《杜臆》卷九）以杜诗考杜甫，有

助于我们对杜甫情况的了解。《园人送瓜》和《热三首》考证“水玉”就是“瓜”，认为前人认为“水玉”是水晶的说法是错误的。《园人送瓜》云：“瓜有水能解炎热，故以水玉称之，此瓜之别号也。”（《杜臆》卷七）《热三首》云：“‘寒水玉’注云：‘水精’，恐是臆解。公《园人送瓜》诗：‘沉浮乱水玉。’谓瓜也。以对‘秋菰’，岂不稳称。”（《杜臆》卷七）王嗣奭的注解和考证也有一些明显的错误。《哀江头》认为“一箭正坠双飞翼”是射箭鸟坠而引百千人发笑，而非杨贵妃笑。他说：“‘一箭’，山谷定为‘一笑’，甚妙。曰中翼，则箭不必言，而鸟下云中，凡同在者虽百千人，无不哑然发笑，此宴游乐事，而注者乃以‘一笑’属妃，而又引贾大夫射雉事为证，其堪绝倒。”这是明显的曲解。《夜宴左氏庄》认为“衣”为琴衣，他说：“‘衣’，琴衣也，衣已沾露，净琴犹张，见主人高兴。琴未弢衣，故用‘净’字，新而妙。”（《杜臆》卷一）实为误解。其实，“衣露”就是弹琴时衣沾露水。仇兆鳌注：“《说苑》：‘孺子操琴于后园，露沾其衣。’”王嗣奭有意求新，反而不得真解。

王嗣奭对杜甫的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因为未刻印流行，影响不大。后引起仇兆鳌的高度重视。仇兆鳌对《杜臆》的研究评价非常高，认为它的研究是最有创见的。他说：“宋元以来，注家不下数百，如《分类千家注》所列姓氏尚百有五十人，其载入注中者，亦只十数家耳。”“各有所长，其最有发明者，莫如王嗣奭之《杜臆》。”（《杜诗详注凡例》）《杜诗详注》采《杜臆》的成果甚多。自此，《杜臆》对杜诗的研究影响甚大。在清中期以后至现代，《杜臆》都为杜甫研究者高度重视。

七 胡震亨

一

胡震亨（1569—1645），字君𢛷，后改字孝辕，号赤城山人，晚号遁叟。浙江海盐（今浙江海盐）人。万历时举人，选授固城县教谕，升合肥县知县，有治绩。崇祯十年为定州知州，为兵部职方员外郎。辞官归故里，以读书著述为事。贯穿经史百家，著述颇为丰富。有《靖康盗鉴录》《读书杂录》《秘册汇函》《续文选》《海盐县图经》《通考纂》及《赤城山人稿》。最有影响的著作为《唐音通签》计一〇三三卷，清代官修《全唐诗》取材于此书甚多。

胡震亨的杜甫研究著作主要为《杜诗通》，是一部很有功力和见地的著作。

二

胡震亨博涉多通，识见卓越。他作《杜诗通》并非为一般读者提供一部详细完善的杜诗读本，而是要为世人提供一部有独到见解、资料丰富的学术著作。

从体例上说，《杜诗通》主要由年谱、编排、注释、评论这些部分构成，它的学术特点也充分体现在这些部分上。

其所编杜甫年谱较为简明、平实。所作年谱是在元代高楚芳所编杜工部诗集的年谱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较宋人的生平系年成果又有提高，也较高楚芳所编详细。对前人的错误有所辨证。但

云“故余谱杜，一以正史及墓志为据”（《杜诗通自叙》），过分相信正史，不知正史中也采有不少小说家言，故而造成错误。如《年谱·大历五年庚戌》：“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完全是小说家的说法，与事实不符，降低了年谱的质量。但这种错误较少。总体说来，其系年是比较可靠的。

（一）在编排上，《杜诗通》是先分体编排，在分类中又分类，在分类中又大致编年（或按杜甫活动地域编排）。可以说是分体、分类和编年三者的结合。全书为四十卷：五言古诗十二卷，七言古诗六卷，五言律诗十一卷，五言排律五卷，七言律诗（附七言排律）四卷，五言绝句与七言绝句（附联句、逸句）二卷。分体、分类、编年是古代编集子的三种主要方法，各有优点，各有不足。一般认为集子编年是编排的最佳方式。但问题是一般作品难以准确系年，故按年编排难度极大。胡震亨也非常重视编年的编排方法，故他煞费苦心地将分体、分类、编年三者结合。尽管他的编排也利用了前人的成果，而他制定这种体例和具体编排都是很下功夫的。胡震亨云：“读杜不可不稍知其岁月，然亦何至每首必定以所作之年，强为穿凿，而于体例多紊乎？今仍依古体分类为编，一体之中各以体类为次。一类之中，除长安、秦州、蜀中、夔府、湖南确然可见者为次外，其余无可定者。以题类相附。一切牵强之说，概从芟去。”（《杜诗通自叙》）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关于编集的基本指导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按年编集的理论非常科学，编辑处理也非常有智慧，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如“发秦州”（卷四）用文字说明所编诗的基本情况，并集前人的评论，进行总的说明：“以下二十四首，自秦州如同谷，至成都纪行之作。东坡云：老杜自秦州赴成都，所历辄作一诗，数千里山川，在人目中。朱晦庵云：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旷逸不可当。如自秦州入蜀，诸事分明如画，乃其正壮

盛时所作也。”诗的编排是大致合理的，说明与评论也都有利于读者的阅读与理解。

（二）其注释采用集注的方式，也有很多自己的注，充分表现出胡震亨的学术造诣。集注采集材料广泛。以宋人著述为主，唐人和明人的著作皆在采集之列。以杜甫的注解著作为主，笔记、诗话、批点、总集、地志、金石，凡有关杜甫的重要材料与观点，皆尽量网罗，估计达百种以上。《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卷一〇）用《东观余论》说注“顾八分文学”云：“《东观余论》定以为顾戒奢。戒奢与韩择木、蔡有邻同在开元中供职。赵明诚《金石录》，戒奢官太子文学、翰林待诏。”可备一说。《水会渡》（卷四）注“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引方采山说，云：“方采山云：‘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余入蜀乃信其语之工。盖叠嶂相连，间有人家，每日寓宿，必有定所。纵雨雪疲极，不能中途而止也。故蜀道之难，而计程不爽。”此有助于我们对两句杜诗的理解。《白小》（卷二九）引《宾退录》说注“风俗当园蔬”，云：“《宾退录》云：《靖州图经》载其俗：居丧不食酒肉盐酪，而以鱼为蔬。今湖北多然，谓之‘鱼菜’，不特靖也，杜句正指此。”完全可以印证杜诗的诗意。胡震亨在有关杜诗专著之外广泛采集材料，用作集注资料，使其注更准确，更精彩。

取博用约，注极精炼。注释不追求繁富详赡，而追求精湛。只注作者认为最需要注释的地方。所注主要为难解典故，疑难字，重要的人名、地名、事件，关于杜诗文意需要特别说明的地方和有新意的注与解。胡震亨总是力图注释前人没有注释到的地方，有所发明。对前人的错误，进行辨证，力求使注释符合杜诗原意。他的注释虽用集注体，以集注为主，而自己发表意见和注释的也不少，一般用“遁叟云”标出。“旧注繁芜，百存一二。其意旨未经前人发明者，略抒肤见，以资商榷。”（《杜诗通》自

序）《别赞上人》（卷一〇）注“豆子熟”云：“豆子熟即是豆熟，北人方言。五谷皆有‘子’字，至今犹然。旧注引伪苏注，以为眼珠，大误。后学或以豆子雨为禅语，亦无所出，非是。”所注甚确，批旧注之讹甚是。《哀王孙》（卷一三）注云：“遁叟云：延秋门，京城西门，《三国·典略》：侯景克建业，重修朱雀、宣扬等门，人心不忘梁。童谣曰：白头乌，拂朱雀，还兴吴。禄山之乱，实与景同。引之虽谓玄宗此门西幸，亦望其复兴如梁时谣也。”注释使此一般的注更加深了一层，把读者的理解也引向深入。《白马》（卷一）驳黄鹤的刘洽杀刺史之说云：“鹤曰：大历三年二月，商州兵马使刘洽杀其刺史殷仲卿，此诗殆为此事作。然是时，公方漂泊楚蜀，何由见商于之乱?”以杜甫的经历批驳黄鹤之说，非常有力。《遣兴五首》（卷二）其三辨“萧京兆”非萧至忠或房琯云：“旧注引《东坡志林》，以为萧至忠。至忠非京兆人，亦未尝为京兆尹，不应称京兆。或以为此是咏房琯，以萧望之为比。望之京兆人，以见废不得为相，左迁太子少傅。琯罢相，亦拜太子少师也，然于旧尹不可通，当再考之。”以二人生平证明，其为京兆说不能成立。《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郎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卷三三）旧注以为沈东美为沈既济之子，胡震亨考为沈佺期之子，云：“按，东美乃沈佺期之子，史虽不载，《太平御览》‘孤怪’中有一则及之为可据。甫祖膳部审言与佺期同值修文，故此东美为诸父，称为通家，‘诗律群公问’，以律体始佺期也。佺期二弟并有文名，同载国史，故云‘儒门旧长史’。旧注以东美为沈既济子，多牵合不通，特拈出。”考证甚有根据，驳旧注之非，合情合理。《郑典设自施州归》（卷八）和《寄裴施州》（卷一七）考裴施州非裴冕，前诗注云：“裴施州，旧注以为裴冕，附李辅国贬施州，按冕为成都尹，杜尝受恩，何诗中略不之及，当另一人耳。”后诗注云：“裴施州之非裴冕，注

见五言古郑典施自施州归下，此诗虽有‘三岁为客’之句，然冕为成都尹，只与公相与一载，亦难定其必为冕也。”从二人的交谊与诗的内容的矛盾来说明裴施州非裴冕，值得重视。《牵牛织女》认为朱熹改“风吹苍江树”的“树”为“去”没有道理，云：“篇中‘树’字，今多从朱晦庵改本作‘去’字，公诗自言雨将来，风先吹江树，写雨景然耳，若云风吹江去，雨却洒来，成何景何句耶?”从诗的意境与文法的角度，说明朱熹改字的错误，很有新意。《送重表侄王砯评事使南海》（卷九）认为此诗应是两首诗残缺后合成的，云：“遁叟云：此诗转韵后，事辞俱不属，疑本是二首，前首缺其后，后首缺其前也。”虽是推测，却非常有道理。总之，《杜诗通》注释充分反映了唐至明的注释成果，反映了胡震亨的注释心得，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与学术价值。

胡震亨对杜诗的评论是《杜诗通》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注和编三足鼎立，地位似更重要。

其品评可分三部分：（一）品评等第。根据自己对杜诗写作水平高低的认识，进行分等评级。（二）对杜诗的思想内容进行分析评论。（三）对杜诗的艺术进行分析评论。品评根据自己的见解作出，而对内容与艺术的评论，仍采用集注与自己评论相结合的形式。所辑主要为宋人与明人的评论，其中尤以刘辰翁、郑继之为最多。其余如唐人白居易，宋人黄庭坚、苏轼，明人王世贞、钟惺、谭元春亦有所采。而胡震亨本人的见解也登录甚多。评论表达的方式主要是评点的形式。评论内容往往与评论艺术结合在一起。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将内容与艺术分开论述。

《杜诗通》对杜诗的思想内容的分析往往细致，精微，时有新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云：“遁叟云：少陵自负，比于稷契，垂老仅得卫幕一官，去平人几何。长途省家，经过华清

巡游之所，感念时君侈政，滥沾恩泽者有人。而我独家人远隔，幼子致以饥死。荣枯不均，怨诽深矣。乃复取平人自较，以租税征伐得宽免为幸，而且代为之且思且念。以‘忧端’‘澒洞’一语终之，又何其婉而厚也。”在阐释诗表现当时政治现实的时候，着眼于对杜甫思想与心态的分析，使诗的旨意更明确，而给读者以启发。《丽人行》（卷一三）云：“遁叟曰：此诗言诸姨出游之盛，‘后来鞍马何逡巡’而下，始及国忠之同游，而致其微辞。杨花入水化为萍，《尔雅翼》：萍其大者蘋，根生水底，不若小浮萍无根漂浮。国忠实张易之之子，冒姓杨，与虢国通，是无根之杨花，落而覆有根之白苹也，又‘杨白花，飘荡落南家’，为北魏淫词，用之真切于比者，青鸟，西王母使者，飞去衔红巾，则几于感慨矣。词隐旨深，惜从来无与发明，聊为拈出。”说杨国忠本为张易之之子，不知何据（胡震亨是一位博学而严肃的学者，其说定有所本。虽然我们并不赞成其说）。而胡震亨从分析杜诗的用典，结合历史，提出杜诗讽刺虢国夫人乱伦，颇有发明，对人们深刻理解杜诗颇为有益。《示从孙济》（卷七）“淘米少汲水”至“放手伤藿根”下云：“遁叟云：人情数见不鲜，而同宗者当不以此为嫌。‘汲多井水浑’，以己之屡过济为歉，‘刈葵莫伤根’，以济之不相厌为望也。古诗‘采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老杜镕铸用之，得比兴深旨。”阐释杜甫用比兴表达希望从孙杜济不要厌烦自己的思想，完全符合杜甫迫不得已而寄人篱下的心态。

胡震亨是一位正直的学者，由于是处士，愚忠思想少一些，对杜诗所表现的忠君思想也有批评。《哀江头》（卷一三）云：“此诗白乐天、苏东坡极称之，诸选家概无异论。愚谓曲江此日，朝家何等情景，追致乱之由，着荒淫之戒，麦秀黍离，诗人自有正义在。第今为妖妃僻主，作有情沾臆等语，媟而非正矣。在杜

集自为下驷，不敢随声附和也。”其说义正辞严，力排众议，表现了一位正直学者的胆识，也令人信服。其思想境界高，议论自然也高人一筹。

但是，胡震亨没有能摆脱传统的比兴说诗的错误影响，有时望文生训，对诗也有错误的阐述。《哀江头》“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堕双飞翼”本写玄宗与贵妃射鸟之乐，而胡震亨却云：“遁叟云：‘双飞翼’正上同辇之第一人也，云箭射而堕者，不敢斥言军士之逼缢而为之辞，观下句即承以‘明眸皓齿今何在’自明。诸家不得其解，至有以为用贾大夫射雉事者，尤可笑。”“诗有宜正言之者，‘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旦’是也。有宜隐言者，‘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堕双飞翼’是也。彼写君颂，此为君讳故也。”本无比兴，而强作比兴解，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自以为是创见，取笑他人，实则是五十步笑百步，适足以见笑于大方之家。

胡震亨对杜诗的艺术有很多非常有见地的评论。胡震亨对于杜甫带有民歌风味的诗评价甚高。《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卷八）云：“遁叟云：若毛诗可续，此当极录《国风》。”《诗》是经，是诗的最高典范之作。胡震亨认为此诗可入《国风》，足见他对杜诗的极力推崇。胡震亨对杜诗的艺术技巧作了具体诠释、阐扬。《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卷三二）“轩墀曾宠鹤，畋猎旧非熊”下云：“遁叟云：注家多以‘轩’为误用，今考韵书：轩：曲轩，幡车也。檐宇之末，亦借取车象名轩，公复借之称轩墀宠鹤耳，此正诗家巧处，不为误也。”谈“轩”字用得新，用得巧。《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卷三）“实欲邦国活”下云：“杂议论。”“惆怅难再述”下云：“遁叟云：无此句找不住，具大神力。”前面说杜甫用议论的手法，后句说杜甫善用概括总结上文。评论非常细致。胡震亨也从整体上总结诗的艺术。《谒先主

庙》（卷三一）云："首尾曲折，句句典实有味，真大手。"《法镜寺》（卷四）云："遁叟云：此诗音俏节短，以用韵胜。"《夜归》（卷一四）云："遁叟云：故作一种粗卤真俚之志，以尽诗之变，此所以为大家也。"评各首杜诗的特点，各首诗的艺术变化。胡震亨还评论杜诗在艺术上的继承发展。《饮中八仙歌》（卷一三）云："遁叟云：此字押韵，重二'天'字，二'眠'字，三'前'字。蔡绦云：古无此体。刘辰翁亦云：不伦不理，各极其平生醉趣，古无此体，无此妙，愚谓《柏梁》亦重叠用韵，但《柏梁》人赋一语，此则以一二语各赋其人，稍异耳。此诗与《柏梁》正借韵之重叠，是错杂之趣，元似有意犯重者。辰翁'不伦不理'之评甚得。至云'古无此体'则失之不深考耳。"虽用前人评论的基本看法，但胡震亨的评论更符合事实，令人信服。《饮中八仙歌》正是在继承中创新的。《越王楼歌》（卷一五）云："杼轴本王子安之《滕王阁》，却矫其浓厚，别以朴词宕调成新观，试并参，知出蓝有自。"指出《越王楼歌》的创作受王勃《滕王阁》诗的影响，但它完全形成了新的格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完全符合实际。胡震亨对杜诗的研究确实非常细致、精深，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胡震亨对杜诗的艺术有不少批评。在集评中，《杜诗通》就集有不少刘辰翁、郑继之批评杜诗的评点。而郑继之的批评尤甚，批评杜诗的评点超过肯定评点的数量。这本身就说明胡震亨基本赞同刘辰翁、郑继之对杜诗的批评。同时，胡震亨本人在二人之外另作批评，表明他对杜诗的批评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时刘辰翁、郑继之肯定的，胡震亨也反驳，对杜诗进行批评。《望岳》（卷三）云："遁叟云：起语无谓，只'荡胸''决眦'一联，艰苦入奇。此望泰岳也，可无大篇酬之，而小哉其言，刘辰翁谓雄盖一世，过矣。"《壮游》（卷三）云："郑善夫以此诗豪宕奇伟，

无一字一句不稳贴，此等乃见老杜之神力。愚谓末后十余韵，亦未见神力在。”足见胡震亨批评杜诗比刘辰翁、郑继之走得更远。我们认为，胡震亨（包括刘辰翁和郑继之）对杜诗的批评（主要是文艺批评），绝大多数是错误的，是不公正的。我们知道，文学评论的基本观点的产生和评论者生活的时代，评论者的世界观、文学理念与知识水平有密切关系。杜甫是一位有着巨大创新力的诗人，一位集大成的诗人，而胡震亨受传统诗歌理论影响很深，他看杜诗自然容易出偏差，产生很多错误的评论。《塞芦子》（卷一）云：“遁叟云：以上三首（今按，指《潼关吏》《留花门》《塞芦子》），直作议论语，非诗体也。”这三首诗确实与传统的诗体不同，但它并非不是诗，而是一种新的诗体。《又上后园山脚》（卷六）云：“本上后园山脚耳，却从昔登东岳，仰望中州，转及时事，迂曲不可为训。”《玉华宫》（卷三）云：“要之，此诗兴感遗宫，忽及征人之无长年者，意殊不伦。在杜集未为至作，虽众所脍炙，不敢附和为美。”在很多看似与时事有关的题材中，用联想写入时事，正是杜甫作为一位伟大诗人的特点，胡震亨对此不理解，当然会做出错误的评论。但是，胡震亨毕竟是博学而有眼光的学者，他对杜诗的有些批评，也可以给我们以启迪，供我们研究时参考。

《杜诗通》还对杜诗做出了等第的品评。将诗人的诗进行分等，本是明代的风尚，胡震亨亦未能免俗，对杜诗也进行了分等。他的分等有自己的特点。（一）分等有自己的标准。分神品、妙品、能品、具品四品，尚有标“删”与未入上五等者，其实是六等。前五等分别标于题目之旁。其分等标准与其《唐音癸签》的标准基本一致。（二）对于诗句也有品评。最佳者在句旁加圈，次佳者在句旁加点。恶者则在句旁加黑线。（三）两者结合，构成一个完整的品评体系。作这种品评，也是一种学术研究，也有

它的价值，其意义和选诗差不多。但局限于自己的眼光，胡震亨做得并不太好。比如“三吏”、“三别”中，《潼关吏》标“删”，《新安吏》标“能品”，《石壕吏》标“妙品”，《新婚别》标“能品”，《垂老别》标“具品”，《无家别》标“具品”，对杜甫的重要代表作品所评等第如此之低，有欠公允。

然而，瑕不掩瑜，胡震亨对杜甫的研究虽然有缺陷，但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

第四章 清

一　清概说

一

清朝是满族建立的政权。其游牧民族的思维与文化对当时全国的经济与文化带来巨大的破坏。后统治者转变观念，吸收汉族文化，用怀柔和严酷兼顾的政策进行统治。生产力迅速发展，城乡经济一片兴旺，文化也相当繁荣。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国家辽阔而富裕。但是，清朝毕竟是封建社会的末世，1840 年，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用鸦片和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志士仁人为了拯救社会、国家、民族，先后发动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起义，最终辛亥革命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清朝灭亡也标志着整个封建社会的灭亡。

清代是古代一个特殊的时代，也是一个巨变的时代，西方文化也逐渐产生了一些影响。然而，从本质看，清代社会仍然是封

建社会，主流思想仍然是儒家思想。故表现乱世儒家思想与感情的杜甫和杜诗，自然受到人们广泛的重视与喜爱。其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共鸣。整个古代都是诗的时代，清人仍然普遍喜欢诗，自然也会从诗的角度研究诗圣杜甫和杜诗。清代学术鼎盛，像杜甫这样伟大的人物，自然也会受到大量学者的重视与研究。这样，巨变的时代并没有冷落杜甫和杜诗，杜甫学反而更加热门与繁荣，自然也带着鲜明的时代色彩。

二

清代杜甫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从顺治时期至嘉庆时期，为清代杜甫学的第一时期。

清代杜甫学与明末的杜甫学高潮一脉相承，可以说清代一立国，杜甫就形成热潮。学术发展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钱谦益对清代杜甫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刻印，及稍后的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出版，大大激发了人们研究杜甫的热情，研究杜甫成为风气。该风气一直持续到嘉庆。这是清代杜甫学的高峰时期，清代重要的杜甫学学者和著作，差不多都在这一时期。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一时期的杜甫学看做是万历至明末时期杜甫学的发展和延续，把两个高潮合并为一个时期，把明万历时期至清嘉庆时期看作杜甫学的一个大高潮。明万历时期至清嘉庆时期，是杜甫学最昌盛的时期。

从道光开始，至清末，为清代杜甫学的第二时期。

这一时期杜甫学依然很热。就杜甫学的著作数量而言，以时间来平均，和前期是差不多的。但著名的杜甫学学者与著作却很少，特别是没有高水平的杜甫注释著作。著作以诗话、评点、考证、札记、论说为多，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相对平常期。杜甫学未能突破前期的成就，掀起新的高潮，原因是复杂的。其主要原因

有以下几点：（一）学术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它本身就是波浪式的发展。清代整个学术在乾嘉之后出现某些衰退，杜甫学也出现某些衰退，是很自然的。（二）清代杜甫学第一时期水平很高，第二期要超越，当然会非常困难。（三）道光以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而一个学者的杜甫的研究，需穷二三十年时光，方有较大成就。在社会巨大变革时期，能如此投入的学者较少。（四）学术需要创新，而只有新的时代，才能带来崭新的学术创新，根本的学术创新。道光以后的清代，仍然是封建社会，尽管是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但并非一个本质变化的新时代，一个有着崭新思想的新时代，杜甫学自然也不可能产生质的飞跃，不可能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天地。

三

清代杜甫学著作非常丰富。如果将其分类，大致可分三类：（一）杜甫学专著。主要是杜甫（包括文集）的研究著作，包括年谱、考证和札记。（二）杜诗评点著作和诗话著作。清代这类著作甚多。（三）杜甫作品的选本和相关研究性著作。很多著作都对所选的诗（包括文）进行注、解、批点，其实是专门的研究著作，有的选本则是普及性读物，有的则是学术研究与普及性结合。现将清代有特色的重要的杜甫学著作和作者简要论述于后。

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二十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二十二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金圣叹《唱经堂杜诗解》四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陈式《问斋杜意》（《陈问斋先生杜诗说意》）二十卷。陈式（1612—?），字二如，号问斋，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年过五十，应试不第，抛弃举子业。做过府署幕僚，也讲学授徒。陈式酷好杜诗，“日咀月咏，寝食都捐”，“居恒呐呐不出口，一言及

杜，则掀髯擘脇，辩论纵横，闻者莫不勃然兴，肃然敬"。该书始撰于康熙三年，成书于康熙六年。书名"说意"，故解说就以谈杜诗的基本思想为主。陈式《读杜漫述》谈自己解说杜诗的理念："注杜大旨则谓注意，止可发明诗人之意，不过执己见。一执己见，则凿矣。"这就是根据杜诗本身文字所传达的内容信息，阐明诗的思想。这样的理念是正确的、高明的。陈式是在总结过去杜诗解说中穿凿弊病产生的根源的基础上谈自己的理念。他又反对蹈袭前人，表示"予是编从不暗袭人片言只字"。总之，他的理念就是反复研究杜甫诗，把杜甫诗的原意解说明白。《问斋杜意》解说杜诗主要解说诗的主要内容，简明畅达，平实妥帖。因为陈式本就"不过执己见"，故新见较少。该书的一个特点是大量记载知己或相识者的评语，人数多达七十多人。这些评语学术价值不高。该书有陈式《读杜漫述》四十八则，是"注杜诗偶有感想，偶有记忆"的成果。内容广泛，而伤于杂乱。总之，《问斋杜意》是一部有真知灼见的杜诗研究著作。

吴见思《杜诗论文》五十六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张溍《读杜堂杜诗注解》二十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张远《杜诗会萃》二十四卷。张远，字迩可，萧山（今浙江萧山）人。康熙中由贡生为缙云县教谕。著有《云峤集》《蕉园集》《梅庄集》。书之名曰"会萃"，即博采众家性质的著作。该书的特点是有注有解。注释综该众作，而直接利用前人成果。主要利用钱谦益笺注和朱鹤龄辑注，而能去其弊端，补其不足，有所前进。该书《凡例》云："少陵诗注不下百家，得朱长孺而备美，然渗轶尚多，止窥半豹，兹更详为采掇，庶不至挂一漏万。钱虞山笺注以唐史证唐事，当日情事毕见。然多牵合傅会，取其确切者著于篇。"该书广泛引材料注释，不作引申论说。其解说则是对全诗进行总的评述。而长篇则分段，各段之后论述大意。

简洁之中见广博，平允之中见功力。《四库全书总目》说："是书采诸家之注而成，故曰'会萃'。分析段落，训释文意，颇便初学。"其实，《杜诗会萃》不仅是便于初学而已。

卢元昌《杜诗阐》三十三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仇兆鳌《杜诗详注》二十五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卢震《杜诗说略》一卷。卢震（？—1704），字亨一，奉天（今辽宁沈阳）人。贡生，官弘文院侍读学士，内秘书院学士。授巡抚。被杀。著有《悦安堂诗草》、《抚偏檄草》、《抚偏疏草》。《杜诗说略》刊行当在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二年之间，为评论性著作。该书的目录是正派、变法、渊源、元气等，共二十四项。该书正是从宏观的诗的艺术理论来关照杜诗，又将杜诗的成就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论述。作者有自己的研究理论体系，也有自己的见解，有的地方也新颖、深入。但由于作者的艺术理论不够高，不够精，如"扫除"、"游涉"作为理论术语，实在不高明，影响了对杜诗论说的质量。

汪灏《知杜堂读杜诗》二十四卷。汪灏，字紫沧，休宁（今安徽休宁）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为翰林院编修，任侍读督山西学政。《知杜堂读杜诗》为注解性的著作。多综述诗意，对诗进行评论。在体例上很有特点。作者在自己认为的创新之处，明确标出"另眼"、"参権"、"着意"，表明创新的情况。关于此三项的含义，作者说："与旧解全不相袭者曰'另眼'，偶有数语别解者曰'参権'，逐字体会虚神者曰'着意'。"此颇便读者阅读。但杜诗研究创新极难，而作者事实上的创新也不多，故其创新则明显表现在体例上。作者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也确有一些创见，这就很不错了。

周篆《杜工部诗集集解》四十卷。周篆（1643—1706），字籀书，号草亭，松江（今上海松江）人。处士，著有《蜀汉书》

《草亭先生集》。《杜工部诗集集解》虽名“集解”，其所集他人之解并不特别多。所集多黄鹤、钱谦益、朱鹤龄数人之注。有时引朋友顾小谢语。该书主要是解杜诗，所解不求全面，而力图解得有见地。故其解有时注释，有时评论，有时也有串讲或分段讲说。该书有时也确有自己的见解。

浦起龙《读杜心解》十五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江浩然《杜诗集说》二十卷，卷末一卷。江浩然（？—1750），字万原，一字孟亭。嘉兴（今浙江嘉兴）人。一生未仕，在各地教学，居济南时间最长。著有《北田文略》、《北田诗臆》、《曝书亭诗笺注》。一生酷好杜诗，晚年始成《杜诗集说》。该书虽名“集说”，其实兼有集注与集评的性质，也阐述自己的见解。《例言》云：“兹编合众论以参稽，期去非而存是，偶或附以己见，以备取资。标题‘集说’，亦不敢掠美前人云尔。”《杜诗集说》编次依朱鹤龄辑注本，而注释主要采自仇兆鳌详注，其余如赵汸、单复、张綖、周篆、王嗣奭、朱瀚、朱鹤龄、顾宸、吴见思、浦起龙亦有注评采择，又采有张孝祥、李梦阳、查慎行、邵长蘅、申涵光、姜宸英的评论，所采较广。每篇均在疏解文字之后，列出各家评论，有时也列出作者自己的见解。

夏力恕《杜诗增注》二十卷。夏力恕，字观川，孝感（今湖北孝感）人。康熙六十年进士，授编修。为顺天乡试同考官，山西正考官。辞官归乡，后主讲江汉书院。著有《四书札记》、《菜根精舍诗》。《杜诗增注》几乎不注释语言和典故，而着重诗的评讲。该书评讲或讲内容，或讲艺术，或二者皆讲。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求整齐划一。其评论有自己的心得，有时还有自己的创建。对杜诗偶尔有所批评。

张甄陶《杜诗评注集成》四十四卷。张甄陶（1713—1780），字希周，一字惕庵，福清（今福建福清）人。乾隆十年进士，为

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任广东鹤山、香山、新会、高要、揭阳等知县。于云南昆明为官，因事罢。先后主讲云南五华书院、贵州贵山书院，晚年主讲福建鳌峰书院。著作甚多。有《四书翼注论文》、《周易传义拾遗》、《尚书蔡传拾遗》、《诗经朱传拾遗》、《礼记陈氏集说删补》、《春秋三传定说》、《松翠堂文集》、《惕庵杂录》等。《杜诗详注集成》是在仇兆鳌《杜诗详注》基础上增删而成的。该书所增评语很广，有李光地、何焯、王士禄、王士禛、浦起龙、蔡世远、陈兆伦、方苞等，也附有自己的见解。张甄陶云："取仇沧柱先生详注，删其繁复，尽录李（光地）何（焯）二公及国朝诸名公前辈评论于上方，其圈点选次甲乙一依西樵阮亭二先生之旧。间有不惬，亦时附已见，以听读书人之定论。"该书对诸家评论多有批评，其解说时有发明。

翁方纲《杜诗附记》，本书有专节论述。

杨伦《杜诗镜铨》二十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刘濬《杜诗集评》十五卷。刘濬，字质文，号寓槎，监生，海宁（今浙江海宁）人。该书刻于嘉庆九年，有作者自序，故推知刘濬为乾隆嘉庆时期人。《杜诗集评》辑录有关杜诗的评论。评论家为清人，作者说明所录者为十五家。这十五家是何焯、宋荦、陆嘉淑、申涵光、俞玚、吴农祥、许昂霄、许灿、王士禄、王士禛、钱灿、朱彝尊、李因笃、潘耒、查慎行。眉批中尚有邵长蘅评语。作者明确表示"不参已见"，自己没有什么发明，其学术价值正在于辑录了众多的评论。

史炳《杜诗琐证》二卷。史炳，字恒斋，溧阳（今江苏溧阳）人，为咸安宫官学教习，选兴化县教谕，又为泾县教谕。生活在乾隆嘉庆时代。著作有《大戴礼正义》、《句俭堂集》。《杜诗琐证》是一部考证性的著作，对历来杜诗注释名物、语词等和系年的错误，进行厘正，故名"琐证"。史炳自序云："余自少习公

诗，安有考订数十百条，皆泛览群书时随录者，是以诗之先后都不诠次。今兹长夏无事，偶取删定之，其目则仍旧贯焉，命曰‘杜诗琐证’。”作者阅读杜诗注本多，长于考证，故该书颇有精彩处。其佳处往往批驳旧注错误有力，其创见亦令人信服。该书的缺点是有时见解偏颇，附会穿凿。

李黼平《读杜韩笔记》二卷。李黼平（1770—1832），字绣子，又字贞甫，嘉应州（今广东梅县）人。嘉庆十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为昭文县知县。后主讲东莞宝安书院。著有《易刊误》、《毛诗细义》、《文选异义》、《花庵集》、《吴门集》、《南归集》等。《读杜韩笔记》为读杜甫、韩愈之作的笔记，主要是对杜甫（这里略去韩愈不谈）诗中，作者有见地的部分进行笺释和评说。其曾孙李云俦跋说该书“推阐诗法，穷其源委，尽其甘苦”，“独超众说，通其神旨，非唯学绝，抑亦识精也”。敬祖之情，难免生溢美之词。而该书确实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施鸿保《读杜诗说》二十四卷。施鸿保（1804—1871），字可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多次应乡举不中，中年后在江西、福建为幕僚，客死福州。学识渊博，著述颇丰。有《春秋左传注疏》、《炳烛记闻》、《可斋诗文集》、《闽杂记》。施鸿保尚有《读杜随笔》八卷，学术界多未见，推测可能改写后成果已入《读杜诗说》中。《读杜诗说》为一部纠仇兆鳌《杜诗详注》之失的书，也是一部展示作者研究杜诗心得的书。作者在肯定《杜诗详注》的成绩的同时，对仇兆鳌的种种错误进行了批评。作者说：“读之既久，乃觉穿凿附会，冗赘处甚多。且分章画句，务仿朱子注《诗经》之例，裁配虽匀，而浑灏流转之气专致扞格，训释字句，又多侘傺不晰语，诗意并为之晦。间附评论，亦未尽允，甚有若全未解者。”作者反对穿凿附会，认为应按杜甫的本意来解释杜诗。作者对仇注的错误纠正甚多，对赵次公、张綖、

王嗣奭、钱谦益、朱鹤龄、卢元昌、黄生等之说亦有辨证。很多纠谬和辨证都是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有时还能有自己的创见。该书有时并不驳仇兆鳌，而是阐述自己对杜诗的见解。张慧剑说："我们也尽可以把这部书看做是施氏记录自己多年研究杜诗的心得的一部札记。"当然，该书也有一些错误。有时用传统的错误去看待仇兆鳌注，如《游龙奉先寺》就用前人的"天窥"之说去纠"天阙"，反而造成自己的错误。有些地方自己也牵强附会，造成错误。

郭曾炘《读杜札记》。郭增炘（1855—1929），字春榆，别号匏庐，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光绪丙午进士，为礼部侍郎，典礼院掌院学士，实录馆总裁。著作有《匏庐诗集》、《五臣本〈昭明文选注〉校误》、《施注苏诗订讹》、《邴庐笔记》。其《读杜札记》为读杜时的心得。评论杜诗的重要注家蔡梦弼、刘辰翁、王嗣奭、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顾宸、浦起龙等的注解的得失，订正他们的讹误，有时也发表自己的意见。作者对杜甫研究甚深，所论多有学术价值。

四

清代学者非常擅长文献学，在杜甫学的文献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里着重谈谈清代杜甫集的注释。杜甫集历来就很难注，虽经宋元明学者的多方努力，完成了基本的注释，但仍存在三大问题：(一) 有一些生僻难注的事典和语典没能注释。(二) 注释较粗糙，有一些该注释的典制、时事背景等没有注释。(三) 单一的专著的注释较少精品，未注的地方较多，错误也不少。清代杜甫学者在继承宋元明注释成果的同时，克服了他们存在的问题，把杜甫集的注释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学术如登塔，总是自下而

上，所见更远。首先，有所突破，将宋元明未注释的事典和语典等基本都进行了注释。宋元明未注释的地方，虽然数量并不大，但由于较生僻，非常难注，需要非常高的学识和很大的精力投入。难注之处的基本解决，是整个清代杜甫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其注释的发明散见于很多杜甫学的著作中，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仇兆鳌《杜诗详注》、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张溍《读杜堂杜诗注解》等则比较多。其次，有较明确而完备的体例，完善了宋元明杜甫学者注释不够完善的诗的时事背景、典章制度、人名地名等注释。第三，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注释精品，如前面提到的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张溍等的著作。这些著作注释比较完善、精炼，较少错误。

清代杜甫学者对杜甫文进行全部注释。杜甫作品的研究，历来特别重视诗，文则受到冷落。就注释而言，注家只注释诗，几乎不注释文。在清之前，宋代的吕本中、杨长孺注过《三大礼赋》，也有人零星注过单篇的杜甫文，至于全部的杜甫文，则一直没有人注过。到清代，朱鹤龄注完了全部的杜甫诗和全部的杜甫文。这是杜甫文的第一次全部注释，也是杜甫集的第一次全部注释。朱鹤龄的杜甫文的注释，与诗的注释一样，质量很高，在杜甫的注释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后，张溍又在《读杜堂杜诗注解》中对杜甫文进行注释和评论。张溍的注释有自己的特点，和朱鹤龄注释比，相对要简略明白一些。而他的评论则是开创性的工作，是对杜甫文的第一次全面研究，在杜甫的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仇兆鳌《杜诗详注》和杨伦《杜诗镜铨》都将张溍关于杜甫文的注释和评论全文收录，可见清人对其高度重视。总之，清人对杜甫文的注释和评论，有着重要的意义。

杜甫之学识博大精深，古人一直叹杜甫集难注。难注的原因，除注者不具备杜甫所具备的一些知识外，还有很多客观因

素，如杜甫时代的典籍大量散佚，一些俗语已无人知晓，一些史实也难知详情，杜甫作品本身在流传中造成的错误也无法校勘。这些都使杜甫集留下了一些无法注释的东西。社会在发展，学术在变化，随着一些文物和新发现的文献问世，有些不可注的东西，也许会变得可以注释。而清代杜甫作品注释的诸多缺陷，还有清人未注到之处，为后人更好地注释它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我们相信，超越清人的、新的、集成式的、有创造的精湛注释之作，一定会在不太久的将来问世。

五

清代是封建社会末期，儒家思想仍然是统治思想，而新的民主色彩的思想已经滋生，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也渐渐传入中国。这种情况自然对杜甫研究产生巨大影响。清代研究杜甫的学者，政治思想差异很大，学术思想与方法的差异也很大。其研究杜甫，视角与观点也大相径庭。顾炎武、申光涵为明代遗民。钱谦益为贰臣，由明降清，而暗有复明之意，思想复杂。金圣叹为狂狷之士，本质不离儒家思想，而又有某些叛逆行为。仇兆鳌为正统的官僚。潘德舆虽为布衣，却是儒家思想的卫道士。各自不同的政治思想背景，对杜甫的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清代杜甫研究，虽带有时代的共同特征，却是百花齐放。

在杜诗内容研究方面，清人对很多诗篇的主旨提出了新的见解。其中，钱谦益、金圣叹、浦起龙新见尤多。钱谦益解杜甫《收京三首》其二，认为肃宗汲汲御丹凤楼下制，是篡位，认为诗"'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盖讥之也"，认为"玄宗内禅，故目之曰'帝尧'。史称灵武使至，上用灵武册，称太上皇，亦可谓殆哉岌岌乎矣。公心伤之"（《杜工部集笺注》卷一〇）。其解便与众不同。浦起龙解杜甫《剑门》云："夏客云《剑门》诗，

因《剑阁铭》而成，用古而能胜于古者。愚按，孟阳之铭，是一篇喻蜀文，有德不在险意。故其词曰‘凭险作昏，鲜不败绩’，为反侧子告也。子美之诗，是一篇筹边议，有怀远之德意，故其词曰‘后王尚柔远，职贡道已丧’，为当宁者告也。翻古而非用古，夏客误矣。”（《读杜心解》卷一）其解与古人异。清代学者敢于冲破传统的观点，在杜诗的内容研究方面大胆探索。

儒家思想仍然是清代杜甫研究的指导思想。在研究的时候，清人以儒家思想为准绳，深入阐发杜诗的深刻内涵，阐发杜甫的思想境界和崇高人格。像前代学者一样，清代学者认为杜诗的核心价值在于表现杜甫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思想，认为杜甫的言行和思想是儒家思想的很好体现。但是清代学者的阐述要深刻得多，准确得多，细致得多，可以说清代的研究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潘德舆谈杜甫的忠君爱国，说：“黄氏生曰：‘杜公屡不第，卒以献赋受明皇特达之知，故感慕终身不替。虽前后铺陈时事，无所不备，而于当时荒淫失国，唯痛伤而不忍讥，此臣子之礼也。说者不得公心，影响附会，辄云有所讥切。此注杜大头脑失差处，妄笔流传，杜公之目，将不瞑于地下矣。’按，宋氏濂曰：‘注杜者称其一饭不忘君，发为言辞，无非忠君爱国之意，至于率尔咏怀之作，亦必牵就为说，子美之诗，益不白于世。’此论最通。夫杜即爱君，岂有篇篇寄意者？果如是，徒形其琐琐好名而已矣。此注者之凿也。黄氏之说，剧得杜意，然黄氏亦有所本。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已讥唐人咏杨妃者，为无礼于君矣。此等处有关名教，学诗者之开宗明义章也。顾黄氏谓杜公‘献赋受明皇特达之知，故感慕终身不替’，此论亦陋。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何关穷达事！使明皇不赏《三大礼赋》，子美将肆其诋諆耶？抑肃、代二帝于子美无知己之感，便可不需感慕耶？意在主持名教，而发论不本于性天，即不可以教忠而明

礼。然则，‘大头脑差失处’，黄氏亦未能免。子美诗云：‘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斯言也，乃纯臣之言也。”（《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认为杜甫的忠君爱国是出于天性，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因而是最纯洁、最高尚的。潘德舆对于杜甫忠君爱国的认识不仅超过前代学者，也超过清代的前辈学者。潘德舆对杜甫的交游，也用儒家思想进行了评论。他说：“王氏应麟曰：‘鲜于京兆，仲通也；张太常、博士，均、垍也。所美非美。然昌黎之于于頔、李实类此。杜、韩晚节所守，如孤松劲柏，学者不必师法其少作也。’按少陵酬应投献之诗，不尽符其平素鲠直之谊，盖唐人风气使然，亦不独于鲜于京兆、张博士也。《投哥舒仆射》诗云：‘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开府当朝杰，论兵迈古风。’而《潼关吏》则云：‘哀哉潼关卒，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无学哥舒。’何其前后违戾如此？此皆古人躁率失检处。而置之集中，不肯删其少作，又见古人朴实，不讳过也。然于翰等，犹可解曰：前时败阙未见，自不应逆探其恶而斥之。若王维、郑虔，大节已玷，犹从而美之曰‘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反复归圣朝，点染无涤荡。’何其深加惋惜乃尔！至称维曰天下‘高人’，称虔曰‘天然生知’，此真不能为少陵解矣。予尝反复推求其故，以少陵植志立身，忠爱贞洁，岂于此大节而反忘之？只缘于朋友一伦，长厚太过，有悱恻缠绵之仁，而无刚健断决之义。见维之取痢称瘖、作诗志痛也，则以为心尚可原。见虔之潜以密章达于灵武也，则以为未忘反正。而不知寺中之伪署，市令之求摄，皆法之所不得宥，而义之所必当绝也。故太白之可谅，在于辞官而逃。维与虔之难宥，在于已污伪命。少陵混视为一，虽无损于己之节目，然已增后学之疑矣。”“且朋友，以义合者也。友如未污，则当辨其冤于‘伤心’‘严谴’之时，友如已污，则当绝其交于功罪核实之日，此非硁硁自好也，义也。今也知其

污而不得鸣冤，又痛其穷而为之饮泣，此温良而不断之失也。乃曰‘不以成败论人’，交谊始可歌泣，是少陵之偏好，亦皆为天地之常经，岂非疑误后人之极者哉？总之，爱古人者当为其诤臣，不当为其佞友。少陵只以中允、司户文学绝人，遂成偏好。然文章本非性命，朋友究次君亲，此义偶疏，难为典训。故‘食肉不知马肝，未为不知味’，学者不读昌黎上于襄阳、京兆李实等书，少陵赠张学士、鲜于京兆、哥舒仆射等诗，未为不知韩杜，而况《赠王中允》《送郑十八》等作，大有累于义理者哉！剔其繁枝，乃识孤松劲柏之成就非常处。此予之爱杜，而非予之谤杜，深于诗教者必知之耳。”（《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论述既实事求是，又合情合理，非常有深度，表现出很高的学术水平。

清代研究杜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考据的方法与以意逆志的方法结合，来阐扬杜诗的主旨。以意逆志是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也是古代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但它在运用时往往没有客观的依据，实际上是凭研究者的感觉来操作，故非常容易堕入穿凿附会的深渊。杜甫的很多诗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与政治内容，而清代有朴学的传统，学者们便搜寻与杜甫作品相关的唐代史料，来与杜甫作品内容比勘研究，以史证诗，或以诗证史，即所谓诗史互证。从更高的层次，以意逆志地来解读杜诗，深入挖掘杜诗的思想内容与社会意义，挖掘杜诗丰富的内涵。这样，可以使人们更多了解杜诗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更深刻地认识杜诗的伟大社会价值。当然，在诗史互证中，特别是在以意逆志中，难免有把无关的史实硬与杜诗扯到一起的地方，难免有郢书燕说、曲解杜诗的地方。

清人对整部杜甫集做了非常高的评价，认为杜甫一生完全践行了儒家思想，而表现杜甫一生言行的杜甫集堪称经书。潘德舆

将杜甫比作孟子，将杜甫集隐然比为六经。龚鼎孳说："诗之有少陵，犹文之有六经也。""文无奇正，必始乎经，诗无平险，必宗乎杜。此少陵之诗与六经之文，并不朽于天地间也。"（《杜诗论文序》，《杜诗论文》）将杜诗与经书相提并论。金圣叹更将杜诗称作最高经典，说："读先生诗，真如闻无上甚深之经典，使小儒意见都尽。"（《秋兴八首·别批》，《杜诗解》卷三）经书是儒家思想的最好表现，是封建社会人们思想与言行的指南。清人把杜甫集评为经书一样的著作，是高度肯定书中所表现的纯粹的儒家思想，是高度肯定杜诗所能起的伟大的教育作用。

清人研究杜甫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即借研究杜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所谓借杜言志。杜甫怀王佐之才，忠君爱国，却流离颠沛，坎坷不用，引起很多士人的同情与共鸣。怀才不用，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清代一些学者借研究杜甫，抒发自己像杜甫一样的忠君爱国的热忱，表达自己像杜甫一样怀才不遇的苦闷，宣泄自己像杜甫一样困顿的牢骚。有时更是推开来，就研究者所关心的一切问题，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抒发的方式各有不同。大致说来，有两种：一种是无我的境界，只谈杜甫，不谈自己，而将"言志"的思想感情，融入到对杜甫的论述中；另一种是有我，在研究杜甫中，找合适的机会直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金圣叹解杜甫《蜀相》诗："丞相不可见于今日矣。然当时若非三顾草庐，丞相并不可见于昔日也。天下妙计，在混一不在偏安。丞相受眷于先，并效忠于后，虽不能混一天下，成开济之功，然老臣之计，老臣之心，是如是也。'死而后已'者，老臣所自矢于我，捷而后死者，老臣必仰望于天。天不可必，老臣之志则可必。第七句'未'字'先'字妙，竟似后曾恢复而老臣未及身见者，体其心而为言也。当日有未了之事在，今日长留未了之计，未了之心。"（《杜诗解》卷四）其解新颖而细致。接下来

议论与感慨云："嗟乎！后世英雄，有其计与心而不获见诸事者，可胜道哉！在昔为英雄之计，英雄之心，在今日皆成英雄之泪矣。"该议论站在历史的高度，通观几千年社会的发展史，指出社会中很多士人都有安邦治国的大志和韬略，但绝大多数都无法实现，最终抱恨终生。这其中也包含着金圣叹自己。这种借研究杜诗来言志，不仅抒发了研究者的思想感情，而且从更广阔、更深刻的层面阐释了杜诗。

清代的杜甫研究，穿凿附会比较多。流传到现在的一些重要的杜甫研究著作，都有不少明显的穿凿附会之说。一方面清人对前人的穿凿附会深恶痛绝，一方面他们自己又在制造新的穿凿附会。钱谦益说："宋人解杜诗，一字一句，皆有比托，若伪苏注之解屋上三重茅，师古之解笋根稚子，尤为可笑者也。"（《杜工部诗集笺注·略例》）取笑黄庭坚解《春日忆李白》"何以异于此乎"。而他自己对有的杜诗的解说，其穿凿可笑，丝毫不亚于宋人。浦起龙说："杜之祸一烈于宋人之注，再烈于近世之解。"（《读杜心解·发凡》）称之为祸，可见穿凿附会的普遍与严重。就是浦起龙自己，也在所难免。造成穿凿附会的原因，主要是人们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所致。首先，在研究杜诗时，人们总认为杜诗有政治含义，有微言大义。其次，用以意逆志作为基本研究方法，而这个方法实际上难以捉摸，以意逆志成为了想当然。而传统的比兴说诗的方法与以意逆志相表里，最终把研究者引向穿凿附会的道路。第三，一些研究刻意求新求深，最终也走向怪，走向穿凿附会的邪路。实际上，造成穿凿附会的原因，在古代各个时代都存在，就是学术风尚最盛的清代也无法克服。因而造成这种情况：一个时代在摈弃前代穿凿附会的同时，自己又在制造新的穿凿附会，最终无法走出这个怪圈。

清代对杜诗艺术的研究也有巨大的发展。

清代学者研究杜诗的艺术，着力探讨杜诗艺术的主要特点、艺术的“窾要”，试图解开杜诗艺术的秘诀，寻求杜诗艺术的规律。翁方纲的《杜诗附记》就是主要探讨杜诗艺术的。翁方纲说：“吾所欲读杜者，何为哉？非欲考史也，非欲缀辑词藻也，唯欲知诗之所以为诗而已。”（《杜诗附记》）意思非常明白，就是想通过探讨杜诗艺术的特点，进而掌握诗歌艺术的规律。在研究方法上，他们尽量熟悉全部杜诗，综合思考，融会贯通，努力寻求艺术的诀窍，寻求艺术的规律，摆脱了前人印象式的研究，即兴式的论说、灵感式的论说，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艺术研究。

研究杜诗的艺术需要很高的诗歌理论。清代很多学者有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他们用自己的理论体系研究杜诗，往往有独到的见解，有自己的发明。沈德潜用格调说，王士禛用神韵说，翁方纲用肌理说来解杜诗，多有创见，使人耳目一新。尽管有时失之奇异，失之褊狭，但总能给人启迪。其余如仇兆鳌、杨伦、浦起龙、金圣叹、查慎行、何焯、朱彝尊、潘德舆也有很多精辟的见解，给人很多教益。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理论时尚。清代研究杜诗艺术，喜欢用立意、结构、语言这一类的模式来研究，甚至直接用当时的时文——八股文的理论起承转合的模式进行研究。这样的艺术研究方法，明代已有一些学者使用，已具备雏形，至清代而发展完善，成为新的研究方法模式。其创造和引领潮流的人物是陈醇儒、金圣叹和吴见思。陈醇儒笺注杜诗自叙说：“因不揣固陋，先取七言律讨论批驳，凡令一诗之前后起承转合，并牵连以及三首、五首、八首，首尾开阖照应之处，一一拈出，成八万余言。”（《书巢笺注杜工部七言律诗》）其注重诗的篇章结构的研究，“每章必先指明曰前四句，后四句，庶使知首尾来去各有分别，虽云

琐细，所不嫌也”（《书巢笺注杜工部七言律诗·则言》）。金圣叹则进一步将杜甫的诗大多都以四句为一解，进行研究，说“唐人诗多以四句为一解，故虽律诗亦必分作二解。若长篇，则或至作数十解”（《唱经堂杜诗解》卷一），然后用“起承转合之法”（清张芳《与陈伯玑书》，刘大杰、章培恒《金圣叹的文学批评》引）进行分析。吴见思的《杜诗论文·凡例》将其研究分为五部分，即总论、章法、句法、字法、余论，足见其研究艺术以研究章法、句法、字法为根本。总起来说，这种艺术研究方法的模式就是三部分：第一部分，研究杜诗的立意，主要是研究艺术构思；第二部分，研究杜诗的谋篇布局，也就是篇章结构，主要是进行起承转合的研究，或章法研究；第三部分，研究杜诗的语言，主要是句法和字法研究，而其根本为研究结构和语言。这样的研究模式是很有新意的，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具有相当的程序化和操作性。这种研究模式在清代杜甫学中形成一种潮流，运用的学者甚多。顾宸、章咏、万俊、鲁一同等均大致使用这一艺术研究模式。新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新的研究成果。自然，像起承转合这样的方法也有很大的局限。用后代作时文的方法来研究变化莫测的杜诗艺术，不免有些荒唐可笑，但艺术的根本原理是相通的，有些研究也颇为奇妙。

清代杜诗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研究细致。其重要表现是研究理念与方法的细密。卢震《杜诗说略》的目次是正派、变法、渊源、元气、胎骨、体裁、品格、章法、声律、诗眼、诗情、诗典、诗史、诗病、浅深、虚实、生熟、平奇、雅俗、大家、扫除、游涉、参悟、神化，计二十四种。可以说是作者研究的二十四个方面。大多数都是艺术研究，足见其研究思路的缜密。万俊《杜诗说肤》目次是原情、式法、炼字、审音。四章皆涉艺术。其《式法》分三部分：（一）章法，列一气顺成法、首

尾相顾法等多种方法；（二）句法，列实眼句、虚眼句等二十七类；（三）对法（对仗法），列走马对、流水对等十八类。研究真是细致。像卢震、万俊的研究也许有些繁琐，分类也许并不严密，乃至混乱，但正是细致使他们的研究深入，有许多发明。

清代还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特别是诗歌发展史的角度对杜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清人认为杜甫所以能成为大诗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继承了自先秦至唐朝杜甫时代的优秀文化，包括向同时代的诗人学习。潘德舆说："严氏羽曰：'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按，言宪章，必当言祖述。少陵所祖述者，其《风》《骚》乎？沧浪不言，何也？且少陵取材，奚啻六朝？观其《过宋之问旧庄》云：'枉道只从入，吟诗许更过。'《陈拾遗故宅》云：'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郭代公故宅》云：'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观薛稷书画壁》云：'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赠蜀僧闾丘师兄》叙闾丘均云：'晚看闾丘意，妙绝与谁论？'《哀故相公张九龄》云：'自我一家则，未缺只字警。'则知少陵于本朝诸巨公靡不息心研玩，安得以其'熟精《文选》理'，'续儿诵《文选》'之句，遂谓其取资止于六朝哉？"（《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论述虽较简略，但却很全面。事实上，杜甫正是吸收了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作为营养，作为诗歌创作的思想和艺术元素，才创作出伟大的诗歌的。

关于杜甫在诗坛的地位，清人认为杜甫继承了《诗经》的传统，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忠君爱国，是诗歌的中兴。潘德舆说："宋氏祁曰：'甫混（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饫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按仇沧柱谓

‘《旧唐书》记事略而论文详，备载元稹原序，亦失史家裁制之法。《新唐书》记事稍详，其论赞一段，简括遒劲，颇类欧史笔意’。愚谓宋氏此赞，简则有之，括未能也。‘千汇万状，兼有古今’，第言其体繁变词富有耳，故接以‘他人不足，甫独厌余’也。又以能切时事，千言不衰为诗史，则杜诗之足贵，第在精而多耶？予考陆象山曰：‘诗学原于《赓歌》，委于《风》《雅》。《风》《雅》之变壅而溢者也，《骚》又其流也。《子虚》《长杨》作而《骚》几亡。黄初以降，日以渐矣。唯彭泽一源，与众稍趋，而玩嗜者少。隋唐之间，否亦极矣。杜陵之出，爱君悼时，追蹑《风》《雅》，才力宏厚，伟然足镇浮靡，诗为之中兴。’此数行文字，能贯三四千家诗教源流，又洞悉少陵深处，语意笔力，皆臻绝顶，乃可谓遒劲简括耳。以作杜公传赞，庶几不愧。”（《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虽是引用陆象山的话来论述，但潘德舆的观点更鲜明，更深刻。他从儒家的诗教立场出发，认为只有把杜甫定为诗歌的中兴者，才是对杜甫最恰当的评价，才是对杜甫在诗歌发展史上最准确、最公正的定位。潘德舆的观点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清代研究杜诗的风格和成就，沿习明代分体研究的方法，但高屋建瓴，综合细致，很有见解。如论杜甫的七言古诗，潘德舆说：“胡氏应麟曰：‘七言古，初唐以才藻胜，盛唐以风神胜，李杜以气概胜，而才藻、风神称之，加以变化灵异，遂成大家。’又曰：‘李杜歌行，虽宕逸沉郁不同，然皆才大气雄，非子建、渊明判不相入者比。’又曰：‘李杜歌行，廓汉魏而大之，而古质不及。’按胡氏论七言古，以李杜并称大家，颇有见地，不似渔洋论七言古诗，独推老杜横绝古今，同时大匠无能抗行，而以太白与嘉州并称也。然李杜分别处，言之尚不详核。予考弇州云：‘李杜歌行之妙，冠于盛唐，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

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绝者，子美也。'确士云：'七言古诗，李供奉鞭挞海岳，驱走风霆，非人力可及，为一体。杜工部沉雄激壮，奔放险幻，如万宝杂陈，千军竞逐，天地浑奥之气，至此尽泄，为一体。'分论两家，各肖其妙，较胡氏为胜。虽胡氏亦尝分别李杜之歌行，曰：'阖辟纵横，变幻超忽，歌也。位置森严，筋脉联络，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此又不免强别歌行以状李杜耳。且胡氏谓'李杜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尤不然。诗各有体，体各有才，才各宜尽，谓'李杜之才不尽于古诗'，将子建渊明歌行绝少，其才犹有未尽者耶？无怪乎谓子建渊明，与李杜为判不相入也，无怪乎谓李杜七古廓大于汉魏，而古质不及也。盖胡氏以貌论诗，不知古诗歌行，貌分而才一，故亦不知丰约文质，貌异而神融，殆所谓皮相之士也耶？至张氏笃庆，又谓'初唐七古，转韵流丽，动合《风》《雅》，为正体。工部一气奔放，宏肆绝尘，为变体'。此又扬何信阳、李沧溟之余波，予已辨于《李诗说》中，不更赘矣。"（《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潘德舆一一审查了历来关于杜甫七古的代表性观点，皆有批驳和吸收，提出杜甫七古与李白相敌的观点，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研究杜甫的接受史。杜甫对古代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极大，清代是封建社会的末期，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研究杜甫条件最好，时间、空间最广阔。清代很多学者都对杜甫对后世的影响做过研究，对杜甫的接受史做过研究。其中，王士禛的研究尤为突出。其研究接受史特点有三：第一，研究涵盖了杜甫身后所有的时代，即对唐、宋、元、明、清都进行了研究。研究人数众多，论述的人数在三四十人之上，很多古代受影响的重要诗人都论述到了。如此大规模的、系统的接受史研究，颇像一部接受简史。虽然他的论述是散见于其著作中的。第二，别致的研究思路和方

法。他主要是研究七言的杜甫接受史。他把诸家七言长句中善于学习杜甫的代表性作品抄在一起，供人们研究。他下这样深的功夫来研究接受史，其论述自然独到而精彩。第三，关于同时代的清代著名文人的杜甫的接受史的研究更值得重视。他是著名文艺理论家与文人，他对同时文人的接受史的论述，有特别的分量。特别是关于钱谦益、其兄王士禄的论述，更有价值。总之，清代研究杜甫接受史，大大超过前代，在深度和广度上又有所拓展。

二 钱谦益

一

钱谦益（1582 — 1664），字受之，常熟（今江苏常熟）人。明万历中进士，授编修。博学工词章，名隶东林党。天启中劾罢之。崇祯元年起官，不数月至礼部侍郎。后削籍归。农民义军攻陷北京，明臣议立君江宁。钱谦益阴推戴璐王，与马士英议不合。福王立，俱得罪。上书诵马士英功，马士英引为礼部尚书。复力荐阉党阮大铖，阮大铖遂以之为兵部侍郎。清顺治三年，豫亲王多铎定江南，钱谦益迎降，命为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俄乞归。五年，凤阳巡抚陈之龙获黄毓祺，钱谦益坐与交通，诏总督马国柱逮讯。钱谦益诉辩，得放还。以著书自娱，越十年卒。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大文豪，大学者。与吴伟业、龚鼎孳号称江左三大家。家富藏书，藏绛云楼中。晚年归心佛教。其文集曰《牧斋集》、《初学集》、《有学集》。乾隆三十四年，因乾隆皇帝睹其诗文语涉诽谤，斥为反复小人，诏令毁板（事见《清史

稿》卷四八四本传等)。

钱谦益非常喜好杜诗，后半生研究杜诗甚力，积三十余年始成《杜工部集笺注》(又名《草堂诗笺》、《钱注杜诗》)，倾注了大量心血。钱遵王云：“此我牧翁注杜诗也，年四五十即随笔记录，极年八十书始成。得疾着床，我朝夕守之，中少间，辄转喉作声曰：‘杜诗某句，尚有疑义。’口占析之以属我，我执笔登焉。成书而后，又千百条。临属纩，目张，老泪犹湿，我抚而拭之曰：‘而之志有未终焉者乎？而在而手，而亡我手。我力之不足，而或有人焉足谋之，而何恨!’而然后瞑目受含。”(季振宜《钱注杜诗序》)足见钱谦益对《钱注杜诗》的珍爱和出版的重视。

钱谦益最早研究杜诗的著作是《读杜寄卢小笺》三卷和《读杜寄卢二笺》二卷。其成书和卢世潅的交往有关。钱谦益云：“归田多暇，时诵杜诗，以销永日。间有一得，辄举示程孟阳。孟阳曰：‘《杜千家注》谬伪可恨，子何不是正之，以遗学者。’予曰：‘注诗之难，陆放翁言之详矣。放翁尚不敢注苏，予敢注杜哉?’相与太息而止。今年夏，德州卢户部德水，刻《杜诗胥钞》，属陈司业无盟寄余，俾为其序。……漫录若干则，题曰《读杜寄卢小笺》，明其因德水而兴起也。因《小笺》，‘不贤者识其小也’。寄之以就正于卢，且道所以不敢当序之意。癸酉腊月，虞方老民钱谦益上。”(《读杜小笺自识》)《钱注杜诗》则是一部系统笺注的巨著，可以视为《读杜寄卢小笺》和《读杜寄卢二笺》的全新发展。《钱注杜诗》原稿本拟和朱鹤龄的杜诗研究合写成一书出版，由于朱鹤龄对钱谦益的笺注删削过多，更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和声名之争等原因，钱谦益决定将《钱注杜诗》稿索回，以后独立出版。钱谦益云：“余为《读杜笺》，应卢德水之请也。孟阳曰：‘何不遂及其全。于是取伪注纰缪，旧注之踳驳者，

痛加绳削。文句字义，间有诠释，藏诸箧衍，用备遗忘而已。吴江朱长孺苦学强记，冥搜有年，请为余摭遗决滞，补未逮。余忻然举元本畀之，长孺力任不疑，再三削稿，余定其名曰朱氏补注。’”“然长孺心力专勤，经营惨淡，令其久锢不传，必将有精芒光怪下六丁而干南斗者，则莫若听其流布，而余为凭轼寓目之人，不亦可乎？族孙遵王谋诸同人曰：《草堂笺注》元本俱在，若《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而今珠沉玉锢，晦昧于行墨之中，惜也。’考旧注以正年谱，仿苏注以立诗谱，地里姓氏，订讹斥伪，皆吾夫子独立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慎也。字句诠释，落落星布，取雅去俗，推腐致新，其存者可咀，其阙者可思。若夫类书谰语，掇拾补缀，吹花已萎，哕饭不甘，虽多亦奚以为。今取笺注原本，孤行于世，以称塞学士大夫之望，其有能补者续者，则听客之所为。道可两行，罗取众目，瑕则相资，颣无相及，庶几不失读杜之初旨，而亦吾党小子之所有事也。余曰：有是哉！平原有言，‘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此千古通人之论也。因循遵王之请，而重为之序，以申道余始终不敢注杜之意。”(《草堂诗笺原本序》)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钱谦益借钱遵王之口对自己《钱注杜诗》所作的崇高评价。《草堂诗笺》的写作有很复杂的个人政治背景。钱谦益在明朝做高官，投降清朝仍为高官，是一个没有气节的人。但他内心很复杂，降清后又暗中与当时的反清势力联系。郑成功攻南京失利回师，钱谦益拟杜甫《秋兴八首》作诗124首以抒发感叹，说明他心中仍然眷恋着明朝。有的学者认为钱谦益投降清朝时充当卧底，是为了反清复明。而通观钱谦益一生的政治表现，他并非一个有操守与卓识的人，故我们不取反清复明志士之说。我们认为他是一位有着故国之思的贰臣。钱谦益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作《草堂诗笺》，虽未

明显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实际上是倾注自己的思想感情于笺注中。钱谦益说："余之注杜，实深有慨焉，而未能尽发也。"(《钱注杜诗·例略》）所以，钱谦益正是借《草堂诗笺》表现自己投降后对明朝的忠贞，表现自己失掉气节后的操守。这实际上是借注杜以明志，不过做得很隐秘，从《草堂诗笺》字里行间很难看出端倪来。只有了解他的经历和思想，只有了解《草堂诗笺》的写作目的和背景，才能从《草堂诗笺》中体味出来。

二

钱谦益的《草堂诗笺》(《杜工部集笺注》）是杜甫研究史上一部非常有分量、非常有影响的著作。

《草堂诗笺》体例完备，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附录。(一）精选唐宋时诗话，作为有关杜甫和杜诗的重要评论参考资料。(二）辑录唐代有关杜甫的"唱酬题咏"，作为重要参考资料。(三）诸传集序：元稹作杜甫墓铭、旧唐书本传；樊晃、孙仅、王洙、王淇、胡宗愈、吴若等序跋。(四)《少陵先生年谱》。前有杜甫世系，所作杜甫生平系年比较平实准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时事"一项，将当时发生的国家与社会大事进行系年，与杜甫的生平对应参照，可以使人了解杜甫生平和作品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达到知人论世的目的。同时，年谱还列诗系年一项，将能准确系年的诗进行系年，使人们可以看出杜诗"诗史"的特色。这样的体例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第二部分是正文。(一）对正文进行校勘。(二）注。(三）笺。

现在我们着重谈谈其校、注和笺。

《草堂诗笺》选用底本很好，校刊也精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杜诗读本。钱谦益经过认真比较，选用宋版吴若本为底本。他说："杜集之传于世者，唯吴若本最为近古，他本不及

也。"（《钱注杜诗·略例》）钱谦益学识渊博，藏书极富，他选吴若本为底本，确实是有眼光的，是正确的。同时，钱谦益照录原吴若本的校语，又做了一些新校。《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钱注杜诗》卷一，以后略去书名）"珊瑚"校："一云三珠。""春寒野阴春景暮"校："一云花繁草青春日暮。""是征路"校："一作引归路。""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贵何如草头露"校："一云：我欲苦留君富贵。何如草头易晞露。""照"校："荆作点。"在全诗的结尾，有校云："一本云：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书卷长留天地间，钓竿欲拂珊瑚树。我拟把袂苦留君，富贵何如草头露。深山大泽龙神远，花繁草青风景暮。仙人玉女回云车，指点虚无引归路。若逢李白骑鲸鱼，道甫问信今何如。"《寄裴施州》（卷六）"此"校："一作比。""衡"校："英华作珩。""感"校："晋作减。""羔"校："一作丝。""龙蛇"校："刊作蛟龙。""辞"校："一作辟。""后来况接才华盛"校："英华此句下有遥忆书楼碧池映七字。"《草堂诗笺》不仅在正文中有校，注中有时也有校。《天育骠骑歌》（卷一）"守天育"注："胡仔曰：东坡书此诗，作'字天育'。郄昂《马坊颂碑》：唐初得马于赤岸泽，命张万岁傍陇右驯字之。从'字'为是。"《赠卫八处士》（卷一）注："近时胡俨曰：常于内阁见子美亲书《赠卫八处士》诗，字甚怪伟，'惊呼热中肠'作'呜呼热中肠'。"以书和碑来校，足见钱谦益对校勘的重视。从版本上说，《草堂诗笺》确实是一个好版本。

《草堂诗笺》的注非常有成绩。它对以前的注进行了清理。他说："注家错谬，不可悉数。"并举例：曰伪托古人，曰伪造故事，曰傅会前史，曰伪撰人名，曰改窜古书，曰颠倒事实，曰强释文意，曰错乱地理。他对正确的注进行了吸收，对伪注、错误的注，或有部分错误的注，进行改正，还自创了很多新注。

钱谦益的注有四大特点：

第一，注释比较准确，引证材料信实丰富。《遣兴三首》（卷三）其二“南望马邑州”注“马邑”：“唐志：马邑州，开元十七年置，在秦、成二州山谷间。宝应元年，徙于成州之盐井。故城隶秦州都督府。《中州集·祝简廉夫诗说》云：鲍钦止注此诗云：马邑州在成州界。旧注，马邑州在雁门，与子美作诗处，全无关涉。”引《唐书·地理志》注马邑州，非常有力，又引《中州集》说明宋人已有马邑州在秦、成二州山谷间之注，并说明旧注马邑州在雁门的错误。《戏赠阌县秦少公短歌》（卷二）“多才依旧能潦倒”注：“潦倒：《北史·崔瞻传》：魏天宝以后，重吏事，谓容止蕴藉者为潦倒，而瞻终不改焉。此正用《北史》语。能潦倒，犹言其蕴藉如故也。”不泛注“潦倒”的一般含义，而引有关“潦倒”为“蕴藉”之意的书证，专释其蕴藉之意。所注确切、精炼，不枝不蔓。

第二，考证性地注，对所引材料的错误加以辨析，力求注释准确、深入。《醉时歌》题下原注：“赠广文馆博士郑虔”注：“郑虔：《旧书》：天宝九载，国子监置广文馆。《唐语林》云：天宝中，国学增置广文馆，以领词藻之士，郑虔久被贬谪，是岁始还京师参选，除广文馆博士。虔闻命，不知广文曹司何在。执政谓曰：广文新置，总领文词，故以公名贤处之，且令后代称广文博士自郑虔始，不亦美乎？遂就职。按，广文馆于国子监增置，故云不知曹司所在。《新书》云：久之，雨坏庑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非实录也。《长安志》：韩庄在韦曲之东，退之与孟郊赋诗，又送其子读书之所也。郑庄又在其东南，郑十八虔之居也。《通志》：郑庄即郑虔郊居，李商隐有过郑虔旧隐诗。”注指出新书言郑虔寓国子监之误，而考出郑虔之居在长安韦曲之东南，这对于我们阅读杜诗“石田茅屋荒苍苔”的诗句颇为有益。《寄裴施州》（卷六）注：“裴施州：裴冕。宝应

元年以右仆射充山陵使，坐附李辅国，贬施州刺史，数月移澧州。大历中，复征为左仆射。元载撰冕碑云：以直遇坎，牧蛮夷者二。大历四年冬，复诏入相，薨于长安，按，冕自施召还，当在大历二年之间。二年二月，史已载左仆射裴冕置宴于子仪之第，碑但记其入相之年也。史称自施移澧，碑不详其先后，以公诗考之，冕盖久于施州，当是自澧移施也。史于移官先后，如高适彭蜀，严武巴绵之类，每多错误，皆当据公诗考证之。”根据杜诗和史料比勘印证，认为裴冕是由澧州刺史改任施州刺史，而非如史言由施州刺史改任澧州刺史，所言颇为有理。这对于阅读杜诗非常有益，同时还可以纠正史书记载之谬。像这样的注，无论其注的态度、眼光、方法，都远远高于一般注家。

第三，注非常注意利用唐代有关材料，突出其有关唐代现实方面的内容。杜诗是表现唐代现实的，故用唐代有关材料来注，最为贴切，最为得体。《北征》（卷二）“寂寞白兽闼”注：“白兽闼：《三辅黄图》：未央宫有白虎殿。《王莽传》：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北虎门。《山堂考索》：开元中，鹳鸽集白虎庭木，则唐亦有白虎之号也。颜鲁公《康使君碑》：父国安，直崇文馆，大学助教。迁博士，白兽门内供奉，崇文馆学士。”唐代宫廷有白兽门，殆由白虎演变而来。用颜真卿所作碑“白兽门”注杜诗“白兽闼”，非常准确。《九成宫》（卷二）注：“九成宫：《寰宇记》：在麟游县西一里，本隋仁寿宫。开皇十三年，杨素于岐山北建。平山堙谷，馆宇相属，督役严急，作者多死。高祖不悦。及幸新宫，游观乃喜。贞观五年复旧宫，以备清暑。改名九成宫。”“迹是雕墙后”注：“雕墙：魏征《九成宫醴泉铭·序》：九成宫，隋之仁寿宫也。冠山杭殿，绝壑为池。跨水架楹，分岩竦阙，高阁周建，长廊四起，栋宇胶葛，台榭参差，仰视则迢递百寻，下临则峥嵘千仞。珠璧交映，金碧相辉。照灼云霞，蔽亏日

月。观其移山回涧，穷泰极侈，以人从欲，良足深尤。”这些注使读者对唐代九成宫的来历及盛况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和杜诗写的九成宫兴衰形成鲜明对比，增强兴衰之感。本来，“雕墙”一语勿须注，但钱谦益用魏征《九成宫醴泉铭·序》注后，使杜诗的内涵更丰富了，这就是钱注的高明之处。

第四，非常重视对有关政治时事的注。杜诗的最大特点是对社会生活和国家大事的迅速反映。钱谦益注重视诗所表现的重要时事政治，非常有利于对诗的政治时事内容的理解。《洗马兵》（卷二）“中兴诸将收山东”注：“收山东：十月，广平王统郭子仪等，与贼战于陕城之新店，官军与回纥夹击，大败之。安庆绪自苑门夜遁，走河北，保邺郡，广平王入东京。”“独任朔方无限功”注：“朔方：《旧书》，玄宗大阅六军，南趋关辅，至彭原郡。房琯败于陈陶斜，方事讨除而军半殪，唯倚朔方军为根本。”“常思仙仗过崆峒”注：“崆峒：《雍录》：崆峒山，在原州高平县，即笄头山，泾水之所以发源也。《元和志》，陇山在陇州，陇山之北即灵州，灵州即灵武也。肃宗即位灵武，南回至原州入，即崆峒在回銮之地矣。《南部新书》：崆峒山，在松州，属陇州西北界。蜀破，后路不通，即古之空桐也。”“成王功大心转小”注：“成王：乾元元年三月，广平王俶自楚王徙封成王。五月，立为皇太子。”《哀王孙》题下注：“《旧书》，六月九日，潼关不守。十二日凌晨，自延秋门出，微雨沾湿，国忠与贵妃及亲属，拥上出。亲王妃主皇孙以下，多从之不及。平明，既渡渭，即令断便桥。辰时，至咸阳望贤驿置顿。《通鉴》：上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是日百官犹有人朝者。至宫门犹闻漏声。三卫立仗俨然。门既启，则宫人乱出，中外扰攘，不知上所之。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山谷。”“夜飞延秋门上呼”注：“延秋门：《雍录》，玄宗幸蜀，自苑西门出。在唐为苑之延秋门，在汉

为都城直门也。既出，即由便桥渡渭，自咸阳望马嵬而西。《雍录》有汉唐要地参出图，唐禁苑西北，包汉长安故城，未央宫，唐后改为通光殿，而出即延秋门。”“东来橐驼满旧都”注：“橐驼：《史思明传》：禄山陷两京，以橐驼运御府珍宝于范阳。不知纪极。”“朔方健儿好身手”注：“朔方，哥舒翰将河陇朔方兵及蕃兵，共二十万拒贼，败绩于潼关。”“窃闻天子已传位”注：“传位：天宝十五载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安禄山事迹》：禄山深宫高居，残虐日恣，酷如狼虎，百姓骚然，间牒日至，士庶潜议亡归。知肃宗即位灵武，皆企官军。相传曰：皇太子从西来也。人皆奔走。市肆为空。”“圣德北服南单于”注：“南单于：《光武纪》：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于是分为南北匈奴。建武二十五年，南单于遣使诣阙贡献，奉藩称臣。开元中，玄宗使郭知运讨逐回鹘，退保乌德健山，南去西域一千七百里。肃宗即位，九月，南幸彭原，遣使与回鹘和亲。二载二月，其首领入朝。”从这些注释我们可以了解杜诗的内容与当时政治军事局势之间的关系，深刻认识杜诗的现实主义内涵。同时，这些注与笺的内容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更难能可贵的是，很多笺证都有少见的材料和不同寻常的见解。《潼关吏》（卷二）“慎勿学哥舒”注：“哥舒：初，哥舒翰请坚守潼关。郭子仪、李光弼亦谓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不可轻出。玄宗信国忠之言，遣中使趣之，项背相望。翰不得已，抚膺恸哭，引兵出关。然则潼关之失守，岂翰之罪哉。公诗曰‘慎勿学哥舒’，其意归责于趣战者也。”其材料与看法都与一般注不同，使人耳目一新。

《草堂诗笺》的注也有未谛处。首先是注与内容不合。《九日寄岑参》（卷一）“畴能补天漏”注：“天漏：《梁益记》：大小漏天，在雅州西北。《寰宇记》：邛都县漏天，秋夏常雨。僰道有大漏天，小漏天。”用“漏天”注“天漏”，不确切。杜甫时在长

安，尚未入蜀，对蜀中是否有漏天这样的故事并不一定知晓。这样注杜，是不能令人首肯的。当然这只是沿袭前人的错误。有些注不够详细。《七月三日亭午已后较热退晚加小凉稳睡有诗因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健步闻旱魃”注：“旱魃：《神异经》：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走行如风，名曰魆。注曰：俗曰旱魃。”杜诗是否用此典，很难说，至少此典与杜诗含义有不一致处。而旱魃即旱鬼，杜诗即用此意。《诗·大雅·云汉》：“旱魃为虐，如惔如焚。”《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止不雨。”虽不是僻典，但注出来似乎更完整些。有些注有曲解文意和牵强附会的地方。《洗马兵》（卷一）“鸡鸣向寝龙楼晓”本是颂扬肃宗向玄宗问安，而钱注却认为是讽刺肃宗对玄宗虚情假意，不能尽子道。其注云：“问寝：肃宗即位，下制曰：复宗庙于函洛，迎上皇于巴蜀。道銮舆而反正，朝寝门而问安，朕愿毕矣。上皇至自蜀，即日幸兴庆宫。肃宗请归东宫，不许。此诗援据寝门之诏，引太子东朝之礼以讽喻也。鹤驾龙楼，不欲其成乎为君也。颜鲁公《天下放生池碑》云：迎上皇于西蜀，申子道于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问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礼。东坡云：鲁公知肃宗有愧于是，故以此谏也。《高力士传》：太上皇至凤翔，贼臣李辅国诏收随驾甲仗。上曰：临至皇城，安用此物。悉令收付所由。辅国趋驰末品，小了纤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云霄之上，欲令猜阻，更树动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所注虽不错，却与杜诗本意背道而驰。

笺是钱谦益对杜诗深刻内涵的阐释。特别是对杜诗涉及政治时事的内容，阐释尤多。其特点是引据史实，结合诗的内容，说明杜诗真实、深刻的含义，也抒发自己的见解与感情。《哀王孙》笺曰：“至德元载九月，孙孝哲害霍国长公主，永王妃及驸马杨

驲等八十人，又害皇孙二十余人，并刳其心，以祭安庆宗。王侯将相扈从入蜀者，子孙兄弟虽在婴孩之中，皆不免于刑戮。当时降贼之臣，必有为贼耳目，搜捕皇孙妃主以献者，不独如孝哲辈为贼宠任者也。故曰‘王孙善保千金躯’，又曰‘哀哉王孙慎勿疏’。危之也，亦戒之也。有宋靖康之难，群臣为金人搜索，赵氏遂无遗种。读此诗，如出一辙。”通过钱谦益所引的史料和对此问题的阐述，使我们对诗所写的时事背景、诗的主旨、其深刻的内涵都有深刻的了解，进而对亡国之君的家族大遭杀戮这一历史现象有所认识。这样的笺无疑对读者阅读杜诗非常有益。《塞芦子》（卷二）笺曰：“是时贼据长安，史思明、高秀岩重兵趋太原，崤函空虚。公以为得延州精兵万人，塞芦关而入，直捣长安，可以立奏收复之功也。首言五城荆杞，惜其单虚，无兵可用也。思明自博陵寇太原，舍河北而西，故曰割怀卫。秀岩自大同与思明合兵，故曰西未已。二贼欲取太原，长驱朔方河陇，而长安西门之外，皆为敌垒，故曰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也。急驱塞芦子，言塞芦子而疾驱长安，非壅塞之塞也。薛景仙守扶风，关辅响应，取道扶风，与景仙合力，则收复尤易也。故曰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此公之深意也。王深父以为不当撤西备而争利于东，宋人又有塞芦子以拒吐蕃者。荆公极推深父，不应无识至此，此诗所论，乃至德二载未收京时事，与留花门似非并时之作，或事后追记之也。”钩微抉隐。阐述安史之乱中，杜甫分析当时形势，提出用精兵一万，从塞芦子取长安的军事战术。这也就是《塞芦子》的主旨。《入奏行》笺曰：“剑南自玄宗还京后，于绵益二州，各置一节度，百姓劳弊。高适为蜀州刺史，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论之，请罢东川节度，以一剑南西山之不急之城，稍以灭（减）削，疏奏不纳。公以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亦请罢东川兵马，悉付西川，与适议合。而是时适在成都，与公往

来草堂，则罢西川捐三城之奏，适盖与公谘议而后行也。此诗云‘此行入奏计未小’，盖适以此疏托侍御入奏。故题曰入奏行也。‘兵革未息’以下，隐括入奏之语。‘江花未落’以下，望其奉圣旨以苏蜀民，相与沽酒相贺。白饭青刍，下及马奴，宴喜之至也。”深刻揭示了诗的内涵，阐释了杜甫的军事和政治主张，表明了诗的重要意义。

笺中也有很多穿凿附会的东西。最典型的是《洗马兵》。《洗马兵》笺曰：“《洗马兵》，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首叙中兴诸将之功，而即继之曰‘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崆峒者，朔方回銮之地，安不忘危，所谓愿君无忘其在莒也。两京收复，銮舆反正，紫禁依然，寝门依然。整顿乾坤皆二三豪俊之力，于灵武诸人何异。诸人徼天之幸，攀龙附凤，化为王侯，又欲开猜阻之隙，建非常之功，岂非所谓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者乎。斥之曰‘汝等’，贱而恶之之辞也。当是时，内则张良娣、李辅国，外则崔圆、贺兰进明辈，皆逢君之恶，忌疾蜀郡元从之臣，而玄宗旧臣，遣赴行在，一时物望最重者，无如房琯、张镐。琯既以进明之谗罢去，镐虽既相而旋出，亦不能久于其位。故章末谆复言之。‘青袍白马’以下，言能终用镐，则扶颠筹策，太平之效，可以坐致如此。望之也，亦忧之也，非寻常颂祷之辞也。‘张公一生’以下，独详于张者，琯已罢矣，犹望其专用镐也。是时李邺侯亦先去矣。泌必琯镐一流人也。泌之告肃宗也，一则曰：陛下家事，必侍上皇。一则曰：上皇不来矣。泌虽在肃宗左右，实乃心上皇。琯之败，泌力为营救，肃宗必心疑之。泌之力辞还山，以避祸也。镐筹终用，则泌亦当复出，故曰‘隐士休歌紫芝曲’也。两京既复，诸将之能事毕矣，故曰‘整顿乾坤济时了’。收京之后，收兵马以致太平，，此贤相之任也。而肃宗以谗猜之故，不能信

用其父之贤臣，故曰‘安得臣壮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盖至是而太平之望亦邈矣。呜呼伤哉！”其实，《洗马兵》表达的思想是在扫荡安史之乱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希望彻底平息战乱，实现天下太平，国家长治久安。说“《洗马兵》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完全是想象之辞，没有丝毫根据。如果诗果真是刺肃宗，那“成王功大心转小”又作何解释？而且《洗马兵》的题目完全与“刺肃宗”的用意无关。所以，钱谦益说《洗马兵》是刺肃宗，完全是穿凿附会。可惜的是，这种说法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称道，说明穿凿附会往往是能迷惑人的，因为它满足了人们求新求异的学术审美需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卷一）：“三山老人曰：此诗讥切天宝时事也。‘秦山忽破碎’喻人君失道也。‘泾渭不可求’云云，言清浊不分，而天下无纲纪文章也。虞舜苍梧，思古之圣君而不可得也。瑶池日晏，言明皇方耽于淫乐而未已也。贤人君子多去朝廷，故以黄鹄哀鸣比之。小人食禄恋位，故以阳雁稻粱刺之。笺曰：高标烈风，登兹百忧，岌岌乎有漂摇崩析之恐，正起兴也。‘泾渭不可求’，长安不可辨，所以回首而思叫虞舜。‘苍悟云正愁’，犹太白云‘长安不见使人愁’也。唐人多以王母喻贵妃，瑶池日晏，言天下将乱，而宴乐之不可以为常也。程嘉燧曰：玄宗游宴，贵妃皆从幸，苍悟云正愁，暗指二妃之事，故以瑶池日晏惜之。”钱谦益继承前人比兴说诗之说，加以发挥，有些地方将政治时事强行类比，仍失之穿凿，特别是对于一些具体诗句的解说，穿凿得近乎荒唐，如“瑶池日晏，言天下将乱”之类。而这首诗的真正主题是表现杜甫对盛世隐含各种危机的忧虑，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钱谦益的笺对杜诗主旨的把握是不大准确的，因而有时对具体诗句的笺释也就乖离本意甚远。钱谦益在笺中所运用的阐释方法，主要是以史证诗的方法。所谓以史证诗，即用历

史事实来阐明自己对杜诗解说的正确。杜甫的诗充分反映了现实与时事，以史证诗，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杜诗。以史证诗的方法产生得很早，宋人已用来研究杜诗。但钱谦益运用得更多，更系统，更纯熟，更精微，因而成为他笺注的重要特色。然而，以史证诗是把双刃剑，运用不当，则会带来严重后果。以史证诗必须建筑在对诗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上。一旦对诗的理解有误，以史证诗也会使笺走得更远。学术研究需要才、学、识的结合，只有才、学、识俱佳的学者，才能创造出完美的学术著作。钱谦益的才和学都达到很高的境界，但他思想复杂，人品不高，来研究杜甫这样一位品德高尚、儒家思想淳厚的人及其作品，自然会有很多谬误和偏差。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本来有些见解就离杜诗的本意甚远，用史一证，就更荒唐。浦起龙说："老杜天姿惇厚，伦理最笃。虞山轻薄人，每及明皇晚节，肃宗内蔽，广平居储诸事迹，率以私智结习，揣量周内，因之编次失伦，指斥过当。"（《读杜心解·凡例》）赵翼说："余读《钱谦杜诗》，而知钱之为小人也。少陵'鄜州月'一诗所云'儿女'者，自己之儿女，钱以为指肃宗与张后而言。则不特心术不端，而且与下文'双照泪痕干'之句，亦不连贯。善乎黄山谷之言曰：'少陵之诗，所以独绝千古者，为其即景言情，存心忠厚故也。若寸寸节节皆以为有所刺，则少陵之诗扫地矣。'"（《瓯北诗话》）正是由于研究者思想的原因，造成《草堂诗笺》在笺和注方面都有很多错误。

但是，总的来说，《草堂诗笺》是杜甫学术史上水平非常高的一部杜诗注释著作。事典语典、人物地理、典章制度、史实时事，皆注释的确，引证富赡，论证精详。而有关对杜诗的理解的笺和注，则有不少瑕疵，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黄生说："钱牧斋笺注杜诗，引据该博，矫伪钲伪，即二史（按，指《新唐书》和《旧唐书》）之差谬者，亦参互考订，不遗余力，诚为本集大

开生面矣。”（《杜诗说·聂耒阳》）潘耒说：“牧斋学问闳博，考据精详，家多秘书，兼熟内典。其笺杜也，钩稽奥义，抉择异闻，他人所不能注者一一注出，诚有功于少陵矣。其斥旧注之病数条，尤为切当。但钱氏求新太过，亦时有此失。如以‘黄河十月冰’为椟盖之冰（《武卫将军挽歌》其二，钱引《左传》杜预注），塞芦子非雍塞之塞，以‘煎胶续弦’为美馔愈疾，以范叔归秦为欲去国忠，以关张耿邓为自喻，以‘前后三持节’为杜鸿渐，种种曲解，皆迂僻难通，所谓目睹秋毫不能目见其睫也。然文义小失，犹无大害，唯其自矜独得，所谓‘凿开鸿蒙，手洗日月’者，乃谓少陵不满于肃宗，多所讥切，《洗马兵》、《收京》诸作皆刺诗，‘鹤驾龙楼’，朱虚商老，两宫警跸，一德兴王，文公赏从，禹功命子，种种无非讥讽，此则伤教害义之大者。谬说流传，或至坏人心术，余故一一标出，欲读者毋味其甘而忘其谬也。”（《书杜诗钱笺后》，《遂初堂文集》卷一一）评价非常允当。

钱谦益生在明末清初，在当时文化界有着非常高的地位。他的《草堂诗笺》对清代的杜甫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开清代杜甫研究风气之先。激起很多学者对杜诗研究的强烈兴趣，很多学者希望通过杜诗研究来施展自己的研究才能，并借杜诗研究来表现自己的学术观点与思想。

（二）对清代杜诗研究方法产生重要影响。其注和笺的方法对清代的研究有直接影响，特别是以史证诗的方法影响尤大。不仅影响了杜诗的研究，而且对整个古代文学的研究，乃至其他学科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影响。

（三）其研究的成果为清代杜甫研究学者所运用和借鉴，几乎清代重要的杜诗研究学者，都吸收和借鉴了其杜诗研究成果，推动杜甫研究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向前发展。

三　卢世㴶

一

卢世㴶（1588—1653），字德水，号紫房，晚年自称南村病叟。祖籍河北涞水，改监察御史，督漕运。入清，拜监察御史。征诣京师，以病废归辞。卢世㴶嗜饮剧谈，善为诗文，作品收入《尊水园集略》。

卢世㴶自青年时学诗，案头常有杜甫诗一部。一生读杜四十余遍。与人会晤，辄谈杜诗。在所居尊水园建杜亭，设杜甫像祀之，自号杜亭亭长。其杜甫研究著作有《杜诗胥钞》十五卷，《余论》一卷。后又将《杜诗胥钞》的《大凡》与《余论》编为《读杜私言》。卢世㴶是一位有建树的杜甫研究学者。

二

《杜诗胥钞》的得名缘于杜甫的诗。卢世㴶云："子美《别李八秘书》有句云：'乞米烦佳客，钞诗听小胥。'余不敏于子美，无能为役，第谨操觚管充胥史（吏）之任而已。"（《杜诗胥钞大凡》）《杜诗胥钞》其实就是杜诗有选择的抄本，明白地说，就是杜诗的一个选本。然而，它也是一部重要的杜诗研究著作。其《大凡》和《余论》是卢世㴶长期研究杜诗的心得，发明很多。因此，《杜诗胥钞》是杜甫学术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

我们先谈选。

《杜诗胥钞》是一部巨型杜诗选本。所选诗占杜诗总量的十

分之七八。卢世潅云："余钞杜诗，止去十之二三，视诸家选本，最为繁富。"（《杜诗胥钞大凡》）选这样多的作品，在杜甫选本中是仅见的。选本占作品总量这样大的比例，在选本中也非常罕见，这正表现了卢世潅对杜诗的珍爱，不忍轻易割舍。卢世潅选诗有自己的眼光，有自己的标准，不随波逐流。《同谷七歌》是公认的杜甫的优秀作品，他就是不选。"乃毅然芟《同谷七歌》者，盖不敢不芟也。其不敢不芟，奈何难言也。第使称诗者取《同谷七歌》与《曲江三章》潜心絜度，而思过半矣。"（《杜诗胥钞大凡》）卢世潅的做法有他的道理。这样选出来的作品表现出选者鲜明的倾向与理念。《杜诗胥钞》共十四卷，第一至五卷为五言古诗，第六至七卷为七言古诗，第八至十一卷为五言律诗，第十二卷为七言律诗，第十三卷为五言排律，第十四卷为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杜诗胥钞》按体编排，再按年编排。卢世潅认为"（《草堂诗笺》）编次最有法，盖取子美作诗岁月之先后，以为定本，一展卷而历履了然"，故取《草堂诗笺》为其系年的主要依据。总之，《杜诗胥钞》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杜诗选本。

现在谈谈卢世潅的杜甫研究。

由于卢世潅长达数十年进行杜甫研究，又由于他的研究成果是附丽于《杜诗胥钞》的，故其研究主要表现为宏观研究的特点。在研究方法上，以诗的分体为视角，将整体研究、分体研究、群体研究、个体研究结合起来，形成鲜明的学术风格。

所谓卢世潅的杜甫研究，其实包括两方面：其一是对杜甫的全面研究；其二是对杜甫作品的全面研究。二者是有区别的，又是有机结合的。"《大凡》专论杜之人品，而间及于诗。《余论》概括杜之诗品而想见其人。此两者同出而异名，交含而互映者也。"（《杜诗胥钞余论跋》）

卢世潅认为杜甫所以成为最伟大的诗人，是因为他"忠厚恻

怛”，“浩气独完”。关于这些，他在论杜诗的时候有详细论述，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也放在论诗部分论述。

卢世淮对杜甫的性格有很多独到的论述。他认为杜甫是大侠，“子美千古大侠，司马迁之后一人。子长为救李陵而下腐刑，子美为救房琯几陷不测，赖张相镐申救获免。坐是蹉跌，卒老峡外，可谓为侠所累。然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而成《史记》，与天地相终始。自发秦州以后，诸作泣鬼疑神，惊心动魄，直与《史记》并行，造物所以酬先生者正自不薄”（《杜诗胥钞大凡》）。从侠客是奋勇救人于危难之中来说，杜甫确实堪称大侠。此观点新奇而不失为有据。卢世淮的论述也非常好。因救房琯而贬官，进而造成漂泊的一生，确实是杜甫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卢世淮认为杜甫狂肆、傥宕。“子美最傥宕，自表其能，上之天子。谓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尚可跂及，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诸？自东方朔以来，斯趣仅见。载观其《遣怀》、《壮游》诸作，又谓许身契稷，致君尧舜，脱略时辈，结交老苍，放荡齐赵间，春歌冬猎，酣视八极，与高李登单父台，感慨骏骨，龙媒赋诗，流涕上嘉吕尚傅说之事，来碣石，万里风至。于闺房儿女悲观细碎情状，尽写入《北征》篇中，与经纬密勿，收京平胡参伍错杂，不复知有旁观，固是笔端有胆，亦由眼底无人。古之狂也肆，子美有焉。”（《杜诗胥钞大凡》）论述非常精彩。杜甫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正缘于他的自信和创新，这与他的性格确实有非常大的关系。卢世淮用一个“辣”字来概括杜甫的性格。“子美性极辣，惜未见诸行事。《雕赋》一篇，辣味尽露。所云重其有英雄之姿，类大臣正色立朝之义。可谓善于立言。《义鹘行》是其一生心事，偶遇好题，遂不觉淋漓痛快，至功成用舍之际，何其撇脱，几于神龙见首不见尾矣。高鸟奇文，并传不朽。”所谓“辣”，就是敢作敢为，富有激情。这样的性格在杜甫的作品中确

实表现得非常明显。卢世㴶对杜甫性格的论述是独到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充分表现了他对杜甫不同寻常的深刻研究。而对杜甫性格的研究，对于理解杜甫的作品非常有益。

下面谈谈卢世㴶对杜甫作品的研究。

卢世㴶非常重视对杜甫思想品格的研究。他对杜甫思想品格的论述往往与对作品的思想论述联系在一起。卢世㴶是从儒家的思想观点来评价杜甫的思想与人品的。他特别推崇杜甫所具有的淳真的儒家忠爱仁义的思想、忠厚恻怛的精神。关于杜甫的忠爱与仁义，前人论述颇多，卢世㴶往往有新的视角。“《赴奉先县》及《北征》，肝肠如火，涕泪横流。读此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忠。”（《杜诗胥钞余论·论五七言古诗》）从读者共鸣的角度来说明，杜诗强烈的忠君爱国感情，必然会感动读者，令人耳目一新。卢世㴶认为，杜甫是诗人中最仁的人，最具仁爱之心，故他的诗也最温柔敦厚。“《语》云：仁人之言其利溥。又云：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今观子美诗，犹信子美温柔敦重，一本之恺悌慈祥，往往溢于言表。他不具论，即如《又呈吴郎》一首，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示吴郎，又回护吴郎。七言八句，百种千层，非诗也，乃人音也。恻隐之心，诗之元也。词客仁人，少陵独步。”（《杜诗胥钞大凡》）从杜诗最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来说明杜甫在诗人中最具有儒家仁爱之心，角度也非常独特。卢世㴶确实非常善于阐述杜诗所表现出来的深厚的儒家思想，论述杜甫是儒家思想淳厚的伟大诗人。

卢世㴶善于对杜诗进行分类研究，故在内容研究方面也往往有创新。卢世㴶提出，杜甫的诗俨然是一部游记。“夫子美之诗而诗也乎哉！从发秦州至万丈潭，从发同谷县至成都府，入天穿水，万壑千崖，雨雪烟虹，朝朝暮暮，一切可怪可吁，可娱可忆之状，触目惊心，直取其髓，而犁然次诸掌上。嗣是金华观，去

通泉十五里山水，凿石浦、空灵岸、花石戍，晚州、衡州，莫不随处点缀，尽妙佳领，统成少陵一部游记。”（《杜诗胥钞余论·论五七言古诗》）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在记录时代的政治军事大事的同时，也记录自己漂泊的经历，说他的诗是一部游记，完全符合实际。卢世㴶认为在杜诗中常表现出一种自由自在、遁世无闷的精神。“至其独往独来，自由自在，则‘白鸥波浩荡，万里谁能驯’。又曰：‘造幽无人境，发兴自我辈。’又曰：‘相逢半新故，取别随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又曰：‘经过倦俗态，在野无所违。喧静不同科，出处各天机。’又曰：‘用心霜雪间，不必条蔓绿。非关故安排，曾是频幽独。’又曰：‘鄙夫亦放荡，草草频卒岁。’又曰：‘结托老人星，罗浮展衰步。’诸如此类，空明狂爽，又高又真，超然尘埃之外。遁世无闷者，子美也。子美其犹龙乎？”（《杜诗胥钞余论·论五七言古诗》）在人们印象中，杜甫是一位恪守儒家思想、关心国家与社会、热衷政治的人，卢世㴶却为我们揭示出他为人的另一面——空明狂爽，又高又真，多少有些隐逸之情，真是发人之所未发，使我们对杜甫有更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卢世㴶对杜甫的技艺诗（主要是论马与论画诗）有精彩的评论。“若夫马之为物，倜傥（権）奇，高僧爱其神骏。画之一道，氤氲蓬勃，根宗昉之卦爻。少陵于斯二事，往往观天而洞微，约略题咏者，有都护骢马，天育骠骥，韦曹画马，又有瘦马，画则奉先刘少府山水，王宰山水，韦偃双松，丹青引，特赠曹将军霸，而少府两儿郎，亦俱拈出，莫不妙极形容，斩新活现。所云‘巧刮造化窟’，殆少陵自道。其尤关至极者，曰‘顾视清高气深稳’，曰‘卓立天骨深开张’，此相马之秘密也。至‘与人一心成大功，与人同生亦同死’，‘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欷歔震荡，终古彷徨。其曰：‘对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又曰：‘意匠惨淡经

营中。’此观画之骨髓也。至‘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若耶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则由艺会道，形神俱佳，即不展图开卷，胸中自有万顷烟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昭昭乎进乎象矣。”卢世漼认为杜甫关于马和画的诗写得好，是他谙熟相马和画的技艺，并能由此而会道。诗要作得好，很多功夫在诗之外。卢世漼的研究是深刻的，使我们能更全面地认识杜甫和他的诗。

卢世漼还从诗的角度，对杜诗的风格和特点进行了论述。诗歌有各种体裁，杜甫在运用诗歌体裁时往往是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了这些体裁，形成自己的特点。卢世漼论杜甫的七言古诗云：“歌行之有子美，岂非天哉！涉入不得其门径，迎随不见其首尾，世所以题评者亦云殚矣，唯子美自题一语曰‘即事非今亦非古’，最为简当。盖尽少陵七言古诗，皆即事也。自撰题，自和声，自开世界，自隆堂构。无古无今，即今即古，其坐断古今在此，其融会古今亦在此。”“中间无妙不征，有奇必畅，所谓‘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至虫臂鼠肝，俱成龙文犀彩。伟哉诗乎！从有天地以来，仅一子美。”（《杜诗胥钞余论·论七言古诗》）论述有真知灼见。杜甫七言古诗往往反映现实生活，内容多有创新。内容的创新导致形式的创新。因而杜甫的七古在题目、篇章结构、声韵、语言、技巧上都与传统的七古大不同，但它又继承了传统的七古形式与表现技巧。卢世漼论五言律诗云：“五言律至盛唐诸家而声音之道极矣，然未有富如子美者。既富矣，又有用矣。何言乎有用？感天地，动鬼神，讦谟定命，远猷辰告，蒿目时艰，动恤民隐，主文而谲谏，言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此所谓有用文章，乃工声律者所未尝讲，而子美氏之所独饶也。”“准绳最密，神理纵横，淘练极清，奇葩焕发，时而优游雪淡，下泪偏多，时而跌宕风流，关情更笃。分明古训，降

作律诗。以至造化权舆，阴阳昏晓，飞潜动植，表里精粗，但经弱毫微点，靡不真色毕呈。先生自云‘下笔如有神’，良不妄语，他人岂能赞一语哉！只可焚香默诵而已。超前绝后，只古单今，将人世无限情境，俱蟠曲于五言八句，犁然宽然。嗟乎！此杜律也。”（《读杜胥钞余论·论五言律诗》）论述确实高人一筹。杜甫的五言律诗好，首先是它的内容好，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内容广泛而深刻，其次是诗律技巧多样，精微细致。卢世㴶论杜甫的五七言排律云：“排律是诗中别局，大类鼓吹，在子美尤为余事。然盛莫盛于子美，妙莫妙于子美，元微之谓‘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观其云‘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似专此排律而论。夫铺陈排比，千言数百，凡有物料，有笔力者皆能之，正非子美之独绝也。子美所独绝者，在不以排律为排律耳。原其执笔觅纸，初无斗富取盈之心，犹水着地，纵横流漫，任其所止而休焉。自六韵以至百韵，无不可者。顾者犹未足为奇也。试取其五言排律一部，从容研玩，翻觉锋发韵流之余，暗有空翠扑人，冲襟相照，如长筵广坐，绝不参一喧客，绝不杂一饾饤，投壶散佚，行酒赋诗，而奇错间陈，妙香静发，因以净洗排当之洗，一空纷呶之陋矣。故有时孤出一语，天地顿宽，全篇于此复命。有时徐布数联，机神更紧，定局从斯转矣，此子美排律中极大法门，亦天授，非人力，所谓‘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殆先生自作题词耳。”（《杜诗胥钞余论·论五七言排律》）揭示杜诗排律成功的秘诀，非常精到。

卢世㴶对杜甫的诗歌艺术理论进行了很好的阐发论述。理论来自实践，但又高于实践。一位伟大的诗人，其诗歌艺术理论必然有超越普通诗人之处。卢世㴶重视对杜甫诗歌理论的发掘，并结合杜甫的诗进行研究，颇多创新。论杜甫的“文章千古事”云：“其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广大精微，最关痛痒，

从来论文，当以此语为首唱。”（《读杜胥钞余论·论摘录》）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杜甫认为作家对自己文章的得失了解得最清楚，其说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卢世潅充分肯定其价值和意义，表现出过人的学术见识。卢世潅论杜甫的诗细的理论云：“自云：‘晚节渐于诗律细。’子美一生只受用一‘细’字，不止晚节为然，盖诗不细不清，不敢纵横也。‘细’之义大哉。”（《杜诗胥钞余论·论七言律诗》）“细”就是精微。艺术只有细，只有精益求精，才可能取得很高的成就。卢世潅论杜甫的诗缓的理论云：“且高岑从来并举，据寻常之论，若专以爽垲者。子美独曰：‘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看得又别。诗之道，温柔敦厚，旁见侧出，一言以蔽之曰‘缓’。缓则曲，缓则闲，缓则宁，缓则可以运完神，蓄则可以蓄余力，缓之一义（作）诗之门也。”（《杜诗胥钞余论·论五七言排律》）把“缓”与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联系起来，认为缓能充分表达精神，使诗有力量，分析非常深刻。卢世潅论杜甫的清省的理论云：“至其只句，则有‘阴何尚清省’。夫‘清省’原系诗家要诀，故再三提掇，既以之赞曲江，复以之美阴何焉。”（《杜诗胥钞余论·论五七言排律》）杜诗中多次用到清省，确实是杜甫一个重要的诗歌理论术语，即清妙精炼之意，实是诗歌创作与评论的重要标准。卢世潅论杜甫的新理论云：“《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盖句不新则诗朽，句徒新则诗亡。苟非有新之学问，日新之识见，而唯务新其皮肤，反至面青黄，此又与于陈腐之甚者。”（《杜诗胥钞余论·论七言古诗》）认为诗的创新非常重要，而诗的新，最重要的是意新，刻意求语言新，有时效果适得其反，可能使诗速亡。卢世潅对杜甫诗歌理论的论述很多，如前面已经引过的“即事非今亦非古”，“意匠惨淡经营中”，“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未谈到的还有很多。他完全把对杜甫诗歌理论的研究和杜诗艺术的研究结合起

来，对杜诗的艺术的研究颇多创新。“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既伤其临老陷贼，又困阙而为面别，故篇中彷徨特至。如云：‘万里伤心严遣日，百年垂死中兴时。仓皇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万转千回，清空一气，纯是泪点，都无墨痕。诗至此，真可使暑日飞雪，午时鬼泣。在七言律诗中尤难。末径云：‘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乃知诗到真处，不嫌其直，不妨于尽。”“《崔氏东山草堂》、《暮归》、《晓发公安》三首，皆拗调诗之绝佳者。‘爱汝玉山’前半篇高爽清鲜，操胜于人耳目之外，只可气听，不容言诠。后半篇又直款近情，诙谐有趣，诗之顿放宜如此。‘霜黄碧梧’，全首娇秀，原是悲诗，却绝无一点悲愁潺气犯其笔端，读去如竹枝乐府。《晓发公安》一首，更瘦更狂，摇曳洒脱，真七言律中散圣，题云‘数月憩息此县’，而感慨系之矣。《宾至》、《客至》二首，别有杼机，自成经纬，见为衰惫实挺动，见为恭谨实放肆，见为坦率实矜局。总由胸中眼中，酣恣空净，而笔底又有千钧力量。故只当家常说话，而人不知觉。”（《杜诗胥钞余论·论七言律诗》）对于诗的艺术的具体分析往往与内容结合，深入而有高度，非常精彩。

宏观研究是建筑在微观研究基础上的，卢世㴶有很多细致的局部研究。如研究严二别驾其人及与杜甫的关系：“《相从行赠严二别驾》，观黄昏叩门，俄顷胶漆，则严二是一新相知。内云‘紫衣将炙绯衣走，铜盘烧蜡光吐日’，则严二之豪俊可想。继之曰‘神倾意豁真佳士’，又曰‘似君须向古人求’，不啻豪俊，更具肝肠。严氏溪放歌，想即是严二水庄，盖高宴既终，复游别业，子美喜得佳士周旋，故与之长夜语。又思许身相就，松根同煮茯苓，则严二真可敬也。”（《杜诗胥钞余论·论七言古诗》）用考证的方法，论述杜甫与严二的交游，说明杜甫的交游态度与状况，非常深入。论《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云：“《观公孙大

娘弟子舞剑器》，序与诗俱登神品，盖因临颍美人，而溯及其师，又追想圣文神武皇帝，抚时感事，凄婉伤心，念从风尘澒洞以来，女乐梨园，俱付之寒烟老木，况自身业已白首，而美人亦非盛颜，则五十年间真如反掌，以此思悲，悲可知矣。一篇中具全副造化，波澜莫有阔于此者。”（《杜诗胥钞余论·论七言古诗》）挖掘思想内容与艺术，都深刻而新颖，有利于读者深刻理解。

四 朱鹤龄

一

朱鹤龄（1606—1683），字长孺，吴江（今江苏苏州）人。明诸生，颖敏嗜学。初专力词赋，笺注杜甫、李商隐诗，作品亦颇受杜甫、李商隐影响。明亡后，屏居著述。晨夕一编，行不识途路，坐不知寒暑。人或谓之愚，于是自号愚庵。自我评价说：“嫉恶如仇，嗜古若渴，不妄受人一钱，不虚诳人一语。”著《愚庵诗文集》。主要学术著作有《杜诗辑注》、《李义山诗集笺注》、《易广义略》四卷、《尚书埤传》十七卷、《诗经通义》二十卷、《春秋集说》二十二卷、《读左日抄》十四卷、《禹贡长笺》十二卷。文集有《愚庵诗文集》。

二

朱鹤龄与钱谦益因研究杜诗颇有一段恩怨。朱鹤龄曾在钱谦益家教家塾，曾以晚辈学者的身份向钱谦益请教杜诗的研究。其时朱注杜诗初稿成，钱谦益授以已稿，欲与朱稿合为一书出版。

朱鹤龄整理后，请钱作序，钱未见稿而作序。等后来见朱稿，发现朱稿与自己观点多不同，大为气愤，索回书稿，与朱鹤龄各自出书，两行其稿。不过后来二人都比较冷静，关系又缓和了。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先出，朱鹤龄《杜诗辑注》后出。钱乃为朱书作序，朱在钱逝世后仍对钱在杜诗研究方面的关心表示感激。朱《杜诗辑注序》云："愚素好读杜，得蔡梦弼草堂本点校之，会萃群书，参伍众说，名为辑注。乙未，馆先生家塾，出以就正，先生见而许可，遂检所笺吴若本及九家注，命之合抄，益广搜罗，详加考核，朝夕质疑，才笺指授，丹铅点定，手泽如新。……壬寅，复馆先生家，更录呈求益，先生谓所见颇有不同，不若两行其书。时虞山方刻杜笺，愚亦欲以辑注问世。书既分行，仍用草堂原本，节采笺语，间存异说。谋之同志，咸谓无伤。是冬馆归，将刻样呈览，先生手复云云。见者咸叹先生之曲成后学，始终无异如此。"钱谦益《吴江杜诗辑注序》对朱注进行了褒扬，并云："杜诗付梓甚佳，但自愧糠粃在前耳。此中刻未必成，即成，不妨两行也。"其实，钱、朱二书若糅合一书，互相掣肘，二人观点才力均不能充分展示，于杜甫学术未必是好事。而二书分出，两位杜学研究大家各展其才，读者得睹两种杜诗研究名著，实在是天公促成的美事。

三

《杜诗辑注》是一部以注释为主的全面研究杜诗的著作。其内容包括：对杜甫生平的研究；诗的编排与校勘；注释；对杜诗的研究。

关于《杜工部年谱》。

朱鹤龄《杜工部年谱》是在利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明。考杜甫生平，认为杜甫弱冠时曾游晋地。朱鹤龄云："公弱

冠之时，尝游晋地，当是游晋后方为吴越之游。”对游晋系年，填补了历来年谱的空白，系年也较为具体，大致可信，对研究杜甫早期的生活与创作有重要意义。朱鹤龄还驳《新唐书》及一些年谱说杜甫依高适为无据。“宝应元年壬寅：或曰：《新书》本传：游东蜀，依高适当在此时。严武入朝之后。按，严武还朝，适领西川节度，公方携家往东川，其时并无一诗与之，不得云依高适也。公在梓州，最善留后章彝。彝为留后，可知适未尝兼领东川，而谓之依高适可乎？”（《杜诗辑注·杜工部年谱》）考证详确，所言甚为有理。朱鹤龄作年谱重视材料的依据，所系年多可信。但有时也因调和不同材料，疏于鉴别材料，而出现错误。如：“大历五年庚戌，公年五十九，春在潭州，夏四月避臧玠乱入衡州，欲如郴州，依舅氏崔伟，因至耒阳卒。传云啖牛肉白酒，一夕卒于耒阳。按，《旧唐书》本传云其孙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归葬偃师，《寰宇记》载甫坟在耒阳县北二里，则公卒在耒阳审矣。唯元微之志云竟以寓卒，旅殡岳阳，当是卒于耒阳，迁柩岳阳，后乃归葬偃师也。只汲公《诗谱》谓是年夏还襄汉，卒于岳阳，鲁訔、黄鹤谱谓卒于潭岳之交，秋冬之际，其说皆未可信，辨详诗集。”杜甫殡于岳阳，当为其孙所言，当可信。殡之地应即其所卒之地。从情理看，杜甫无卒于耒阳而移柩殡于岳阳之理。朱鹤龄首鼠两端，其说实不足取。

关于编与校。

朱鹤龄编杜甫诗集主要受蔡梦弼《草堂诗笺》的影响，即大致将诗系年，而将某一时期某一地点的作品系在一起。其《辑注杜工部诗集凡例》云：“唯草堂诗笺觉有伦理，今略仿其意，前后以时事为排比。……而于各卷之首标为公某时某地作，庶几编年之法，而无其陋云。”应该说，杜甫一生多游历漂泊，用这种方法编排，可以较好地确定杜诗写作的时期，考察杜诗创作发展

的脉络，是比较科学的。

校勘版本较好，校勘比较细。主要用一些宋本及《唐文粹》、《文苑英华》校勘。“今遍搜宋刻诸本及《文粹》《英华》对勘，夹注本文之下。”如《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一作向）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西郊口（今按，当为“虏”）正（一作骑）繁”，“至今犹（一作残）破胆”，“应（一作犹）有未招魂”，“近侍（一作得）归京邑”，“移官岂（一作远）至尊”。校勘非常细致，可惜未标出所用的版本，这就降低了它的价值。

关于注释。

注释是《杜诗辑注》的主要工作。作者对前代杜诗注释的成果广泛搜罗，删刈粗陋，汲取精华，纠正错误，新增注释。朱鹤龄云：“今为翦其繁芜，正其谬乱，疏其晦塞，谘诹博闻，网罗秘卷，斯亦古人实事求是之指，学者所当津逮其中也。”（《辑注杜工部集序》）

注释取材广博，比较精确、细致，在前人的基础上有很多创新。《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卷一）注“韦尹丈人”：“《旧唐书·韦济传》：天宝七载，为河南尹，迁尚书左丞。《唐会要》：天宝七载四月，河南尹韦济奏于偃师县东山下开驿道通孝义桥，公寄诗当在其时。”用新的材料，并加以考证，颇有新意。《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卷四）注：“《唐会要》：宣政殿在含元殿后，即正卫殿也。《唐六典》：在宣政门内，殿东有东上阁门，殿西有西上阁门。按，东上阁门，门下省在焉，西上阁门，中书省在焉。公时为左拾遗，属门下，故出左掖。《汉书》注，掖门在两旁，若人之臂掖。”注诗题细致，准确。《晚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得溪字》（卷一一）注“摩诃池”云：“《元和郡县志》：摩诃池在州城西。《通鉴·注》：《成都记》云：摩诃池在张仪子城内，隋蜀王

秀取土筑广子城，因为池，有胡僧见之，曰摩诃宫毗罗。盖胡僧谓摩诃为大宫，毗罗为龙，谓此池广大有龙，因名摩诃池，今在成都县东南十二里。”注摩诃池准确而简明。相比之下，旧注云因萧摩诃而得名适见其浅陋。《上兜率》（卷一〇）“栋宇自齐梁”下注：“按，王勃《郪县兜率寺碑》：‘兜率寺者，隋开皇中之所建也。’此云‘自齐梁’，疑未详考。”以王勃碑考据，疑“自齐梁”有误，所注甚好。

解释文意符合历史背景，解释多准确，有新意。《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卷三）注云：“此诗‘去秋群胡反’，赵次公、黄注诸注皆指吐蕃。按，《唐书》，至德元载，吐蕃陷威、戎等，诸军入屯石堡，此在陇右、河鄯等州，而河西、凉州未尝陷。《通鉴》：至德二载正月丙寅，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二城坚守。度支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以二城攻之，旬有七日平之，此云‘群胡反’，正指其事。曰‘去秋’者，讨平在正月，而发难在去秋也。是时武威虽复，而余乱尚有未戢者，故欲其早到凉州，安甿黎而按城堡也。”考证史实，准确地解释“去秋群胡反”的准确时间及事件的情况，阐明了诗的写作背景及内容。《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卷一一）“黄老真如律，青袍也自公”下注：“《唐会要》：天宝四载十一月，敕御史依旧置黄卷书阙失，每岁委知杂御史长官比类能否，送中书内下改转曰褒贬。按，《唐·志》：‘尚书员外郎，从六品上。上元元年制，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公时已赐绯，而此云‘青袍’者，以在幕府故耳。旧注谓青袍九品服，误矣。‘真如律，也自公’，言幕下之体，亦同于朝廷也。”解说幕府也有考核制度，体制大致同于朝廷，对于了解杜甫的诗意非常重要。

不破不立，多指出旧注之非。杜诗注解甚多，错误也多，不

廓清旧注的影响，新说就难以产生巨大的影响。任其谬种流传，必然误人子弟。《杜诗辑注》指责前人的错误之处甚多。《八阵图》（卷一二）云："《东坡诗话》：尝梦子美谓仆，世人多误会吾《八阵图》诗，以为先主、武侯欲与关羽复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吾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能相图。晋之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志，以此为恨耳。此说甚长。按，史，昭烈败秭归，诸葛亮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使东行，必不倾危。观此，则征吴非孔明意也。子美此诗正谓孔明不能止征吴之举，致秭归挫辱，为平生遗恨。东坡之说殊非。潘鸿曰：蜀自昭烈亡后，未尝有吞吴之志。晋所灭，失不在此，此亦非东坡之言，当削去。"所谓"东坡诗话"，其实非东坡所著，乃伪东坡注。《杜诗辑注》所驳甚是，同时阐明了杜诗的本意，可谓拨乱反正。《览柏中丞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卷一四）注"三止锦江沸"云："'三止锦江沸'是指柏中丞与崔旰相攻时事，黄鹤指讨平段子璋、徐知道及崔旰，非也。子璋反东川，与成都无涉。次公谓宝应元年徐知道反，永泰元年崔旰反，大历三年杨子琳以泸州反，考子林入成都，公当去蜀已久，柏中丞亦不闻反复迁蜀，安可妄为之说哉！"驳斥旧说之误有充分的根据，很有说服力。《玄都坛歌寄元逸人》（卷一）驳陆游东蒙为终南山峰名之说云："按，公同太白访范隐居诗'予亦东蒙客，怜君如兄弟'，此在鲁郡作也。《昔游》诗'东蒙赴旧隐，尚忆同志乐'，正指元逸人言之。陆放翁谓东蒙乃终南山峰名，引种明逸诗'登遍终南峰，东蒙最孤秀'为证，乃喜信之说，不足信也。"用考证说明杜甫所到东蒙为山东东蒙山，元逸人所隐亦应为此处，驳斥有力。正是在驳论的同时，《杜诗辑注》进行了新的注释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于论述。

研究杜诗的目的，主要还在于正确理解杜诗，汲取思想与艺术的营养。所以，《杜诗辑注》非常重视对杜诗思想内容的解说。对于长诗还分段解说。“训释之家，必须事义兼晰。今于考注字句之外，或贯穿其大意，或阐发其微文。古律长篇，汗漫难读者，则分章会解之。若诗语易晓，概不赘词。”（《杜诗辑注·凡例》）

朱鹤龄对杜诗在总体上有正确的把握。他认为杜甫敦笃儒家的伦理道德，在艰难困苦中仍然拳拳忠爱，儒家思想已化为他的性情，而这种性情充分表现在他所有的诗中。他说：“子美之诗，非徒学也，夫诗以传声，节族成焉。声以命气，底滞通焉。气以发志，思理函焉，体变极焉，故曰诗言志。志者，性情之统会也。性情正矣，然后因质以委思，役才以适分，随感以赴节。虽有时悲愁愤激怨诽刺讥，仍不戾温柔和平之旨。不然，则靡丽而失之淫，流漓而失之宕，雕镂而失之琐，繁音促节而失之噍杀，缀辞愈工离本愈远矣。子美之诗，唯得性情之至正而出之。故其发于君父友朋家人妇子之际者莫不有敦笃伦理，缠绵菀结之意极之，履荆棘，漂江湖，困顿颠踬，而拳拳忠爱不少衰，自古诗人变不失贞，穷不陨节，唯有如子美者。非徒学为之，其性情为之也。”用儒家思想去观照杜甫与杜诗，得出了正确而深刻的结论。用这样的思想来指导他整体的杜甫研究和具体研究，自然成就突出。

《杜诗辑注》对诗篇内容和艺术的解说比较准确，有新意。《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卷一）云：“此诗前后乃陈情也。韦必尝荐公而不达，故有踆踆去国之思，今犹未忍决去者，以眷眷大臣也。然去志终不可回，当如白鸥之远泛江湖耳。意最委折，而语非乞怜，应与昌黎上宰相书同读。范元实但称其得体，未为知言。”准确地解说了陈情的内容特色与表现曲折的艺术特色，最

符合杜诗的实际。《塞芦子》（卷三）云：“此诗首以五城为言，盖忧朔方之无备也。高史二寇合力攻太原，克太原则渡河而西，即延州界，北出即朔方五城，朔方节度治灵州，灵距延才六百里尔。灵武为复兴根本，公恐二寇乘虚袭之，故欲以万夫守芦关，牵制二寇，使不得北。景仙从扶风出兵，捣长安之不备，所谓芦关扼西寇也。‘塞’字仍作壅塞解，时太原几不守，幸禄山死，思明走归范阳，势甚岌岌，公故深以为虑也。‘谁能叫帝阍’，即《悲青坂》所云‘安得附书与我军’也。此本陷贼时诗，诸本多误解，故次在收京之后。”从文本出发，认为《塞芦子》就是告诉抗击安史叛军的军队统帅，要守好芦子关，防止叛军攻破太原，从延州进攻灵武。并将诗系在收复长安之后。纠正历来一些注家的错误之说，更可见杜甫高瞻远瞩的军事才能。《杜诗辑注》像这样的闪光之处甚多。

《杜诗辑注》虽名曰诗注，其实是包括文的注释，是全集之注。在《杜诗辑注》之前，还没有杜甫的全集之注。完全可以说《杜诗辑注》是杜文注释的开山之作。朱鹤龄说：“子美文集，唯吕东莱略注《三礼赋》，余因为广之，钩贯唐史，考正文义，允称杜集备观。”（《杜诗辑注·凡例》）

朱鹤龄的杜甫文的注，有两大特点：（一）整个注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注，即注事典、名物制度，包括人名、地名，还注语典，有时对难懂的地方和含义深邃的地方进行解说。极少对杜甫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进行评论。（二）注总体而言比较贴切，比较正确，比较详明，较少错误，较少穿凿附会。其表现出来的注的水平与诗歌部分是一致的。

朱鹤龄的杜甫文的注是开创性的注，也是古代最详细的注，也是质量非常高的注，在杜甫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有着重要的地位。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杜诗辑注》有以下特点：（一）取材极为广博，凡古代与杜甫和文集内容有关的材料以及有关的研究材料尽量网罗。从唐人的材料直至作者当代的材料都努力搜寻，这为辑注内容的丰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对材料认真分析，进行考证。不管是从信前人的材料和结论，还是另立新论，都下一番鉴定考据的功夫，力求做到无征不信。（三）做结论时非常谨慎。众说纷纭，难以作结论时，则罗列众说，供读者选择。《杜鹃》（卷一二）“云安无杜鹃”下注云：“夏竦曰：四句乃题下甫自注耳，误以为诗。黄希曰：《白头吟》：郭东亦有樵，郭西亦有樵。此诗起法或本此。吴曾《能改斋漫录》：《乐府·江南词》：鱼戏蒲（应为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子美正用此格。赵曰：连用四杜鹃，正《诗·有酒醑》：我无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之势（式），岂是题下注耶？此四句特记杜鹃有无，其下云‘我昔游锦城’至‘哀哀叫其间’，则以成‘西川有杜鹃’之句，下又云‘君可有情鸟’至‘泪下如迸泉’，则以成‘云安有杜鹃’之句。诗之引结甚明。”对于“西川有杜鹃”四句是题下杜甫自注，还是诗的正文，这两种根本不同的说法，作者只是罗列众说，而未表态。对于杜诗应注而无材料可注之处，往往存疑。《壮游》（卷一五）“枕戈忆勾践”下注：“‘枕戈待旦’乃晋刘琨语，此作勾践事用，未详。”不可解就用“未详”说明，而不强解，显示出实事求是的态度。（四）广泛利用前人的成果，成集成式的集注之作，又有大量有创见的新注和新解，是一部有创造性的注释之作。特别是关于杜文的注释，更有开创之功。钱谦益晚年虽与朱鹤龄有矛盾，但仍对朱鹤龄注杜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特点作了充分的论述与赞许。其《杜诗辑注·序》云：“其刊定是编也，斋心祓身，端思勉择，定一字如数契齿，援一义如征丹书。宁质无夸，宁拘无偭，宁食鸡跖，无噉龙

脯，宁守兔园之册，无学邯郸之步。斤斤焉取裁于骚之逸，选之善，罔敢越秩。近代攻杜者，觅解未憖，又从而教责之，章比字栉，俨然诗资。长孺蹙额曰：不知群而愚，那用故谤伤。鹤龄虽固陋，忍使百世而下，谓有师心放胆，犯蚍蜉撼树之诮，如斯人者乎？”

《杜诗辑注》也有明显的缺陷。最大的缺陷是对杜甫作品的注释和解说都有明显的错误。这在清人的一些著作中，都有指正。有的解说不够正确，不够透辟精到。《望岳》（卷五）“箭栝通天有一门”下注：“按，地志诸书并不云华山有箭栝。《韩非子》：秦昭王令王施钩梯而上华山，以松柏之心为博箭，长八尺，棋长八寸，而勒之曰：王与天神博于此。《水经注》：自下庙历列柏，南行十一里，东回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从北南入谷七里又屈一祠，出一里至天井，井才容人行，迂回顿曲而上，可高六丈余，山上有微涓细水，流入井中，上者皆所由涉，别无别路，出井望空视，明如在室窥窗矣。此与天通一门语甚合。所云‘列柏’，岂即‘箭柏’耶？《初学记》事类亦以‘莲峰’对‘箭柏’，则‘箭栝’乃‘柏’字之讹耳。李攀龙《华山记》又云：自昭王施钩梯处西南上三里许，得一峡如栝，曰天门。岂后人因杜诗附会乎？”其注解详而不得要领。其实，杜诗正用《韩非子》以松柏之心为博箭之语。用松柏作为箭栝，自可用箭栝指松柏。朱鹤龄过分拘泥，说“箭栝乃柏字之讹”，迂曲而无据，反致错误。

《杜诗辑注》是一部极见功力的著作，是一部集成式的富有学术个性的著作。以注释为主，兼及多方面的研究，集众家之长，而建树颇多，是杜甫学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杜诗辑注》与钱谦益《杜诗笺注》齐名，盛行于清代，对于开启和繁荣清代的杜甫学，功绩甚伟。

五 金人瑞

一

金人瑞（1608—1661），一说本姓张，名采，字若采。江苏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金人瑞明末为秀才。入清后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务。学问广博，才思敏捷，狂放不羁。以《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西厢》为“六才子书”。评点《水浒》与《西厢记》，有新见，流传非常广。金人瑞有反清思想，诗《塞北》云：“塞北今朝下教场，孤儿百万出长扬。三通金鼓摇城角，一色铁衣沉日光。壮士并心同日死，名王卷席一时藏。江南士女却无赖，正对落花春昼长。”描写了清军的屠杀和表现一些士女对亡国的麻木，具有明显的爱国思想。清世祖去世时，金人瑞因参与逐吴令而惊世祖灵，被杀抄家。金人瑞是清代著名文学家批评家和诗人，有《沉吟楼诗选》。

金人瑞把杜诗列为“六才子书”之一，称第四才子书，对杜甫非常崇敬，研究杜甫甚勤，把对杜诗的研究看作一生重要的事业。“继批杜诗，以为能将诗圣之诗，句解明晰，则杜诗一日不灭，句解亦一日不灭也。宵深不寐，勤心从事，乃伏案三月未终一卷。”（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金人瑞》）“每于亲友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风晨月夕，醉中醒里，朱墨纵横，不数年所批殆已过半，以为计日可奏成事也。而竟不果，悲夫！临命寄示一绝，有‘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

《马》《杜》待何如'句。"（金昌《叙第四才子书》）金圣叹批杜诗二十余年，未批完即被杀，未能实现他的杜诗研究规划与宏愿。身后，学人将其杜诗研究成果结集成《杜诗解》四卷。虽非完璧，却是杜甫学的重要著作。

二

金圣叹研究杜诗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他准确地掌握了杜甫的思想，在研究杜诗时，始终注意根据杜诗的语言所传达的信息，准确而深入发掘杜甫在诗的艺术形象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金圣叹与杜甫在为人与思想上虽有巨大的差别，但在根本之处却非常契合，最突出的有两点：其一，讲忠孝；其二，有政治抱负。因此，金圣叹从根本上对杜甫有准确而深刻的认知和理解。在研究方法上，很多学者的研究要么停留在杜甫艺术形象表达的意义的表面，见解浅薄而寻常，要么离开杜诗文字传达的信息，随意穿凿附会。金圣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力求读懂杜诗文字信息背后的含义，通过剖析艺术形象，把杜甫的真实思想具体加以分析，使读者真正领略杜诗的真谛。由于金圣叹往往能比普通的研究者更深一层看到杜甫作诗的本意，人们往往觉得他的研究见解新，见解奇。金昌说："大抵少陵胸中具有百千万亿漩陀罗尼三昧，唱经亦如之，乃其所为批者，非但刳心抉髓，悉妙意之闳深，正复祛伪存真，得天纵之剀挚。盖少陵，忠义士也，非以忠孝之心逆之，茫然不历其藩翰，况于壶奥！"（《叙第四才子书》）《羌村三首》诗意本非常明白，但经金圣叹一解，觉得在明白的背后有着丰富深邃的内涵。其二："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金圣叹解云："此解用意最曲，不说不知，说之便朗如日月之在怀也，既归后，忽然自想早岁出此门去，岂不自谓致君尧舜，返俗黄虞，功成名遂，始奉身退，壮矣大哉！

快乎乐也！乃今心短计促，迫为偷生，窜身还乡，昔图总废，咄咄自诧，又何惫欤！娇儿心孔千灵，眼光百利，早见此归不是本意。于是绕膝慰留，畏爷复去。四句总是曲写万不欲归一段幽恨。”其三：“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金圣叹解云：“父老一问，直得无言可对。何也？先生远行，专为普天父老，然则父老欲问，我只须各自问：特地出门五年十年，而俾父老耕地无人，羞杀也！愤杀也！先生妙笔，全在无字处如此。从来人读此以为平平。”诗：“苦（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金圣叹解云：“既用上解意，又反复申明之。先生被父老一问，方在无言可对，乃父老反为酒薄自愧，说出无数絮叨，句句曲解酒薄缘故，句句热剥先生面皮，真异样奇笔。”诗：“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金圣叹解云：“我贻汝以艰难，汝报我以深情，真正愧杀也。前父老问，竟到底不答。至此但请为歌。歌即歌‘艰难愧深情’五字也。歌罢浩叹，虽父老皆作殷浩咄咄矣。”（《杜诗解》卷一）金圣叹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在解说诗表现的情景时，展现了杜甫的心理活动理与内心世界。这样，杜诗的意境就非常完美、非常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给读者以全新的印象。金圣叹研究杜诗，善于阐释诗中杜甫的形象，阐释杜甫的思想、襟抱、品格，这样就抓住了杜诗的本质与灵魂。《春日江村五首》本是郊游题材，无甚特别之处，而金圣叹却能透过杜甫所写的江村景象和杜甫的所感，解说诗所表现的禹、稷之心，杜甫关心苍生社稷的伟大胸怀。金圣叹题下解云：“极似良辰无事，逍遥原野题。及读其诗，江村之大计如彼，春日之皇皇如此，叹先生一肚皮禹、稷，非雕虫小儿所知也。”（《杜诗解》卷三）诗其一：“农务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金圣叹解云：“此眼便是禹、稷。看先生劈头提起‘农务’二字。

题是一村，诗忽云‘村村’，盖一村急，即村村不可缓也。于是先生放眼再思：一村急即村村急，今纵横万里，果得村村皆已急乎？或连兵漫野，或受甲不归，其若之何？念至此，便不胜己溺己饥之痛。然而一生之心，至今不试，时序又春，百年眨眼。我如苍生何？苍生如我何？真乃睹此茫茫，百感交集者也。”诗：“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艰难昧生理，漂泊到如今。”金圣叹解云：“‘艰难’，说苍生。此非无家语。承上‘乾坤万里’，有田不耕如此，我奈何独以家为？盖非无茅屋，不少桃源，遭时艰难，甘就漂泊，正即大禹三过不入一副心肠也。读此诗，相先生何等人！”（《杜诗解》卷三）金圣叹所解说的确实是游江村的杜甫，所解说的思想是真实的杜甫的思想。这使读者加深了对这首诗的认识，也加深了对杜甫的认识。《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的解更别致。诗：“地偏初衣袷，山拥更登危。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金圣叹解云：“人徒知万国戎马，故泪垂，即岂复成诗者耶？万国戎马，而此独酣歌，是以不得不垂泪耳。我见题中有‘诸公’字，便知先生是日必无好气也。如此读断‘泪垂’字，是则圣叹所以奉赠后贤者也。读毕，始知寒花开尽。”（卷三）金圣叹之解确实与众不同，乍一看，觉得惊奇，细细一想则令人叫绝。金圣叹确实解出了杜诗的阃奥，解出了杜甫的深衷。它不像一般穿凿附会的解杜，让人摸不着头脑，也不像一般的人云亦云，有解与无解无异，它使人如入桃源，看到一片新的景象，新的思想天地。

金圣叹解说杜诗，着重阐说杜甫安邦济世的政治思想和忠孝仁义的道德思想。应该说，这是千百年杜诗研究的传统主题和主流思想。但是，金圣叹是一位狂怪的人，也是一位很有抱负的人，一位有叛逆思想的人。他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又杂糅释家和道家思想。故而他解说杜诗既传统又怪异新奇。《空囊》解

说杜甫的操守与品格。其一解云："衣食二者，无一日可以暂辍，乃小人偏于此卤莽，君子偏于此艰难。'卤莽''艰难'，字法妙绝。……此非君子不畏饥寒以杀身，而无奈以礼处身，以义处心。吾守吾道，之死无二。不能学当时小儿，甘者即食，卑者亦餐。卤莽觅活，腼颜人世也。"其二解云："前一解，是先生自写骨力。后一解，是先生自写襟怀。……夫人至于通宵彻夜，饥寒备极如此，他人已不知有几许悒郁侘傺，先生却有闲胸襟，自戏自谑。"（《杜诗解》卷二）分析非常透辟。金圣叹在解《孤雁》时，提出杜诗都是忠孝切实之言的观点，并援引道教与释家思想加以说明。其解说云："余尝谓唐人妙诗，从无写景之句。盖自三百篇来，虽草木鸟兽毕收，而并无一句写景，故曰'诗言志'。'志'者，心之所之也。誌字，从言从㞢，先生集中，都是忠孝切实之言，往往有所寄托而愈见其切实，如《孤雁》诸篇是也。庄生书，通途解向幻忽惝恍一边，殊不知其开口说鲲说鹏，便是一片切实道理。……《法华》龙女成佛必于南方，故曰'徙于南冥'。如此说来，有一字不切实否？因读先生咏物诗，附见于此。"（《杜诗解》卷三）用《庄子》和《法华经》来帮助阐释杜有所寄托而愈见其切实，有些勉强，可是颇为新鲜。"忠孝切实之言"之说，表现了金圣叹对杜诗的思想的最根本的看法，表现了金圣叹对杜诗的高度评价。金圣叹为人狂放，而对杜甫极为尊敬，一再表现对杜甫的仰止之情，尊杜诗为经典。《〈秋兴八首〉别批》其四云："读先生诗，真如闻无上甚深经典，使小儒意见都尽。"（《杜诗解》卷三）这样评价杜诗，在古代可以说是最高的，也是别致的。

艺术也是金圣叹杜甫研究的重要内容。金圣叹对文学艺术理论有深厚的修养，又深入研究过"六才子书"，因此，他的杜诗艺术研究非常精彩，发明甚多。

金圣叹杜诗艺术研究的最大特点，是用清代时文的理论去观照杜甫诗的艺术，去准确探求杜诗的风格，探求杜甫的诗篇艺术的创新，探求具体的表达特点。所以金圣叹的杜诗研究往往是细致的、透辟的，见解往往是独到的。

在具体研究中，金圣叹最重视对杜诗的结构研究，也就是对诗的起承转合的研究。其理论云："大抵圣贤立言有体，起有起法，承有承法，转合有转合之法。非如后世涂抹小生，视为偶然而已。吾不信天下事有偶然又偶然也。"（《杜诗解》卷三《秋兴八首》）理论并没有特别高明处，不过是八股文的理论。但杜诗艺术所以伟大，其结构卓绝是其重要因素。金圣叹研究艺术往往从结构对内容表达的视角来研究，因而可以看出杜诗不同于其他诗歌结构的独到之处。同时他研究细微，往往可以阐发出杜诗结构的精妙。金圣叹解《柟树为风雨所拔叹》，题下云："按史，永泰元年三月辛丑，大风拔木，此诗岂纪实耶？又是年四月，严郑公薨。读起曰'草堂'，结曰'草堂'，知为郑公，不为柟树也。"结尾云："看通篇结构，'草堂'起，'草堂'结，知为草堂不为柟树。先生于是乎思去草堂矣。"（《杜诗解》卷三）诗题是写柟树，而金圣叹认为草堂是诗的结构之本，进而从结构之本探索诗的深意，其艺术研究视角独特，别开生面。很多时候，金圣叹对艺术的解说是融在内容解说中的。在金圣叹看来，离开内容，是无法解说艺术的。而对艺术的精湛解说，往往是通过对内容的深透剖析来实现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对前半首的解说："欲说荆门有明妃村，先着'群山万壑'句，用形容寻龙问穴之法，大奇！高耸起则为山，跌下则为壑，耸起则又为山，无量劫来，天地如此其浩浩也。于其间有楚，楚山楚水，起伏无数，遥遥直走千里万里，而后有荆门，而后荆门有村，而后村中有明妃。然则明妃真为天地间气特钟可知。今明妃往矣，村则尚有。'尚有村'

者，言但有村而已矣。三四承上‘村’字，言明妃当日虽生长此村，而后不复为村有者，为入汉宫也。乃至明妃既入汉宫，并不复为汉宫有者，则为去紫台也。夫明妃而去紫台，明妃之踪迹尚可问也。明妃去紫台，遂连朔漠，明妃之踪迹则不可问也。”（《杜诗解》卷三）这里固然主要是解说内容，但同时也是对艺术的精妙解说。谈诗的起、承和语言，都很有发明。事实上，在金圣叹的解说中，内容的解说与艺术的解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金圣叹非常重视对杜诗语言的研究，解说语言新意颇多。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艺术就是语言的艺术。语言解说好了，艺术的研究也就深透了。金圣叹特别注意研究杜诗语言的新异和精妙。特别注意研究杜诗语言的表现力和美。《蜀相》解云：“三四，碧草春色，黄鹂好音，入一‘自’字，‘空’字，便凄清之极。二语，是但见祠堂而无丞相也。”“第七句‘未’字、‘先’字妙，竟是后曾恢复而老臣未及身见之者，体其心而为言也。”（《杜诗解》卷二）这些分析都非常精彩，颇有新意。《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诗批解都以论语言为主，真正能发杜诗语言艺术之奥妙。其上半首解云：“‘雷声喧’者，见其雨大，是昨夜如此。‘动微寒’者，春寒多雨，见天未及晴也。莺极怕雨。鹭，水鸟，不怕雨。‘黄鹂’句，承‘春城’句。‘白鹭’句，承‘江浦’句。莺于林木为宜，鹭于野浦为宜也。‘并坐交愁’，妙，‘群飞太剧’妙。‘并坐’者，当是雌雄相并也。‘剧’即是戏。‘太剧’者，喜其羽毛得干也。此二句，寓二种意在：若依黄鸟，只好坐在家里。若依白鹭，又好走出门去。先生一心要到路十九家去，写来不觉直如戏语。诗到此，岂非化境！”下半首解云：“‘诗律细’‘酒杯宽’，用一路逼法，逼到路十九身上去。路十九爱先生，是爱其律之细也。却偏以‘清狂’二字替之，妙绝。不然，

便是以诗为酒杯地也。今云‘酒杯宽’者，算来只有一个路十九，故曰‘惟君’。今我要遣闷，除路十九，更到谁家？‘百遍相过’者，我两脚只思走到君家，不顾有雨无雨。一遍不止，两遍不休，即至百来遍，亦无不可。何以故？度君爱我之意，正未阑也。路十九家，真是遣闷之地。是日雨中，性急要去，语语作相逼之势，是为‘戏呈’也。”诗的语言的最高境界是最艺术、最完善地表达诗的意境，即用最佳的文字最真实、最生动地表现诗人所要表现的事物和思想感情，而诗的语言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最客观、最完全地体会诗人的语言妙处。而要达到这样的语言研究的最高境界，必须对语言本身有深透的研究，必须有自己运用语言的高超的能力与体验。从金圣叹对《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的解说看，他对杜诗语言的研究达到了极高的境界。金圣叹解杜诗之意往往是建立在解杜诗语言基础上的，而在解说杜诗语言艺术的时候，也往往伴随着对意的解说。他解说杜诗语言艺术细致、准确、新颖、别致。

在杜诗研究中，借杜甫和杜诗以言志，表现自己的抱负和思想，抒发自己的郁闷与牢骚，也是一股小小的潮流。在这样的研究者中，金圣叹无疑是杰出代表。他是一位狂狷之士，他表现的思想明显有某种叛逆性，大胆而旗帜鲜明，论述自己的思想透辟而饱含感情。在《杜诗解》中，金圣叹首先表现出对封建专制的某种不满与反感。解《三绝句》云：“此《三绝句》，非写三事，乃独刺殿前兵马也。却为‘殿前兵马即盗贼’一语，投鼠尚忌器，岂可唐突便骂？故分作三绝句以骂之。第一绝，言盗贼即理当淫杀如此。若不淫杀，亦不成为盗贼。第二绝，言普天下人酷受淫杀之毒，我只谓都受群盗之毒。第三绝始出正题，言近则闻道殿前兵马乃复淫杀不减，竟不知第二绝是受群盗毒，是受官军毒？谁坐殿上？谁立殿下？试细细思之！”（《杜诗解》卷四）语

言含蓄，意思却非常明白，金圣叹认为皇帝应为殿前兵马的淫杀负责。金圣叹的话是完全符合道理的。金圣叹解《洛阳》云："后半首写天宝天子虽幸得归，不为万民所惜也。"（《杜诗解》卷三）这里金圣叹完全曲解了杜诗"故老仍流涕，龙髯幸再攀"。杜诗本意是万民为再见天子而高兴，金圣叹却反着说，万民不愿见天子。从曲解中，我们可以看出金圣叹对神圣的君权的某种蔑视与挑战。金圣叹借杜诗研究来表达自己关于君权的态度和思想，无疑提高了杜诗研究的学术性和价值。

金圣叹在《杜诗解》中，表现最强烈的是对封建社会戕杀与糟蹋人才的批判。解《黄鱼》借题发挥，说自古以来淹杀豪杰无数。题下解云："为儿时，自负大才，不胜侘傺。恰似自古迄今，只我一人是大才，只我一人是独沉屈者。后来颇颇见有此事，始悟古来淹杀豪杰万万千千，知有何限？青史所纪，磊磊百十得时肆志人，若取来与淹杀者比较，乌知谁强谁弱？嗟哉痛乎！"结尾解云："呜呼！才子以才而建功垂名，则诚才之为贵。若才子以才而终至饥饿以死，回首思之，我何逊于屠沽儿而一至于是？真不怪饥饿，怪杀有才矣！"（《杜诗解》卷三）认为古代绝大多数人才都被掩杀，所用者只是极少数。金圣叹所论，完全符合实际。故而言辞激烈，情绪愤惋！《咏怀古迹五首》其三，杜甫本意并非咏怀才不遇，而金圣叹题下批云："咏明妃，为千古负才不遇者十分痛惜！"明确把咏怀才不遇作为诗的主旨。金圣叹认为古代怀才不遇的根源在有弃才之主。此首后解云："从上转下，转出从来弃才之主一面照胆镜来。真才贵于确知确见，原无按图索骥之事。况元帝以汉天子择美妇人，则后庭春风之面，何难以一一尽见？一一尽识？而顾凭画工之手以为进退，可鄙也！"见解非常卓越。的确，古代怀才不遇的终极原因，就在于君王不重才，君王弃才，君王懒于见才识才，金圣叹还大胆地写到自己时

代的怀才不遇，就是无由让皇帝了解有才的人。《吾宗》解云："今日经书满腹者，君臣之际，往往难言，始信先生此事不可不读。"（《杜诗解》卷三）为何"难言"？意思很明白，还是因为皇帝弃才，不重才，不然，有什么难言的？金圣叹在《杜诗解》中大叹自古的怀才不遇，其实最终是落到谈清代统治者不重才，最终落到自己怀才遭弃，抒发自己的牢骚与愤懑。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他关于古代怀才不遇的研究是非常深透的。

金圣叹的杜诗研究成就是巨大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金昌赞美说："乃其所为批者，非但刳心抉髓，悉妙义之闳深，正复祛伪存真，得天机之剀挚。"（《叙第四才子书》，《杜诗解》）仇兆鳌《杜诗详注》引用金圣叹的说法，不少现代学者都赞同金圣叹的一些创见性见解。

六 卢元昌

一

卢元昌，字文子，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诸生。著作有《杜诗阐》。

二

《杜诗阐》是一部研究性的杜甫学著作，最大的特点就在"阐"字上。所谓阐，就是阐释，就是论说，其旨趣在阐释杜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思想内容是主要的），充分展示杜诗的魅力与精妙。《杜诗阐》也有注释，但注释不求完备，而力求发掘新

的与内容有关的社会背景材料和其他一些有利于表现杜甫生平和行踪的有关材料，对杜诗的内容加以注释。与此同时，又利用这些注释的材料来对杜诗加以阐释和论述。这样，全书将事类与义理结合，形成鲜明的学术风格。

卢元昌的杜甫学研究方法是，以杜诗文本为本，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结合杜甫时代的社会背景、典章制度、历史事实，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来阐释杜诗的丰富意蕴和深刻内涵。卢元昌云："予于难者芟之，使归于一。于凿者核之，使确。于繁者约之，使不多旨而乱视。于陋者泽之，使雅。于简者栉比而遍识之，使不挂漏。而又加以熔铸组织之功焉，以意逆志，既又发其言中之意，意中之言，使当年幽衷苦词，曲传纸上。"（《杜诗阐自序》）（一）在总结前人得失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研究方法，避免走弯路。（二）针对杜诗政治思想性强和诗史的特点，充分运用社会背景材料，站在当时社会的高度和历史的高度来研究，高屋建瓴，分析透辟。（三）研究材料丰富，视角多样。不凿空分析，不单调，表现出深厚的研究功力。（四）新材料，新视角，加上精细，其阐释常有新意。卢元昌的研究方法是高水平的，在他那个时代表现出一定的先进性。

在诗意的阐释上，具体操作别出心裁。其思路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把握杜诗的旨趣，严格按杜诗语言所表达的内容，不枝不蔓，忠实而晓畅地解说。其方法颇类似用白话意译古文，通俗易懂而又不离作者原意。所阐释的诗包括杜甫所有的诗。第二步：在解说之外，如果作者有对诗的进一步的理解，有独到的观点，有助于深入理解杜诗的社会背景和其他材料，则在对全诗阐释之后，另外列出。一般用"○"（圆圈）隔开。这种阐释只是一部分诗有，很大一部分诗没有。如果作者对诗的意思理解完全正确的话，第一步与第二步阐释的结合，往往既能正确地解说杜

诗的基本意义，又能进一步解说杜诗的深刻含义或言外之意，使人们真正理解杜诗的精髓。《新安吏》（《杜诗阐》卷七，以后略去书名），卢元昌云：“我行新安道，点兵之道，一何喧呼。问之新安吏，新安吏曰：府帖昨下，县小无丁。不得已，点中男行也。顾此中男，人未成丁。身绝短小，守城之役，何以堪此。况中男中，其瘦而无母者，为更苦。此时送者行者，莫不恸哭。但闻白水呜咽，东流不还。青山遥隔，哭声犹在。眼枯矣，泪纵横矣，谁知天地无情。岂以恸哭，可免斯役哉！幸毋然哉！所以点中男者，守王城也。守王城者，相州未平也。当九节度围邺，垒城穿堑，壅水灌城，自冬涉春，庆绪食尽，人咸谓克在旦夕。岂意史思明引兵趣邺，抄掠四布，官军出，辄情难料如此。至今日退军修备也。先是诸军乏食，人思自溃。今就粮，只因故垒耳，食不乏也。先是围邺时，贼兵抄掠，官军牛马人车，日有所失，今练卒亦依旧京耳，非远戍也。先是壅水灌城，军士有筑垒穿堑之役，今掘壕力省，牧马役轻，无前此之劳矣。先是诸军既无统帅，进退无所禀，军中苦乐不闻。今王师既顺，抚养分明，有一体之谊矣。我劝送者行者，不必恸哭，为此之故。况仆射子仪，恩同父兄。行矣戍矣，慎守王城，勿以相州之役，逗留不前也。”阐释杜诗，基本符合杜诗之意，而又非常周全。但卢元昌意犹未尽，又将当时战争的态势、征兵之制和唐太宗时罢征中男之事加以综合分析论述，说明当时征中男的局势，以加深人们对此诗的理解。故卢元昌又云：“相州之役，正丁战死，因及次丁。考之周礼，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故致余子。守王城，大故也。按太宗点兵，并点中男，魏征谏，乃罢。祖制，中男不点。今日中男之点，虽非得已，时事可知。时郭子仪军中，尚有六、七万粮，故有就粮固故垒句。”综合两条阐释，卢元昌从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角度说明杜甫从根本上反对

征中男，对中男的被征表示悲哀与同情，但又认为征中男是从军事局势出发，迫不得已，故又安慰和鼓励中男，充分表现了杜甫爱国与爱百姓的复杂而深沉的感情。分析非常细致而全面，非常到位。《剑门》（卷一〇），卢元昌云："险不可以人设，唯天设险。如剑阁者，实为天下壮观。山控西南，以卫其内，石向北角，以距其外。两崖之倚，宛若崇墉。刻画之状，分明城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原天设险，取隔绝无取相通。不知何时，使珠玉之宝走于中原。岷峨之气，便已经凄怆。五帝三王时，道里未通，即鸡犬之声，不闻中国。自秦凿岷峨以通蜀，务为柔远，遣人□修职贡，太古淳朴之道已丧矣。因而英雄之人，以此地险固而富饶图王者，思并吞，争霸者欲割据，极力图谋，不肯相让，亮（谅）天应悔多设此险也。计唯铲此崖嶂，以平其险。既不能，然又恐诛求职贡，使并吞割据者，究复而起，能无临风嘿然，独自惆怅也已？""蜀在天隅，安史不到。中兴以来，朝廷军需皆责之蜀。蜀遂困矣。先是，明皇荔枝之役，置驿传送，日不暇给。公他日居蜀，作《病桔》诗曰：'惜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作《枯棕》诗曰：'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作《甘林》诗曰：'于实不得吃，货市送王畿。尽添军旅用，迫此公家威。'蜀民困于诛求，如此类者，不可胜数。其《打鱼》一篇曰：'日暮蛟龙改窟穴，山根鳣鲔随风雷。干戈兵革斗未已，凤凰麒麟安在哉。'已知民穷走险，在所不免。未几，段子璋反绵州，徐知道据剑阁，崔旰、杨子琳作乱成都。篇中'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公盖隐忧之。其曰'珠玉走中原，岷峨气凄怆，后王尚柔远，职贡道已丧'，岂非悲蜀民竭蹶输，朝廷犹征艺无厌乎。结曰'恐此复偶然，临风嘿惆怅'，则已□言其有乘机窃发者。"第一步，对诗的原文作了忠实的阐释；第

二步，说明诗的主旨是杜甫希望朝廷减赋税，以防不轨之徒乘机割据。作者引用大量史实说明杜诗主旨产生的背景和重大意义，说明杜甫的先见之明。历来的注杜者，要么穿凿附会，要么不做阐释，像卢元昌这样运用丰富史料，准确深入阐发杜诗主旨的非常少。《送灵州李判官》（卷一〇）也阐释得很好，其文云："乱起禄山，腥闻已久。回首一望，只叹茫茫。盖腥闻为血战，而茫茫以氛迷也。侧闻主帅，能专策略，此间幕府，更多才良。况今中兴之主，赫然命将，专领朔方劲兵，与贼决战于河阳。清乾坤，洗日月，在此一举。我为中兴之主贺，兼为判官厚期之。""乾元二年十月间，李光弼领朔方兵，与史思明战于河阳。诸将齐力致死，呼声动天地，斩首无算，思明遁去。史言河阳之战，真为确斗，非李光弼督诸将致死，不能决胜。'近贺中兴主，神兵动朔方'，正谓此也。"从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印证诗所写的内容，揭示诗的主题，非常分明，非常有力。《天河》（卷八），卢元昌云："天河常时，听其显晦，一当秋至，分外分明。岂无微云，掩其光彩？然于永夜，终自常清也。况含星浮阙，常近至尊，伴月沉城，勿伤沦落，其分明又如此。彼牛女渡河，常于秋至，天河任其自渡，风浪不生。河身有定，故其分明，亦有常耳。"本是咏物诗，作者解说符合文意。但此诗体兼比兴，明显有言外之意。故卢元昌第二步阐释云："诗意谓君子处遇显晦随时，亮节耿耿，时穷弥见，不犹天河常时任显晦，秋至最分明乎？虽有小人流言，暂掩其光，乃其常明之体，终不为其所敝，纵被微云掩，终能永夜清乎？含星动双阙，天河近而有光，君子心依至尊，亦若是耳。伴月落边闉，天河远而有耀，君子自安遐弃，亦犹是耳。况世自风波，吾尝安止。彼天河映水结体，牛女虽渡，风浪不生，亦由其体恒定也。黄鹤云，公为小人所间，出华州，故咏此。"卢元昌认为诗以天河自比，言自己不管晦显，

始终保持自己耿耿的高节，结合诗作于因救房琯而贬华州的背景，则看得更明白。这样的阐释真正揭示了杜诗的本旨与意蕴。卢元昌这样分两步对杜诗进行阐释的方法在体例上也是一个很大的创造。第一，严格按杜诗语言本身的文意来解杜，把杜诗文字所含的本原的思想准确地表达出来，使读者真正感到杜诗文字所传达的思想，避免穿凿附会，而把解说者的思想强加给杜诗，从而误导读者。这种解说法是唯物主义的解说法。第二，作者在对原文进行客观的解说后，又提供材料，深入发掘诗语言文字之后更深的含义，有利于读者深入认识杜诗的微言大义，即杜诗真正的思想。这样分两步阐释后，解说者给自己留下了退路。即使第二步解释是错误的，第一步解释总是正确的，不致造成根本性的错误。对读者来说，可以将第一步解说与第二步解说加以对比，综合分析，做出判断。这样，读者只将第二步的阐释作为参考，可以接受第二步的阐释，也可以不接受第二步的阐释，读者有广阔的思索和选择的空间。因此，这样阐释杜诗，看似一个简单的变化，其实是重大的变革。用这种阐释方法将杜诗的本来面目在第一时间印在读者的脑海中，一扫历来穿凿比附说杜的流弊。同时，作者又能充分提供研究的材料和独到的见解，使阐释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

以意逆志解诗，从理论上说是对的，而实际上却非常容易出偏差。卢元昌解说杜诗也有不少不准确和穿凿的地方。本来，古代解说诗歌，受今文经学穿凿附会的影响和比兴说诗的影响，往往以穿凿性的解说为深刻，以穿凿性的解说为时髦。而古代的诗歌理论又要求诗人作诗要有“兴寄”，客观上也要求解说者用比兴说诗的理论来解说。而比兴说诗本来很玄，没有明确的标准或思路，一不留神，就会滑入穿凿附会的泥潭。故而卢元昌也不能幸免于穿凿附会之失。《曲江二首》（卷六）其二：“《韵略》曰：

点水，生子也。然则穿花，即求耦也。”所解杜诗为“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本是写景，而附会为写性，写爱情，荒唐可笑。《成都府》（卷一〇）：“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卢元昌解云：“旧注以初月比肃宗，众星比史思明之徒，殊谬。即曰有托，初月，是太子俶，众星，是兴定二王。”其实，杜诗二句仍为咏景之作，以比兴解之，即是方法错误。旧注自然误，卢元昌新解亦误。像这样的谬解，《杜诗阐》尚有很多。这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杜诗研究之普遍现象。好在阐释的主要部分基本没有这些瑕疵，这就使《杜诗阐》总体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

《杜诗阐》也重视对杜诗艺术的研究。其研究有以下特点：（一）将艺术研究与内容研究结合。（二）偏重于对结构和语言艺术的研究。（三）研究有自己的创获。《新婚别》（卷七），卢元昌解云：“一篇中，‘君’字凡七唤。首曰‘结发为君妻’，下数‘君’字，皆从此出。为君妻，则暖君床。席不暖君床，凡以君有行也。为君妻则随君去。既不得暖君床，又焉得随君去。为君妻得为君洗红妆。为君妻，则与君双翔。君行矣，君往矣，不得与君同去矣，红妆已洗也。相望则与君永，凡以为君妻也。七个‘君’字，一呼一泪。”分析杜甫用“君”字的作用，用“君”字的艺术很有新见，也非常细致深刻。《曲江对酒》（卷六），卢元昌解云：“花落鸟飞，本寻常物色，却于‘逐’字‘兼’字写得出色。‘逐’字‘兼’字，亦未深微，‘逐’曰‘细逐’，逐得有情。‘兼’曰‘时兼’，兼得无意。”也可以看出作者对杜诗艺术细微而独到的感受。

《杜诗阐》也有注释。它注释的最大特点，只注自己认为是注家该注而没有注的地方。不像一般的杜诗注释著作，求详备，太繁琐，它的注释非常简明。《伤春五首》其四（卷一六）：“《平

准书》：‘上北出萧关。’”以注“萧关迷北上”的语典，甚确。《山寺》（卷八）注：“按《天水图经》，东柯谷南麦积山有瑞应寺，阁道萦旋，上下千余尺，故诗云‘山园细路高’。上下水纵横可涉，故诗云‘乱水通人过’。又《玉堂闲话》云：麦积山梯空架险而上，其间千房万室，悬空蹑虚，故诗曰：‘悬崖置屋牢，高槛可以眺。’故诗曰：‘百里见纤毫。’”引《天水图经》和《玉堂闲话》认为诗所写的“山寺”即麦积山瑞应寺，虽不能必，但可备一说。有考证，也有新意。不仅对阅读《山寺》有好处，也为杜甫在天水的行踪提供了新线索。《杜诗阐》对事典语典、名物制度注释较少，而注释最多的是与诗内容相关的政治时事、社会背景材料。不少注和诗意的阐释融为一体。《所思》（卷八）注“郑老身仍窜”云：“郑窜已久，曰仍窜者，乾元元年六月，敕两京陷贼官，三司推问未毕者，毕释之，贬降者续处分。公冀郑得邀恩典归，竟不可得。故曰仍窜。”注出朝廷敕的内容，对于我们了解诗写作的背景，理解诗的内容，非常有益。《巴山》（卷一六）注云：“代宗十月丙子出奔，丁丑车驾至华州，幸鱼朝恩营。辛巳方至陕，时吐蕃焚劫长安，欲掠城中士女，整众归国，又还至凤翔，逼城请战，是‘还奔突’。车驾逗留，尚未发陕，是‘恐未回’。初，上出幸，官吏藏匿，至华容，奔散无复供职，故曰‘群臣安在’。”材料与诗对应，可以把诗理解得更为透彻。《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卷一三）云：“蜀自上皇还京后，分剑南为两节度，百姓疲于调遣。西山三城，又列戍焉。蜀民藉为兵者，无宁岁矣。上元三年，段子璋反，将士大掠为害。蜀民既苦寇，又苦兵。为吏者，李若幽、崔光远拊循乖方。读公《枯棕》等诗，曰：‘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蜀民长番不已，差科不息，安得营农酿钱作社。严武镇蜀西川兼摄，蜀民始稍苏息。公是年《说旱》云：‘中丞下车，军

郡之政，罢敝之俗，已下手开济矣。凡百冗长者，又已革削矣。’合之此诗，严吏治精能，蜀民休息，大略可见。又本传载公住浣花里，好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此诗既曰‘邀我尝春酒’，再曰‘遗拾能住否?’又曰‘盆中为吾取’，‘欲起时被肘’，狎荡之趣，大是可想。”所注的关于严武的材料，关于杜甫在成都与野老狎荡的材料，对于阅读全诗、理解诗的主题，都非常重要。作者注释不单纯罗列材料，而是边列举材料边阐释，充分发挥了材料对诗的解说作用。这也是《杜诗阐》与一般杜诗著作的注的重要区别。

《杜诗阐》是一部体例有创造的杜诗研究著作。它克服历来穿凿的弊病，对杜诗作了基本忠实原文的阐释，又用以史证诗和以杜证杜的方法，对杜诗作了深入的研究，笃实厚重。其间虽也有一些穿凿，而正确的创见不少。鲁超云：“卢文子潜心杜学二十余年，所著《杜阐》一书，穿穴钩摘，直取古人精意于千百载之上，举前此诸家卮词曲说，牵合附会之陋，一扫而空之。事类意义，两者兼尽，可谓至当而无遗议者矣。”(《杜诗阐序》) 虽然赞美太过火，可也不是瞎吹捧。《杜诗阐》确实是一部“事类意义”兼善的杜甫学著作。

七 张溍

一

张溍 (1621—1678)，字上若，直隶磁州（今河北磁县）人。顺治九年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淡于做官，以母病乞归故里。

家居二十余年，静坐书斋，著述自乐。《左传》、《庄子》、《离骚》、《史记》、《汉书》、《后汉书》皆批注数次。特别喜欢研究杜甫，有《杜诗注解》二十卷。又有文集《读书堂集》十卷。

二

《杜诗注解》倾注了张溍的半生心血，历时二十四年方才完成。“自言于是书起于己丑，迄于癸丑，阅二十四寒暑，五易稿而成，盖用心之勤如此。”（宋荦《杜诗注解序》）它是清代一部重要的杜甫学著作。

《杜诗注解》有以下特点：

（一）从读者的角度来作《杜诗注解》。杜诗自来就号为难读，尤其难注。一些学者就是有感于杜诗太难读而注杜的。研究张溍的笔记（张榕《先大夫批注杜集卷末遗笔》，《杜诗注解》），知道张溍作杜诗注解的过程，也是他自己真正读懂杜甫集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张溍作杜甫集的注解，自然与一般为杜甫集作注解的注释者有所不同。一般为杜甫作注的人，是站在学者的角度来考虑哪些该注解和怎样注解，学术上才最完善。而张溍则是根据自己的体验，从读者的角度来考虑哪些该注解和怎样注解，读者才能完全读懂，收获才最大。注释的角度和理念不同，《杜诗注解》的体例和内容自然也与很多杜甫学著作不同。.

（二）著作形式是读书札记。如前所述，张溍是站在读者的角度来作杜甫研究的，而其著作《杜诗注解》实际上是他多次阅读杜甫著作和杜甫研究著作的读书笔记。其自记云：“今夏以长洲许君自昌校刻千家注披阅一过，心目爽然，似有所得。”“合修远五七律注，孝辕注及文庄旧注，参以己意，酌裁楮上，解悟较多。”“照钱牧斋又阅杜一匝，疑者解十之九，不特知其用意佳处，即率笔晦笔具得其故。”“兼采朱长孺杜注，疑难尽豁。”

（《杜诗注解》附《先大夫批注杜集卷末遗笔》）这种读书札记的性质，决定了《杜诗注解》有两大特点：其一，集注性质与心得体会相结合。一方面，张溍集录了大量前人的重要的注解，利用前人的成果，带有集注性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自己的思索，自己新的注解。因此，张溍的注解既不同于一般的集注，也不同于完全自己进行注解的著作。其二，体例颇为特殊。初看，《杜诗注解》整个体例混乱，并非按正规的注文所需的体例排列。细看，注解是按张溍读书顺序先后排列，再按所注作品应有的注解次序与体例大致排列的。看清了它的特点，对它的体例也就容易理解了。

（三）对杜甫之文全部进行了注与解。《杜诗注解》其名虽是"诗"注解，而实际注解却包括了诗与文两部分。古代杜甫集的注解著作汗牛充栋，但所注解皆集中在杜诗上，对杜甫文的注解，却付诸缺如。在整个杜甫学史中，将整个杜甫文集的诗与文全部作注和解的，只有张溍一人。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张溍在杜甫学史上占有一个重要位置。在张溍之前，朱鹤龄为全部杜甫之文作了注，其功甚伟，可惜的是他未对杜甫之文作解，未作解说与评论。对杜甫之文作注又作解的责任，历史性地落在了张溍肩上。张溍关于杜甫之文的注解问世后，很快受到很大关注。仇兆鳌《杜诗详注》未对杜甫之文作注与解，而将张溍之注解载于书后，以成杜甫文集注解之完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张溍的杜甫之文注解的重要性与影响力。

（四）注解呈现周全而简明、平实而创新的学术风格。首先，张溍力求注解周全。凡是费解的地方，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都尽量进行注解，以便读者真正周全准确地理解杜甫的作品。杜甫的作品是非常难以注解的，有些注家会有意回避一些特别难注解的地方，而张溍则尽量注解所有应该注解之处，不放过任何应该

注解的地方。其独到之处，是对很多作品文意看似非常明白、容易理解，实则真实文意与字面非常不同、甚至相反的地方进行了注解，使读者不致误入歧途。其次，注解力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直接切入，不旁征广引，钩奇炫博。为了节省篇幅，很多时候甚至不注典故的原始出处，而只概括讲述典故的大意。解运用流行的批点方法，力求短小精悍，文约意丰，给读者以启发，不故弄玄虚，故作高雅。第三，注解多有新意。张溍学识广博，善于独立思考，其注解的角度又与一般的学者不大同，故其注解创获颇多。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一般注者不注，张溍则尽量注解。有些前人有注有解的地方，他则提出新的注与解。特别是在解得方面，发表了很多很好的个人见解，创新尤多。第四，注解平实。学术讲究有根有据，实事求是。张溍基本上是无征不信，无征少言。他的注解力求笃实可靠，避免华而不实。他的注解较少穿凿附会的东西。因此，张溍的注解形成了这种周全而简明、平实而创新的学术风格，这是一种良好的风格。

《杜诗注解》确实是清代初期一部颇具学术功力的有创新性的、有特色的杜甫学著作，在当时即受到很高的赞誉。宋荦评论说："原注能疏瀹千家之踳驳，弃瑕而存瑜。评点往往独标新隽，间亦欲助以近代诸名人，可谓稡诸家之长而擅其胜者。韩愈氏有言用功深者其名也远，则是书之传亡疑。"（《杜诗注解·序》）阎若璩说："先生灵心慧眼，标新抉异，其措辞尤温润静好，读其书，每想见其为人。于旧注不苟同，亦不尽废，斑斑然错落于行间。"（《杜诗注解·序》）评价完全符合实际。而学术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杜诗注解》也有贬斥的评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多依傍旧文，尚未能别开生面"（《别集类·存目一》），近乎完全否定。这个评论是不公正的。推其贬斥的原因，除学术偏见外，恐怕是评论者并未细读此书，仅凭浮光掠影的印

象，就妄下雌黄。因《杜诗注解》辑有前人的注，很容易得出“多依傍旧文”的结论。因其注解较简洁，较为平实，乍看显得平庸，就对它的创新视而不见，产生“尚未能别开生面”的论断。《四库全书》在学术界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其贬斥之说自然会产生不小的影响，至今仍有学者追随其说。然而，决定学术著作生命的，是学术著作本身的质量，谬评虽能一时使好的学术著作受到伤害，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掩盖其光辉。自《杜诗注解》问世，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不断产生重要的影响。仇兆鳌、杨伦、浦起龙皆推《杜诗注解》为杜甫学的重要著作。《杜诗详注》、《杜诗镜铨》皆大量采录张溍的注解，《杜诗详注》更是全文附录《杜诗注解》中文的部分，作为文的注解。清范辇云《岁寒堂读杜》二十卷，实际上是《杜诗注解》的删改本，即将其中集注部分删去，对张溍注解作一些改动（此说根据郑庆笃《杜集书目提要》)。清顾庆淳的《杜诗注解节抄》，则是《杜诗注解》的删节本。这些事实说明，《杜诗注解》在清代始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

《杜诗注解》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杜甫世系和生平研究，即《杜氏世系考》和《杜工部编年诗文谱目》。(二）杜甫诗注解。(三）杜甫文注解。现在我们就分别对这三部分的研究成就、研究方法与特色进行论述，以期从根本上扫除前人《杜诗注解》谬评的影响，让《杜诗注解》不断放出自己的光辉和热能。

现在先谈杜甫世系和生平研究。

《杜氏世系考》对自杜甫远祖杜预至杜甫父亲一系的父祖血统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对母亲一系及兄弟姊妹也进行了考证。考证精确、详细，用图表表示，非常清楚、直观，代表了当时杜甫

世系研究的最高水平。其间有自己的发明。杜甫出生地，一般皆认为是河南巩县，而张溍则认为是长安杜陵。《杜氏世系考》云："杜氏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至公时又居京兆之杜陵，岂依艺（曾祖）为巩令，故徙河南，闲为奉天令，故徙杜陵邪？然则公实生于杜陵。"（《杜诗注解》卷首）其说虽未详细列出证据，但不无值得重视的价值。

张溍对杜甫生平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杜工部编年诗文谱目》。

研究杜甫的生平，要研究杜甫生活的时代，研究与杜甫有关的人和事，研究杜甫本人。杜甫的作品是最重要、最直接的材料。张溍对杜甫作品的研究全面深入，尤其是对杜甫文的研究更为独到，而杜甫文中有关自己生平的材料更具体，也多，这就使他对杜甫生平的研究较一般的杜甫学学者更为深入，成就也更为突出。明白地说，《杜工部编年诗文谱目》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杜甫年谱。作为年谱，《读杜工部编年诗文谱目》胜过它以前的绝大多数年谱，是一部质量很高的年谱。其优点有三：一、年谱列时代背景，背景材料具体、简明、扼要，背景与杜甫息息相关，有助于读者了解杜甫所生活的时代，进而解读杜甫。二、全面。现举两年系年为例。"丁酉，至德二载。……公年四十六。在贼中，间至东都。四月，公脱贼中，谒帝行在，拜左拾遗。会房琯罢相，上疏救琯。上怒，诏三司推问。宰相镐救之，获免。时公家在鄜州。八月，奉诏自凤翔还鄜州。十月，扈从还西。""戊戌，乾元元年。……公年四十七。是年春在谏省。夏六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作《试进士策》、《为郭使君进灭寇图状》。冬晚离官，以事之东都。"系事精确到月，一年的行迹非常清楚。而如"在贼中，间至东都"，"作《试进士策》、《为郭使君进灭寇图状》"，"冬晚离官，以事之东都"则是多出一般年谱的系事内

容，为一般年谱所少见。文系年，也为一般年谱所少见。就年谱系年的准确和细致而言，张溍的年谱在很多方面超过古代一般的年谱。张溍对杜甫生平的研究水平，超过古代一般的杜甫学学者。

四

现在来谈诗的注和解。

张溍在诗的注释中有不少发明。首先是补注了一些应注而未注的名物与典故等。《重过何氏五首》（《杜诗注解》卷二，以后略去书名）其一："重来休沐地，真作野人居。"在阐释中，将"休沐地"一语加以注释："以休沐而作野人居，正形将军忘势而耽幽。古诸侯朝于京师，有休沐地，以譬山林。"故杜诗的休沐地，即"古诸侯朝于京师，有休沐地"之休沐地。这样的注说明了"休沐地"的特殊内涵，对读者准确理解原文非常有益。《丽人行》（卷二）注"蹙金"："蹙金：……如今之累丝金也。"用清代的用语来注，使读者明白"蹙金"的含义。《玉台观》（卷一〇）"浩劫"，张溍注解云："浩劫，大塔也。塔一级二级为一劫二劫。"称大塔为浩劫的并不多见，完全有补注的必要。其次，补注了一些语典。《严公仲夏枉驾草堂携酒馔得寒字》（卷八）"自识将军礼数宽"注："《廉颇传》：不知将军宽至此也。"将"宽"字的语典注出，顿觉杜诗的语意丰富深厚了很多。《丽人行》（卷二）注"炙手可热"云："唐时进士荣贵，长安市语：郑杨段薛，炙手可热。"炙手可热本是成语，张溍的注告诉我们它又是唐代的俗语，我们因此有理由相信杜诗的"炙手可热"就是用当时的俗语，使我们对杜诗俗的一面有更新的认识。第三，注出典故背后隐含的事实与意义。诗文用典故，实际上是一种隐喻，是用古人和旧事来写事实。既是一种隐喻，在一些情况下，

是极难理解的，因为作者本身就没有明示。自然，要理解杜甫的一些典故所写的现实内容，更不容易。因而理解典故的真实含义需要深入研究，需要想象。否则，即使对典故烂熟于心，而对它所表现的实际内容却茫然不知。因而，在典故所表现的现实内容非常隐蔽的时候，注出典故所表现的现实内容，是相当必要的。《玉台观》（卷一〇）“彩云萧史驻”，张溍注解云：“萧史句：观中或有公主遗迹。”“文字鲁恭留”，张溍注解云：“鲁恭王制宫室于壁中得古文经传，滕王必有诗文遗迹在焉。”“萧史”“鲁恭”并非僻典，张溍或不注，或简注，而重点注明诗写玉台观有公主遗迹和滕王诗文遗迹。不看张溍注，恐怕很多读者未必体会得出。而体会诗的现实含义非常重要，因为这两句诗重点在写玉台观与最高地方长官和唐王室的密切关系，从而展示玉台观的崇高社会地位。故张溍的注释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

杜诗难懂，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杜诗大量用典，而另外一方面也在于杜诗中很多看似寻常语，人们却难于准确把握它的含义。张溍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探索注释杜诗中寻常语的准确含义。《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卷一）“迹籍台观旧”有些难于理解，关键是“籍”。张溍注：“籍，典籍所记也。”读此注便觉诗句之意豁然贯通。《卜居》（卷一六），张溍注“着处”：“着处，犹随在也。”《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卷一一），张溍注“上”：“上，谓之官也。”和一般用“上”字不同。《寄董卿嘉荣十韵》（卷一一），张溍注“黄图”：“黄图，疆宇图，犹今黄册。”又注“月窟”：“月窟，言宫殿高如月窟也。”《小至》（卷一五），张溍注“五纹：五色线也。”又注“教儿且覆掌中杯”的“覆杯”：“覆杯，饮尽，干杯也。”《楼上》（卷一九）“皇舆三极北”，张溍注“三极”：“天地人为三极。”从这些注解可以看出张溍力求让读者完全理解杜诗的良苦用心，也可以看出张溍注解的

深厚功力。

在杜诗文意可作多种理解时，张溍作注解引导读者做符合杜甫原意的理解。《饮中八仙歌》（卷一）“天子呼来不上船”，张溍注解云：“正以扶曳登舟状其酒狂，非真不上船也。”这样的解说，看似画蛇添足，实则很有必要。没有此注，普通读者都会按字面进行理解，造成对杜诗的误读。《客从》“哀今征敛无”，张溍注解“征敛无”云：“征敛无：言今之重征，民已一无所有也。公诗往往有此闷句。”注解迂曲，看似与诗意相反，而统观全诗，才明白张溍的注解最符合杜甫的本意。

在注释中，张溍也对前人的错误进行分析指正，以加强自己注释的影响力，以正本清源。《杜位宅守岁》（卷一）“守岁阿戎家”，张溍注云：“钱云：旧注以阿戎为王戎，位乃公从弟，不应用父子事，善本作‘阿咸’。东坡与子由诗‘头上银幡笑阿咸’，又‘欲唤阿咸来守岁，林乌枥马斗喧哗’，正用此诗也。今按，《南史》，齐王思远，小字阿戎，王晏之从弟，清介有识，尝规切晏，晏贵盛，不知避，果及祸。子美诗用阿戎，当出此。注改阿咸，亦非兄弟。东坡偶误用耳。”张溍以王思远字阿戎注杜诗阿戎，其事较为贴切。而钱谦益擅改杜诗“阿戎”为“阿咸”，本已犯注家大忌，而阿咸又不切杜诗兄弟之意，显然是错误的。张溍否定钱注，另作新注，表现出勇于探索的精神。《咏怀古迹五首》（卷一五），其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张溍注解云：“他本评群山万壑似生长英雄，起句未合。不知杜正谓山川灵秀，产一明妃，故诗中深惜之。”地灵人杰，山川灵秀，不但能产英雄，照样能产美女。在批判前人的错误见解中，有力地阐明了自己的正确见解。

张溍的学术作风严密谨慎，实事求是。他在提出新的见解和创作新注时，如果自己没有绝对把握认为是正确时，往往列出异

说，以供读者参考和抉择。《小至》（卷一五），张溍注云："至前一日为小至。原注：或云阳为大，阴为小，冬至阴极，故曰小至。"张溍认为，小至就是至日的前一天。又引前人注，说小至就是冬至。二说有异，读者可以研究和选择。遇到杜诗难解之处，张溍往往提出问题，或存疑，或作推测性的解释，不轻率下结论。《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郎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卷二），张溍注云："'承'字作何解，当系讹。""膳部默凄伤"，张溍注云："'膳部'句，公因大父审言而发，非此，将作何解。杜诗每切情事，凡不解处，必有他故。失注便茫然，不能强释，此类可推。"张溍对杜诗中有疑惑的字句的处理和注释态度是正确的，而正确的态度又来源于正确的学术理念和对杜诗的深刻研究。

关于杜诗的解。

所谓解，就是解说，就是论说。张溍对杜诗的解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诗的内容的，一是关于诗的艺术的。相对于注释而言，解更有创造性，更有学术特色。

张溍的解，完全以儒家思想为理论指导，以《诗经》为最高准绳，来论说杜诗的思想与艺术。他善于从实际出发，结合诗的时代背景，对诗作具体分析；在分析内容时，有时从艺术的角度分析；在分析艺术时，有时也从内容的角度来分析，努力分析各首诗的特点。有时也加以引申、概括、总结，论证杜诗的特色与魅力。其解是用评点的方法，往往短小精悍，一语破的，画龙点睛。

张溍关于杜诗的内容的解，有两大特点：（一）善于钩微抉隐，揭示诗的深刻含义。（二）高瞻远瞩，牢牢把握杜甫忠君爱国、忧世忧民的根本情怀。《寄贺兰二铦》（卷一〇）"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张溍解云："着'震荡'于'欢娱'之后，寓

意甚深，正叹此时朝内以逸乐酿祸也。非杜诗不能发此语。”表面看，“朝野”句与“乾坤”句的意思是平行的，实际上是因果关系。“欢娱”为“震荡”之因，“震荡”为“欢娱”之果，二句正说明朝廷以逸乐酿祸。本来很含蓄的表达，经张溍的解一揭示，便洞若观火。逸乐酿祸，本是杜甫一贯的思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就有这样的观点。安史之乱前，“朝野多欢娱”，杜甫就感到非常忧虑，认为可能会酿成天下大乱。故张溍此处的解完全符合杜甫的原意。《送韩十四江东省觐》（卷八）“兵戈不见老莱衣，叹息人间万事非”，张溍解云：“百行以孝为本，乱离至使人不能养父母，则天下事可知。首二句多少感慨。”张溍的分析非常深刻。一个社会已发展到战乱的地步，家庭遭破坏，没有亲情，还能叫社会吗？杜甫的诗确实表现了无限的感慨。《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卷一一），张溍解云：“是一则致治宝训，不当作诗读。”这本是一首交游题材的诗，而张溍的解却揭示了它深刻的政治内涵，对读者非常有启示。《客从》（卷一九），张溍解云：“此公因朝廷征求皆民膏血，哀其穷困而作，用意深挚之极。”这本也是一首交游题材的诗，张溍认为它是写朝廷征敛的重大主题的诗，是杜甫哀伤百姓因赋敛而极度贫困的诗，提醒读者仔细体会杜诗的深刻含义。这样的解释是很高明的。《诸将五首》（卷一一），张溍解云：“从陵墓朝廷最大处说到临边，又从天下大事说到蜀中一隅，总见无御寇之人，以致焚劫蹂躏。至此终忆严武，因其有破吐蕃之功，且知己之感存焉。五首纵横开阖，反复唱叹，爱国忧民绸缪警戒意极笃至。然往往蕴藏不露，深得比兴遗意，与三百篇并存可也。”分析诗的创作思路，分析诗的比兴艺术，而突出分析的是诗“爱国忧君绸缪警戒”的根本思想，分析极为中肯，极为透彻，对读者非常有启发。

张溍在艺术方面的解亦颇有特色。他善于运用儒家的审美思想，结合诗的内容，来论述杜诗的艺术创造。既分析杜诗具体的创作技巧，也论述杜诗独特的创作方法，阐发杜诗高超的艺术境界。《丽人行》（卷二），张溍解云："通篇皆极口铺张作赞，却句句是贬，真三百篇之旨。此诗言诸姨出游之盛，'后来鞍马何逡巡'始及国忠之同游，而致其微辞。盖国忠实张易之子，冒姓杨（今按，言杨国忠为张易之子，有待考证），是无根之杨花落而浮水上之浮萍也。又'杨白花，飘荡落谁家'为北魏淫词，用来甚切。青鸟，西王母使者，飞去衔红巾，则几于感帨矣。曰覆曰衔，总见溷乱之状，绸缪之状，隐曜甚妙，真令本人看之亦无可怒。"将艺术论述与内容分析融为一体，而在艺术方面着重分析其以赞美作讽刺，深于比兴的特点。《行次昭陵》（卷一）对艺术分段评论，非常具体。"旧俗疲庸主，群雄问独夫"，张溍解云："二句括隋末多少情事，'庸主'二字更贬得当。""谶归龙凤质，威定虎狼都。天属尊尧典，神功协禹谟。风云随绝足，日月继高衢。"张溍解云："六句开创、缵成、辅翼意俱有。""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张溍解云："四句写出盛朝慎重平易气象，不独思古，正以伤时。'半老儒'，'不崎岖'，开国盛事已尽，真史笔。"结合诗的内容，对杜诗概括力、褒贬、铺叙、写实、暗寓感慨的具体写作手法一一表出，结尾概括整首诗的特点："庄重浑含，如《典》《谟》，如《雅》《颂》，是大手笔。"非常有见地。《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引》（卷一一），张溍解云："风格之老，神韵之豪，针线之细，可谓千古绝调。"指出这首杜诗的特点是豪雄严密，苍劲老道。而又进一步分析说："杜诗咏一物必及时事，感慨淋漓，今人不过就是填写，宜其兴致索然耳。"杜诗内容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能由小及大，从身边琐事写到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时事，敢

于抒发自己的感情，发表自己的感想。这正是杜诗高于一般诗的重要方面。而正是这样独特的内容，造就了杜诗独特的艺术。张溍从这样的角度来评论杜诗的艺术，正抓住了杜诗艺术的独特之处。这也表现出张溍艺术研究的过人之处。

五

现在来谈谈张溍的杜甫文研究。

张溍注释杜甫文，像注释杜甫诗一样，力求让读者准确完全地理解杜甫作品的含义。对一般读者不懂的典故，略述典故梗概，一般不说明出处。而对一般人较熟的典故，则不加注释，或只概括地说明其含义。重点在于说明杜甫文深刻的或真实的含义，对那些看似寻常而不容易真正理解的文字语言，也加以说明。《雕赋》（文卷一），张溍文中注释如下："伊鸷鸟之累百"下注："鸷鸟累百不如一鹗。""固先系于利嘴"下注："谓此以化诱之。""挥拘挛之掣曳，挫豪梗之飞翻"下注："谓条碹以驯之。""夫其降精于金"下注："金，天杀气。""立骨如铁"下注："爪刚如铁。"（今按，以"爪刚"解"立骨"不完全符原意。"立骨如铁"即筋骨如铁之意，形如铁塑之意。）"此鸟已将老于岩扃"下注："卒伤此鸟之不得见试，盖以自喻。寓意可感。"张溍在文后注："杨杙：《长杨赋》：杨巀嶭而为杙。杙，橜也。乌攫：《黄霸传》：吏出食于道旁，乌攫其肉。空回斗星：《元命苞》：瑶光星散为鹰。"从学术的角度看，张溍注释典故有些未详细列出处，有些未全引原文，降低了注释的一些学术品位和质量。但其注释的着力之处，在于让读者准确全面把握杜甫之文的内容。文献注释的根本目的和最高境界正是让读者准确全面地了解所注作品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说，张溍的注是非常出色的。他的注简洁明白、平实准确，具有很高的水平。将张溍的注与朱鹤龄的注进行

比较，更可以看出张溍注的特色。朱鹤龄的杜甫文注释基本上是注释典故、典章制度、名物舆地，其特点是破解疑难，注释富瞻详细，精审明确，具有很高的学术性。朱鹤龄是拓荒者，注释已达到很高的境界。而张溍作为后来人，其注释别辟蹊径，以疏通杜甫文文意为主，形成自己的特色。像杜诗一样，杜文很难懂，张溍的注释在帮助读者读懂杜文上下功夫，抓住了注释的关键，在朱鹤龄注释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典故语词、典制舆地的注释方面，也有新的创获。

张溍对杜甫文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杜文的内容、艺术，也涉及和内容、艺术相关的诸多方面。

在内容研究方面，张溍善于抓住杜文的主旨，加以精炼明白地论述，使读者感到豁然开朗。《雕赋》，张溍解云："始终借雕自喻。公后为拾遗，丰裁可以想见。"表面看，《雕赋》所写为雕，完全是咏物之作，而张溍却认为《雕赋》运用比兴手法，借雕表现自己。雕的形象，正是杜甫的风采。张溍的评论尽管非常简略，却完全抓住了文的主旨，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当然，在张溍之前，学术界已看到《雕赋》是用雕自比。不过，张溍的解更为深刻。他认为雕就是杜甫人格的化身。杜甫做拾遗时，其风采就像只雕。张溍的解给人很多启发。《朝献太清宫赋》（文卷一），张溍认为是祀老子之文："此当是祀老子之文。明皇追祖老子，号玄元皇帝，天宝二年加号太圣祖。"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读者明白此文为祭祀之文，就能很好地掌握此文的内容，进而探索杜甫的思想。《封西岳赋并序》（文卷一），张溍解云："登封颂功，中藏讽谏正义尤难。"说明此赋是封华山而赞美皇帝功德之作，但同时指出其间含有讽谏，含有正义。这就使读者了解了本文的主旨，明白杜甫进献之赋，并非像一般流行的进献之赋多为奉承阿谀之作，而有着正义的思想、针砭的内容。

更值得注意的是，张溍在研究杜甫文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杜甫，研究杜甫的行迹、思想、品格、才能。

如前所述，杜甫的文很多对杜甫自己的生活有较为具体而细致的记叙，张溍结合杜诗和其他材料，对杜甫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关于生平的研究的最突出成果是《杜工部编年诗文谱目》，关于生平和思想的研究也散见于杜甫诗文的注解中，就不再赘述，这里只谈谈张溍在杜甫文的研究中对杜甫品格和才能的研究。

张溍在研究人物时非常重视人物的品格研究。他很推崇杜甫崇高的品德。他特别表出杜甫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文卷二），张溍解云："语藻而气质闲处叙事尤真，古人一饭之德不忘，杜陵有焉。其法足法也。"杜甫幼年丧母，养于其姑家。杜甫在为其姑作墓志时，表现出深深的感激。张溍特表而出之。张溍还认为杜甫有期朋友以义方的品格。《杂述》（文卷一）张溍解云："进叔卿以谦退，规巢父以阔大，公真益友。"从文的内容来分析杜甫的思想品格，确实是研究的深化。

杜甫是否具有真正的政治军事才能，历来是杜甫学聚讼纷纭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多数学者相信两唐书的说法，认为杜甫好论天下事，高而不切，认为杜甫是一个在政治与军事上都夸夸其谈的人，并无实际才能。张溍在研究杜甫的有关政治军事之文后，驳斥了这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杜甫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而杜甫有关政治军事之文就是最好的佐证。《东西两川说》（文卷一），张溍解云："公意在诸羌分党各属，而统以汉将，其末归于散兼并择委任，可谓御边之妙策。""洞中机宜之文，即少陵之经济可知，谁云迂阔少实用。"杜甫的两川说，是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的安定边疆、繁荣边疆的政治军事策略，事实证明这些策略是正

确的、实用的、高瞻远瞩的。《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文卷三），张溍解云："遣帅分兵，犄角互进，算无遗策，谁谓公不长于经济。"杜甫分析当时敌人的形势，提出分兵成犄角互进的战略，确实是高明的战略。杜甫有关政治军事的对策之文，是研究杜甫政治军事才能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张溍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杜甫具有杰出的经邦济世之才，是符合实际的。虽然在他之前，已有一些学者提出杜甫具有很高的治国才能，而张溍通过分析杜甫之文加以论述，角度是非常新颖的，而证据也是最有力的。

张溍对杜甫之文的艺术也有独到的研究。他以汉代和汉前之文为文的最高典范来衡量杜甫之文，来研究杜甫之文的艺术技巧、风格、成就，研究杜甫之文在文坛的地位。他的研究是深入的、细致的。其特点是研究艺术不脱离内容，分析从具体的文本出发，既有对章句艺术的细微阐发，也有对篇什技巧的精辟归纳，也有对整个杜甫之文的宏观理论论述。《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文卷二）"甫昔卧病乎我诸姑"至"感者久之"一段，杜甫写自己母早亡，养于姑之家。杜甫病，而巫言"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姑将居屋之东南的自己的孩子挪开，让杜甫居住。张溍解云："此段尤叙得明切入情。"说杜甫的叙述非常生动、精炼，又饱含感情，评论非常准确精彩。该文张溍总评云："谁能叙闺中事人如许深致语！少陵之文，本自过人，反为诗掩。"张溍从杜甫作墓志反映出的巨大表现力，反映出的叙事写人的真切、明晰、生动、深刻，认为杜甫不仅是伟大的诗人，也是出色的散文作家。《雕赋》，张溍解云："始终借雕自喻。……中铺叙有法，景真语警，即置汉赋内亦可。"《东西两川说》，张溍解云："文之迂古，似断实续，酷肖西京。"《秋述》（文卷一），张溍解云："古拙曲折，似西京以上文。"《封西岳赋并序》，张溍解云：

“此序逼真汉人，宜公每以相如枚乘自命。”从具体作品入手，论述各个作品不同的艺术特点，说明其共性则是具有汉代和汉以上散文的韵味，达到了古代散文艺术的最高层次。张溍的评论语言精炼，但又准确而深刻，是真知灼见。《朝享太庙赋》（卷一），张溍解云：“骈丽繁富中有朴茂之致，胜宋人多矣。”《唐兴县客馆记》（文卷一），张溍解云：“以质见姿，似拙似滞，而有古致，总不欲堕流利尖巧一家。后人学此种笔力不佳，往往有画虎之弊。”认为杜甫之文在具有时代流利繁富的作风中，又朴茂古致，因而杜甫之文是后世无法企及的。这些看法都别具眼光，颇能给人以启发。《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文卷二），张溍解云：“时含时露，用意婉至，此少陵第一首文。盖人遇知己，其情既笃，其文自佳。”又云：“房次律建分王帝胄之议，为禄山所畏，公深推慕。复以救琯左迁，乃生平最大之事，故此文亦生平最得意之文。”认为此文为杜甫最佳的作品，很有见地。而探求此文艺术的高妙着眼于杜甫的思想与感情，表现出张溍文学的艺术理论的深厚与独到。

八　吴见思

一

吴见思，字齐贤，武进（今江苏武进）人。据其《杜诗论文》序言“年且五十”，而序作于“康熙辛亥冬”（1671）推断，当生于1622年（明天启二年）前后。祖父吴中行曾任编修。侍讲学士，父吴襄为南平令、沧州知州。明亡后，吴见思绝意仕

进，读书著述。“齐贤闭户著书，不赴铨政。故于一饭不忘君父之余，扬扢其焦劳忧愤而不失其和平温厚也。”（龚鼎孳《杜诗论文序》）著有《史记论文》一百三十卷，《杜诗论文》和《杜诗论事》。

《杜诗论文》和《杜诗论事》是研究杜甫的姊妹书。《杜诗论文》是杜诗的论文之作，《杜诗论事》是杜诗的注释之作。《杜诗论事》一书今不存，是否写作完稿也不得而知。董元恺《杜诗论文·序》云：“成《论文》一书，更将与吴先生搜讨旧闻，网罗故实，续为《杜诗论事》，以救从来纰缪穿凿之病，使天下之读杜诗者，适还杜诗之本然而已。”（吴见思《杜诗论文》）《杜诗论文·凡例》云：“千家之注，或自成一家，或各宗一说，莫不以人握隋珠，家藏荆玉。然其中舛谬亦多。是者存之，非者去之，未备者补之。共补一万余事，参古今之诗论，另著《杜诗论事》一编，续出。”综上所言，可以看出：（一）吴见思早年研究杜甫时，就计划写作《杜诗论文》与《杜诗论事》二书。《杜诗论文》先成书，后写《杜诗论事》。（二）《杜诗论事》当是集注性质的书。到《杜诗论文》完成时，为论事所备的材料已非常充分，光补前人未备的材料即达一万多条。（三）人们对《杜诗论事》写作的情况不甚了了，《杜诗论事》是否写成，现在尚不知道。现在我们只能就《杜诗论文》进行研究。

二

《杜诗论文》是一部有创造性的著作。其创造性首先就表现在体例上。历来杜甫学著作都是将注和释结合在一起，而《杜诗论文》则将注另成书，专门阐释，专门论文。吴见思云：“杜诗而曰论文，止就其文义稍加衍释，校之钩深凿空者，庶明白简易焉。若事实考订，诸家笺注已备，除公自注者不录。”（《杜诗论

文·凡例》）明白地说，吴见思著书的本意就是忠实地阐释杜诗，使读者真正能明白杜诗。基于这样的目的，不列笺注，就很自然。但也有激烈批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夫笺注典故，所以明文义也。论事自论事，论文自论文，是以两无据矣。"（《杜诗论文》提要）从根本上否定了《杜诗论文》。论事与论文，本是两条学术分枝，分而为之，有何不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根据学术惯例认为论事与论文必须合为一体，未免胶固，《杜诗论文》实在是一种成功的探索。

《杜诗论文》共编诗一千四百四十八首。全部采用按杜甫生平活动系年，以诗系于相应年份之下的方法，再将诗分为五十六卷。对所有诗都进行了系年，故为编年体。吴见思认为杜诗都可系年，其言："诗不如是学也，即如杜甫，其生平所遇之境，亦甚不一，而恶乎漫学之？吾见有悄然以悲者矣，艴然以怒者矣，蓦然以委顿，而蹙然以愁思者矣，而皆莫不有岁月时事之可按。至于游览阅历，宴会赠答，或以人，或以地，或以事，亦莫不有所感会，而后通于诗。"（潘眉《杜诗论文序》载）但他对杜甫的生平和杜诗系年并非特别用功，主要利用前人的成果。自云："杜诗必用编年体者。玄、肃、代三朝，事实不同，即古、律、绝各体，亦连属不断，上下俱有承接，时代不可改易也。编次即有少差，前人未必无据，悉依旧本。"（《杜诗论文·凡例》）对前人的成就进行去取，形成自己的编排成果。其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将诗系年，便于研究杜甫的生平与创作，好处甚大。而杜甫的诗并非每首都能系年，强为系年，难免牵强。而系年须对所有的诗一一研究考证，贸然用前人的成果，也难免会蹈袭前人的错误。

《杜诗论文》在论述杜诗内容方面的最大特点，就是从杜诗的文本出发，做出符合杜诗本意的阐发，不求过深。《负薪行》

（《杜诗论文》卷三四，以后略去书名）云："夔州处女，发已半华，顶发半华。无夫家，正见处女也。因丧乱无人，而嫁不能售，故一生抱恨耳。况土风坐男使女，使之应当门户，负薪觅钱者，十有八九。所以双环垂颈，而插有野花山叶，便不与银钗并重。且登危而樵，集市而卖，更苦者盐井劳作，拼死射利，其艰苦如此。即有妆饰，亦与啼痕相杂。而利既僻，衣又单，困顿石根之下，更可怜也。夫巫山之女，粗丑如此，而地有昭君村，何耶？寻出一人，为处女处色。"阐释紧扣诗的内容，近乎串讲。论述也就内容本身而发，不探求所谓"隐秘"，以免偏离杜诗原意。《独酌成诗》（卷七）云："昨日灯花之喜，已许还家。今日绿酒相亲，依然为客也。一醉已消客愁，诗成若有神助，顶'绿酒'句。况兵戈在眼，正用武之时。儒者迂阔，岂有谋身之术。而又被微官羁绊，不能自由，反愧田野之优游耳。"论述简洁明白，符合杜诗原意。读了论述，理解杜诗变得很容易了。如果反复回味，理解就更准确而深刻。

《杜诗论文》对长诗往往要分段分析，段末简单归纳段意，在论文的开始还要归纳诗的主旨或特点。《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括概全诗云："此诗是咏怀之作，故目中所见，胸中所怀，无端无绪，一时序出。"将诗共分八段，并述段意。"一段，自序。""一段，序其耻干谒。""六句是自京赴奉先县。""一段，序游幸。""一段，言滥赏。""一段，序诸杨。""一段，言路途之苦。""一段，序到家以后之苦。""下又推开一步（又一段）。"全文就杜诗本身敷衍成文，一气呵成，插入分段和段意，文字极简洁，毫不影响文气的贯通。诠释准确，生动，通俗易懂。历来的杜诗诠释家很少把杜诗注释得这样符合杜诗原意，这样细致明了。

《杜诗论文》在论述时，注意发掘杜诗的意境，注意从意和

境两方面去阐释杜诗，因而有利于对杜诗意境的深入理解。《夏日李公见访》云："居在远林，暑气微薄，故公子适来游耳。贫居实类村坞，而僻近南楼。惟其僻，故邻家淳朴，而所愿易求。唯其易求，故我沽酒，从隔壁借问，而墙头已递过矣。于是展席清流之上，清风旋绕，客意经秋，正见远林暑气薄也。我居僻，故巢多众鸟，叶有鸣蝉，喧聒相仍。唯有水花晚色，庶足淹留耳。然邻家之酒无多，村晚无由更觅，故预恐其尽，而更为谋也。"仔细分析杜诗所写的事、所写的景，仔细分析杜甫的心态、感情，杜诗的意境也就豁然显现。读者对杜诗的理解和认识，也就深刻细致多了。

学术极需创新。由于《杜诗论文》竭力把握杜诗的本意，很多时候他对杜诗的认识理解也就与众不同，颇有新意和见解。《新婚别》（卷九）云："兔丝而附蓬根，不得所附，故引蔓不长。嫁女而与征夫，不得所归，故不如弃路旁也。四句比兴，引起结发而为君妇。恩义已深，乃暮婚晨别，无乃太匆忙乎！婉而悲，是新婚人语也。虽云君行不远，守边河阳耳，但妾初入门，百事未谙，何以事姑嫜乎！因言父母养我之时，令我避人，所以百事不谙。及出嫁之时，虽鸡狗亦得携去。爱我如此，孰知今日委弃如此，岂父母生我之意乎！所以君当生死之地，沉痛迫于中肠。虽欲随君同往，则携家而行，去就反为不便。不如决绝前往，努力事军事耳。即我同往，则妇人在军，兵气为之不扬，不敢以私害公也。又念贫家之女，即一罗襦，久而方就，其难如此。乃自今不复更着，而红妆尽洗，以绝君念。因叹百鸟无不双飞，而人事乖离，与君相望而不相见，哀哉。通篇皆新婚之言。"解说很细，"鸡狗亦得将"则有新意。

《杜诗论文》非常重视艺术的论述。在《凡例》中用很大篇幅谈论杜诗的艺术，在具体诗篇中又对艺术加以具体评论，说明

吴见思对艺术的研究超过一般的研究者，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首先，吴见思对杜诗艺术的研究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形成了自己明确的理论体系。他说："读诗之法，当先看其题目。唐人作诗，于题目不轻下一字，亦不轻漏一字，而杜尤严。次看其格局段落，其中反复照应，丝毫不乱。而排律更精。终看其句法，前后相合，虚实相生，而诗之能事毕矣。"（《杜诗论文·凡例》）事实上，他评论杜诗是有法而无定法，用艺术创造最根本的理念去解读杜诗的艺术创造。他说："杜诗纵横尽变，必有一定之法求之，是胶柱之瑟，刻舟之剑也。"（《杜诗论文·凡例》）因而他论杜诗的艺术精髓，是从篇题入手，进而论述其章法、句法、字法。而以此为纲，综合论述有关艺术理论问题，或加以引申，论述相关的一些具体艺术问题。这样的理论在清人中无疑是高明的。

在评论中，《杜诗论文》有很多新颖的见解。如论述杜甫以文体作诗："有以文体作诗者。如剑南纪行，《龙门阁》、《水会渡》诸诗。湖南纪行，《空灵滩》诸诗，用游纪体。如《赠王评事》'我之曾老姑'一首用传体。如《八哀诗》八首，用碑传墓志体。如《北征》、《壮游》诸诗，用记体。"以文为诗，本是杜诗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从文体方面论述杜诗以文为诗，很有创新。如论杜诗句法的创新与美妙。论杜诗用重复的句式："叠句。如'甚愧丈人厚，甚用丈人真'，两句中徘徊感荷。如'人道我卿绝世无，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东都'，两句中顿挫感慨。"分析杜诗用叠句表达思想感情的凝重和感慨以及诗句在重复中的变化，非常有见地。论杜诗语意的创新："翻新之句。如咏广文，而曰'寒毡'，贫矣。反曰'坐客无寒毡'，寒毡且无，况其他乎？如对月思家，而曰双照，苦矣。必曰'双照泪痕干'，

泪痕且不得双，何况乐乎!”比一般诗人论杜甫更深入一层来描写，故能出新，对杜诗艺术的认识较深刻。用与句意相反的词来表达思想。“反形之句。极荒凉处而以富丽语出之，如‘野寺残僧少’也，而曰‘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益见其荒凉。极贫窘事，而以富贵语出之，如‘乔木村墟古’也，而曰‘登俎黄柑重，支席锦石圆’，愈见其贫窘。极悲伤事，而以欢快语出之，如北征初归，‘老夫情怀恶’也，而曰‘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而益见以前之悲伤。”从反面来写，正是匠心独运之处，不仅能达到正面描写的效果，而且视角独特，含义丰富。论杜诗从侧面描写：“借用之句，如‘辛苦贼中来’也，而曰‘所亲惊老瘦’，借旁人眼中看出，而己不知。如‘生还偶然遂’也，而曰‘邻人满墙头’借邻家感叹写出而愈悲也。”诗忌直说，从侧面描写，转换一个新的视角，给读者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杜诗论文》的这些论述都是很精彩的。所论述的实际上不仅是语言的范畴，也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技巧。论杜诗的语言锤炼，论用字的精彩：“点一字而神理俱出者。如‘国破山河在’，‘在’字则兴废可悲。‘城春草木深’，‘深’字则荟蔚满目矣。用一字而景物毕肖者，如‘雨行秦树直’，‘直’字方是秦中之树。‘万点蜀山尖’，‘尖’字方是蜀中之山。如‘细动迎风燕’，‘细’字写燕，并写大江中燕。‘轻摇逐海鸥’，‘摇’字写鸥，并写急流中之鸥。用一字而反衬者。如‘山河扶绣户’，‘扶’字，借山河而写绣户之高。‘乾坤绕汉宫’，‘绕’字借乾坤写汉宫之大。如‘楼光去日远’，‘去’字不写日远，而写楼之峻。‘峡影入江深’，‘入’字不写江深，而写峡之高。”对杜诗用字的研究，非常深，非常细。论杜诗在一首诗中大量使用同一类名词：“用重字，诗家之病也。而《赠韩谏议》一首，如星宫之

君、北斗、羽人、赤松子、南极老人，并麒麟、凤凰、芙蓉、旌旗、琼浆、烟雾，纯用神仙事。《魏将军歌》一首，如星缠、天驷、天河、欃枪、荧惑、钩陈、玄武，纯用天文事。《舍弟观到江陵》第一首，用荆州、峡内、沙头、硗关、寒江、黄牛，八句而用六地名。前题第二首，如庾信、罗舍、蒋诩、邵平，八句而用四人名，反以相犯出奇。而不复见其使事之迹。”（以上均见《杜诗论文·凡例》）论述杜诗敢于打破传统的理念，以相犯出奇，正见出杜诗的创造性，见出杜诗的功力。

在诗篇的艺术性研究中，《杜诗论文》往往结合内容分析艺术，往往只抓住一两点论述，非常精辟。《垂老别》（卷九）云：“乃竟介胄而来，长揖上官，以强壮激烈语，写衰迈痛苦之情，其悲亦甚矣。下乃收转。”很能抓住杜诗的特点，分析其非同寻常的创新之处。

《杜诗论文》认为杜诗风格多样，对中晚诗人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其《凡例》云：“即就唐人而论，杜公已掩有众长。如‘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则元白也。‘客醉挥金椀，诗成得锦袍。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则温李也。‘万壑树声满，千崖秋气高，眼穿当落日，心死着寒灰’，则贾岛也。‘崩石欹山树，清涟曳水衣。红浸珊瑚短，青悬薜荔长’，则钱刘也。‘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荷花本自双’，则韩偓杜牧也。‘王即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豫章翻风白日动，长鲸跋浪沧溟开’，太白无此雄放。‘太常楼船声嗷嘈，向兵刮寇起下牢。牧出令奔飞百艘，猛蛟突兽纷遁逃’，长吉无此奇杰。出奇余绪，已足衣被一代。”杜诗在艺术上集大成，开启中唐，对后世唐人诗风的形成确实产生了重要作用。《杜诗论文》的论述确实是很有见地的。

《杜诗论文》的研究也有不足。由于作者也用“以意逆志”

的方法理解杜诗，有的理解未能完全避免穿凿，有的论述也嫌肤浅。对艺术的论述，有的太简单，有的太浅。如“诗成若有神助，顶‘绿酒’句”（《独酌成诗》，卷七）便没有多少意思。

总的说来，《杜诗论文》的作者鉴于历来研究杜诗多穿凿附会、强为臆说，或曲征博引、释事忘义的弊病，开辟一条旨在以杜论杜，专门研究杜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创造的道路，并取得巨大的成就。《杜诗论文》是明代单复、邵宝以杜解杜的道路的继续与发展。在杜甫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吴兴祚云：“今学杜与注杜者，皆泥乎诗之见，所由失之愈远也。独家齐贤诵其诗能会其心，其所为文，即以文章之法次第疏导之，不强杜以从我，而举杜以还杜。但学晦者如揭，塞者以开，血脉贯通，而神气盎溢，则不待易其衣冠，改其故步，而千载之活杜公出矣。”（《杜诗论文序》）龚鼎孳云：“虞山宗伯笺注，尊重艺林，殆非一日，今吴子互相发明，虞山论其事，吴子论其文，文既剖析无晦，事更可考而知矣。”（《杜诗论文序》）钱谦益名重一世，当时看，对吴见思的评价似乎太高。世易时移，今天看，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九 仇兆鳌

一

仇兆鳌（1638—1717），字沧柱，号章溪老叟，鄞县（今浙江鄞县）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康熙四十三年，仇兆鳌将所著《杜诗详注》献给康熙皇帝，受到赏

识。为翰林院检讨，总裁纂修《方舆程考》。历官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翰林学士。

仇兆鳌一生从事杜甫研究，搜集了大量杜诗版本和材料，辑为《杜诗详注》，历时二十余年。书刻成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他在《杜诗详注》的《凡例》中说："宋元以来，注家不下数百，如分类千家集注所列姓氏尚百有五十人，其载入注中者，亦止十数家耳。其所未采者，尚有洪迈之《随笔》，叶梦得之《诗话》，罗大经之《玉露》，王应麟之《困学纪闻》，刘克庄、楼钥之文集。……今备采编中。"(《杜诗凡例》)书出版后，他仍然孜孜不倦地搜集材料，进行增订。他说："甲申冬，仍上金台，复得数家新注，如前辈吴志伊、阎百史、年友张石虹、同乡张迩可，各有发明。辛卯，致政南归，舟次辑成，聊补前书之疏略，时年七十有四矣。"(《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后《今按》)可以说，《杜诗详注》是一部惨淡经营的杜甫学巨著。

二

创作学术巨著，首先要有高远的研究理念。仇兆鳌高瞻远瞩，他不把杜甫仅仅看作一位著名的作家，而是看作一位政治与思想的伟人。因此，他特别注重站在儒家的立场，用儒家思想来指导杜甫、杜诗的研究。研究从实际出发，将当时的社会与杜甫和杜诗参照研究，知人论世。同时将杜甫作为古代忠义的代表来研究，揭示他人格的社会意义。对于他的作品的艺术也从大处着眼研究，而不单单"较诸词句之工拙"。故其《杜诗详注·原序》说："盖其（杜甫）为诗也，有诗之实焉，有诗之本焉。孟子之论诗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又曰：'可以兴观群怨，迩事父而远事君。'诗有关于性情伦纪，非

作诗之本乎？故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使舍是二者而谈杜，如稹愈所云，究亦无异于词人矣。”“故注杜者必反复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概乎有余悲，悄乎有余思也。”在研究杜甫的艺术思想、方法和体裁上的创造与成就时，往往能从历史的高度和发展的眼光来观察，评价大多准确而深刻。因此，我们说仇兆鳌对杜诗的研究比一般研究者站得高得多，研究的领域也广得多，成果也丰富得多，深刻得多。

内容丰富，结构宏大，体例严密。仇兆鳌多角度、宽领域对杜甫和杜诗进行研究，又用严密的体例使他的研究成果条理化、规范化。从体例上说，《杜诗详注》包括这样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对诗文进行详细的注与评。仇兆鳌说：“先挈纲提领，以疏其脉络，复广搜博征，以讨其典故。汰旧注之楦釀丛脞，辩新说之穿凿支离。夫亦据孔孟之诗论者以解杜，而非敢凭臆见为揣测也。”（《杜诗详注·原序》）其二，有关杜甫的资料附录，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仇兆鳌搜集的有关杜甫的遗诗及相关情况。（二）有关杜甫生平事迹和诗集的重要资料。主要有杜甫诗集（包括所注集）的序，杜甫寓所记、墓志和有关资料。（三）历代咏杜的诗。（四）历代对杜甫的评论。都是提供有关杜甫和杜诗宏观研究的材料。仇兆鳌用这样宏大而严密的体例，把自己有关杜甫的研究心得和历代有关杜甫的成果（包括注释），精心梳理组织，精心阐发，奉献给读者。

诗的注与评是全书的主要内容和价值所在，也有严密的体例，以规范和展示作者的成果。现作细致的论述。

（一）广列异文，详细校勘。《杜诗详注》所用校勘材料非常

丰富，除不同的杜诗版本外，总集、诗话、碑刻、字幅皆在所用之列。《天育骠图歌》（《杜诗详注》卷四，以后略去书名）“图”（《英华》作图，别本作骑）。“吾闻天子之马”（《艇斋诗话》作天马之子）。“鬃”（从赵作鬃，别作骏）。“缥”（《英华》作骠）。“矫矫（一作矫然）龙性（一云矫龙性逸）含”（蔡云：东坡书作含，《英华》同，一作合）。“监”（一作考）“攻”（一作收，一作神）。“字”（胡仔云：东坡作字，《英华》作守）。“骏”（一作俊）。大量罗列异文，可供阅读参考。一些重要文字的校勘，往往是在正文中出校语，在注中作考定，在附考中辩证。《游龙门奉先寺》校：“天阙”（《正异》作窥，姜氏作开）。注：韦述《东都记》：龙门号双阙，与大内对峙，若天阙然。陆倕《石阙铭》：假天阙于牛头。朱注：《丹阳记》载王茂弘指牛头山两峰为天阙，见《文选注》，禹疏伊水北流，两山相对，望之若阙，见《水经注》，皆确据也。况此本古体诗，何必拘拘偶对耶。钱笺：“韦应物《龙门游眺》诗云：‘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阙。’此即杜诗注脚也。”注释既是释天阙之意，也是确定本文应为天阙的理由。用附考对异文加以否定，说明定本应为“天阙”。“附考：杜诗各本流传，多有字句舛讹。昔蔡伯世作《正异》而未尽其详。朱子欲作考异，而未果成书。今遇彼此互异处，酌其当者书于本文。参见者分注句下，较钱笺、朱注多所辩证矣。如此诗‘天阙’诸家聚讼约有八说：蔡兴宗《正异》依古本作‘天窥’，有《庄子》‘以管窥天’及鲍照诗‘天窥苟平圆’可证。杨慎云‘天窥’‘云卧’乃倒字法，言窥天则星辰垂地，卧云则空翠湿衣，见山寺高寒，殊于人境也。蔡绦及《庚溪诗话》皆作‘天阙’，引韦述《东都记》‘龙门若天阙’为证，言天阙迥而象纬逼近，云卧山而衣裳凉冷也。朱鹤龄从之。姜氏疑‘天阙’既用实地，不应‘云卧’又作虚对，欲改作‘天开’，引《天官书》‘天开书云物’为

证，则属对既工，而声韵不失。张綖谓‘天阙’乃寺门观，‘云卧’犹言云室。《杜臆》解‘天阙’为帝座，以《宋·志》角二星十二度谓之‘天阙’也。王介甫改作‘天阅’。旧千家本或作‘天阔’，或改‘天关’，俱未安。据文翔凤《药溪谈》：伊阳之北山，即鸣皋之派，长殆百里，如云卧然。龙门南直卧云，故云然耶。”所列异文达八种，并列各家持此文的理由，可供读者研究。这样做校勘，非常详细，体例也是一种创造。

（二）提供诗的写作背景材料，尽可能对诗系年。《杜诗详注》往往在诗的题目下注出诗的写作时间、地点、社会背景以及诗人的情况，这对于读者理解诗的内容很有益处。《夏日叹》题下注：“此乾元二年夏在华州作。《旧唐书》：乾元二年四月癸亥，此久旱徙市，云祭祈雨。《通鉴》：时天下饥馑，九节度围邺城，诸军乏食，人思自溃。与诗中‘上苍久无雷’及‘流冗’‘豺狼’等语正合。”注提供了当时大旱和战争的社会背景，使读者知道诗“万人尚流冗，举目唯蒿莱。至今大河北，化作虎与豹。浩荡想幽蓟，王师安在哉”完全是纪实，而对于杜甫“对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谐。眇然贞观初，难与数子偕”的感情和思想也理解得更为深刻。由此我们也可以对古人称杜诗为“诗史”有更深刻的理解。《杜诗详注》对前人系年的错误，或对诗内容理解的错误也进行了辩证，有助于读者正确理解杜诗。《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卷五）集朱鹤龄注：“去秋群胡反，赵次公、黄希诸注，皆指吐蕃，非也。《唐书》：至德元载，吐蕃陷威戎等诸军，入屯石堡，在此陇右河鄯等州，而河西凉州未尝陷。《通鉴》：至德二载，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威武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威武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贼据其五，二城坚守。度支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此云群胡反，正指其事。曰去秋者，讨平在正月，而发难

则在去秋。是时武威虽复，而余乱尚有未戢者。故欲早到凉州，安黎甿而按城堡也。”原来注家认为此诗“去秋群胡反”指吐蕃，朱鹤龄则认为是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之乱，朱鹤龄的看法是符合事实的。

（三）分章解说。分析每章的内容、具体词语的含义、诗人的思维脉络、具体的艺术表现、篇章结构。仇兆鳌分《北征》为八段。一、“首段从北征问家叙起。”二、“次述辞朝恋主之情。上八，欲去不忍，忧在君德。下八，既行犹思，忧在世事。”三、“此历叙征途所见之景。既逾越阡陌，复回顾凤翔，自此而过邠郊、望鄜畤，家乡渐近矣。”四、“此备写归家悲喜之状。裋褐以上，乍见而悲，极夫妻儿女至情。老夫以下，悲过而喜，尽室家曲折之状。在贼四句，缴上起下，所忧在君国矣。”五、“此忧借兵回纥之害。妖氛豁，天意回矣。回纥助，人心顺矣。此兴复大机也。但借兵外事，终为国患，故云‘少为贵’。”六、“此陈专用官军之利。是时名将统兵，奇正兼出，可以收两京、定河北，而擒安史，此为制胜万全之策。朱注：当时李泌之议，欲令建宁并塞北出，与光弼犄角，以取范阳，所见正与公同。”七、“此借鉴杨妃，隐忧张良娣也。许彦昭曰：祸乱既作，唯赏罚当，则能再振，否则不可支矣。陈元礼首议诛国忠太贞，无此举，虽有李郭，不能奏匡复之功，故以活国许之。欲致兴复，当先去女戎。”八、“终以太宗事业，望中兴之主。当时旧国思君，陵寝无恙，其光复在指顾之间矣。此章大旨，以前二节为提纲。首节北征问家，乃身上事，伏第三、四段。次节恐君遗失，乃意中事，伏五、六、七段。公身为谏官，外恐军政之遗失，内恐宫闱之遗失，凡辞朝时，意中所欲言者，皆罄露于斯。此其脉理之照应也。若通篇构局，四句起，八句结，中间三十六句者两段，十六句者两段，后面十二句者两段，此又部伍之整肃也。”研究文学

应该像研究建筑一样，既要从整体和宏观上观察，也要从结构与细部研究。仇兆鳌的分章分段解说，正是从结构的角度对诗篇的内容与艺术进行细致的剖析，深入诗的内部体会诗的妙处。即便不太长的诗，也有具体解说。《登兖州城楼》本是一首律诗，仇兆鳌解说云："公至兖州省亲而咏南楼也。通首皆登楼所见。'海岱''青徐'属远景，故以'纵目'二字起之。'秦碑''鲁殿'属近景，故以'临眺'二字结之。仍上下四句分截。"下并引他人的解说以补充。"赵汸云：三四宏阔，俯仰千里，五六微婉，上下千年。曰'从来'则平昔襟抱可知。曰'独'则登楼者未必皆知。"以分析结构为中心，具体详说诗的内容与艺术特点。

（四）注解详明。《杜诗详注》的基本内容是对诗中有关的人名地理、典章制度、天文名物、事典语典、难辞僻句进行注释。总之，一切需要说明的地方，一切需要提供阅读材料的地方，《杜诗详注》总是尽量注解，让读者尽可能充分理解杜诗，研究欣赏杜诗。

（五）集诗歌评论，对整首杜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进行阐发。有的还从诗歌发展的历史角度，对杜诗的创造和地位进行评论。《兵车行》列评论五则："单复曰：此为明皇用兵吐蕃而作，故托汉武以讽，其辞可哀也。先言人哭，后言鬼哭，中言内郡凋敝，民不聊生，此安史之乱所由起也。吁！为人君而有穷兵黩武之心者，亦当为之恻然兴悯，惕然知戒矣。王道俊《杜诗博议》：王深父云：时方用兵吐蕃，故托汉武事为刺。此说是也。黄鹤谓天宝十载，鲜于仲通丧师泸南，制大募兵击南诏，人莫肯应。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前，故有牵衣顿足等语。按明皇季年，穷兵吐蕃，征戍驿骚，内郡几遍。当时点行愁怨者不独征南一役，故公托为自诉之词，以讥切之。若云惧杨国忠贵盛而诡其词于关西，则尤不然。太白《古风》云：'渡泸及

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壮士，南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已明刺之矣，太白胡独不畏国忠耶？蔡宽夫曰：齐梁以来，文士喜为乐府词，往往失其命题本意。《乌生八九子》但咏乌，《雉朝飞》但咏雉，《鸡鸣高树颠》但咏鸡。大抵类此。甚有并其题而失之者。如《相府莲》讹为《想夫怜》，《杨婆儿》讹为《杨叛儿》之类是也。虽李太白亦不免此。唯老杜《兵车行》、《悲青坂》、《无家别》等篇，皆因时事，自出己意立题，略不更蹈前人陈迹，真豪杰也。海宁周甸曰：少陵值唐运中衰，其音响节奏，骎骎乎变风、变雅，与骚同功。唐非无诗，求能仰窥圣作，裨益世教，如少陵者鲜矣。胡应麟曰：六朝七言古诗，通章尚用平韵转声，七字成句，读未大畅。至于唐人，韵则平仄互换，句则三五错综，而又加以开阖，传以神情，宏以风藻。七言之体，至是大备。又曰少陵不效四言，不仿《离骚》，不用乐府旧题，是此老胸中壁立处。然风骚乐府遗意，老杜往往得之。太白以《百忧》等篇拟风雅，《鸣皋》等作拟《离骚》，俱相去悬远。乐府奇伟，高出六朝，古质不如两汉，较输杜一筹也。又云：乐府则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风雅。《蜀道难》《远别离》等篇，出鬼入神，惝恍莫测，《兵车行》《新婚别》等作，述情陈事，恳恻如见。张王欲以拙胜，所谓差之厘毫；温李欲以巧胜，所谓谬以千里。”这些评论对《兵车行》的写作时代背景、立意命题的创造、有益于社会的创作主旨、对风骚乐府创作精神的继承发扬、对七言体（或者说乐府体）的贡献与地位都有精辟的论述，对于读者阅读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六）用按语的形式阐述自己的见解，或与前人的论点商榷。一部学术著作，应该有自己的学术见解，并形成体系，才算一部高水平的著作。仇兆鳌在长期对杜诗进行集注的过程中，对杜诗有深入的研究，他的主要心得表现在对杜诗的分章阐释中，而有

些他认为好的见解也放在诗后。《戏为六绝句》（卷一一），仇兆鳌说："少陵绝句，多纵横跌宕，能以议论摅其胸臆。气格才情，迥异常调，不徒以风韵姿致见长矣。"杜甫的有些绝句确实以议论为主，纵横捭阖，形成其独特的风格。仇兆鳌的评论是很精彩的。有些考证也很有力。《冬日怀李白》（卷一），仇兆鳌说："李集有《尧祠赠杜补阙》诗：'我觉秋兴逸，谁言愁气悲。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相宜。烟归碧海少，雁度青天迟。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段成式《酉阳杂俎》谓杜补阙即杜子美，公此诗用李诗迟字以和之。其说非也。公遇李时尚为布衣，其授拾遗，在至德乾元间。且补阙、拾遗官衔不同，岂可强作傅会耶。"仇兆鳌之说甚是。杜甫未做过补阙，故李白的诗不是赠杜甫的。而杜甫的诗与李白的诗在内容上无关联，故杜甫的诗也不是和李白的。仇兆鳌的考证破前人谬说，有利于李白、杜甫关系的深入研究。《卜居》正本清源，力破众说之谬。仇兆鳌说："公《壮游》诗云'鉴湖五月凉'，盖深羡山阴风景之美。今见浣花幽胜，仿佛似之，故思乘兴东游，此快意语，非愁叹语。诸说纷纷，总于诗意不合。张綖谓东向山阴，意在访郑虔也。按公崎岖入蜀，方构草堂，岂能舍妻子而远寻故人？其说迂矣。周珽谓欲东归洛阳，须从山北阴处上船而去。按成都无山，不当以溪畔为山阴，其说凿矣。顾宸谓公欲万里而至山阴，则冕之为人可知。此似作憾冕之词。按公至成都，在乾元二年十二月。次年三月，以李若幽为成都尹，时公方卜居，而裴亦将去矣，焉得有不足之词？其说亦无据也。"仇兆鳌对《卜居》的理解是正确的，力破旧说，虽无新意，但使人们不为谬说所蔽，使其回到正确的轨道，也是对学术的贡献。

《杜诗详注》是清代朴学盛行的产物，是民族诗歌研究方法的结晶。一方面，作者尽量汇集历代关于杜诗研究（广义的研

究，包括注释）的重要的和有代表性的成果，汇集各种有关杜诗的重要资料。（值得注意的是，《杜诗详注》集注所用的原著，有的已经亡佚，这些所存的集注之文，就弥足珍贵。）同时作者进行新的注释，包括对前人研究错误的甄别与批评，提出自己的新的见解，它是一部包含着著者鲜明学术创新的、以阐释为中心（或者说以集注为特点）的、汇集历代杜甫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著作。集成和创新在这里达到了很好的结合。它是杜甫研究史上的高峰。就内容的丰富而言，就影响的巨大而言，在它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巨著，在它之后，也还没有产生过能与之比肩的巨著。

当然，《杜诗详注》也有严重的缺陷。一方面因为作者并非清代最杰出的学者，在学识方面还没有达到宏博精深的境界，一方面也因为这样一部包罗万汇的著作，难免出现很多错误。故而《杜诗详注》一方面很受推崇，一方面也颇受指责。杨伦《杜诗镜铨》和浦起龙《读杜心解》对《杜诗详注》都有批评与纠正，施鸿保的《读杜诗说》更是一部批评《杜诗详注》的专著。我们认为，《杜诗详注》主要有以下缺陷：

（一）解说和注释存在大量错误。到清代，已经有大量的杜诗注释存在，这对集注来说很方便。然而，《杜诗详注》却将有些错误的注解采入集注中。《阆水歌》“巴童荡桨欹侧过”，解说者没有读懂原文，本来是巴童在船上荡着桨欹侧从江上走过，而解说者误解为“桨欹侧”。“巴童荡桨欹侧过”与“水鸟衔鱼来去飞”两对，句式完全一样。“水鸟衔鱼来去飞”的“来去飞”的是水鸟，而不是鱼在来去，那么“巴童荡桨欹侧过”的“欹侧过”的是巴童，而不是“桨欹侧”。同时，阆中的嘉陵江非常宽，“桨欹侧”，人在岸上是难以看清的，而船工荡桨侧身的姿态却历历在目。同时，船工欹侧荡桨，姿态优美，富有诗意，而写桨欹

侧则味同嚼蜡。《上水遣怀》“我衰太平时，身病戎马后”，仇兆鳌说：“太平指天宝以前，戎马，指至德以后。”其“太平指天宝以前”即不符合杜甫原意，应包括天宝时期才对。实际上，杜甫是说安史之乱前，我不为世所用，身心衰惫，安史之乱后，我奔窜逃难，身体多病。这说明仇兆鳌对杜诗的理解还没有达到正确精微的水平。

（二）有些见解浅薄，评论卑陋。研究杜诗，应该有伟大的胸襟、非凡的学识，才会有高明的见解。关于李白与杜甫，仇兆鳌往往从抑李扬杜出发，不顾事实，乱发议论。《冬日怀李白》（卷一），仇兆鳌：“今考：太白集中，有寄少陵二章，一是《鲁郡石门送杜》，一是《沙丘城下寄杜》，皆一时酬应之篇，无甚出色，亦可见两公交情，李疏旷而杜剀切矣。至于天宝之后，间关秦蜀，杜年愈多而诗学愈精，惜太白未之见耳。若使再有赠答，其推服少陵，不知当如何倾倒耶?”考的前半部分说李白赠杜甫的诗“无甚出色”，已使人不能信服，而后半推测如果李白天宝后见到杜甫诗当如何倾倒，则更加无聊。明知不是事实，说来有什么用。《羌村三首》（卷五），仇兆鳌评：“杜诗每章各有起承转阖，其一题数章者，互有起承转阖。此诗首章是总起。次章，上四句为承，中四句为转，下四句为阖。三章八句为承，中四句为转，下四句为阖。此诗法之可类推者。”杜甫是一个伟大的诗人，《羌村三首》是他的名诗，艺术上有很多创新。而仇兆鳌用作八股文的起承转合的方法来评论杜诗，将一篇奇妙精彩的诗评得只剩起承转合四个枯骨。这不是在阐扬、评论杜诗，完全是在亵渎杜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下，仇兆鳌评论说：“今按，《北征》诗尚带率语，如‘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将真情真事信笔写来，黄彻谓如转石于千仞之山，势也。学者尤之过甚，亦

未窥其远大者耳。若此诗（按：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悲愁激切，而语皆雅饬，更无疵句议矣。”本来，仇兆鳌所举的《北征》中的六句诗，运用细节描写，表现杜甫安史之乱回到家中与家人见面的惊喜和自己的身体状况，表现战乱中别离的人们还家的景况，极为真实生动，非常富有艺术创造性。而仇兆鳌以传统的“雅饬”为标准，来进行评论，便显得尴尬与矛盾。既肯定它，又带有否定；认为它是“率语”，又承认它“如转石于千仞之山”，没有说到点子上，没有说深说透，故将对《北征》的主要评论放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

（三）见识不高，别裁不精，有不少冗杂的注释和辑评，也有一些当注、当详者没有注释和辑评。杨伦曾说：“至近时仇注，月露风云，一一俱烦疏解，尤为可笑。”（《杜诗镜铨凡例》）《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卷三）“应是雨催诗”集注：“赵曰：东坡诗‘飒飒催诗白雨来’句，本于杜诗。”作为注释，实在多余。《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卷五）诗末集评：“苏轼曰：七言之伟丽者，子美云：‘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而后寂寞无闻。欧阳永叔云‘苍波万古流不尽，白鸟双飞意自闲’，又‘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可以并驾争先矣。小生亦云‘令严鼓角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又‘露布朝辞玉关塞，掉书夜到甘泉宫’，亦庶几矣。”苏轼的评论并无高见，且主要谈宋代诗歌，辑入辑评中已嫌不够格，而仇兆鳌更在苏轼基础上引申，大谈宋诗的雄伟激壮：“今按：米南宫《浙江潮》诗‘天排云阵千军吼，地涌银山万马奔’，陆放翁诗‘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又云‘云埋废苑呼鹰处，雪暗荒郊射虎天’，又云‘江声不尽英雄恨，天意无私草木秋’，皆雄伟激壮，可参唐人佳句。”这样的辑评对阅读杜诗没有益处，只是徒增累

赘而已。相反，有些应有注释的，却未注释。《北征》（卷五）“仗钺奋忠烈”的“仗钺”只注了出处：“《书》：左仗黄钺。”应有疏解。又《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卷五）“欲知世掌丝纶美”的“丝纶”也只注了出处：“《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应有疏解。《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卷一〇）是杜甫的名诗，前人多有评论，而《杜诗详注》却没有辑评，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

（四）对前人材料梳理不够，集注引用材料有不少失误。集注理应引用最早的、完善的注释作为注释，而《杜诗详注》对前人的注释钻研、熟悉不够，往往抛弃最早的注释，而用后代的注释。《悲青坂》（卷四）的“青坂”，郭知达本已有注释，钱注本用郭知达本注释。《杜诗详注》不用郭知达本注释而用钱注，显然错误。《不见》（卷一〇）的“匡山读书处”的“匡山”，郭知达本注释颇详。《杜诗详注》不用郭知达本注，不用宋人注，而用明代杨慎《丹铭录》之说“《丹铭录》谓指彰明县南之匡山”，真是舍本逐末，很不恰当。

《杜诗详注》作为古代杜甫学的巅峰之作，却有如此多的缺陷，称不上精湛之作，这是令人遗憾的。这表明杜甫研究确实非常难，与此同时，也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一〇 王士禛

一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阳山人。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人。顺治时进士，授江南扬州推官。擢

礼部主事，迁户部郎中。改翰林院侍讲，迁为侍读。为国子监祭酒，迁少詹事。任兵部侍郎，调户部。迁刑部尚书。后罢，归故乡。王士禛是清代著名诗人，又以博学著称于当时，著述甚富。主要作品收入《带经堂集》。王士禛的杜甫研究成果散见于其著作中。

二

王士禛是大官僚，又是文坛领袖与文艺理论家，他研究杜甫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儒家思想与自己的神韵理论结合起来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这就形成了他独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从儒家的观点和官僚的立场出发，王士禛对杜诗的思想性评价非常高，总体评价是“杜甫圣语”（《带经堂诗话》卷一《品藻类》），虽是“戏论”，却堪称的评。所谓“圣语”，就是杜诗所表达的思想为人们的指导思想，是人们思想行为的指南，这样的评价，在封建社会可谓最高评价。

杜甫之作为“圣语”，在王士禛看来有两个最主要的因素：其一，杜甫将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化为了诗的气骨，贯穿诗的一切方面；其二，感时纪事，本之于诚，使其诗成为诗史。他说：“独是工部之诗，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故形之篇章，感时纪事，则人尊诗史之称。冠古轶今，则人有大成之号。不有拟古浮辞，而风谣俱归乐府。不有淫佚艳靡，而赠答悉本风人。故登吹台于梁宋，则支离东北风尘。栖江阁于夔州，则漂泊西南天地。故浑脱浏漓，只如其自道，顿挫独出，能此者几人?”（郎廷槐《师友诗传录》三〇）忠爱之说，乃为人所常道，史诗之说，也是早已有之。但王士禛论述深刻，而且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他超过前人的地方，也是他创新的地方。王士禛还特别强调杜甫之作的“诚”，他说：“盖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谓之

'诗史'者，其大过人处在诚实耳。"（《带经堂诗话》卷一《品藻类》）这里的诚实非一般的诚实，而是"气"的"诚"。它是事实的诚、思想的诚，也是内容的诚、艺术的诚。也就是说，杜甫做到了内容最大的真实，达到了一般人没有达到的艺术真实的境界。王士禛用"诚"来提升他对杜诗表达忠君爱国和杜诗是诗史的论述，形成了关于杜诗内容评价的理论体系，论述非常完整和深刻，也是有创见的。

王士禛对杜诗的艺术论述很多，也很精彩。从宏观上说，他认为杜甫所以能成为一位最伟大的诗人是因为他能集大成，也善于创新。关于集大成，前人论之已多，王士禛所论又有创新。他借汪洪度的话说："纵观载籍，由汉魏以迄于今，大而塞乎无垠，细而入乎无间，集古今之大成，敻万象而独出者，莫先杜陵，尊之曰圣，诚莫与京矣。"（《居易录》）一般说集大成，是集诗歌艺术之大成，而王士禛所谓的集大成，是集一切文章技巧之大成，集一切文化之大成，其见解又进了一大步。而这个说法，更能反映杜甫集大成的实际。对于杜甫的创造，其论述甚多。不仅称赞其语言技巧的创新，尤为称赞其格调和体裁的创新。"至少陵乃大惩厥弊，以雄辞直写时事，以创格而纾鸿文，而新体立焉。"（《师友诗传录》二六）王士禛特别强调杜甫的"变"："杜之《新婚》《无家》诸别，《石壕》《新安》诸吏，《哀江头》《兵车行》诸篇，皆乐府之变也。"（《师友诗传录》三）"李杜始大变其（指其古换韵法）格。"（《师友诗传录》一三）所谓变，就是创新之意。正是集大成和大创造，形成杜诗伟大的艺术魅力。"诗至工部，集古今之大成，百代而下无异词者。七言大篇，尤为前所未有，后所莫及。盖天地元气之奥，至杜而始发之。"（《带经堂诗话》卷四《纂辑类》）虽所论为七言大篇，实际上适合一切体裁的诗。的确，王士禛的话非常有见地，正是因为杜甫最善于继承

和创新，杜诗才有那样无可比拟的巨大艺术力量。杜甫所以能成为最伟大的诗人，其秘诀也在于此。

王士禛认为杜甫诗的风格是高浑典厚、苍凉悲壮，而其基本艺术方法，就是以赋为主，而兼比兴，即将赋比兴结合运用。“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雅，四曰颂，五曰比，六曰兴。夫六义之序，以赋次风者，何也？元晏先生所云：‘赋也者，因物造端，敷弘而体理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是赋者，古诗之流也。雅颂之则，于是乎托，比兴之音，于是乎俪。故讽喻抑扬之音以寓，涵蓄消停之义以存，是真风雅之正则也。流极其后，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辞博诞绝类。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纤毫之内。祖构之士，雷同附和，罔知所终。’至杜少陵乃大惩厥弊，以雄辞直写时事，以创格而纾鸿文，而新体立焉。教之白太傅讽喻诗《秦中吟》之属，及王建、张籍新乐府，倍觉高浑典厚，苍凉悲壮。此正一主于赋，而兼比兴之旨者也。以贯六义，无遗憾矣。”（《师友诗传录》二六）王士禛以传统的文艺理论来观照杜甫，对杜诗的风格和艺术方法的把握非常准确，论述非常深刻。

王士禛对杜诗的艺术也有具体论述。他认为杜诗长于议论和叙事。“至于议论和叙事，自别是一体。故仆尝云，五七言有二体，田园丘壑，当学陶韦，铺叙感慨，当学杜子美《北征》等篇也。”（《师友诗传录》五）王士禛还认为杜甫的语言是最美的，“句法杜老最妙”（《然镫记闻》七）。

从各种体裁诗的成就来说，王士禛认为杜甫很多体裁的诗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谈七律云：“学诸家七律（指王维、李颀等），久而有所得，然后取杜诗读之，譬如百川而至于海也，此是究竟归宿处。”论七古云：“七言古诗，诸公一调。唯杜甫横绝古今，同时大匠，无敢抗行。李白、岑参二家，别出机杼，语羞

雷同，亦称奇特。”（《带经堂诗话》卷一《品藻类》）评价极高，但非常公允。

对具体的诗的艺术，他也有精彩的论述。如谈杜甫《登高》和《滟滪》二诗：“七言律有以叠字益见悲壮者，如杜子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江天漠漠双鸟去，风雨时时龙一吟’是也。”（《带经堂诗话》卷三《真诀类》）论杜甫《高都护骢马行》云：“《高都护骢马行》：此子美少壮时作，无一句不精悍。”（《石洲诗话》卷六《渔洋评杜摘记》）谈杜甫《子规》诗云：“常爱杜诗‘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又明初人诗‘数家茅屋临江水，一路松风响杜鹃’，写蜀江风景宛然在目。”（《带经堂诗话》卷一二《佳句类》）

王士禛熟精杜诗，用神韵派领袖的眼光来研究杜诗，确实有很多高妙的见解，对杜诗的内容与艺术的论述都有独到而精微之处。翁方纲说：“杜之神理，亦唯渔洋能识之。”（《渔洋论诗精髓》）

王士禛还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杜诗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最具特色和最精彩的是，王士禛以游宦的机会，来到杜甫漂泊和生活的地方，对杜甫的生活经历、作诗的地点、环境与诗的关系和杜甫的遗迹等进行实地考察，进而研究杜甫和杜诗，实地体验杜诗的内容与艺术。他对于巴蜀的杜甫行踪和杜甫遗迹考察尤详。所考察经历处主要有落凤坡（德阳境内）、阆中、鹅溪（盐亭境内）、潼川（今三台）、涪江（在绵阳）、徐州（今宜宾）、奉节、白帝城，此外尚有湖北、河南、山东等地的下牢溪、松滋渡、石壕、洛阳、济宁等。王士禛记云：“保宁府治阆中县，东北过灵山，昔蜀王鳖灵登此。又有玉台观、滕王亭子，皆滕王元婴遗迹。泊舟城南阆中山下，山一名锦屏。……山上旧有少陵祠堂，遥望半山一亭，芜陋甚，无楼观台榭，盖乱后废久矣。”

(《蜀道驿程记》卷上)这对于阅读杜甫的有关阆中的诗有益处。“蜀盐亭县有鹅溪，县出绢，谓之鹅溪绢，亦名东娟，子美诗‘我有一匹好东娟’是也。”(《池北偶谈》卷一八《东绢》)“鹅溪在城北，人家以绢为业，坚洁异他处，文与可诗所云‘鹅溪绢’也。杜诗‘云溪花淡淡，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严家聚德星。’县有德星、春郭二桥以此。出南门，渡梓橦江，缘光禄山行，即杜《光禄坂》诗所谓‘山行落日下绝壁’者也。”(《蜀道驿程记》卷上)这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杜甫的《戏为韦偃双松图歌》、《行次盐亭县聊题四韵》、《光禄坂行》等诗。王士禛还有一些考证。如考证杜甫的瀼西住宅的位置：“卧龙山下里许至少陵祠，有石碣题‘唐杜工部子美游寓处’。堂三楹，祠中有沔阳陈文烛修祠旧碑，宋治平中知州贾昌言常刻少陵夔府诗为十二碑，建中靖国元年运判王遽又刻十碑于瀼西果园，今‘昆明池水’一篇独完。盖后人别刻《秋兴》八碑，非宋之旧矣。此地在宋为漕司，即少陵瀼西宅址。”(《蜀道驿程记》卷下)考证瀼西住宅位置甚详。同时辨巴东西瀼杜甫宅之非。“过西瀼，记称少陵亦尝居之，有草堂遗址。考少陵年谱，以大历二年居夔州瀼西草堂，三年正月去夔，有《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诗，三月即至江陵，秋移公安，未尝淹留巴东，复有西瀼之宅。盖土人以山间之流通江者，道呼为瀼，瀼西名适相类，因傅会耳。”(《蜀道驿程记》卷下)这些都有很强的学术性，对于我们研究杜甫的生平很有用处。追踪杜甫的行踪来阅读和研究杜甫和杜诗，可以加深对杜甫和杜诗的了解，学术上有更多的发现，不失为一条研究杜甫的重要途径。前人已有不少运用，如苏轼、陆游等，但不够多，不够系统，像王士禛这样大量的还很少见。

王士禛还有一些有关杜诗的名物的考释。如考多罗树：“吉贝多树枝干皆左旋，甚奇古，望之如画枯木。二月叶始生。三月

作花，五出，如木笔，边白，内黄外紫，气馥郁，略如栀子，瓣亦左旋，其叶较菩提尖而大，纹理如绣，可作书。按《酉阳杂俎》云：贝多出摩伽陀国，有三种：一多罗婆力叉贝多，一（二）多黎婆力叉贝多，三都阇婆力叉贝多。即西域之多罗树也。杜诗：'吾知多罗树，却倚莲花台。'"（《带经堂诗话》卷一六《名物类》）考浑脱："乐府有《浑脱舞》，《明皇杂录》《历代名画记》皆云：公孙大娘善舞西河剑器、浑脱，故杜诗云云。注家多不详浑脱之意。朱中丞《浣水续谈》云：'唐长孙无忌以乌羊为浑脱毡帽，时人效之，号赵公浑脱。予于役三关，次太子滩，隔岸群彝来见，乱流而渡，见有骑一物浮水面者，问之，曰浑脱也。盖取羊皮去其骨肉，令不透水，以气管吹之，宛然羊也。彝人乘以渡水，若壶然。盖浑脱其骨肉而制之，故以为名。赵公之帽，义亦应尔。'愚因忆南卓《羯鼓录》载，杜鸿渐尝于嘉陵江楼，见岸上群羊皆低昂盘旋舞，应节奏。则舞名浑脱，亦当以羊取义。顷闻奋威将军王进宝自河西恢复兰州时，贼尽拘船于河东，王乃缝羊皮为囊以济师，须臾飞渡。盖中丞所见即此制也。"（《带经堂诗话》卷一六《名物类》）其说甚详，皆可采作杜诗注释材料。

王士禛对杜诗版本校刊也有研究，认为文字应从善本，而不应迷信宋本。他指出钱谦益杜诗笺注本版本文字的错误。如认为"两脚但如旧"的"两"应为雨。"今人但贵宋椠本，顾宋板亦多有讹舛，但从善本可耳。如钱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参》诗，从宋刻作'两脚但如旧'，而注其下云：'陈本作雨。'此甚可笑。《冷斋夜话》云：老杜诗'雨脚泥滑滑'，世俗乃作'两脚泥滑滑'。（今按：惠洪之说非是。言泥滑滑应为两脚，作雨脚则不通。）此类当时已辨之，然犹不如前句之必不可通也。"（《带经堂诗话》卷一七《注家类》）又认为"千人何事网罗求"的"千人"

应为“干人”。“《丹浦欸言》云：杜诗‘千人何事网罗求’，当作‘干人’。杜牧之诗：‘自滴阶前大梧叶，干君何事动哀吟？’按此说，则南唐元宗戏冯延巳云：‘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语固有本。然千家注、刘会孟本只作千字，钱本注云：晋作‘干’，或作‘于’，‘于’字恐无义。‘千’字对上句‘在’字，亦未切。’子田之说是也。”（《池北偶谈》卷一三《干人》）他还认为“漫兴”应校作“漫与”：“秀水朱竹垞检讨（彝尊）云：杜诗‘老去诗篇浑漫与’，今本皆讹作‘漫兴’，非也。予考旧刻刘会孟本、《千家注》本，果皆作‘与’字。赵云：耽佳句而语惊人，言其平昔如此；今老矣，所为诗则漫与而已，无复着意于惊人也。刘后村集《跋陈教授杜诗补注》亦云：或兴笔漫与云云。然近日虞山钱宗伯本仍作‘兴’字，略无辩证。”（《带经堂诗话》卷一五《字义类》）这都是发挥前人之说，而批评钱谦益本文字之误甚是。从王士禛对版本文字之误的批评看，他对杜诗的研究是非常细致、非常用功的。

王士禛还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杜甫与杜诗：有时着眼于时代，论述一个时代所受杜甫影响最大的诗人；有时着眼于体裁和风格，谈所受影响最大的诗人与受影响的特征。他对唐宋明时期受杜甫影响的诗人论述很多。他说：“宋明以来，诗人学杜子美者多矣。予谓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气，鲁直得杜意，献吉得杜体，郑继之得杜骨。它如李义山、陈无己、陆务观、袁海叟辈，又其次也。陈简斋最下。”（《池北偶谈》卷一六《学杜》）“昔人谓义山善学子美。”（《带经堂诗话》卷三《微喻类》）“宛公之后，学杜韩者，王文公为巨擘。”“有明一代，作者众多。七言长句，在明初则高季迪、张志道、刘子高为最，后则李宾之。至何、李学杜，厌诸家之坦迤，独于沉郁顿挫处用意。最一变前人，号称复古，而同源异派，实皆以杜氏为昆仑墟。”（《带经堂诗话》卷

四）他论清代受杜甫影响的诗人道："明末暨国初歌行，约有三派：虞山源于杜陵……"（《分甘余话》卷二《明清之际歌行三派》）他也承认兄长王士禄（王士禄对杜诗批评多）和他自己受杜诗的影响。"先兄考功平生诗，不减二千余篇……孙豹人以为取法少陵，稍出入于康乐、东坡之间。"（《蚕尾续文》卷三《考功集序》）"云间董钱法，孝廉俞之弟也。自京师寄余书，略曰：'先生具不世出之才，悟最上乘之道，光焰万丈，仙佛一身，天下学人如百川之赴海，不肖幼侍先伯父得仲、从兄苍水，论诗必首推先生，全体学杜，而镕化诸家。'"（《分甘余话》卷四《董钱法论诗》）所论范围非常广，虽然论个人所受影响时有不恰当处，总体所论也较简略，但精彩处颇多，而且勾勒了古代诗人所受杜甫影响的基本轮廓。王士禛还将历来受杜甫影响的七言诗抄在一起，成《七言诗》，以供学习和研究。其《凡例》云："愚抄诸家七言长句，大旨以杜为宗。唐宋以来，善学杜者则取之，非谓古今七言之变，尽于此抄。观唐人元、白、张、王诸公悉不录，正以抄不求备故也。举一隅以三隅反，其在同志之君子。"（《带经堂诗话》卷四《纂辑类》）以一种文体为范围，从具体作品出发来研究杜甫的影响，是一种开拓。综合来看，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杜甫，王士禛的成就是非常大的。

王士禛的学术性格非常复杂。一方面，他对杜甫非常崇敬，批评那些攻击杜甫的人，另一方面，他对杜甫也有不少严厉批评。他批评祝允明说："祝允明作《罪知录》，论唐诗人，尊太白为冠，而力斥子美，谓其'以村野为苍古，椎鲁为典雅，粗犷为豪雄'，而总体评之曰'外道'。李则《凤凰台》一篇，亦推绝唱。狂悖至于如此，醉人骂坐，令人掩耳不欲闻。"（《带经堂诗话》卷二《评驳类》）他认为杜甫"冠古轶今"，为最伟大的诗人，"每思高岑、杜辈同登慈恩寺塔，高李、杜辈同登吹台，一

时大敌，旗鼓相当，恨不厕身其间，为执鞭弭之役”（《带经堂诗话》卷二《推较类》），钦迟之情，溢于言表。但批评杜诗时，其语言也很尖刻。其中批评《八哀诗》最多。“杜《八哀诗》，最冗杂不成章，亦多啽呓语。而古今称之，不可解也。”“杜甫《八哀诗》钝滞冗长，绝少翦裁。”（均见《带经堂诗话》卷二《摘瑕类》）“《八哀诗》自是巨篇，顾多钝拙不可晓，何也?”（《石洲诗话》卷六《渔洋评杜摘记》）反复斥骂，甚至将一些字句抹去。对杜甫其他的诗，也有一些批评。如评《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五《江头五咏》和《示从孙济》云：“凡粗字、纤字、俗字，皆不可用。词曲字面尤忌。即如杜子美诗‘红绽雨肥梅’一句中，便有二字纤俗，不可以其大家而概法之。”（《师友诗传录》卷一六）“少陵《江头五咏》，语多可笑，亦不成章。”（《带经堂诗话》卷六《题识类》）“《示从孙济》‘所来为宗族’二句，笑柄。”（《石洲诗话》卷六《渔洋评杜摘记》）这些话表现出的是对杜甫的不恭。故当时舆论大多认为王士禛诋毁杜甫。平心而论，王士禛批评杜甫，有些是受前人的影响，宋人叶梦得、刘克庄和刘辰翁等，还有不少明人都批评过杜甫，王士禛做了一些附和，也有好胜心强，要表现连杜甫也敢批评的心态。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杜甫的诗不完全符合王士禛的审美标准。直白地说，杜甫的诗不完全符合神韵的理论，有背道而驰的地方，自然会遭到王士禛的批评。对于王士禛对杜甫的批评，翁方纲驳斥云：“《八哀诗》，渔洋诗话竟评其冗杂不成章，又以呓语目之。盖渔洋于诗，专取轻圆俊利之句，于杜法无当也。如是，则《三百篇》变雅中亦颇似多后人不可尽晓之句，又当如何?”（《杜诗附记·八哀诗》）“阮亭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者，岂必尽于三昧诸家得之乎？杜公之大，已自无义不包矣。”（《杜诗附记·舟中雪夜有怀卢十四侍御弟》）“渔洋之言诗，得诗味矣，深绎而熟思

之，此特渔洋之诗耳，非尽可以概杜诗也。”（《杜诗附记自序》）翁方纲为王士禛的弟子，对王士禛是很尊敬的，他的批评是中肯的。事实上，王士禛就是把杜甫的一些诗放在“三昧”之外。《师友诗传续录》五载：“问：《唐贤三昧集序》‘羚羊挂角’云云，即音流弦外之旨否？间有议论，或以序事体为诗者，与此相妨否？答：严仪卿所谓‘如镜中花，如水中月，如水中盐味，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皆以禅理喻诗。内典所云不即不离，不粘不脱，曹洞宗所云参活句是也。熟看拙选《唐贤三昧集》，自知之矣。至于议论叙事，至别是一体。故仆尝云，五七言有二体，田园丘壑，当学陶、韦，铺叙感慨，当学杜子美《北征》等篇也。”显然认为杜甫的一些诗不在“三昧”之内。因此，当王士禛用“三昧”来评杜诗时，对一些杜诗有所苛评，自然不奇怪。王士禛对杜甫的研究，可以说是得也神韵，失也神韵。

世间的事物是非常复杂的。尽管王士禛有时对杜诗的风格艺术多少有点不习惯（特别是语言），但他也是一位著名诗人，无法抗拒杜诗巨大的魅力。他逐渐认识到，杜甫浑涵浩茫、沉郁顿挫和李白雄奇豪放、汪洋恣肆的风格，方是诗歌艺术的极致。因而他渐渐将三昧韵致天然、味外有味的标准，提升为神奇变化、浑涵恣纵，使他的神韵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郭绍虞说：“他（王士禛）便想于神韵风调之中内含雄浑豪健之力，于雄浑豪健之中别具神韵风调之致，这才是他理想的诗境，这才是所谓神韵的标准。”（《中国文学批评史》六八《王夫之到王士禛》）可以说，王士禛神韵理论的提升，正得益于他的李杜研究。这正说明杜甫学术研究对文艺理论构建的重要。当然，王士禛就是在晚年，很多时候也仍然奉行他原来的神韵标准，并未始终坚持雄浑豪健而兼神韵风调的标准，故评价作家和作品有时难免褊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坚持运用杜甫研究的正确心得对于长期支撑正

确的文艺理论是何等重要。

一一 浦起龙

一

浦起龙（1679—?），字二田，无锡（今江苏无锡）人。雍正二年进士，曾官苏州府教授。聪明强记，嗜古博学。著作有《读杜心解》、《史通通义》、《酿蜜集》。

雍正二年，《读杜心解》由浦氏宁我斋出版，广为流传。该书作于浦起龙四十五岁之前，是一部很有影响的杜甫学著作。

二

浦起龙的杜甫研究集中体现在《读杜心解》中。其工作大致可分三部分：编诗；注（含校。校无突出的特色，故不论）诗；解诗。现分别加以论述。

先谈编诗。

《读杜心解》的编排方法采用以诗体编排为主，寓编年于分体中，附杜甫文于内容相关的诗后的方法。

杜诗的编排，自宋以来就有两大途径：一是分体裁编；二是按写作时间先后分期编。也有以分体为主，再按写作时间先后分期编排的。浦起龙继承以分体为主，再按写作时间先后分期编排的方法，又有所发展。

分体编排。《读杜心解》将杜诗分为六卷。“今统分为六卷：一、五古。二、七古。三、五律。四、七律。五、排律。六、绝

句。而每卷篇数不均，则窃取诗传之例，各就卷内析之，使楮叶停匀。其七排、五绝篇数最少，则一附卷五之末，一附卷六之前。”（《读杜心解·发凡》）分体编排次序合适，所分卷次和卷内所分亦大致合适。

《读杜心解》还附载有同时代人与杜甫有关的酬唱诗。杜甫集自宋代即载入相关的同人酬唱诗，浦起龙将其编入是循杜集编纂旧例。

《读杜心解》自创体例，将杜甫的散文附在有关诗后。浦起龙说：“今按诸篇于集中诗多有关会者，亦用附载酬唱诗例，分承诗篇之后，各以类从。学者或反因参考诗义，逐一留览，似为两得。此皆别立义例，世或不病余妄。”（《读杜心解·发凡》）将杜甫的文附于其诗后，并用附载酬唱诗的体例编排，应该说这种编排的体例是很别扭的，但其用意却是好的，甚至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其目的是要人们重视杜甫之文的研究，希望人们在研究杜诗时，能将同一时期的杜文一起研究，更全面地理解杜甫作品的思想含义，更全面地理解杜甫。这种想法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编排的方式表明浦起龙还没有完全摆脱历来轻杜甫文的偏见。

对杜诗系年。浦起龙更看重系年编排。他说：“编杜者，编年为上，古近分体次之，分门分类者乃最劣。盖杜诗非循年贯串，以地系年，以事系地，其解不的也。余此本则寓编年于分体之中。”（《读杜心解·凡例》）编文集以编年为上也是古人流行的观点。《读杜心解》既以分体编排为主，故编年便另外建立一个系统。其编年体系为：（一）作《少陵编年诗目谱》，将能系年的诗一一分别列于其下。其前有小序云：“往近体裁，卷分各种，既不病其夺伦；迁流人事，义取互相，或颇嫌乎离立。将以还诗史之面目，厥唯寓年谱于篇题，若网在纲，其比如栉。为便读计，则古、律、绝六集，居然案部就班。为尚论资，则玄、肃、

代三朝，从此发凡起例，作编年诗目谱。”（《读杜心解·凡例》）（二）在分体中，将诗分时期。如“卷二之三（七古）：起代宗大历元年讫五年”，在开头作简要的年谱：“《纂年谱》，大历元年，公在夔，寓西阁。二年春，迁赤甲，寻迁瀼西。秋，往来东屯、瀼西之间。三年正月，去夔出峡。三月至江陵。秋，移公安。冬晚，之岳州。四年正月，自岳之潭，未几，入衡山。夏，复回潭。五年夏，复自潭避乱入衡。欲如郴州，至耒阳不果。秋，回湖湘，竟以寓卒。”所编年谱虽然简略，但还比较细，有助于读者了解杜甫的行踪和事迹，作为读诗的参考。在同一时期中，将诗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另外，他在注中还对能确切系年的诗进行了准确的系年。这就形成了《读杜心解》完整的编年体系。

浦起龙对杜诗编年下了一番功夫。他的编年理念与方法都有可取之处。他说：“盖旧本以编年非其时，而诗失其旨者，动以百数也。道在准居处，酌时事，证朋游，得者八九矣。其无甚关系，无从印合者，略依旧次，不敢妄有牵附焉。”又说：“古人遗集，不得以年月限者，其故有三：生逢治朝，无变故可稽，一也。居有定处，无征途显迹，二也。语在当身，与庶务罕涉，三也。杜皆反是。变故、征途、庶务交关而互勘，而年月昭昭矣。”（《读杜心解·凡例》）他借鉴前人（鲁訔、蔡梦弼等）编年的成果，继续深入研究，又有创获。

《读杜心解》的编可谓煞费苦心，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有明显的缺陷。既要以分体编排为主，又寓含按年编排，本身就很难处理好，再加上《纂年谱》的内容，怎么看怎么别扭。不过，浦起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古人虽认为诗以编年为上，但对具体诗的编年，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得到普遍的认可，故浦起龙方才采取寓编年于诗体编排之中这种方法。

三

浦起龙对杜诗注释非常重视。为了杜诗的注释，他做了大量有关准备工作，进行了长时间的知识积累。他说："昔人云：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地，不可与言杜。今且于开元、天宝、至德、乾元、上元、宝应、广德、永泰、大历三十余年事势，胸中十分烂熟，再于吴、越、齐、赵、东西京、奉先、白水、鄜州、凤翔、秦州、同谷、成都、蜀、绵、梓、阆、夔州、江陵、潭、衡，公所至诸地面，以及安孽之幽、蓟，肃宗之朔方，吐蕃之西域，洎其出没之松、维、邠、灵、藩镇之河北一带地形，胸中亦十分烂熟。则于公诗，亦思过半矣。诗中关合地志处，不可悉数，间又涉天官家言。注家承讹于地志，十有三四，至举天官等书，则不谬者十无一二矣。今地界则取衷于《唐书》，而证之舆图，统志以求其合。历历白榆，举目了然也。唯《伤春》诗之执法则指势星而言，《晋·志》以后无此名，参之石氏《星经》始定。当时乱端不一。其大头脑，前曰安、史，后曰吐蕃，曰藩镇。他如蜀之徐知道，段子璋、崔旰，湖南之臧玠辈，又错起其间。注家遇说乱处，往往东西混淆，甲乙回迕。此亦大费考核。又其时稔乱不已，宦竖典兵。重帅权，轻守令，贵武夫，贱儒术，劳遣戍，困征徭，三致意焉。最足考镜世变，亦特为捻出。"(《读杜心解·发凡》）浦起龙进行广博的知识积累，并对前人注释的得失进行总结，形成了自己的注释思路，这些都为他的杜诗注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注释是《读杜心解》的重要组成部分。浦起龙认为注释主要是注古事、古语和时事。而他的注释主要是吸收前人的成果，特别是清代学者钱谦益、朱鹤龄和仇兆鳌的成果，自己也有所发明。他说："凡注之例三：曰古事，曰古语，曰时事。古事、古

语自鲁訔、王洙、师氏、梦弼之徒，援据亦略备矣。其谬者，牧斋、长孺驳正特多。近时仇搜罗更富，集中节采，大率本此三书。间有参议论著，十得二三耳。”（《读杜心解·发凡》）他对诗的写作背景的分析时有新见。《前出塞九首》注：“王嗣奭《杜臆》：天宝间，哥舒翰征吐蕃事。愚按：征西已久，不必泥定哥舒，与《兵车行》所指之事同。”诗没有哥舒翰征吐蕃的内容，浦起龙认为就是写西部战争的诗，比较切合实际。在处理注的问题上从实际出发，不拘守一隅，注解往往通达。《游龙门奉先寺》（《读杜心解》卷一，以后略去书名）：“‘天阙’‘云卧’，诸说纷纷。王安石改为‘天阅’，蔡兴宗正义作‘天窥’，是欲以虚对虚也。文翔凤云：‘伊阳之北山，如云卧然。’将‘云卧’与‘天阙’俱作地名解，是又欲以实对实也。其说俱不稳。朱注则曰：‘古体诗何必拘拘偶对。’似属超解矣。然此诗中四，却非散体。按‘天阙’字出韦述《东都记》，其为地名无疑。若‘云卧’，正形容宿处之高迥，定属虚用。而‘云’自与‘天’对，‘卧’自与‘阙’对，正以不执死法为文家妙用。”他的说法很有道理。虽是解，却应归入注的范围。《海棕行》（卷二）注“左绵公馆清江濆”的“左绵”：“《蜀都赋》：‘于东则左绵巴东。’按：左绵，对蜀都而言。旧注谓绵居涪水左，误。”浦起龙所注甚是，对旧注有所匡正。《读杜心解》非常重视用杜甫的自注来注杜诗。由于有的刻者和注家不重视杜甫自注，甚至认为不是真正的杜甫自注，故一些版本大量删削。《读杜心解》则非常重视杜甫自注，总是尽量搜罗，尽量用在注中。浦起龙说：“题下篇中时载原注，公自注也。昔人以谓王原叔、王彦辅诸家附益。今细绎之，伪者文字必平顺，其枯涩者断属的笔，悉照原文登录，坊本多任意削去，或混列注中俱非体。”（《读杜心解·发凡》）杜甫的自注是诗的内容的重要补充和说明，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对理解杜诗非

常有益。《山寺》注："原注：章留后同游得开字。"通过原注可以知道诗作于梓州，和梓州刺史章彝同游西作，由此可知诗的写作的地点和大致时间。《奉寄别马巴州》（卷四）注："原注：时杜甫（"杜甫"二字当衍）除功曹参军，在东川。"原注使我们理解杜甫时除功曹参军，对理解诗的"功曹非复汉萧何"等内容大有好处。

《读杜心解》的注也有明显的缺陷。

最大的缺陷是注太简略。《读杜心解》既然有注，理应为人们提供有助于文字内容理解的重要材料。一些必须要注释的没有注，必须要引书证的没有书证。《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翠旗淡偃蹇"注："《七发》：翠旗偃蹇。"（《七发》本来是"旌旗偃蹇"，引文有误。）注不完善。《长门赋》："淡偃蹇而待曙兮。"李奇注："淡，犹动也。"理应用《长门赋》和李奇注。又"坡陀金虾蟆"，"坡陀"本应作注，而未注。"金虾蟆"注："《埤雅》：一名蟾蜍，或作詹蜍。"只注了虾蟆，未注金虾蟆。而"钮琇曰：按《潇湘录》唐高宗患头风，宫人穿池置药炉，忽有虾蟆跃出，色如黄金，背有朱书'武'字。宫人奏之，放之苑池"，虽然杜诗并不是用此故事，但可参考。《草堂》（卷一）注："邛州在成都西。""剑阁在成都北。"《九日寄岑参》"步履随春风，村村自花柳"注："暗使潘岳河阳事。"《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天笑不为新"注："天笑，见《说苑》。"注释都有些草率，过于简略。

《读杜心解》的注释还有明显的错误。有时曲解文意。《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卷一）解："'问升斗'，旧云：问酒数，吾谓是问生产也。见有此好官，不须记挂口料，不怕没饭吃。吾曹今日，只管开怀痛饮。"问酒数，正是开怀痛饮，问生产则说到一边去了。看似有意出新，实际是封建正统思想作怪，把他的思路引到岔路上了。《新安吏》"次选中男行"注："顾炎武曰：唐制：人有丁、中、黄、小之分。天宝二载，令民十八以上为中男，二

十三以上成丁。”根据下文“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中男应是未成年而身体短小者，而顾注为十八岁，无论从古今看，皆已成人，便无所谓“短小”，故中男应按古代一般所指十六岁为是，顾炎武所注未确。

四

《读杜心解》的主要精力在解上，其主要贡献也在解上，故其集名为《读杜心解》。

《读杜心解》对杜诗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解释，新见迭出，往往能把握诗的主旨，进行深入分析，给读者以启迪。而在艺术上也能抓住杜诗的特点，精微阐扬，使读者领略其妙处。

好的学术研究成果，大都缘于研究者有新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浦起龙在杜诗研究上有很大的创新，是根源于他总结前人杜诗研究的得失，力求通过了解杜甫的时代与杜甫的生活和思想，去全面理解杜甫和杜诗。通过全面理解杜甫和杜诗，再从实际出发，理解作品的具体内容，力求把握作品的精髓与特点，不乱想，不臆断，不粉饰，力求按杜甫的本意去解说杜甫。浦起龙说：“吾读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诠释之杜，愈益弗得。既乃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合乎百氏之言十三，离乎百氏之言十七。合乎合，不合乎不合，有数存焉于其间。吾还杜以诗，吾还杜之诗以心，吾敢谓信心之非师心与?”又说：“解之为道，先篇义，次节义，次语义。语失而节紊，节紊而篇晦。紊斯舛，晦斯畔矣。而说者每喜摘一句两句，甚或一两字，别出新论，不顾篇幅宗主如何归宿，上下文势如何连缀。此最害事，凡是必痛削之。”（《读杜心解·发凡》）这些话都充分表现出他卓越的研究见解与方法。

《读杜心解》特别重视对诗的思想内容的解说。它根据诗所传达的基本思想，确立解说的中心；通过对语言和章节的解说，结合实际生活和时代背景，对基本思想加以阐扬。对于主题思想明确的诗，在点明主题思想后，重点挖掘诗所蕴含的深层次的思想和精神，挖掘杜甫对社会的关照和社会意义。《又呈吴郎》（卷四）："公向居此堂，孰知邻妇之苦，听其窃枣以活。吴郎新到，不知其由，将插篱护圃。公于东屯闻之，吃紧以止之，非既插而责之也。首句提破，次句指出可怜之人，下皆反复推明所以然。三、四，德水所云出脱邻妇，又照育邻妇者。着'恐惧'字，体贴深至。盖窃食者，其情必恧而怯也。五、六更曲，妇防远客，几以吴为刻薄人，因属多心也。此又德水所谓回护吴郎，又开示吴郎者。末又借邻妇平日之诉，发为远慨，盖民贫由于征求，由于'戎马'，推究病根，直欲为民社者告焉。而恤邻之义，自悠然言外，与成都《题桃树》同一神味。卢云：'百种千层，莫非仁音。'知言哉！若只观字句，如嚼蜡耳，须味之于无味之表。"诗的解析准确而透辟。诗的主旨就是要吴郎不要插篱而任邻妇扑枣，又深刻阐扬当时的官府征求是百姓贫困的根源，表现杜甫对带给百姓灾难的战乱的忧虑，表现杜甫关心、同情百姓的仁爱之心。这样的解对读者阅读和理解杜诗有很大的帮助，是真正的"心解"。《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卷一）："是为集中开头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领。须用一片大魄力读去，断不宜如朱、仇诸本，琐琐分裂。通篇只是三大段。首明赍志去国之情，中慨君臣耽乐之失，末述到家哀苦之感。而起首用'许身'比'稷契'二句总领，如金之声也。结尾用'忧端齐终南'二句总收，如玉之振也。其'稷契'之心，'忧端'之切，在于国泰民困。而民为邦本，尤其所深危而极虑者。故首言去国也，则曰'穷年忧黎元'。中慨耽乐也，则曰'本自寒女出'。末述到家也，则曰'默

思失业徒’。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则其所谓比稷契者，果非虚语，而结忧端者，终无已时矣。”浦起龙从杜甫的安邦治国的政治理想入手，转到分析杜甫的民本思想，结合诗所表现的当时的老百姓的生存状况，说明杜甫对国家所潜伏的巨大危险的忧虑。剖析剀切，而又非常有创意，其解析非常有功力。《读杜心解》对于主旨含蓄的诗，其解说则主要围绕将诗的主旨解说明白、透辟而进行。其具体方法是在认定诗的主旨后，结合诗写作的社会背景与杜甫的思想生活，对诗的段落和语言进行分析，力求笃实而显豁。《除草》：“除草以喻除奸也。起四句总领。‘曾何生修阻’者，言何尝尽在辽远，虽肘腋间亦有之。‘毒甚蜂虿’，领去之贵速。‘多弥道周’，领去之贵尽。中间十二句一段，分两层看：前六，言去之速。后六，言去之尽。末四句，觉眼中一爽，速与尽兼收在‘芟夷’二句中。结出‘疾恶如仇’四字，略露本意。申涵光谓正义多则反浅者是也。〇从来去奸而奸反为害者，不速不尽故也。解此诗者，总不得肯綮，非胸有千古，目有时艰，深识祸乱之源，历鉴优柔之弊，未易语此。”诗的主题就是讲除奸的道理，即除奸要果断彻底，否则会为奸所害。浦起龙认定这样的主题符合诗的本意。其阐释准确深刻，最难能可贵的是不穿凿附会。

《读杜心解》也重视对杜诗艺术性的阐释。它往往抓住一首杜诗表达内容的突出特点，着重分析它的创造性。因而它的解说往往与内容结合在一起，贴切，精彩，有新意。《赠李白》（卷一）：“天宝三载，太白由翰林供奉被放东游，与公遇于东都，公赠之此诗也。太白栖神世外，自相遇之后，即有齐州受箓，王屋访隐之事。其地皆于梁宋为近，所谓‘梁宋游’者，必邂逅盟心之语。公述其语为近，则李是主，身是宾也。今乃先云自‘厌’‘腥膻’，将托迹神仙，而后言李亦有‘脱身事幽讨’之志。自叙

反详，叙李反略，则似翻宾作主，翻主作宾矣。不知其自叙处多用‘青精’‘大药’等语，正为太白作引。落到李侯，只消一两言双绾。而上八句之烟云，都成后四句之烘托。明乎彼此虚实之用，可与说杜矣。”诗以结构为视角，分析诗似拙实巧、大巧若拙的特点，颇有独到之处。《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卷五）：“元微之言曰：‘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亦数百。’其所推服，首在斯篇。顾于观是诗制局运机之妙，在于独往独来，乍离乍合，使人不可端倪。如篇首数语，层层伏案，此十面之埋伏也。如当筵听曲，蓦入长安，借明主怀贤，搭上郑李，此陈仓之暗度也。如以怀贤搭郑李，却只写其诗才，将功名按住。既就郑李写诗才，忽接自身北望，将两人截住，此栈道之烧绝也。如以答书问之语，群述瀼西贫况，使实处皆虚，以勖登朝之语，隔开就访本怀，使连处反断，此临晋之疑兵也。直到天明出峡，而后若夔若荆，若己若郑李，一齐合拢，此诸侯之皆会也。乃于出峡就访处，夹入求禅，其实只因便道带出篇尾之根，主意却专在访友，此又云梦之伪游也。至若尾末处，归到‘刮膜’‘离铨’，前尘影事一切扫空，此直鸟尽而弓藏矣，故知善用多多，尤在善能将将，千古唯龙门有此笔阵。杜老以俳偶律切之体，与之分道扬镳，不亦异乎！后来如白傅《代书》一诗，岂不条鬯流美，然只是始叙同官，中言被谗，末致怀思，视此不免直头布袋。然则元氏所云，还说得自家一辈诗。至少陵堂奥，未在未在。善乎遗山子之论诗也：排比铺陈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论述杜诗层次结构的复杂多变，照应关锁的严密精细，充分表现出他对杜诗的精细揣摩和深入研究，故能发前人所未发。

《读杜心解》的解说成就是多方面的，但缺点也不少。

浦起龙封建正统思想浓厚，特别强调杜甫的儒家正统思想。

他说："老杜天资惇厚，伦理最笃。诗凡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都从一副血诚流出，而语及君臣者尤多。虞山轻薄人，每及明皇晚节，肃宗内蔽、广平居储诸事迹，率以私智结习，揣量周内，因之编次失伦，指斥过当。继有作者，或附之以扬其波，或纠之而不足关其口，使霭然忠厚之本心，千年负疚，得罪此老不少。愚不惜刓精尽气，疏通证明，于此益力。"正是这种思想的指导，在解说中便把一些本与君臣无关的事硬与君臣关系扯到一起，造成曲说。《兵车行》（卷二）的"君不见"本是当时作诗的习惯用语，而《读杜心解》硬解"君"为"君主"之君。说："噫！山东近在东土，乃事之可见者，而深宫竟不得闻。青海陷我穷民，宜君所习闻者，而绝域又不可见。两呼'君不闻'，'君不见'唤醒激切。"若"君"指"君王"，直言其"不闻""不见"，有质问之意，颇为不敬，古人有这样对君主说话的吗？简直是曲解之尤。《北征》（卷一）："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读杜心解》认为陈玄礼无人臣礼，杜甫不应写这样的内容。说："愚按，玄礼为亲军主帅，纵凶锋于上前，无人臣礼。老杜既以'诛褒妲'归权人主，复赘'桓桓'四语，反觉拖带，不如并隐其文为快。"为了维护君权的绝对权威，竟一反常态，对杜甫也有所指责，真是封建社会的忠诚卫道士。正是因为过分强烈的封建正统思想，造成了《读杜心解》的一些瑕疵。

《读杜心解》好标新立异，又受传统的比兴说诗等主观唯心方法的影响，因而解说有许多穿凿附会的地方。杨伦说："浦解好为异说，故多穿凿支离。"（《杜诗镜铨·凡例》）《白小》（卷三）解："诛求者无艺，自军兴饷急，孤嫠不免追乎，讽切时弊之言。"实际从诗的内容上，看不出讽切时弊的意思。诗的主题就是批评人们拼命索取自然资源，指出这是不义的行为。这样的

主题本身也很有意义，不一定非扯上讽切时弊不可。《剑门》“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明明是写景，而浦起龙却解说：“‘抱西南’，见曲为彼护。‘角北向’见与我为敌。”这实在是曲解。浦起龙明明说：“子美之诗，是一篇筹边议，有怀远以德意。”二者的理解不是有矛盾吗？对“与我为敌”者恐怕首先不是“怀远以德”，而是制服他，再“怀远以德”。这样理解诗意，不能自圆其说。《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卷一）解：“‘蒙鸿’，淫气也。‘宫殿’，荒制也。‘必十月’，频也。‘临九州’，夸也。”这完全是随心所欲的解说，并非杜诗的本意。又解：“按钱笺《长安志》：汤泉在阴盘故城东门外。贞观中，乘舆自东门入，水暴涨，见物状如猪，当上门卧。命有司致祭，其物起向北。开元八年乘舆自南入。黑风从东北起，倏忽满城。从官相失。时学士王翰作词曰：‘龙跃汤泉云渐回，龙飞香殿气还来。’又按《禄山事迹》：帝宴禄山，禄山醉卧，化为猪而龙头，帝曰：‘渠猪龙耳，无能为也。’据此则湫中之物，信为禄山之应矣。明皇毫不知警。漫逞嬉游，可叹也。故下文又幻出‘虾蟆’化虬一段以深惕之。考‘金虾蟆’乃月中蚀月之物。月，贵妃象也。禄山通宵禁中，宫闱浊乱，帝以宠贵妃故不问，‘虾蟆’亦举其类欤？又《通鉴》：国忠言：‘禄山必反，陛下试召之，必不来。禄山闻命即至，上益亲信之，续遣归范阳。禄山惊喜，疾驱出关。明年遂反。今诗曰‘至尊顾笑’‘王母不收’，意举朝议收之，妃阴劝上纵遣之欤？噫！词旨微矣。”杜诗有对玄宗携杨贵妃到温泉享乐而不勤国事之忧，也有杨贵妃误国的隐忧，但诗却没有一点涉及安禄山。浦起龙言杨贵妃与安禄山淫乱，进而说举朝有诛安禄山之意，而杨贵妃劝唐玄宗放安禄山归范阳，纯属想象之词，而引小说之言说禄山化为猪龙尤为荒诞。这实际上是沿着穿凿附会的老路在往前走。

浦起龙在杜诗的内容和艺术分析方面受当时八股文理论的影响，分析时讲究起、承、转、合，特别注重承、转的分析，经常把杜诗内容讲得很枯燥，把创造性讲得很平常，读来淡然无味。《彭衙行》（卷一）解："起四，即点彭衙，是先出题法，'尽室'以下，乃追叙初起身至'彭衙'一句之行程，不应迟迟若此。故前后用'尽室徒步''尽日数里'点破之。'小留'以下，备述孙宰高义。先着'欲出'一句，益得高义出。见此来本非有意驻足，而款留不放，全由故人情重也。下则先叙安顿自身，次叙安顿妻孥，再总写四句再致感两句。非此入情曲笔，那显此会云高义。结则所谓'静言思之，不能奋飞'也。"解说的基本架构就是八股样式。《瘦马行》（卷二）解："起句唱破，随以三句写其瘦态。不曰可惜，偏曰岂复有意于世，惋惜倍深。中以'细看'二字作提，四述其见遗于今，四推其立功在昔，二原其委弃所由，二状其哀鸣失色，凡作四层，无限曲折，末以'远放'二字自影被斥，'日暮'二字自影途穷，此正起句所谓'使我伤'者也。结联，须体贴当日初谪官情事，从一片恋主效忠悃忱发出，非乞怜语也。"正是用分析八股文的方法在分析杜诗。当然，每个人都难以摆脱时代的影响，我们也不应苛责《读杜心解》。

从主流看，《读杜心解》是一部极富创造性的著作，特别是在解方面，力破历代穿凿附会的陋说，对很多杜诗做了基本符合其本意的解说，立论精当，分析透辟。它成功的关键在于，分析都从杜诗的文本出发，从杜甫和他生活的时代出发，实事求是，综合贯通。而其过失的原因，也在于它有时离开杜诗的文本，自逞想象，信口曲说。历史的经验说明，实事求是是研究杜甫和杜诗的重要原则。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基础，不从杜甫的作品文本出发，一切所谓研究都不过是痴人说梦。

一二 杨 伦

一

杨伦（1747—1803），字西禾（一作西木），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时中进士。官广西荔浦县知县。晚年主讲江汉书院。杨伦为诗人，与孙星衍、洪亮吉等唱和，著有《九柏山房集》。又是著名的杜甫学者，著有《杜诗镜铨》。

二

在清代杜甫学史上，杨伦的《杜诗镜铨》向来与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仇兆鳌《杜诗详注》并称，为清代杜甫学四大名著之一。它以简明精粹而著称。

《杜诗镜铨》虽追求简明，但研究项目却非常多，著作格式却非常繁。仇兆鳌《杜诗详注》研究项目已比一般研究者多，而《杜诗镜铨》则更多，著作格式更繁。其研究项目如下：（一）杜诗编排。主要是按写作时间编排。（二）题下做诗系年。注时代背景。（三）校勘。一般注出“其义可两存者”。（四）对难字注音。（五）注典故、人名地名、典章制度。凡一切需要说明的皆作注。（六）释文意。对难以理解的诗句，隐含深意的诗句，加以阐释。（七）对较长的诗分段，归纳段意。（八）对诗的内容进行评论。对诗的艺术进行评论。（九）对诗的妙处进行点和圈。（十）在绝妙的诗句旁作短评。（十一）在书稿的顶端作眉批（主要是引前人的评论），一般是对诗的内容和艺术作短评。分析这

些研究项目可以看出，前八项是清代流行的项目，后三项虽然明代一些研究著作（如胡震亨《杜诗通》）已有，但清代研究大家却基本没有运用，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探索，其特点是对诗句的研究更具体和细致。因此，《杜诗镜铨》研究项目的多和著作格式的繁，使它表现出外表简约而实际繁富的风格。

注精炼而较为准确。注历来是杜甫学最能显示学识的领域，故学者总是尽力追求注的特色与质量。首先，《杜诗镜铨》在集注的“集”（所谓别裁）上下功夫，尽量广泛搜罗前人的注。特别是对于前人集注没有用过的好的资料，更是努力搜集。“杜评始刘须溪，宋潜溪讥其如醉翁寐语，不甚可晓。然于诸本中为最古，其可采者悉录之。前辈如卢德水、王右仲、申凫盟、黄白山、张上若、沈确士等，皆多所发明。近得王西樵、阮亭兄弟、李子德、邵子湘、蒋弱六、何义门、俞西月、张惕庵诸公评本，未经刊布者，悉行载入，庶为学者度尽金针。建安蔡氏有《草堂诗话》二卷，诸本所采亦夥。余如《东坡志林》、《容斋随笔》、《困学纪闻》、王楙《野客丛书》、张戒《岁寒堂诗话》之类，凡前人有未经采录者，今并补入，以广见闻。”（《杜诗镜铨·凡例》）（这里杨伦说的主要是评的资料，但也有注的资料，为了行文的方便，均放在这里论述。）杨伦大量搜集宋、明、清的杜甫学资料，尽可能把注做得准确，同时也使注具有更广阔的视野。特别是大量采用同时代的清人杜甫学成果，使集注站到了当时学术的前沿，具有新的时代气息。其次，注最需注者，注文力求简洁扼要。其指导思想是：“兹所采各注，或典故必须疏证，或是发明言外之意，否则俱从芟汰。其易晓者，亦不复赘词。然微词奥义，亦已阐发无余矣。”（《杜诗镜铨·凡例》）集注的材料的抉择，直接决定集注的质量。《杜诗镜铨》注最需注者，使注真正起到释疑解惑的作用，起到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杜诗的作用，完成

注的责任。但又力求简洁，不注所不当注，避免繁冗。不繁冗，也就不会喧宾夺主，不会掩盖杜诗本身，影响读者对杜诗的阅读理解。第三，有自己的研究心得，能补充前人所未逮，改正前人之所失。杜诗注释至清代已基本完备，但杜诗内容博雅深奥，至清代也还有一些忽略未注和未能注解的地方。杨伦长期进行杜诗研究，故有自己的发明。如《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得开字》题下注语典“扶侍”：“《后汉书·刘平传》：平弟仲为贼所杀，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难。”（卷一〇）“扶侍”为寻常语典，搜求极难，因而更见功力。《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卷二）为杜甫上鲜于仲通之诗。鲜于仲通为佞人，品格低下。杜甫为何为其献诗？这是人们所疑惑的。杨伦注云：“此殆公谒选时所上。”此注虽是推测，但完全符合诗意，应符合事实，所注甚好。由注人们可知杜甫给鲜于仲通献诗，是一般举子求仕向高级长官献诗的通例，这样也使杜甫免于阿谀佞人之嫌，其意义非小。杨伦对长诗进行分段（很多时候并不标明具体划分处），并写出段意。段意概括比较简洁，比较切合诗意，有时还顺便归纳艺术手法的特点。《寄韩谏议》（卷一八）分三段，归纳段意为“首致怀思韩君之意”；“此申明谏议去官之由”；“末想其老成宿望，再出而济世匡君也”。段意有助于读者把握杜诗的内容与精神。《寄峡州刘伯华使君四十韵》（卷一六）的段意是“首致思念之怀，宾主兼叙。”“此段追述世交家学。末二双绾，即束即提，有印泥画沙之妙。”“此称刘君之诗。”“此称刘君之官。承老兄真不坠。”“此自叙客夔近况，承上小子独无承。”“此段复宾主交叙，自甘遗世，而勖刘以有为。末叙寄诗之意，因言己亦将远泛江湖矣。”分段比较细，段意归纳简明准确，并略言段落艺术。分段的研究显示出杨伦的研究功力。

杨伦非常重视对杜诗的评论，即对杜诗内容与艺术的研究与

评说。评论亦采用集注形式。《杜诗镜铨》的评论和注释相比，更为精彩。其评论的特点与注释的特点是基本相同的。正是这种相同，构成全书鲜明的学术风格与个性。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再将其评论的特点做一个总的论述，而不避文意的某些重复。首先，杨伦用集注的方式汇集自杜甫学产生以来的评论，按自己的评论理念和见解，精选最佳和最有代表性的评论，组成一个评论体系，即展示对诗（一般是以首为单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总的评论和具体的诗句和段落的评论。在具体集评时，在注重最佳和代表性的同时，特别注意集前人未集的好的评论，特别是集清人的好的评论，注意集注的创新。其次，集入杨伦自己的研究成果。杨伦才、学、识俱高，长期对杜诗进行研究，很多评论非常精彩。这从根本上保证了《杜诗镜铨》的学术创新性和学术价值。

在杜诗的内容评论方面，杨伦善于将诗所写的内容与时代背景结合，论述诗的主旨或杜甫所表达的思想，往往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杨伦评说《收京三首》（卷四）其三云："是时王师复两京，围安庆绪于邺城未下，故言方春必可平贼，正值樱桃荐庙之时，盖预期之也。但恐回纥恃功邀赏，诸将僭奢无度，将万方送喜之时，毋乃即圣躬焦劳之渐乎？盖忧虏横臣骄，复成蹂躏跋扈之势。厥后边方猾夏，藩镇擅权，果如所料。公之有远识如此，而语意仍含蓄不露。"评说认为这首诗的基本思想是"忧虏横臣骄，复成蹂躏跋扈之势"，完全符合杜诗的原意。这由浦起龙所注"毋乃圣躬劳"可以佐证。蒲注："晋羊祜既请伐吴，乃曰：正恐吴平之后，方劳圣虑耳。意与此同。非无使君劳之谓。"这样的解释很透辟，引导读者从诗中领略杜甫的政治卓识与远见。《观兵》（卷五）杨伦评说云："是时屯兵邺城，军无统制，公早其有覆败之患，故借所见嗣业之兵以发之。"邺城之战是唐王朝

与安史之乱军决战的重要战役，杜诗借观兵对当时的战争态势和战略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杨伦的评说揭示了诗的隐微含义，有助于读者把握诗的精神。杨伦评说《伤春五首》（卷一一）云：“激昂慷慨，亦复悱恻缠绵，与《有感五首》并见才识忠悃，此皆杜诗根本之大者，学者所宜着眼。”特别强调所表现的政治见解与才能，所表现的忠君爱国，认为这是杜诗最伟大之处，这是对杜诗的总的评价，也指示了杜诗研究的根本方法。《有感五首》（卷一一）杨伦评说云：“所言皆当时大事要著，足补国史所未逮。公生平自许稷契，良非虚语。”“诸诗多为藩镇作。藩镇之祸，始于仆固怀恩，而唐遂失河北，下逮五季，兵火相寻，五诗见其端矣。”评说极好，真正抓住了杜诗的关键。藩镇之祸是自中唐开始的重大政治问题，而杜甫自其萌芽时就加以关注，确实表现出非凡的政治眼光与智慧。杨伦的评说非常深刻。

在诗的艺术评论方面，杨伦善于以自己对诗歌创作的感悟和诗歌理论，评论杜诗高超的艺术方法和独特的艺术技巧，往往具有新意。杨伦评说《无家别》（卷五）云：“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苕华》《草黄》之哀，不是过也。乐天《古乐府》《秦中吟》等篇，亦自此出，而语稍平易，不及杜之沉警独绝矣。”对杜甫随意立题，写时事的诗的创新和巨大意义，论述全面而精到。杨伦评说《剑门》（卷七）云：“以议论为韵言，至少陵而极，少陵至此等诗而极。笔力雄肆，直欲驾《剑阁铭》而上之。”指出这首诗的最大艺术特点就是以议论为诗，并认为它达到以议论为诗的极致，其艺术成就似乎超越了张载的《剑阁铭》。评论可谓独具慧眼，而又恰如其分。杨伦评说《野人送朱樱》（卷九）云：“托兴深远，格力矫健，此为咏物上乘。”“开手击此动彼，入后一气直下，独

往狂来，小题具如此笔力。”评论认为这首诗有两大艺术特点：一是运用比兴，由野人送樱桃写到皇帝赐朝官樱桃。表现了杜甫的忠君之情和漂泊之感；二是由野人送樱桃写到皇帝赐朝官樱桃，联想转换自然，有变化而又一气呵成。评论突出杜诗以小见大、善于兴寄的高妙的艺术才能。

《杜诗镜铨》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所有的研究，无论是注释、解说，还是评论，都符合杜甫的原意。杜诗研究历来存在一个大问题，就是有太多的穿凿附会。后代的研究虽然革去前代的一些穿凿附会，但又重新陷入新的穿凿附会。清代的杜甫学仍有不少穿凿附会的东西。杨伦深知穿凿附会对杜甫学的危害，因而力戒穿凿附会，力求回归杜甫诗意的本真。他说：“孟子说诗，贵于以意逆志，但通前后数十卷参观，自能见作者立言之意。浦解好为异说，故多穿凿支离。拙解不为苟同，亦不喜立异，平心静气，唯期语语求其着落，庶少陵于千载之上犹如晤语也。”（《杜诗镜铨·凡例》）他又说：“窃谓昔之杜诗，乱于伪注，今之杜诗，汩于谬解，多有诗意本明，因解而晦，所谓万丈光焰化作百重云雾者。自非摧陷廓清，不见庐山真面目。”（杨伦《杜诗镜铨·自序》）所谓谬解，绝大多数都是穿凿附会。研究文学，尊重作家的原意，这是起码的要求，也是崇高的要求。这说来简单，要做到还真不容易，但必须做到。穿凿附会，无异于痴人说梦，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杨伦把符合杜甫原意作为研究追求的目标。“今也年经月纬，句栉字比，以求符合作者之意，殆尚所云镜象未离铨者。”（杨伦《杜诗镜铨·自序》）实际上，杨伦是实现了他“符合作者之意”的追求的。做到这一点也是很了不起的。咏物诗是研究者最容易滋生穿凿附会的地方，杨伦也能避免。杨伦解《江头五咏》（卷九）云：《丽春》：“此公自喻竞进者多，已独耿介自守，不移其性，故人之知公者少也。”《栀子》：

“此公自伤以有用之才而孤冷不合于时，甘自老于江湖也。”《鸂鶒》：“此公自喻失位于外，无心求进，有留滞之叹，但当安于义命也。”《花鸭》：“此公自喻以直言救琯外斥，唯恐易招世忌而欲有心韬晦也。”这五首都是咏物诗，杨伦所解似嫌太胶固，太实。然诗的字里行间确实有兴寄，杨伦所解大致符合杜甫的本意。虽然并无直接的证据说杜甫就是这样想的，但也没有证据说杜甫就一定不是这样想的，完全可以说是一家之言。学术允许这样的研究，也需要这样创造性的研究。

总之，《杜诗镜铨》是清代一部重要的杜甫学著作，简洁明白而又广雅博洽，集诸家之长而又有鲜明个性，妥帖平实而又有所发明，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三　翁方纲

一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又号苏斋，大兴（今北京）人。乾隆壬申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司业，累至内阁学士。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四年，左迁鸿胪寺卿。翁方纲是著名学者，读群经，有《书》、《礼》、《论语》、《孟子》诸书的《附记》，并为《经义考补正》。尤精金石之学，著《两汉金石记》。其著作尚有《复初斋全集》、《礼经目次》、《苏诗补注》。其杜诗研究著作为《杜诗附记》。翁方纲又是著名诗人，所为诗，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其中，论者谓能以学为诗。

二

翁方纲一生对杜诗的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其研究杜诗，可以说自幼开始。大致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少年与青年时期。他大量阅读杜诗和有关注释与研究著作，研读杜诗三十余遍，但心得不多。不过这使得他对杜诗烂熟于心，对日后的研究极有好处。第二阶段是青年（二十多岁）至晚年时期。他抛开前人的研究，独辟蹊径，进行独立研究，完成《杜诗附记》。他的《杜诗附记》云："余幼而从事焉，始则涉鲁訔、黄鹤以来诸家所谓注释者，味之无所得也。继而读所谓千家注九家注，益不省其所以然。于是求近时诸前辈手评本，又自以小字抄入诸家注语，又自为诠释，盖三十余遍矣。……一日读山谷《大雅堂记》而有会焉，曰：诸先生之论说皆胜语耳。于是手写杜诗全本而咀咏之，束诸家评注不观，乃渐有所得如此。又岁余，而徐徐附以手记，此所手记又涂乙删改，由散碎纸条，渐积写于一处，甲申乙酉以后，按试粤江，舟中稍暇，录成一帙，后乃见吴下有专刻杜诗全文无注释之本，便于携阅，庚戌以后，由阁庁事每于待票籤未下时，当午无事，则以此本复核如此者又十年。"（《杜诗附记自序》）门人梁章巨云："研精覃思，前后凡三十年始成此册。嗣后意有所得，随时点定，又三十余年，至晚岁重加装池。"（《杜诗附记后记》）可以说，《杜诗附记》是翁方纲一生杜诗研究的硕果，也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

三

学术在创新中发展。翁方纲的杜诗研究角度和用意很新。他研究杜诗，就是要通过对杜诗的分析，探讨诗的基本原理，也就是探讨杜诗所以超越其他诗人的根本奥秘。《杜诗附记自序》云：

“其中用事人所共知者不复写入也，其事所系，其语所出，苟非实有关于此篇笋缝节族者，概弗录也。且吾所欲读杜者何为也哉？非欲考史也，非欲缀缉词藻也，唯欲知诗之所以为诗而已。”杜诗正是“诗之所以为诗”的绝佳范本，翁方纲就是要通过剖析杜诗，诠释诗之所以为诗的根本道理。

从宏观上说，翁方纲论诗主张真和正。他认为真是诗的灵魂，作诗只有真，才有艺术生命力。在真的同时，也就得艺术之正，包容各种艺术风格与技巧，形成海纳百川之势，这样，艺术也就达到了超越寻常的境界。杜甫的诗所以伟大，是他的诗达到了全面的真与彻底的实。翁方纲云：“言者心之声，心之声则人之全体具见焉。岂有以迷离惝恍则真者乎？岂有以奇特超悟见真者乎？奇特超悟偶一见之则称善有之，未有时时处处以变眩为主者也。……读杜诗则句句见真，步步皆实地也。由此可以理学业，可以定人品，即以诗言，可以加膏沃，可以养笔力才藻，即所谓羚羊挂角，三昧之旨，亦必从此得之，此乃八面莹澈之真境也。苏诗之酣放，本极精微，然已不能如此矣。是故专学韩则每有意于造奇，学白每有意于闲旷平直，学李太白每有意于超纵，学李义山每在意趋藻饰。即使专主王韦三昧，亦每在意存冲淡，凡专立一路者，其路非不正也。然而意有专趋，则易于渐滋流弊，未有若杜之得正得真者。……必如李义山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此方是善言李杜者。”（《李杜附记自序》）认为杜诗最真最正，这是翁方纲对杜诗的总体评价，也可以视为翁方纲论诗的最高指导思想。

翁方纲认为，杜诗的突出特点是博大精深，无所不包。首先是内容极为丰富。在一首诗中，往往是上下古今无所不有，小中见大。内容的极大丰富，决定了艺术的极大丰富。因而杜诗在艺术上无所不有，巨刃摩天，又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水槛》

（《杜诗附记》卷一一，以后略去书名），翁方纲云："如此一小题而其中古今上下无所不有。"《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卷二〇），翁方纲云："阻水疗饥却自括入时事，古人诗不苟作如此。"《返照》（卷一三），翁方纲云："尝取《剑南集》中痕字之句集抄观之，以为放翁善用'痕'字也，至杜公此篇，则村失魂招，无一不摄入，昌黎谓'雷硠''巨刃'，斯其至矣。"《舟中夜雪有怀卢十四侍御弟》，翁方纲云："阮亭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者，岂必尽于三昧诸家得之乎？杜公之大，已自无义不包矣。"丰富而深刻重大的内容、无所不有的丰富的艺术表现方式，使杜诗远远超越一般的诗作。

在具体评论杜诗时，翁方纲则着重剖析杜诗的意境构成和篇章构成的艺术。《杜诗附记自序》云："篇中情境虚实之乘承，笋缝上下之消纳，是乃杜公所以超出中晚宋后诸千百家独至之诣，凡有足以窥见下笔之深秘者，苟可以意言传之，则岂有灭尽线迹者哉？"可以说，探求"情境虚实之乘承，笋缝上下之消纳"，是翁方纲探求杜诗奥秘的两条基本途径。

翁方纲认为杜诗最有实境，肯定了杜诗伟大的现实主义特色。而杜诗的过人处还在于它能将实提入虚，或将虚坐实。即将现实的东西升到理论的高度，或将理论的高度联系到具体的现实中。《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卷一一）云："诗至于杜，句句字字皆真实境会也。敖器之谓白乐天如山东父老话农桑，事事言言皆着实，然杜公已具此理，特更超浑耳。"这就是说，杜诗的情境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所谓"特更超更浑"，是杜诗的情境（即意境）超越了一般的现实主义，比现实本身更真实，更广阔，更深刻，更具有认知性。《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卷三），翁方纲云："结句面面俱到，而却是实事，所以为史也，读《春秋》当知此意。"特别强调杜诗对虚实结合的运用。《水槛》

（卷一一），翁方纲云："扶颠何谓乎？岂谓救房琯耶？笔笔是提向空处，而笔笔坐落实地。"翁纲方认为，杜诗不是一般的实，即不是单纯的实，而是由虚入实，或由实入虚，这样的虚实结合，才是情境的极高境界。

但虚不得奇怪，要正，一奇怪就不实了，也就不正了。翁方纲认为杜诗都是质实的，没有奇怪的东西，而《凤凰台》因为结尾近诞，本来非常尊崇杜甫的翁方纲，也不禁有所批评。《凤凰台》（卷六），翁方纲云："此诗后半未免滞而近乎诞矣，非诗之正也，岂得为杜曲致解说乎？然虽如此，在杜固非其至者，即以诗理言，亦非诗之正也。究竟通合纪行诸篇，皆即景质实，而独此间偶借题忽发奇想，亦是文章随地之变。韩子之文约六经之旨，起八代之衰，而自命怪怪奇奇，杜则无一笔涉怪奇也，只有《秦州纪行》中间偶一写之，正亦未容深泥耳。"翁方纲反对想象，反对浪漫主义，故而对杜诗的浪漫主义也进行了批评，这个批评完全是错误的，反映出翁方纲文艺理论褊狭胶固的缺陷。他过分重实，近乎死板。

翁方纲在论诗重实的同时，也重气。所谓气就是元气、正气，也是气象、气势、力量。《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卷二）翁方纲云："坡公固云万象摄入牟尼珠，然安能以杜之吸入众景运实入虚耶？其妙在'元气'二句已包摄尽矣，所以野亭渔翁，水鸟湘竹，色色玲珑，无不出神耳。"杜诗直接用"元气"，故诗也元气充盈。由此可见，杜诗中实与虚的结合，产生出巨大的元气。翁方纲认为评诗首先要看元气，只要有巨大的元气，就不必拘泥诗的形式和技巧的细节。《恨别》（卷七），翁方纲云："浩浩乎元气鼓荡而行，更不必以第一句第七句之平仄互换为呼吸矣。"《建都十二韵》，翁方纲云："杜五排到此篇，纯是血泪，所谓浩然之气塞乎天地之间者，岂得以句字之平仄音节求之？然

即以一三五字乘除翕阖之理言，亦极正变起伏出没神化之能矣。”杜诗的元气是正义的精神，正义的巨大力量，同时还有艺术所产生的力量。正是内容与艺术巨大的合力，形成杜诗的浩浩元气。这种浩浩元气也就是杜诗情境所产生的艺术感染力。所以翁方纲云：“先生之境之真，诗力之厚，所以凌跨百代者也。”（《杜诗附记》卷一一《桃竹杖引赠章留后》）

在虚实之外，翁方纲非常重视对篇章结构的研究。他认为杜诗有天然章法，也有奇特章法。《乾元中寓同谷县作歌七首》其六（卷六），翁方纲云：“木叶一联，看其对法，此于第六歌中便已办得结束矣，溪壑回春，天然章法。”《建都十二韵》（卷七），翁方纲云：“江剑田园，青蒲翠竹，皆不必与长安关辅相关照也，而神理自然关注，《三百篇》之后，子史文集皆罕此杰构。”《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进》（卷一四），翁方纲云：“专叙射雁一事，亦史迁法也。又‘迴翠麟’乃插入之笔，若无此句，则如马谏猎诸句皆无根矣此种健笔，岂以阮亭之讽而减格哉！”这些对于杜诗句法章法的分析，是很独到的。

翁方纲还分析了杜诗的节奏、音节、韵，很多分析都是很新颖的。《最能行》（卷一三），翁方纲云：“前篇结句以不对承对句，此篇结句以对句承不对，皆自然之节奏。”《白帝》（卷一三），翁方纲云：“浩浩乎直以淋漓雨气为之铿锵节奏，故是骚些竹枝篇法也。”这是比较早的用“节奏”这个术语来论诗，很新鲜。具体的评论也很有见地。翁方纲认为平仄音节与诗的章法有联系。《水宿遣兴奉呈韦公》（卷一八）翁方纲云：“‘璋’字必仄，是转，是开，是接，读者须于此参悟章法。此在全篇内为才过前半，而此句第三字平，第四字仄，合之末句‘老’字以仄收者，愈见章法之迴合也。近日杭人翟晴湖误读此句‘琏’为平声，反谓杜公误用，盖不知诗中音节为章法所关耳。”翁方纲认

为杜诗用韵的转换与篇法、段法有密切关系。《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卷二〇），翁方纲云："韵之转换与篇法段法乘承比伍，熟读此篇，思过半矣。"这些研究是很细致的，也是很新颖的。

翁方纲研究杜诗，是从他的肌理说出发的。他在《杜诗札记》中常用"理"这个概念。《杜诗附记·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更提出"杜公诗理"（卷二〇）。可以说，《杜诗附记》就是用"肌理"来阐发杜诗的诗理。而反观翁方纲肌理说形成的渊源，应该说其间有杜甫的重要影响。杜甫本来就是讲"理"的，"熟精文选理"所重的那个"理"，与肌理有某些相通。杜诗"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丽人行》），更有"肌理"之说。虽然我们不能说翁方纲的"肌理"来自杜甫的"肌理"，但其间有审美的共性，故不能仅视为巧合。而论人美讲肌理，论诗也讲肌理，在翁方纲肌理说的形成过程中，他从杜诗中汲取过大量营养，有着深刻的诗歌理论感悟。因此，我们认为，没有杜甫的长期深入影响，翁方纲的肌理说可能不完全会是现在的样子。而在翁方纲用肌理说来研究杜诗的时候，他又受杜诗的影响，丰富和提升了自己的肌理说理论。翁方纲说"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其实际"（《延辉阁集序》，《复初斋文集》），"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又说"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蛾术篇序》），"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词未可判为二途"（同上）。他论诗虽有以学问为诗的倾向，而究其根本，却是主张诗要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无所不有，又要有正确的思想，符合儒家经典。他的这种诗学理论和主张，在《杜诗附记》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完整。因此，换一个角度说，《杜诗附记》是翁方纲对自己诗学理论的全面运用与阐发，是对肌理说的全面诠释。而且表现得比翁方纲别处的论述似乎更有高度，也更有广度。

翁方纲还非常重视杜甫学的文献研究，取得了独到的成就。《杜诗附记》有考证和辨释，很有水平。《东屯月夜》（卷一七），翁方纲云："杜诗'轻云倚细根'，注家率以云生于石解之，盖因诗家多以石为云根也，或遂引张景阳诗'云根临八极'句以证之，又以杜公拆用'云根'二字甚新，此皆妄说，不可从也。按诗家相沿，多以石为云根者，如宋孝武诗'积水溺云根'，李义山诗'江风吹浪动云根'，此自指石言。至于张景阳诗'云根临八极，雨足洒四溟'，解之者曰'八极之云是雨天下'，其非言石明矣。'云根'者，即谓云起之处耳。杜诗亦屡用云根。……此诗题是《东屯月夜》，则月是题之正位，此二句正接上'月'字来，曰'乔木澄稀影'，'稀影'非他，即乔木之影也。曰'轻云倚细根'，'细根'非他，即轻云之根也。"澄清历来关于云根注释的错误，对云根作了正确而细致的解说。《杜诗附记·题张氏隐居二首》引王文简《居易录》认为"曲阜县东北有石门山，即杜子美《题张氏隐居》所谓'春山无伴独相求'，《刘九法曹郑瑕邱石门宴集》所谓'秋水清无底'者是也"，"山南有两小阜，俗称金耙齿、银耙齿者。子美诗'不贪夜识金银气'句，盖偶然即目耳。非身历其处，固不知也"。考证清楚而详细，有益于研读杜诗。

翁方纲非常重视杜诗的版本校勘。《杜诗附记自序》说《杜诗附记》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而第一方面则是"古体之编次，如宋椠某本下略有次第可见者，如句字以诸本参合者，更宜精其剖择也"（另一方面是探求杜诗所以为杜诗，已论述如上），足见翁方纲非常重视校勘。《杜诗附记》校勘记有多条，条条都非常精彩。这些校勘记不仅用版本比勘，列出异文，同时用自己渊博的学识进行取舍判断，是非分明。翁方纲有正确的校勘理念，他主张不迷信石刻和古本，而是对校勘的材料具体分析，主要根据

诗的文意定是非。《哀江头》（卷二），翁方纲校："杜诗'一笑正坠双飞翼'，'正'吴作'笑'，别本作'箭'，蔡君谟作'发'。"《附记》云："'一笑'既与'翻身'相对，又与'明眸皓齿'相生。其作'一箭'者，乃适与'带弓箭'相复耳。作'一发'则更无谓。"《酬孟云卿》（卷四），翁方纲校云："'移官运至尊'，'远'一作'岂'非。"附记云："'远'自伤违君侧也，作'岂'字者谬矣。人臣唯君所使，若迁谪果由于君意，遂可怨望耶？此等版本悖理伤教，学者所当辞而辟之，不特文义欠通而已。"《小寒食舟中作》（卷二〇），翁方纲校云："'娟娟戏蝶过开幔'，'开'一作'闲'。"附记云："'开幔'正承隐几来，亦正承看花来，此犹言开幔而蝶过也。若作'闲暇'之'闲'，则此处无着。"从内容、文义来判断是非，非常有力。在异文多可通的情况下，则不下判断，或虽下判断，而其他字亦可参考。《杜诗附记·喜雨》（卷一二），翁方纲校："杜句'佳期赴荆楚'，'赴'一作'付'。"附记云："'付'字亦正可相参。"《西郊》，翁方纲校："杜诗'无人觉来往'，旧作'竞'，一作'与'，荆公定作'觉'。"这样处理校勘，态度严谨，方法科学。

学术离不开学者之间的商榷与评论。翁方纲对一些重要的杜甫研究学者也进行了评论。对王士禛的评论最可注意。他认为王士禛是清代杜甫研究的极有见解的学者，往往能发杜诗的奥秘，但由于王士禛论诗主神韵，并不能完全理解杜诗的博大精深，所以很多评论是错误的。《杜诗附记自序》云："始于诸家评语慎择之，惟新城王渔洋之语最发深秘，乃遍摭其三十六种书，手抄一篇，题曰杜诗话，自以为有得矣。然而渔洋之言诗，得诗味矣，深绎而熟思之，此特渔洋之诗耳，非尽可以概杜诗也。"《八哀诗》（卷一四），翁方纲云："《八哀诗》，渔洋诗话竟评其冗杂不成章，又以嗅吃语目之。盖渔洋于诗专取轻圆俊利之句，于杜法

无当也。如是，则《三百篇》变雅中亦颇似多后人不可尽晓之句，又当如何?”《舟中雪夜有怀卢十四侍御弟》（卷二〇），翁方纲云：“阮亭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者，岂必尽于三昧诸家得之乎？杜公之大，已自无义不包矣。”论述王士禛的杜甫研究成就和得失缘由，都客观公正，合情合理。他还批评王嗣奭《杜臆》关于杜诗版本文字的说法有很多错误，对于仇兆鳌盲从《杜臆》也进行了批评。《催宗文树鸡栅》（卷一三），翁方纲云：“《杜臆》谓旧本颠错，移‘踏籍盘按翻’句在‘终日’句上。移‘课奴杀青竹’句在‘塞蹊’句上，移‘避热时来归，问儿所为迹’二句在‘我宽’上。仇本从之。不知‘踏籍盘按’正接上句‘憎’字也，‘织笼曹其内’正接上句‘问儿所为迹’也。此所谓‘一一当剖析’也。‘不得’二字，直贯下‘稀间’二句，则‘我宽彼免变’接更从容不迫耳。岂有此间插入‘来归’‘问迹’二句之理耶?《杜臆》之不可信，往往如此，仇本妄从之，而外间学人或有执以为说者，故不可以不辨。”翁方纲的批评甚为有理，版本校勘非王嗣奭所长，故多曲说。他还批评朱鹤龄注释错误。《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卷一），翁方纲云：“谢灵运拟阮瑀诗：‘蹑步凌丹梯。’注：丹梯，陛阶也。又《游敬亭山》诗：‘即此凌丹梯。’注：谓山也。朱鹤龄曰：‘二注不同，当从前说。’方纲按，朱说非也。此句上承鸿宝，下接淮王孙登，则此丹梯正谓登山耳。”其说甚是。

翁方纲是清代一位重要的杜甫学家。他的杜甫学成就斐然，颇具特色。然而也有明显的不足。翁方纲大约是为了研究有新意，刻意避开杜甫学一贯的一些重点与热点，如杜甫其人、杜诗的思想内容，这本无可厚非，但却使他的研究成果显得不那么完整，也觉得分量不沉。研究中，往往过分重视诗的所谓关键部位，“笋缝簇节”，有点目无成竹，所见难免褊狭，论述不够大

雅。解说杜诗时，有些地方说得太玄。如《望岳》，翁方纲说："'夫如何'三字，乃是从下句倒卷而出，'夫'字即坐实岱宗如何者。"（《杜诗附记》卷一）"夫"字不过是语助词，将疑问句化为陈述句，说它"坐实岱宗如何"，有点莫名其妙，不着边际。我们的批评近乎有意挑剔，而所得也不过是微瑕，更表明翁方纲杜甫学成就的特出。

一四　潘德舆

一

潘德舆（1785—1839），字彦辅，又字四农，山阴（今江苏淮安）人。为人至孝，父咯血，割臂肉和药进。对祖母孝敬弥至。抚寡妹嗣子，教养尽二十年。一生信奉儒家思想，"尝以挽回世运，莫切于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经术"（《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传·潘德舆传》）。道光八年，举江南乡试第一，座主侍郎钟昌对人说："四农乃吾师也。"潘德舆以知县分安徽，未到官卒。著有《养一斋诗文集》二十六卷，《札记》九卷，《诗余》一三卷，《诗话》十三卷。潘德舆是清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对杜甫非常崇敬，一生研究用力甚勤。他在充分吸收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可称为一位集成式有创新性的杜甫研究学者。

二

古代品评人，首先是看思想品德，儒家尤其如此。潘德舆研

究杜甫，也是通过对其著述与行迹的研究，对他一生进行评定。根据儒家品评人物的标准，潘德舆对杜甫作了极为崇高的评价。他认为杜甫有救世之心，有经邦济世的伟大才能，可惜不为世所用，故将其思想表现在诗中，而成为最伟大的诗人。其出处与孔孟合，是一位圣人。他说："赵氏次公曰：'杜陵野老负王佐之才，有意当世，而肮脏不偶。胸中所蕴，一寓于诗。'其曰：'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又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其素愿也。至其出处，每与孔孟合。'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则有迟迟去鲁之怀。'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则有皇皇得君之意。按杜公之诗，人之推服至极者，如秦少游以为孔子大成，郑尚明以为周公制作，黄鲁直以为诗中之史……王元美以为诗中之神，亦蔑以加矣。其为人，则《新唐书》本传云：'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数语亦简而核。然本传又谓'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则于杜公之经济出处，犹未之识也。考杜公诗，于国家之利病，军国之成败，往往先事而谋，援古而讽，无不洞中窾要。而其难进易退，去就皎然，亦何尝非'接淅而行''三宿出昼'之宗派哉！详见集中各诗，不及备述。赵氏只引二联，尚属挂漏。然断之曰'王佐之才''出处与孔孟合'，则信非溢美矣。故杜公祠堂，凡有数处。而鄜州学孔庙戟门，则祀子美。夫以子美之诗，抉经心，执圣权，以从祀孔子庙，不较胜于唐人之从祀何休、王弼哉？……黄氏彻曰：'东坡问：老杜何如人？或云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据此，则谥以文贞，其美尚有不尽者欤？"（《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虽然结论言辞闪烁，而所引的都是对杜甫的顶级品评，意思非常明显，就是推崇杜甫为孟子似的圣人。这是古代对君王之外的人所能做的最高品评。尽管前人也有隐隐推杜甫为圣人者，

但只是提出观点，很少论述。潘德舆荟萃众家极度推崇杜甫之说，加以详细论证，可以说达到历来推崇杜甫的极致。杜甫确实是历史上完全践行儒家思想的人，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思想也产生了变化，而像杜甫那样践行儒家思想的人，更显得可贵与令人尊敬。潘德舆推崇杜甫为圣人，是对历来尊杜说的总结与拓展，也符合学术发展的潮流。

杜甫所以伟大，是因为《杜工部诗集》。潘德舆认为，杜甫诗的价值就在于它表现了杜甫的“发乎性，止乎忠孝”，就在于杜甫把儒家思想运用得非常得体。潘德舆说：“苏轼曰：‘太史公论《诗》：《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以予观之，是特识变风耳，乌睹诗之正乎？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作。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而已矣。若夫发乎性，止乎忠孝，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与?’按少陵之诗，千古无不推奉，然至比之变风雅止矣，东坡更谓其为风雅之正，尤在‘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之上，非徒以大言伏世人也。‘发乎性止乎忠孝’七字，评杜实至精矣。荆公诗‘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又足为‘发乎性止乎忠孝’注脚也。”（《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尽管文章主要引苏轼的话，但却不是苏轼之言的简单重复，而是有所发展。潘德舆认为，忠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杜甫已将忠孝化为自己的性情，将忠孝化为自己的灵魂，因而杜甫这样的人所写的诗表现的也就是天然的忠孝、纯粹的儒家思想，这样的作品也具有造化般的力量。潘德舆的论说极为深刻，完全抓住了杜诗的本质，揭示了杜诗的魅力所在。

在学术上，潘德舆非常耿直。他虽然极度推崇杜甫，但认为杜甫还是有违背儒家思想的地方。他认为杜甫早年有些躁率，与

一些位高的小人交往；后来对一些失节的朋友，不能毅然断交，并为其辩解与惋惜。这些都是杜甫违背义理的地方。他说："总之，爱古人者当为其诤臣，不当为其佞友。少陵只以中允、司户文学绝人，遂成偏好。然文章本非性命，朋友究次君亲，此义偶疏，难为典训。故'食肉不知马肝，未为不知味'。学者不读昌黎上于襄阳、京兆李实等书，少陵赠张学士、鲜于京兆、哥舒仆射等诗，未为不知韩杜，而况《赠王中允》《送郑十八》等作，大有累于义理哉！别其繁枝，乃识孤松劲柏之成就非常处。此予之爱杜，而非予之谤杜，深于诗者必知之耳。"（《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批评非常严肃，但又有分寸。从儒家角度看，事关大是大非，批评是完全应该的，很有意义。在整个杜甫研究过程中，像这样剀切的批评非常少见。潘德舆这样批评杜甫，是防止不符合儒家思想的部分产生消极影响，从而让杜甫的诗更好地宣扬儒家思想，其目的完全是为了维护儒家思想。

潘德舆非常重视对杜甫艺术性的研究，有很多创造性的见解。

首先，潘德舆发展儒家的诗有六义之说，认为杜诗艺术的最大特点，是善于运用比兴，表现自己的忠君爱国思想。他说："李氏纲曰：'王者迹息而诗亡，《诗》亡而《离骚》作。《九歌》《九章》之属，引类比义，虽近乎俳，然爱君之诚笃，而疾恶之志严，君子许其忠焉。汉唐间以诗鸣者多矣，独杜子美得诗人比兴之旨，虽困踬流离而心不忘君，故其词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节，非止摹写物象风容色泽而已也。'按作诗当先辨六义。《风》《雅》《颂》，朱子谓之三经，赋比兴朱子谓之三纬。三代以后，《风》《雅》《颂》之体不可摹袭，而赋比兴，则作者之性情触物流露，虽无风雅颂之貌，而实风雅颂之心也。作诗若有赋而无比兴，则诗心凋丧，而去风雅颂益远。唯子美以志士仁人之节，阐

诗人比兴之旨，遂足为古今冠。学诗者熟玩《三百篇》之比兴，而子美之真心不难求，大节不难见矣。”（《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潘德舆论述的核心是比兴。他所说的比兴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内容方面的，即所谓“比兴之旨”，其含义即相当于陈子昂所谓的“兴寄”（《与东方虬论诗书》）、白居易所谓的“风雅比兴”（《与元九书》）；二是艺术方法方面的，即“作者之性情触物流露”，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形象化的方法。他认为杜甫超过一般作者的地方在于，站在儒家立场上，运用各种比兴的形象化的艺术手法，敦厚深沉地表现思想感情。他认为杜甫真正实践了儒家六义之说，得六义之实。

其次，认为杜诗的艺术技巧无所不有。潘德舆说：“范氏温曰：‘老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类如此。使其皆工，则峭急无古风，如李贺之流是也。’又曰：‘齐梁诸诗人，以至刘梦得、温飞卿辈，往往以绚丽风花伤其正气，由于理不胜而词有余也。杜公虽涉于风花点染，然穷理尽性，巧移造化矣。’按王敬美云：‘杜诗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丽句，有险句，有拙句，有累句，拙累不能为掩瑕也。抑知拙累正所以为古气哉！’陈后山云：‘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而杜子美之诗，工易、新陈、奇常莫不好也。’观此，则知诗不嫌拙。昔赵秋谷议渔洋、竹垞之诗曰：‘朱贪多，王爱好。’爱好则与拙字相反，故为渔洋诗病。范氏之言信当矣！然予考王氏琪曰：‘子美诗有近质者，如“麻鞋见天子”“垢腻脚不袜”之类，所谓转石于千仞之山，势也。学者效之过甚，岂远大者难窥乎？’屠氏隆亦曰：‘人谓少陵最可喜处，不避粗硬，不讳朴野。予谓老杜大家，言其兼雅俗文质，无所不有，是矣。乃其所以擅场当时，称雄百代者，则多得之悲壮瑰丽、沉郁顿挫。至其不避粗硬，不讳朴野，固云无所不有，亦其资性使

然，擅场正不在此。’此二则最平正无流弊。盖‘拙’字不可故避，致来‘爱好’之讥。亦不可目为擅场，但装拗语硬语，自许浣花衣钵，实堕小径旁门，如王元美所谓‘不画人物而画鬼魅’，柴虎臣所谓‘献古摹仿杜诗，多任心率笔，拙而无味，俗而伤雅’者也。范氏能知杜诗工拙相半，固为有见。但李贺、温岐刻划害理，其病正坐一巧。梦得优游，差胜两家。范氏并贬之，似太过。至谓‘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亦不尽然。杜有全首拙者，七言绝最多。全首工者，七言绝亦有之。他诗愈多。其工拙杂糅之作，诚更难仆数，终不得谓其篇篇皆如此耳。”（《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说，杜甫艺术的秘诀是根据内容运用技巧。只要内容需要，一切技巧都可以使用，包括那些不是技巧的技巧。没有内容所需要的技巧，就根据需要创新。潘德舆的论述含义非常丰富与深刻。（一）杜甫心中没有技巧的好坏与高低之分。一切技巧都根据内容的需要来设计，打破了人们传统的关于技巧的理念。（二）只要内容需要，一切已有的技巧可以运用，没有的技巧可以创造出来，这就打破了人们关于技巧框框，最广泛地运用技巧，充分创造技巧。（三）杜甫集历代诗歌艺术之大成，又敢于创新，技巧无所不有，无奇不有。

第三，认为杜甫最善于运用语言。语言含义丰富，表现力强，最有意境。潘德舆说：“朱子曰：‘杜诗佳处，有在用字造意之外者。唯虚心讽咏乃能见之。’按，薛文清公云：‘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可以形容有道者之气象。‘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可以形容各付物之气象。‘江山如有待，花鸟更无私’，唐诗皆不及此气象。此即朱子所谓‘佳处在用字造意外，虚心讽咏，乃能见之’者乎？……唯叶氏石林曰：‘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唯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不可以形迹捕诘。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

'有'与'自'两字间。而吞吐山川之气，俯仰古今之怀，皆见之言外。此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雍容闲肆，略不见其用力处。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仿用之，偃蹇狭陋，尽成死法，不知意与境会，出言中节，凡字皆可用。'此段议论，虽讲用字造意，而所见造乎象外，入其环中，可以参朱子之说，而痛砭今之专研《律髓》《诗眼》，至于病入膏肓者。"（《养一斋诗话》卷二）文学语言的最高境界，就是用精炼、准确、生动、优美的语言，创造艺术形象，来表现思想。杜甫最善于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杜诗最善于创造意境，也就是最善于创造形象，因而表现力也最丰富，最强。

"变化无方，境与天会"（《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可以看做是潘德舆对杜诗艺术总的论述。乍看起来，这个论述有点虚，有点玄，而事实上，杜甫的艺术太丰富，太高妙，经细细琢磨，只有这样的话语才能准确概括。潘德舆的论述有两层含义：（一）杜诗艺术方法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二）杜诗最善于创造意境，这种意境达到天然的境界，这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潘德舆的评论是独到的，非常能概括杜诗的艺术特质。

潘德舆学问渊博，思绪严密，善于考证。他对杜甫生平的很多重要事迹进行了考证。如杜甫一生的主要经历、杜甫救房琯、杜甫与严武的关系、杜甫非饫牛肉白酒而终。他的考证不仅在于弄清事实，不仅在于考证材料充分，论证有力，令人信服，更在于通过考证说明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批驳一些错误观点。潘德舆认为刘辰翁、江盈科对杜甫事迹不熟悉，又用鄙陋的心胸来看待杜甫，使杜甫形象严重扭曲变形。在用考证杜甫生平来驳斥二人关于杜甫生平的谬说之前，潘德舆先对二人研究理念与思想品格进行分析，说明造成二人研究错误的根本原因。潘德舆说："此君（按：指江盈科）论杜，与辰翁却相反。然予每笑辰翁之

论杜，与此君之论李，同是一副鄙陋心胸，而考之又不悉也。夫诗之为心声，枯菀穷通，皆可自见。今谓少陵之出群，由于东道之豪盛，已觉不成议论，又以得见丽人为少陵喜幸，此其鄙恶居何等乎？青莲奇气凌云，视爵赏如尘芥。今谓流窜夜郎以后，兴趣索然，此稍有气概者所不为，况倪荡如青莲者乎？就使少陵境遇称怀，亦不得谓诗人冠世，即由乎此。就使青莲夜郎以后诗篇少见，安知不由编辑零落，亦不得断其兴趣颓唐，而况皆不然哉！今详据杜公年谱，并核其诗以为证。”（《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提出学术研究不仅和研究者的学术水平有密切关系，而且也和研究者的思想品格有密切关系。尽管是针对刘辰翁和江盈科来说的，其实有着重要而广泛的理论意义。同时，这样说对探求二人在杜甫生平研究上的致误原由更全面。对杜甫与严武的关系，潘德舆也进行了新的考证。潘德舆说：“《新史》本《云溪友议》不足信，故鲁訔以严武镇蜀，章彝入觐证其伪。刘克庄云：‘世传严武欲杀子美，殆未必然。观子美哭严仆射诗云：“老亲如夙昔，部曲异平生。”极其凄怆。至列之《八哀诗》中，忠厚蔼然。’王嗣奭亦云：‘观公《九日寄严大夫》、严武《巴岭答杜二见忆》两诗，两人交情，形骸不隔，可知欲杀之讹。’‘观《八哀》中，“小心事友生”句，亦知武无欲杀公事。’以上诸说，皆足明严之未尝忮公矣。若公之凭醉登床，斥严家讳一事，《旧史》则贬之曰：‘性褊躁，无气度，恃思放恣。’《新史》则贬之曰：‘性褊躁傲诞。’此亦未免已甚也。”“然玩其语意，实是追念故交，且爱武之极，乃有此惊喜过望之词。以沉醉不检，故脱口触讳，本非不足于武，何‘褊躁傲诞’之有！是以武虽卞急，亦能略其形迹谅其心曲，而不以为衅，且待之加厚也。”“若常明黄氏，直以公之醉语，为疾恶刚肠，为孩弄严武，为不畏强御，此又于君子之过，从而为之辞者，鄙意殊不谓然。武本非恶人，公

亦未尝疾武，疾武亦不应醉中名武之父，以此为豪视八极，士之禔身接物，将何所不至也！故新、旧史书论公已甚之处，断不敢从，而黄氏之说，予不敢不辨之，以明学者身世间之常法焉。”（《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考证认为杜甫与严武友情深厚，很有说服力。同时对两唐书关于杜甫的错误记载与评论进行批驳，对黄彻的错误辩解也进行了辨析。（笔者认为史书记载杜甫说严挺之云云，亦是小说家言，不足信。潘德舆信之，使考证略显不足。）与严武的关系涉及杜甫的性格与人品，潘德舆的评论澄清了谬说，维护了杜甫的形象，有重要的意义。关于房琯的考证，是潘德舆所有考证中最精彩的。潘德舆诗话云：“予检杜公《奉谢口敕三司推问状》云：‘琯以宰相子，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必位公辅。陛下委以枢密，众望甚允。观琯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画一保泰，素所蓄积。而性失于简，酷嗜鼓琴，董庭兰今之琴，游琯门下有曰，贫病之老，依倚为非。琯之爱惜人情，至于玷污。臣不至度量，叹其功名未垂，志气挫衄，觊望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据此，则琯之罢相，自为琴工董庭兰事，与陈涛之败，了无交涉。盖陈涛之事，在前一年也。”“呜呼！观公《陈涛》之诗，则知公于琯无徇私讳匿之心。观公救琯之疏，则知公于国有爱惜人才之意。直笔忠悃，可质百世。故公之《谢推问状》云：‘陛下贷以仁慈，怜其恳到，不书狂狷之过，深容直臣，劝勉来者。’夫以肃宗震怒之余，而公之引罪曰‘恳到’，曰‘狂狷’，曰‘直臣’，亦可谓自信而不疑，果毅而有守矣。世人见琯素负时名，而谈释老，仿战车，名实不称，比之殷浩。不知琯于建议分藩外，如救王思礼，荐严武，颇能裨益帷幄。殷浩钓名之鄙夫，非其伦也。公救房琯之明年，琯为贺兰进明所谮，兼谮及公，同时贬谪。琯既功名不终，公亦羁旅以老，皆属时命，无可言者。然进明之杀张许，又谗房

杜，凶人之谗贼善类如此，持论岂可更扬其余焰而助之哉！李肇曰：‘宰相自张曲江之后，称房太尉、李梁公为重德。’司空图《房太尉》诗云：‘物望倾心久，凶渠破胆频。’刘克庄云：‘房琯虽败，不失为名相。’综是数说，琯之德望，岂易企及！若董庭兰依倚一事，考之朱长文云：‘薛易简称董庭兰不事王侯，散发林壑者六十载，貌古心远，意闲体和，抚弦韵声，可感鬼神。给事中房琯，好古君子也，庭兰闻义而来，不远千里。予因此说，亦可以观房公之过而知其仁矣。当房公之为给事中也，庭兰已出其门，为相岂能遽绝哉？赇谢之事，予疑谮琯者为之，庭兰朽耄，岂能辩释，遂被恶名耳。故房公贬广汉，庭兰诣之，公了无愠色也。’观长文所辩，房公诚不失为长者，而易简即为天宝时人，其言又信而可征也。然则董庭兰尚不足以累房次律，而房次律何足以累杜子美哉！”（《养一斋诗李杜话》卷三）学术界一直认为房琯被黜是因为陈陶兵败，而潘德舆则考证出直接原因是客乐师董庭兰。考证清楚细致，令人信服。古人有的认为杜甫救房琯是出于私交，几遭大祸不值。潘德舆则提出房琯为名相，杜甫救房琯是爱惜人才，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观点新颖，也符合事实，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杜甫。像这样既注重史实的考证，又重视进一步的思想与理论的探求与提升，比一般层面的单纯考证，具有更高的学术品位。

学术是一个最需要创造与个性的领域。只有具备充分的创造力与个性化，才能做出巨大的贡献。潘德舆作为清代中后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的杜甫研究具有鲜明的个性，具有突出的特点。

第一，强烈的儒家思想色彩。

在封建社会，儒家思想是统治思想，也是学术研究的统治思想，学者普遍用儒家思想研究杜甫。但唐以后，儒释道三家思想

逐渐混合，学术研究也存在儒释道三家思想逐渐混融的现象。潘德舆在学术研究中，特别是在杜甫研究中，力倡用纯粹的儒家思想来研究，反对混杂佛老思想。如评论李白，“朱子以其从容法度为圣，何等了当！杨升庵曰：‘太白为古今诗圣。’语据朱子，颠扑不破。而他日又谓‘太白诗仙翁剑客语’，何其仙圣之杂糅也。”（《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一）潘德舆的杜甫研究，具有比一般学者更浓的儒家色彩，表现在以下方面：（一）将儒家思想作为研究的唯一指导思想，不杂其他思想，将其他的思想作为异端加以排斥。（二）将儒家思想贯穿于研究的一切方面，贯穿于研究的始终。（三）研究目的是为宣扬儒家思想。客观地说，杜甫作为一位信奉儒家思想和践行儒家思想的儒者，也最适宜于用儒家思想来研究。用本家的思想来评价本家的人，一切都洞若观火。潘德舆的杜甫研究也有三大特点：第一，对杜甫的研究见解比较准确，也比较深刻。潘德舆的研究往往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单刀直入，颇中肯綮，特别是对杜甫思想与感情的分析，精辟深透。第二，胸襟高远。研究着眼于总体、大部，不注重细枝末节。就是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注意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阐明一些重要的问题。特别注意研究杜甫的思想与人品，研究杜甫对社会的态度，研究杜甫诗的倾向与艺术风格，研究各类诗体的特点，研究杜甫在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的地位。第三，给杜甫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杜甫有“王佐之才”，是孟子一样的圣人，是对古代高度尊杜的总结，是古代对人所能做的最高的推崇与评价。那么，潘德舆为什么如此推崇杜甫呢？其终极目的是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维护封建秩序，维护清朝的统治。然而，在潘德舆的时代，封建社会已是弊窦丛生，已处于山崩地裂的前夜。因而，潘德舆的杜甫研究多少带有卫道士的苦心，卫道士的色彩。“生于末世运偏消”，我们总感到他的卫道力不从心，无法挽狂澜于既

倒。

第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拓。

杜甫研究发展到潘德舆的时代，已是硕果累累。潘德舆非常重视前人的成果，也非常注意创新。正是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他取得了优异的成果。对待前人的成果，他用三种方式批判继承：（一）在批判前人的错误中，树立自己的新观点。（二）对前人正确的观点，或补充材料，或进行新的论证，使其理论更高，更完善，更缜密。（三）博采众家之长，形成新的完善的观点。关于前面两点，从上面有关潘德舆的引文已经看得很清楚，无需再引文证明。这里只想引一个例证来说明第三点。如何理解黄庭坚说的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如何理解杜诗的继承与创新？潘德舆说：“黄氏庭坚曰：‘子美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后人读书少，故谓杜韩自作此语耳。古之能文章者，直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陈言入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按《东皋杂录》云：或问荆公，杜诗何故妙绝古今？荆公云：‘老杜固尝言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予考‘破’字之义，张氏迩可谓‘识破万卷之理’，仇氏沧柱谓‘熟读则卷易磨’。愚以张氏为近之，唯其识破万卷之理，故能无一字无来处，而又能陶冶点化也。元氏遗山云：‘子美之妙，元气淋漓，随物赋形，谓无一字无来处可，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遗山之说，尤兼赅无流弊。今人诗非空疏则饾饤，未尝不读杜也，亦考遗山此说耶？又程氏棨云：‘韩文杜诗号不蹈袭者，然无一字无来处。’‘大抵文字中，自立语最难，用古人语又难，须是用古而不露筋骨。’王氏世懋云：‘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牛溲马勃咸成郁致。子美之后，欲令人毁靓妆，张空拳，必不能也。然病不在故事，顾所以用之如何耳。’愚以荆公、遗山、程氏、王氏四说互证山谷，前辈金针，殆已度尽。”（《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

单独看，王安石、元好问、程棨、王世懋四家的观点都正确，又都不全面。潘德舆巧妙地综合了四家观点，则深刻而全面。看起来都是别人的观点，综合看则是潘德舆的创新。可以说，潘德舆的一些杜诗研究成果，是对前人成果的总结与发挥，带有集成的性质。虽然他还称不上杜甫研究集大成的学者。

后 记

岁月真是比流星还快，从1999年申请四川省社科项目（又申请为211工程），至今日成稿付梓，竟长达十二年。坐在案前，心潮起伏，往事也历历在目。

拙稿的写作是艰苦的，因日常有繁重的教学工作和科研任务，既要保证教学科研的完成，又要写《杜甫学史》。常常是工作的时候牵挂着写书稿，写书稿的时候又牵挂着工作。节假日很多时候自然也要用到写书稿上，常常感到很累。杜甫学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资料都是善本，搜集起来非常费事。记得2003年暑假，赤日如火，大地似蒸，去杜甫草堂博物馆查阅杜甫集善本，并做笔记，历时一月有余，常处在似病非病的状态中，也真的病倒了两次。学术史的写作，看似单纯，实际上非常费事。稿子是按项目申请规定时间完成了，但自己看着总觉得不满意。于是自己为难自己，不断修改，至今日才算彻底完成。此刻，就像劳工放下肩头重担，感到身心都非常舒畅轻快。想十二年之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看窗外原来的小树如今已经高耸茁壮。心有所感，涌出一首小诗："光阴荏苒十二春，杜甫学史费精神。枝头啼莺浑似旧，天上浮云又变新。"

末了，我要衷心地感谢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杜甫草堂博物馆，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拙稿

写作和出版的人。因为关心和帮助的人太多，恕不一一记载致谢。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二〇一一年十月三日于四川大学华西新村